

目 录

一、为了第四国际 ₁	3
——《新国际》创刊词（1934年7月）	
二、共产国际的演变	12
——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文件（1936年7月）	
三、托洛茨基：一个伟大的成就（1938年8月30日）	34
四、第四国际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宣言（1943年6月）	39
五、欧洲成熟的革命形势和第四国际的当前任务	55
——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政治决议（1945年1月）	
六、只有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防止第三次 世界大战！	68
——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宣言（1946年4月）	
七、新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和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	98
——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1946年4月）	
八、世界局势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48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总政治决议（1947年11月）	
九、苏联和斯大林主义	175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	
十、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	227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纲（1957年10月）	
十一、关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的报告	252
——巴布洛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57年10月）	
十二、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的动力和前景	273
——杰尔曼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57年10月）	

附录:

- 一、巴布洛: 民主、社会主义和过渡纲领 (1959 年)..... 295
- 二、席尔瓦: 不断革命论概要 (1954 年 1 月)..... 305
- 三、古纳瓦达尼: 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
分歧 (1954 年 3 月) 329
- 四、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 (1959 年
7 月) 352
——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政治局
- 五、为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 全世界工人
团结起来 (1959 年 10 月) 357
——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第三次草案
- 六、争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 386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 (1961 年 6 月)
- 七、二十五年之后..... 416
——第四国际委员会宣言 (1963 年 7 月)

一、为了第四国际！

——《新国际》创刊词（1934年7月）

我们的这个期刊是在国际工人运动生活的最危急的关头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机器正在大家的面前土崩瓦解。从前，它却曾使整个一系列国家摆脱封建主义的落后状态，建立那种能使全人类享受高水平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庞大生产机器。在达到进步的最高峰之后，它现今正以极端危险的速度滚下一段陡峻的斜坡。当它上升的时候，它碰到了种种障碍，但它克服了那些障碍并且爬得更高。当它摔进那个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它注定要掉进去的深渊的时候，最微小的障碍都会使它受到最猛烈的打击。它遍体鳞伤，发出令人窒息的臭味，像一具腐烂的尸体散发那种毒化空气的气体一样。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一切堕落的和寄生的可憎特征都冒到表面上来，企图用垂死的挣扎避免为它的过期的死亡付出最后的代价。

从前曾经给予反动的封建和僧侣势力以革命的沉重打击的年轻强壮的资产阶级，已经达到龙钟衰老的高龄，它的生命要依靠恢复世界经济和政治中一切过时的、反动的势力并且同它结成联盟了。过去一度是进步的资本家阶级，如果不在一大半的世界上保存封建主义和农奴制度并在其余的世界上求助于法西斯主义的暴虐，就不再能够生存。资本主义从前依靠使它和社会摆脱共同敌人的羁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支持而获得胜利，现在却只能通过把它以前的同盟者的生活和文化水平降低到封建时代的水平的办

法来保存自己。

资本主义已经衰老无用了！它无法扩大人类的生产力——反而使生产力减缩了。它无法养活群众——它使他们挨饿。它无法使人民享受太平的生活——它驱使他们进行战争。它不再能够振振有词地维持它的统治地位——它只有用法西斯主义的刺刀来加以维持。

如果我们能够像冯·胡吞在他那个时代所说的那样，说这是一个宜于享受生活的时代，那只是因为我们在革命的时期，革命的胜利完成将开辟人类的新纪元。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东西的生产力在反抗着阻碍其达到最充分的发展的不合时代的桎梏。无产阶级时而盲目地、时而自觉地反抗它的剥削者。殖民地的奴隶们在反抗他们宗主国的压迫者。至少在阶级本身被消灭以前，任何人类的或自然的作用都不能消灭阶级斗争而不消灭社会，而这种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达到空前的尖锐程度。然而，除苏联以外，资本主义还占据优势。它非但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而使无产阶级遭到历史上最悲惨的一些挫折。

一方面是一种过时的社会制度，它暴露出本身内部存在着诞生一个新社会的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是一个在社会上已经发展到能够产生这种新社会的地步的无产阶级，虽然它还没有集合足够的力量来推翻旧社会。这个未知因数是非常出名的，并且可以用数学方程式的精确性加以证实：

历史曾经成功地把推翻资产阶级和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任务交给无产阶级的两个政党，但是它们已经彻底失败了。最初在德国，接着在奥地利、拉脱维亚和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像吸干了蛋黄和蛋白的蛋壳一样，一下子就被打碎了。（应当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在二十年之前就从政治上消失了；在它

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它也是同样的卑鄙。)

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全部历史正足以强调它的一切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即政党的不可缺少和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已经变成解决一切问题的总关键。阶级战争是由阶级军队来作战的。整个工人阶级——姑且不说它在居民其他部分中的必要的同盟军——显然并不具有牢固的同一性。它的许多阶层的觉悟程度各有不同，意识形态互不一致，并且在等级、宗教、民族、性别和年龄上利益也有种种差别。从它的队伍中出现的——但超越这些差别，因而能够克服这些差别——是它的先锋队，即革命的政党。党体现着无产阶级所积累的并提炼成它的革命理论的经验。它是阶级觉悟的宝库。它包含着最先进的、最有战斗意志的、最忠实的成分，把他们牢固地团结在经过考验的原则的基础之上，并用严格的纪律把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一个整体来说，不能直接地计划和指挥它的各个战役，正如一支军队的每一个排不能拟定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一样。对于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参谋部、一支先锋队——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军队中那样由上面硬派下来，士兵们无法加以监督和验证，而是依靠经过考验的能力和一致的赞扬从士兵中提拔上来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重要，因为敌人阵营中的力量已经高度集中，它的机动性大有增加，同时也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往往来得非常突然。这些都要求有一个深谋远虑因而能够预作安排的训练有素的、时时警惕的先锋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照耀着前面道路的探照灯才能做到深谋远虑，因为这个探照灯的强大电池完全是凝练的历史经验。

由于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党，工人阶级接连遭到了失败，到了1933—1934年，可怕的危机终于充分地暴露了现有组织的破产。

这两个党没有一个是由于德国或奥地利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某种越出常轨的情形而得到悲惨的结局的。它们的毁灭倒是可以溯源于它们各自的国际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这些理论的分类名称叫做民族主义机会主义。

现代的社会民主党是靠了它们各自的民族祖国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脱脂乳被养育长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对殖民地进行剥削而攫取的庞大利润变得十分强大和异常富裕之后，觉得有必要并且有可能腐蚀它们本国的整整一部分工人阶级，从而获得它的支持。社会民主党是以工人贵族、一个宽大的帝国主义所恩赐的一些改革以及中间阶级的各个阶层为基础的。它逐渐被吸收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把它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因此就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所干出来的令人不易忘怀的背叛行为，每一个党用血污的手卡紧另一个党的脖子，为它自己的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因此也就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在战后自发的革命浪潮有淹没资产阶级的可能时对资本主义国家所表现的狂热的忠诚。因此也就产生了像把葡萄酒和圣饼变成耶稣的血肉那样容易地和神秘地把资本主义逐渐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产生了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代之以同民主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保存资本主义的做法，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因此也就产生了两害相权求其轻——资本主义比布尔什维主义略胜一筹——的理论，即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铺平道路的理论。

使那些斯大林主义的党同社会民主党有所区别的，倒并不是它们政策的结果——双方的政策的后果都同样是灾祸性的——而是它们的民族主义的不同起源。斯大林主义的党不是在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井边而是在过去专门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水源所补充的

并边受到毒害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苏联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蜕化变质的表现。在苏联的利益和世界革命的利益之间，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天然的矛盾。然而，寄生性的苏联官僚机构的利益可以并且确实同世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概括的表述包含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之中。

苏联的官僚机构目光短浅地把暂时的现象看作永世长存，因而不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可能发生世界革命。既然官僚分子的一切思想中渗透着这种心理，他们就首先要捍卫俄国的领土完整，以便建设一个与其他国家隔绝的乌托邦。这个方针已经坚定不移地导致第三国际从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变为苏联边界的巡逻队。国际主义要求每一国家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民族主义意味着世界运动服从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利益。

不管它们的民族主义的蜕化变质在其起源和形态上多么不同，这种蜕化变质使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德国遭到了滑铁卢式的惨败。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存的那两个国际会土崩瓦解。一切错误和罪恶，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和不大引人注目的，都是从一个中心的源头流出来的。

历史和构成历史的种种事件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它们使我们有可能作出理论的概括并从中吸取教训。早期共产国际的伟大力量在于它从第二国际的崩溃中吸取了教训。

这两个国际的崩溃所提供的教训是：不是抛弃国际主义而是要恢复国际主义。并且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行动上。革命的国际主义必须是积极的和具体的。现在，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掀起第四国际的旗帜，努力不懈地使全世界的先进分子都聚集在旗帜的周围！

* * *

——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可是，如果我们先在每一个国家建立牢固的革命政党，然后在世界范围内把它们团结起来，这样的国际不是更好和更强大吗？

——亲爱的朋友，最近二十年人们已经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因此看起来似乎每一个人都一定已经懂得一些道理。但事情不能凭外表来判断。

如果不在同时努力不懈地积极从事国际的重建工作，你怎么能够在各个国家的范围内建立起“牢固的革命政党”呢？民族的革命政党像民族的党纲一样，早就是明日黄花了。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作为特殊的实体而存在的时期，只能有一个革命的政党——在每一个国家都设有支部的国际。国际不可能是各个民族党的单纯算术上的总计，也就是说，它不应当是这样。如果你在任何时候达到组织你的国际的阶段，你所得到的将是一个不像由若干不同的党组成的第二国际那样讨厌的组织，因为那些不同的党已经各自向分散的方向发展，它们爱护自己的“民族独立”，憎恨“局外人的干涉”。你打算退回到二十五年之前。我们却情愿向前迈进。

——可是，难道一定要在目前工人阶级队伍中发生极大混乱的时刻来组织国际吗？

——正是因为这一点。对群众是不应当玩捉迷藏的。革命的先锋队需要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现在群众很混乱，这是事实。他们之所以发生混乱，是因为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人告诉他们：第二国际好得无以复加；它是可以改革的，如果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如果不是明天就是……法西斯主义在更多一些国家获得胜利之后。他们正在被斯大林分子弄得晕头转向，因为这些人告诉他们说，第三国际昨天是对的，今天是对的，明天是对的，并且永远是对的。他们也被动摇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弄得莫知所从，因为这些人

编出一套话来欺骗他们，说什么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合为一体啰，说什么要组织另一个国际——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国际（真是满嘴胡言！），而是“第二和第三国际以外的所有好的政党”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安身之所的国际啰。第四国际可不会在工人阶级群众中制造混乱。它带给他们的，将是一柄光芒四射的利剑，这柄剑的剑锋可以刺穿那套谎言、欺骗和伪善，它的光芒将划破黑暗。

——可是现在谁需要一个第四国际呢？你们的力量很弱，这是一个连遭挫败的时期，甚至列宁都是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一年有半才组织了第三国际的。

——亲爱的朋友，你的论证没有随着时代的转移而有所提高。列宁宣布有必要建立新的国际，即第三国际，不是在俄国胜利之后，而是在1914年8月的最黑暗的反动日子里。1915年他在齐美尔瓦尔得竭力反对那些像你一样认为“我们人数过少”因而“现在尚非其时”的人们。一年以后在昆塔尔，他的百折不挠的态度已使新的和更大的力量转到他的这方面来。共产国际的基础不是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而是在四年以前奠定的。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的斗争，正如争取在每一国家重新建立新的党的斗争一样，不能再拖延了。它正像阶级斗争本身一样不能迁延时日。在我们看来，国际并不是像考茨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和平时期的而在战时不起作用的工具。那是当年他的国际的实际情况。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参谋部，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像军队一样，总参谋部就在战争结束时实行复员，或使其职能大大地受到限制。但是我们的阶级战争还远没有结束。

——可是那些过去赞成新国际的人不是有些已经开始动摇了吗？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这对他们来说只有更糟；对那些采

取同样方针的人只有更糟。并不是所有那些最初参加列宁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人都是能够坚持到底的。有些人心里逐渐有了意见，有些人离开了，还有一些人甚至叛变到敌人方面去了。可是不要根据表面的现象来作出判断。今天动摇分子关于他们以前信誓旦旦的第四国际窃窃私语或在口头上根本没有什么不满的表示。他们要想“争取”特兰梅尔的挪威工人党和布罗克威的独立工党的“群众”。用什么方法呢？安坐不动。明天，当特兰梅尔之流已经走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时，如果特兰梅尔的现在的追随者从中吸取了必要的教训，那肯定不会是这些动摇分子的功劳。可是，当他们采取行动并抱有这种决心的时候，他们将格外坚决地同那些始终不懈地为第四国际奋斗的人们携起手来。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叫做第四国际，干脆叫做新国际呢？

——词儿含有一种意义，或者说它们应当含有一种意义。第四国际——这意味着所有新的共产党和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第二国际意味着社会改良主义的一切变种。第三国际意味着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中间主义。可是，另外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想要弥合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想要使二者合而为一。他们需要一个第二半国际、一个供政治上无家可归的人容身的家、一个夜店，以便等群众中的风暴刮过以后，他们可以太平平地重新回到第二国际去，像他们于1923年在汉堡所做的那样。

第四国际？这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用语。这是一个战斗纲领！它意味着对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誓死搏斗。它意味着对叛卖的社会改良主义、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一味怯懦地实行妥协的形形色色的中间主义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它意味着无条件地努力保卫苏联，因为当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分子不加斗争地让第一号反苏头子希特勒执掌政权时，他们置苏联于为

德国所控制的危險境地。它意味着爭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爭取工人阶级最后胜利的斗志昂扬的斗争。

为了第四国际！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我们这个期刊决心加以保卫的清白旗帜。在像我们现今正在经历的这样一种时期里，某些方面的人们养成一种风气，总想在除了可以找到原因的地方之外的一切角落去寻找失败和反动的原因，除了其根柢以外的任何地方去探索根源。应当责备的不是国际主义的诽谤者；也许正是国际主义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诽谤者；也许正是要求修正或“重新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像昨天一样，我们今天将继续竭尽全力来保卫再三经过考验的、从各个角度得到千百次证实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新国际将在一切领域内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接受那些仅仅复述了老修正主义者早就被驳倒的说的“新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并重新加以驳斥。我们的旗帜高举起来了，迎风招展了。具有阶级觉悟的斗士们将团结到旗帜下面，并把它树立在资本主义的城堡上。

为了第四国际！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二、共产国际的演变

——从世界革命的党到帝国主义的工具——

——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文件(1936年7月)

编者按：要想彻底了解斯大林分子最近战术的变化，必须先知道斯大林分子蜕化变质的整个历史背景。我们发表在下面的文件提供了这种必要的资料。这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正式文件之一，原来是为1936年7月29、30和3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起草的。以三十八个命题的形式包含在这个文件中的，是共产国际的兴起和后来蜕化的简明历史。它包括大约十七年的期间，即从共产国际在1919年3月建立起到1936年春。

为了补充这个文件，完全有必要概括地叙述一下以后几年的发展。1936年，全世界的斯大林分子都处在他们的最后归结为慕尼黑四国公约（英、法、德、意）的“人民阵线”年代。1936年6月，法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人民阵线”政策终于牵制了法国群众并挫伤了他们的锐气。首先由于斯大林分子的影响，一个异常有利的革命形势被糟蹋掉了。同时，这同一个政策被用来耗尽西班牙内战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正是在1936年，即发生西班牙内战和法国革命危机的时候，斯大林演出了荒谬的莫斯科审判案，以便具体地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老干部和苏联国内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痕迹。

像实际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人民阵线”的整个时期和苏联国内的空前的血腥清洗不过是另一个外交策略的序幕：这一次是同纳粹德国结成同盟。1939年8月，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了条约，从而发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信号。在这个同盟中，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克里姆林宫承担了希特勒的军需官的任务。各斯大林主义的党调整了它们的政策来适应莫斯科的新的外交政策。纳粹德国连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被宣扬为真正爱好和平的

国家，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则专门被分派给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这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的彻底投降是用听起来很过激的辞句掩盖起来的。各斯大林主义的党装腔作势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高唱阶级斗争的调子，从而进一步使世界工人阶级迷失方向和丧失锐气。

在1940年5月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四国际宣言里，列夫·托洛茨基总结了斯大林主义的策略如下：

“在十分露骨地奉承了那些民主国家达五年之久以后，当全部的‘共产主义’变成了法西斯侵略者每次总要提到的攻击对象时，共产国际在1939年秋季突然发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罪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向后转！从此以后，关于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侵占丹麦和挪威，以及希特勒匪帮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犯下的骇人听闻的兽行，一句谴责的话也没有！希特勒被说成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者面前不断受气的爱好和平的素食主义者。英法同盟在共产国际的报刊上被说成是‘反对德国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戈培尔本人都捏造不出更精采的谎话来！”

可是，同希特勒的结盟维持不到两年。1941年6月，希特勒的军队侵入了苏联。这使得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宣传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来一个大转变。所有的标签都换了样。以前由希特勒任意支配的共产国际的业务这时被出卖给了“民主的”帝国主义者。斯大林分子比好战论者更加好战。在美国和英国，斯大林分子变成了破坏罢工的工贼。在印度，他们变成了英帝国主义镇压印度群众的解放运动的公开的工具。斯大林分子的反对德国的宣传从一开始就起了助长纳粹政权的作用。这又是戈培尔求之不得的事！1943年5月，斯大林正式解散了气息奄奄的共产国际，从而保证了他同“民主国家”的合作。

人们会注意到：从1933年即希特勒在德国当政的那一年起，斯大林分子的政策接连不断的改变是同世界舞台上帝国主义集团彼此力量的消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每一次的改变只有同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这个外交政策的主要精神是在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运用策略，以及利用共产国际作为外交上一切贩马交易的补充手段。每一次，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都遭到蓄意的无情践踏。

当前斯大林分子的变化也是同样的情形。它的根源在于克里姆林宫一

帮人现在所处的国际局势以及他们同那完全受美国支配的单一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在权力政治的角逐中，各斯大林主义的党今天像过去一样充当着纯粹走卒的作用。

1.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在资本主义扩张的长时期内已经使其官僚机构适应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二国际，在战争爆发的决定性时刻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采取了保卫祖国、即保卫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疆土的立场，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连同私有制一起已经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 只有为数极少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第二国际的无耻的背叛和可怜的破产中得出必须建立第三国际的结论。固然，在多数国家内组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观点的反对派，但这种反对派起初带有主要是和平主义中派的性质。在齐美尔瓦尔得(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的国际会议上，拥护建立第三国际的人始终占据少数，并被一切中派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称做热狂者、空想家和宗派主义者。

3. 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对国内敌人进行斗争并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的革命原则的胜利，这个原则从1914年起就已由少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面提出，用来反对保卫祖国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在克服了他们自己队伍中的类似的倾向以后，同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态度暧昧的采取中间路线的多数派决裂，高举了第三国际的旗帜。

4. 在举行成立第三国际的代表大会(1919年3月)时，只有少数比较弱小的党和派系同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起开会。卡

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本来应当在这次集会上占据很高的地位，可是他们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诺斯克手下的军人杀害了。

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反对按照战前的形式重新建立第二国际的反动努力（1919年2月的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党派的伯尔尼会议），赞成把先锋队集合在一个纯一的革命的国际里。代表大会的宣言无情地揭露了威尔逊总统的居心叵测的和平主义以及受第二国际支持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的欺骗性。代表大会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乃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学说，揭穿议会民主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列宁关于“民主和专政”的提纲，说明了形式上的“纯粹”民主制的抽象的口号和原则（“自由”、“平等”等等）是带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的。列宁的提纲用俄国经验的例子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苏维埃（工人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5. 在1919年，也获得了匈牙利革命的经验。那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异常的恶化和混乱，政权落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手里。可是从开头起匈牙利革命就缺乏真正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化为一体，从而表明了它不是一个共产党。匈牙利革命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国际形势对它不利，而且也因为贝拉·库恩之流的领导完全软弱无能（例如，除党的组织问题外，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国际不过刚刚成立，从组织的意义上说还不够牢固，无法对匈牙利革命发出不同的指示。

6. 战争的灾祸深重的后果促使群众中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穿社会民主党所起的背叛作用。在他们的下层群众的压力下，有些老的改良主义和社会

和平主义的领袖们(德国独立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等)力求加入共产国际,但并不改变他们的中间立场。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点条件,杜绝了这种有可能把机会主义倾向注入共产国际队伍的危险。这些条件宣布对中派的暧昧不明、动摇态度和毫无益处的社会和平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求同一切和平主义思想和幻想(例如裁军、国际联盟、国际仲裁等等)彻底决裂。针对着第二国际在以国家为单位而具有独立身分的(并且彼此在行动上直接对立的)各党之间保持松弛的接触这一支配原则,相反地提出了建立在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世界党的原则,以及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实现一个共同的国际领导这一目标。

7. 第二次代表大会使那些中派和调和派(对第二国际)的政客们不能参加共产国际,他们便设法组织了第二半国际(1921年春)这样一个中间的东西,即介于公开的社会叛卖和革命之间的中间道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独立党人”、法国“龙格派”、英国独立工党等等)。像卡尔·李卜克内西所说的,第二半国际重新宣告“水火的团结一致”,革命者和社会叛徒在一个国际内的团结一致。但历史没有给不彻底的解决办法以存在的余地。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和第三国际的斗争中被挤垮了。它的革命成分转向第三国际。它的官僚主义的上层在1923年(汉堡代表大会)重新同第二国际合并了。

极端左倾的毒害

8. 并不领导群众而是想要受群众领导的机会主义中间主义认为极端激进主义是它的补充,因为这种极端激进主义不是依靠在群众的组织、斗争和经验中进行合作的办法从内部去争取群众,

而是从外部给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这些极端左派分子宣布自己的立场,反对参加议会选举,主张离开群众性的职工会而组织“纯粹的”革命工会,主张由先锋队采取孤立的行动。这些倾向导致德国在1920年成立了共产主义工人党。可是甚至这个正式的德国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摆脱机会主义的倾向。这一点主要在三月事件(1921年)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那时该党不是限于采取防御性的策略来反对当政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挑战,而是领导了孤立的先锋队发动武装进攻,并遭到了失败。但最大的危险还在于当时已有一大批理论家在党内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把三月事件的策略变成一种原则(塔尔海默、弗勒利希、马斯洛夫、克能等等)。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了极左派的冒险行动,发布了“到群众中去”这一口号,同时承认战后第一次的高潮(1917—1920年)正在消退,必须利用已经出现的喘息时间来更好地和更彻底地为未来的斗争作好准备。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和战略被规定在决议中,即使到今天也还不失为典范。代表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指导原则,它们的工作的方法和内容”。这些决定固然过分机械、“过分俄国化”(列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话),却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的联系、迅速地从一种工作方法转变到另一种工作方法的必要性、报刊的组织、工厂小组的建立等等。

9. 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重新肯定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经验教训,并且把它们处理得更加彻底和更加具体。苏联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之后,由于环境的无情的压力不得不采用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所提供的十分重要的经验,即甚至在夺取政权以后都有必要实行策略性的退却这一经验,或许不但对于落后的俄国而且对于比较先进的国家也会是适用的。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能够回顾巨大的组织成绩。在三年的期间，各大洲而且实际上是一切国家都成立了支部，此外还建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那时共产党在许多国家中都在领导着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

意大利无产阶级在 1922 年的失败并不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在策略和战略上的失败，而是意大利最高纲领主义（塞拉蒂）在策略和战略上的失败，对于这些策略和战略，共产国际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起就曾不断地进行剧烈的斗争，但没有能够避免那个不幸的结局。

10. 那几年共产国际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它宣传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性重大意义，支持了被奴役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这种任务是第二国际一向所忽视的，并且由于第二国际在世界大战中表现的态度，这种任务完全被它叛卖了。

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指导原则》，目的在于明确地反对想把实际上并非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运动贴上共产主义标签的任何企图。这些提纲认为暂时同民族革命运动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指出了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同这些民族主义政党合并在一起，而是要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地主张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

1923 年的转变

11. 1923 年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由于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滋生了新的剥削分子阶层，由于工人阶级在革命和内战年代作了巨大的努力和发挥了非凡的热情之后普遍感到精疲力竭，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已经同时变得十分强大，能

够日益迅速地上升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上升为主宰各阶级的裁决者。但是，官僚机构只有进行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党和苏维埃内部无产阶级民主制的斗争，才能获得政治权力。这就是1923年开始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内容。官僚机构的抬头恰巧发生在列宁病重和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但列宁在他最后的几篇文章中（特别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和所谓遗嘱中）已经清楚地看出了官僚化的危险，要求对它以及对它的主要代表斯大林进行斗争。

12. 1923年在德国又爆发了一次革命危机。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并没有克服，经济危机不过由于暂时的少量繁荣而有所间断，法军占领了鲁尔地区，德国资产阶级对这种占领组织了“消极抵抗”但遭到了失败，德国的通货发生了剧烈的膨胀——所有这些原因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化。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工厂代表运动变成了革命群众的集合点。工人们组织了“百人团”，开始武装自己。在许多大工会中，共产党人甚至争取到了多数。社会民主党陷于混乱；资产阶级发生了分裂。群众运动达到了临界点，这时需要革命领袖拿出最高程度的决断和实际的主动精神，把这个运动进一步推向胜利。但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歇、弗勒利希等等）表现出它自己是无法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从而证明它不过是涂着共产党油漆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它坚持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不了解统一战线的思想是“退后一步以便更好地向前跳去”，也不了解在一定的时刻争取群众的斗争只能通过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才能实现。由于已经表现出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的迹象，共产国际的领导方面也是不能够引导德国共产党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当德国资产阶级终于蓄聚力量，宣布紧急状态并开始采取攻势时，德国共产党不经过

斗争就投降了。其结果是德国、同时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的惨败，从而使欧洲资本主义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

1923年失败的后果

13. 1923年的失败引起了德国共产党的一次严重的内部危机。一个新的“左派”领导(费舍-马斯洛夫)被选出来了。可是这个领导没有看出十月失败是带有决定性的。它不是命令退却，而是沿着冒险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从而扩大了失败的规模。

在保加利亚，共产国际保加利亚支部(在科拉罗夫-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也在1923年错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革命形势，它接着在1923年9月力图用起义的冒险行动来加以弥补，从而造成保加利亚无产阶级一次致命的失败。

在德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把这个路线推广到整个国际，其结果是在爱沙尼亚遭到了另一次失败(1924年12月的塔林起义)。

14. 德国的失败已经削弱了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阵地，另一方面它在同等程度上有助于加强苏联官僚机构变成独立力量的倾向。这一点可以说明何以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主要意味着共产国际屈从于俄国官僚机构的支配。共产国际本身官僚主义化了，并变成完全从属于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中心。

15. 官僚机构的头子斯大林在1924年秋季提出的、显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相抵触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新形成的社会阶层(官僚、富农、“专家”等等)来说，成为他们以本国为限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不是国际无产阶级而是官僚机构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体现者。共产国际本来是作为

世界革命的工具而被建立起来的，这时却成了苏联官僚机构追求本国利益的工具。这种基本的矛盾影响到共产国际将来的政策，它从此以后便成为中派的组织——一方面躲躲闪闪地、毫无原则地适应改良主义官僚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实行暴动的冒险主义。所有这些特征在它的政策上混杂地表现出来。这种类型的中间主义——一个世界运动中的稳定点——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的官僚政治。

官僚主义中间主义

10. 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对待群众的两种方法——一方面毫无原则地适应现有的环境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另一方面突然地、毫无准备地求助于群众的革命本能——根源于苏联官僚机构的社会地位（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是它的唯命是从的附属品）。由于它的整个的社会性质，苏联官僚机构倾向于迁就苏联社会的享有特权的和剥削的阶层（富农、知识阶层、工人贵族）。可是，一旦形势的发展达到了临界点，当这些阶层的社会地位变得十分强大以致威胁到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官僚机构的地位时，后者便采用求助于群众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实际上，它只是始终运用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特别是国家政治保安部）来鼓动无产阶级群众（或者更正确地说，不过是这些群众中的极小部分）。在国际范围内，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发生兴趣。可是，由于国内的种种原因和事件的发展趋势，苏联官僚机构又觉得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它突然地企图把群众赶上革命行动的道路。但是，既然共产国际缺乏那种为推行其最后要求所需要的国家力量，群众始终是消极被动的。

这一方面说明了何以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会在苏联取得虚假的

成功(它们给予形形色色的市俗,即从英国反动的费边社分子、韦伯夫妇之流到罗曼·罗兰乃至社会劳动党-独立工党的“伦敦局”以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何以共产国际会遭到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

17. 1924—1925年的冒险主义方针在完全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利益相对立的官僚主义同盟中找到了它的机会主义的补充。成立农民国际,同拉狄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和美国的拉福莱特(联合农工党)相勾搭,乃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企图在国际范围内利用富农派系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对抗力量的例子。不问阶级区别而联合中国国民党,对英国工会的官僚分子寄予希望——1924—1925年的所有这些冒险主义方针的支柱,成为1925—1927年露骨的机会主义方针的最重要的因素。

18. 在1925至1927年的期间,中国革命有了巨大的爆发。最初的一些事件使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能够取得了领导权。共产国际宣布它同国民党及其军事领袖(蒋介石)完全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独立政策,不得不参加国民党并完全受它的支配。这样,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一切教训都被抛在一边了。官僚机构引用了1905年革命时期的一个公式为这种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政策辩解:“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民主专政”。对列宁来说,这个公式初步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结成战斗联盟以反对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专政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具体形式,完全要由每一个具体的革命形势来决定。可是,在1917年春,当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试图用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旧的公式作护身符时,列宁在他的《论策略书》(1917年4月)里便认为现今的发展已经使它变得陈旧而把它抛弃掉了。然而,在斯大林主义的手里,列宁当初用来

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口号，却被用作使无产阶级完全听从自由资产阶级支配的借口了。

可是，尽管匍伏在军事官僚面前而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缺乏信心的斯大林官僚机构采取了机会主义政策，中国的无产阶级群众和贫苦农民却转向共产主义，希望在他们的国家实现“十月革命”，分配土地，剥夺剥夺者，摧毁资产阶级军阀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苏维埃。

金融资本使国民党资产阶级同地主和富农结合在一起，所以国民党资产阶级竭力反对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既然在斯大林主义的支配下受制于国民党，就无法起来领导土地革命。农民一直没有革命的领导机构，中国的革命丧失了它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尽管斯大林主义采取了屈从政策，中国的资产阶级却并没有就此罢手，不去解决由共产主义的日益高涨的浪潮所产生的潜在危险。国民党的军阀领袖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并且，当人们还在莫斯科欢呼蒋介石是革命英雄的时候，他就下令枪杀了成千成万已经被斯大林主义政策剥夺了权力和武器的中国无产者。在蒋介石“背叛”（不是背叛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是背叛斯大林主义的一厢情愿）之后，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便怂恿同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结成同盟，结果从汪精卫那里取得了同样痛苦的经验。当失败已成定局之后，这个官僚集团才求助于其中绝大多数刚刚被打倒的无产阶级群众。结果产生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带有局部暴动的性质，其势非陷于完全孤立并因而遭到失败不可，但回想起来，它再度确凿无疑地表明了中国革命的阶级性质、组织苏维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而也就突出地暴露了整个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罪恶的愚蠢想法。

机会主义的政策

19. 在其他殖民地和东亚国家(英属印度、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等等),斯大林主义在这时期支持建立与共产党直接相反的“农工党”(国民党类型的)。这个政策彻底地挫伤和瓦解了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且——同中国革命的灾难性的失败有关——是在那些国家里至今没有组成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原因。

20. 和那同国民党结成的政治同盟相似,也同英国工会官僚机构缔结了一个政治同盟,即目的在于“防止干涉战争”的所谓“英俄委员会”。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要把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这方面来,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在这里却根本没有同英国群众发生接触。英俄委员会只限于纯粹官僚主义的活动(会议、宴会等等)。其结果是提高了反动工会官僚机构的权威,并由第三国际直接抛弃了当时在工会内部顺利发展的少数派运动。在工会领袖以莫斯科的权威为掩护而卑鄙地加以出卖的 1926 年英国总罢工的期间,英俄委员会的这种反动性质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关系破裂了,这是在最有利于英国官僚机构的时刻由英国的而不是俄国的官僚机构撕破的。

21. 1927 年,苏联官僚机构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斗争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在各方面证明左派反对派、即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批评是正确的),官僚机构同富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派系直接结成联盟,采取最苛酷的手段、即抛弃无产阶级一切民主原则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开除出党、撤消职务、监禁、流放、充军、暗中派遣特务混进反对派队伍进行挑拨离间、伪造证据、处死等等,为斯大林的拿

破仑式的独裁扫清了道路。

22. 在利用富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阶层作为压制反对派的靠山之后，这个官僚机构本身遭到被这些阶层挤垮的危险。为了保全自己，它这时不得不转而反对富农。在国际范围内，由于同伙的态度有所转变（英国工会官僚机构的断绝关系，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也不可能继续公开地贯彻机会主义的路线了。就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其所以存在着矛盾，主要是由于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考虑。这些原因导致官僚机构一方面不再去迎合社会民主党、工会和民族民主主义（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另一方面不再实行官僚主义的强迫命令和冒险主义。（见命题16）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

23. 过了四年之后召开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1928年）带有曖昧的、矛盾的性质。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从极端右倾转变到极端左倾的时期举行的，其目的在于准备把右派排除出去，因为它不愿离开它从1925到1927年所采取并实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布哈林、李可夫、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瓦尔歇、弗勒利希、基尔波姆、勒夫斯东等等）。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从头到尾都是以折衷主义为基础的。它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奉为圣典，从而阉割了共产国际。

这个纲领并不把联成整体的资本主义的当前世界局势作为前提，由此必须得出有必要进行世界革命这一结论，而是用一种一知半解的反动方式来考察每一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从而为共产国际将来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蜕化堕落敞开了大门。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甚至有限度地对于西班牙、葡萄牙、波兰

等这样一些国家——纲领发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并使这个口号充满着曾使中国革命一败涂地的同样的反列宁主义内容(阶级合作)。关于策略和战略问题，这个纲领并没有越出老一套的范围。它没有分析十月胜利和无产阶级在德国、匈牙利、中国等等的惨败所取得的真正的经验，也没有分析革命政党及其领袖的作用和意义。

24. 在以后的整个时期，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主要是，虽然并不专门是靠它所能掌握的另一方法发生作用的，那就是，毫无准备地向群众发号施令，提出不可更改的要求。在1924—1929年当时还存在的繁荣时期比较和平的社会环境下，它突然命令在国际范围内一律举行“革命发动”(所谓“第三时期”)。它实行了分裂工会的致命政策(宣传红色工会是独立的组织)。它拒绝同社会民主党缔结盟约，即使这种盟约不过是暂时性的或实用技术性的。它传播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斯大林说：“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对立面，它们是孪生兄弟。”)，否认议会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有什么区别。战后最初几年所发生的“极左派的越轨行动”(列宁语)无论如何是由真诚的革命愿望造成的，而斯大林主义官僚分子却卑鄙地出卖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

25. 1929—1930年在美国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深深地震撼了现有的政权、首先是德国的政权，因为列宁所说的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一断言也适合于这时的德国。迁就衰落的资本主义(在“二害相权取其轻”的口号下)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德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妨碍了经济危机期间工人运动力量的壮大。小资产阶级转向进行蛊惑宣传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鼓吹发动反对无产阶级而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压迫者的内战，其目的在于通过压制一切民主权利的

办法来维持和加强资本主义剥削。只要德国共产党懂得怎样推动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的这个凶恶敌人的兴起本来是可以用作发动革命的有力手段的。可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甚至没有认清这个危险，更不必说同它斗争的能力了。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绝对神经错乱的估计，导致了同真正法西斯主义的和解（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对法西斯分子在1931年举行公民投票以反对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这一行动的支持，等等）。这个迁就民族主义情绪的纲领，以及用官僚主义的怯懦态度规避对法西斯敌人进行军事斗争的做法，在完全受眼前的考虑支配的苏联对外政策中找到了支持。这个对外政策认为它的任务在于保持德国和法国的对立，借以排除来自西方的干涉。当然，苏联对外政策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这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为了对外政策的眼前考虑而牺牲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乃是一种前所未闻的犯罪行为。

德国共产党的罪恶的、盲目的政策（整个的共产国际对此应负完全责任）导致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未经战斗即遭到的可耻失败。德国共产党的悲惨的瓦解（1935年1月萨尔区公民投票的凄凉的结果再度证实了这一点）终于证明了：共产国际已经从世界革命的主观因素变成世界革命的客观障碍。从这个事实得出了绝对有必要建立第四国际的结论。

无原则的合作

26. 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政策认为同破了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平主义者和小说家（马莱勋爵、巴比塞、罗曼·罗兰、海因里希·曼等等）以及斯大林分子所组织的“和平大会”、反帝同盟、苏

联之友等等实行无原则的合作是它的补充政策。这个政策恰恰同列宁主义争取无产阶级群众的统一战线策略相反,反映了对于“身居高位的人们”的官僚主义赞扬以及对于革命群众力量的官僚主义蔑视。

27. 1934年,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所改变的国外政治形势使共产国际的政策发生新的转变。以前列宁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曾被当作是“反革命的”,而这时在任何地方出现的每一个机会却被用来不但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且同它的主子、即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且这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叛卖性投降获得了“人民阵线”这一冠冕堂皇的名称。

28. 斯大林于1935年5月对法国总理赖伐尔宣布,说“他完全理解和赞成法国的国防政策”;这个声明表明共产国际已经投靠帝国主义阵营。与此同时,已经参加国际联盟的苏联对外政策鼓吹“集体安全”(即帝国主义强盗毫无阻挡地继续掠夺的安全)、国际仲裁等等。因此,共产国际就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用以欺骗群众并准备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的种种最陈旧的幻想的支柱,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凶残袭击清楚地表明了集体安全这一谎言的全部空洞和浅薄。

29. 终于在1935年秋召开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表明共产国际传统的最后残余已被完全抛弃,“人民阵线”和“国防”、社会叛卖和社会沙文主义是这次代表大会——官僚主义傀儡们的一场浅薄的戏剧表演——必须提供给世界工人阶级的全部东西。

30. 一切国家中的斯大林分子只要求一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愿意保卫“祖国”的诺言,那就是,各该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得以反对苏联为目标。光是法苏军事协定就足以把法国的斯大林分子变成

一种鼓吹一切阶级以及一切政治和宗教派系间的全国大合作的最恶劣的沙文主义者。英国的斯大林分子的唯一目标是使英国资产阶级成为法苏协定的签署者。今天，共产国际的美国支部已经同意美国对日作战以“保卫苏联”。虽然美国对日本的一场战争——假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政策——可以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提供巨大的可能性，美国的斯大林分子却已经在鼓吹放弃革命的阶级斗争，支持美国资产阶级这一世界上最强大、最危险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中国，斯大林分子打算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再度交到反革命的蒋介石手里，只要后者表示愿意掉转他的刺刀去对付日本。

在欧洲的一些小国，斯大林分子已经表明他们是“民族独立”的捍卫者。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链环中的环节；它们也是抱着帝国主义的目的进行战争的。就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为斯大林分子所特别喜爱的国家来说，它根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一个被法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若干民族的凝集体。波兰、罗马尼亚、比利时等等本身是少数民族的压迫者。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国家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它们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并不比帝国主义大国逊色。奥地利的斯大林分子宣布他们准备保卫“奥地利的独立”——这种人为的造物是不可能有所独立的存在的——只要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和英法资本）允许斯大林分子享有一定程度的合法地位来进行他们的爱国忠诚宣传。侨居国外的德国斯大林分子已经变成社会爱国者，即从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民族主义战士转变为维护这同一个条约所造成的现状的捍卫者。根据德国斯大林分子现今采取的立场可以推断，一旦德国法西斯专政为另一类型的资产阶级政权所代替，他们将变为真正的社会爱国者。

和这种大规模地贩卖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行径完全相反，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坚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这一国际主义的口号；不是保卫几十年前成为任何进步发展的障碍的反动国界，而是要加以废除；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欧洲和全世界的联合的苏维埃共和国。

两个机会主义的国际

31. 由于斯大林主义向社会爱国主义的转变，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纯粹由于共产国际的蜕化变质，第二国际才能人为地延长它的生存）的一切差别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因此，“有机的统一”——第二和第三国际的合并——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在改良主义仍对工人运动拥有垄断权的那些国家里（英国、斯堪的纳维亚），第二国际的党反对有机的统一。在比利时，斯大林分子最近的几次胜利和工党的失败也许已使后者更赞成合并的想法。但是，依靠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势力而逐渐壮大的法国共产党却把问题搁置下来。然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事关紧要的是纯粹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的方法。但不管是否能实现“有机的统一”，先进的工人必须认定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对立面，而是孪生兄弟”。它们都是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黄色代理机构。

32. 现今共产国际正在经历一定程度的不可低估的发展，但它是作为一个社会变节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政党而不是作为一个革命党发展起来的。面临着到处表明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巨大的政治紧张局面，群众急剧左倾并在那边找到他们所熟悉的唯一门户、即共产国际的门户。所以，在最近的选举中法国共产党所得到的选票比以前多出一倍以上（它的议员名额增加了六倍）。

主要是无产阶级的选区——巴黎和近郊——投了共产党的票。另外，比利时共产党虽然一向很弱，却也能在今年的选举中获得一次并非不重要的胜利（与1932年相比，选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议员名额增加了两倍）。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瑞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也可能获得某些成功。其他支部（英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美国等等）的发展即使不是肯定的，也决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固然群众希望第三国际帮他们摆脱战争的危險，共产国际却准备在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充当主要的政治工具。这样，共产国际便代替陈腐的第二国际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帝国主义效劳，但它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33. 共产国际最近的这些成功首先使所有那些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国际局”（伦敦局）的小资产阶级市侩们，即德国的社会劳动党、英国的独立工会、瑞典的社会党、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宁-摩林）等等晕头转向。在德国工人运动的灾难性失败的影响下，某些中派的政党本来要逐渐转到第四国际方面来。但是，1934年秋斯大林主义的转变把犹豫不决的瓦尔歇之流、摩林之流、宁之流等等连带拉进了人民阵线的泥淖，斯大林主义之完全吸收伦敦局现在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群众激进化

34. 与现今共产党的发展有关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矛盾的例子，是法国过去几星期内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和占据工厂事件（参加的大约有两百万体力劳动者和事务工作者），这些是在完全出乎法共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发生的。可是当这个新的群众运动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时，它发现共产国际的陈腐机构在它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例如，法国共产党不是去领导罢工运动和提出革命要求，而

是一开头就同政府和雇主们合作，以便找到一个结束罢工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预言：不是法国无产阶级群众的新的运动扫除斯大林主义叛徒的官僚机构并建立一个新的领导——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获得胜利——便是变节的官僚们控制局势——从而使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

35. 急剧地向左靠拢的斗志昂扬的群众和各国共产党所起的新的叛卖作用之间的矛盾，给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提供新的任务和可能性。这些组织中有一些在不久的过去参加了社会党，把那里的最优秀的成分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来。在内部政治发展异常迅速的国家里(法国、比利时)，这证明是一个简短的步骤。在其他国家里(波兰、英国)，这个经验还没有完成。在另外一些国家里(美国)，它们还正在开始。可是，不论第四国际的各支部是独立地还是在社会党内部进行工作，它们必须注意到，现今第三国际正在向第二国际勾引工人。因此，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斗争是反对共产国际、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斗争。最重要的任务是向工人们阐明共产国际作为帝国主义代理机构的今天的性质，使他们了解到从第二国际转到第三国际意味着从热锅跳到火里。

36. 这项工作的道路和方法将是多种多样的和千变万化的，取决于每一国家的整个发展和特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反动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同它的社会支持者、即革命的劳动阶级发生公开的对立。到处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搜集材料，仔细地随时研究一切矛盾的倾向，以便能够及时地和有效地采取行动，那是很重要的。

37. 最初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理论和实践，在现今的共产国

际中是毫无影踪可寻了。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学说,以及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肯定,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这些学说和经验从 1923 年起就曾由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加以捍卫,以反对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它们是反对派的政治和理论工作的基础,而反对派从最初起就曾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社会爱国主义蜕化变质的根源作斗争的。应用于新的事件和现象的列宁主义的策略学说和经验,以及对斯大林主义在 1923 至 1936 年期间的错误和罪行的无情批判,曾被反对派用来教育全世界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如果不彻底研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这一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和著作,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假如他想名副其实——都没有资格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中起领导作用。

38. 第四国际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第三国际所采取的但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所叛卖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目的作为它的政策的唯一指导方针,因此它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将近一百年的革命斗争的学说和经验武装了自己,并从而重新肯定了无产阶级伟大先驱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思想和毕生的事业。

三、一个伟大的成就

——托洛茨基

当这篇短文在报刊上发表时，第四国际的会议也许已经结束它的工作了。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个不可和解的革命倾向，虽然受到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政治倾向多半没有受到过的迫害，却已经再度证明了它的力量。它克服一切障碍，在它拥有无限权力的敌人的种种打击下召开了它的国际会议。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充分的生命力和毫不动摇的坚定性。一次成功的会议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由于渗透了我们各支部的革命国际主义精神所提供的保证。事实上，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今日欧洲和全世界都相信迫在眉睫的战争即将爆发时为了集合国际革命力量而作的国际联系。民族仇恨和种族迫害的气氛今天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政治空气。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不过是沙文主义力求克服或扑灭难以忍受的阶级矛盾的疯狂行径的最极端的表现。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复活，或者毋宁说是它的新的公开而无耻的表现，属于法西斯主义的同一范畴，但适应着民主思想或它的痕迹。

也属于同一类事件的，是苏联的公开助长民族主义：在集会上、在报刊上以及在学校里。这决不是所谓“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即捍卫十月革命成果以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不，这是恢复旧俄罗斯的爱国传统的突出地位的问题。并且这也是一种建立超社

会、超阶级的道德标准以便更有效地训练劳动者并使他们屈从于贪婪的官僚主义寄生虫的工作。现今克里姆林宫的官方思想求助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亲王的功绩，求助于苏沃洛夫-里姆尼茨基或库图佐夫-斯莫连斯基的军队的骁勇，同时它拒绝了解这样的事实，即：这种“骁勇”是以人民群众的愚昧和对他们的奴役为基础的；因此，旧俄军队只是在对更加落后的亚洲各族人民或对西方边界上的分崩离析的弱小国家的斗争中才获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在对欧洲先进国家的冲突中，英勇的沙皇军队总是一败涂地。显然，克里姆林宫已经忘掉了上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正如它已经忘掉了十月革命是失败主义的直接产物这一并非不重要的事实一样。热月派分子和拿破仑主义者哪里顾得上这些？他们需要民族主义的偶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必须来帮助尼古拉·叶卓夫。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既然打破了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斗争的计划，就不能不归结为苏联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浪潮，并且不能不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内引起一股同样性质的相应的浪潮。就在两三年之前，人们还坚决主张，共产国际的各支部只有在决心支持苏联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所谓“民主”国家中才应支持它们的政府。保卫工人国家这一任务本来是打算用来为社会爱国主义作辩解的。今天，不折不扣地像斯大林国际的其他“领袖”一样卖身投靠的白劳德却对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宣布，一旦美国和苏联发生战争，他白劳德和他的党将站在他们自己的民主祖国的一边。这个答复多半是受斯大林的指点的。可是问题并不因此有所改变。叛卖有它自己的逻辑。由于走上社会爱国主义的道路，第三国际正在明显地摆脱克里姆林宫集团的控制。“共产党人”已经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者，他们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盟友和竞争者不一样

的地方，只是在于他们更为无耻而已。

大 叛 卖

叛卖有它自己的逻辑。随第二国际之后，第三国际已经完全不成为为一个国际了。它不再能够在世界无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内表现任何种类的主动精神。当然，在十五年的精神逐渐萎顿的过程之后，共产国际在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即在无产阶级最迫切地需要它的国际革命团结的时候暴露出了它内部的彻底腐败，这并不是偶然的。

历史已在第四国际的面前堆积了许多巨大的障碍。奄奄一息的传统正在被用来反对活生生的革命。一个半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之余辉在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代理机构——第二国际——的手中已经被用作并且现在仍然被用作粉碎和瘫痪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工具。第三国际抱着同样的目的，正在利用十月革命的新鲜和有力得不可比拟的传统。对于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而进行的第一次胜利的起义的纪念，在篡夺者的手中被用来拯救资产阶级民主制，使它免受无产阶级起义的打击。眼看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社会爱国主义组织已经在人民阵线的标签下同资产阶级左翼实行合作，而人民阵线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垂死的挣扎中企图像革命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使无产阶级受其支配那样再度使无产阶级就范的努力而已。过去曾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表现，现在在我们面前变成一出令人作呕的反动的滑稽戏。可是，固然“人民阵线”没有能力医治那烂透了心的资本主义，固然它们甚至无法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军事侵略——西班牙的例子充满着象征的意义——它们却还有足够的力量在工人群众中间散播幻想，瘫痪和破坏他们的战斗意志，从而在第四国

际的道路上制造一些十分严重的困难。

工人阶级，特别是在欧洲，仍旧是在退却，或者充其量是处在一种期待的状态。多次失败的记忆犹新，并且决不是以后不会遭到失败。失败在西班牙呈现了最明确的形式。这就是第四国际在其目前发展过程中的处境。第四国际成长得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外行、庸医和蠢汉由于不了解历史起伏的辩证法，曾经不止一次地下过判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思想也许是正确的，但这种思想无法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仿佛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可以在任何和一切条件下建立起来似的；仿佛一个革命的纲领并不责成我们要在反动时期安于占据少数并抵抗逆流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用他自己的急躁情绪作为衡量时局发展速度的尺度，是不值一文的。世界革命运动的道路从来没有像在今天这个最伟大的革命动乱的新时代的前夕一样充满着如此巨大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的对局势的正确评价应当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最近几年我们已经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成功。

俄国的“左派反对派”是在十五年之前形成的。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的正确工作总共还不到十年这一整数。第四国际史前的时期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左派反对派”还希望有可能改革共产国际，并且把自己看作它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共产国际在德国所实行的并为它的各个支部所默认的令人痛心疾首的投降，明明白白地引起了有必要建立第四国际的问题。可是，我们人数不多的组织是实际上在工人运动本身之外的理论批判的过程中通过个别地选择成员而扩大起来的，因此它们还没有进行独立活动的准备。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甚至不惜暂时放弃正式的独立地位而力求为这些孤立的宣传组织找到一个真正的政治环境。参加

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行动立即使我们的队伍有所扩展，虽然就数量来说，收获还不像应有的那样大。可是这种参加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从政治上教育我们的各个支部，使它们在初次面对着政治斗争的现实及其当前种种要求时可以考验它们自己和它们的思想。由于取得了经验，我们的干部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收获是我们同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者、捣乱分子和骗子手宣告决裂，他们惯常在开头就参加每一个新的运动，其目的不过是想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和使它陷于瘫痪。

我们各个国家的支部的发展阶段当然在时间上是不会一致的。然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却可以算是第二个阶段的结束。从此以后第四国际便面临着群众运动的任务。过渡时期的纲领是这种重要转变的反映。它的意义在于：它不是提出一个既定的理论计划，而是总结我们各国支部所已经积累的经验，并根据这种经验来揭示更广阔的国际前景。

这个纲领是由事先的一次漫长的讨论或毋宁说是一系列讨论预作准备并加以保证的，大家接受这个纲领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收获。第四国际在这个意义上是现今唯一的国际组织，即：它不仅清楚地考虑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动力，而且还准备着一整套能够团结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过渡时期要求。我们不需要自欺欺人。对于我们今天的力量和明天的任务之间的矛盾，我们比我们的批评者看得更清楚。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苛酷的和不幸的辩证法却起着有利于我们的作用。到了怒不可遏的时候，群众只会看中第四国际所提供给他们们的领导。

1938年8月30日

四、第四国际关于共产国际 解散的宣言

在第三国际的杀害者斯大林把它埋葬的时候，第四国际向全世界的工人、尤其是依附过共产国际的工人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各国共产党的党员：你们从前以为共产国际是你们的，你们对它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可是你们没有可能发表意见来决定它的命运。单单这一事实就可以使你们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根本不是你们的，你们效错了忠诚，斯大林和他的那些傀儡出卖了你们。5月22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公布了它的解散的决议——公布的目的在于使你们面对既成的事实。不到三星期之后，即在6月10日，主席团用一个破产的店老板的口吻，宣布指定一个四人委员会来“结束事务、解散机构和处理共产国际的全部职员和财产”。共产国际是由谁授权解散的呢？表面上，在5月22日至6月10日的几天中，曾有一系列的共产党赞成解散的决议。实际上究竟是谁表示了赞成的意见的呢？是斯大林和他的主席团一手挑选的所谓各个党的中央委员会，但甚至没有征求委员们的意见。列在表示赞成的名单中的，有德国和被占领的欧洲的那些共产党。可是，除了住在莫斯科的一小撮蜕化堕落的官僚以外，谁能够在三星期之内煞有介事地代它们发言呢？官僚主义的解散方法表明了共产国际在近二十年来实际上是个什么机构——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一个集团手中的极权主义工具。

应该特别指出，共产国际的最后的决议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恶毒进攻。在解散的决议中所举出的每一种理由都是反动透

顶的。

成立共产国际的原因

为了隐瞒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同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之间的鸿沟，那个决议闭口不谈最初建立这一国际的原因。它只是说，这个国际“是在 1919 年由于战前绝大多数旧的工人政党在政治上土崩瓦解而建立的”。但它不敢用只字片语提到那种政治上的崩溃究竟包含什么内容：第二国际的那些政党支持战争和拥护它们“自己的”资本家的政府。共产国际的政党也已经变成了资本家的政府及其战争的拥护者，因而使第四国际有必要根据当初成立第三国际的同样一些理由而建立起来。共产国际的那个最后的决议伪造第三国际的起源，以便隐瞒产生第四国际的历史必然性。

由于同样的缘故，那个决议伪造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目的，说它的“历史任务”在于“维护工人运动的原则”，在“许多”国家中帮助“前卫的”工人们努力“捍卫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整个决议甚至没有提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阶级斗争。请你们把它同 1919 年成立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对照一下。那个纲领说明共产国际的目标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夺取政权”，以便“剥夺资产阶级并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在 1920 年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的第一条也说：“建立新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组织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以便达到一个单一的和同一的目标，即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一个苏维埃国际共和国，而这个目标达到以后，就有可能完全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从 1919 至 1922 年每年召开一次——的一切文件都用响亮的语句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这个国际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豪地声明“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的《共产党宣言》的传统。斯大林的解散的决议，像所有的斯大林主义的文件一样，属于一种和任何革命事业的精神与语言背道而驰的截然不同的传统。

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真正起源和国际主义目标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主义的决议所提出的工人们不再需要一个国际的说法是多么虚伪和反动。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根据资产阶级社会具有世界规模因而需要发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来加以推翻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事实，证明有建立国际的必要。更具体地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有必要建立的国际不应当是许多国家的党的一个单纯的总和，而应当是各处设有支部的一个单一的世界党。各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平衡，决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反对国际主义的论据，而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坚决主张要建立第三国际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始终不倦地强调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英国的工人和印度的群众、美国的无产阶级和拉丁美洲的劳动者等等——在其反对帝国主义霸王的斗争中需要互相支援。

斯大林主义的决议宣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大相径庭”以及“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水平与速度的不同”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致“通过某种国际中心来解决问题势必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个说法是违反上述由来已久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如果这些论据是正确的，同时由于同样的基本条件在 1919 年也存在过，那么这个国际当初就根本不应该建立了。

但是每一句话都是虚妄的。

那个决议谎话连篇，说什么共产国际“在工人运动的最初一些阶段才是需要的，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已经使它失去意义了”，又说什么它的解散是“考虑到各个共产党及其在各该国家中的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的”。多么可怕的笑话！共产国际在1922年的全盛时代，在资本主义世界拥有好几百万党员，在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南斯拉夫、法国等等都有庞大的群众性政党，但这时除阶级敌人而外，谁也没有想到要解散这个国际。现在，当这些政党由于斯大林的错误政策而被破坏时，当少数仍旧存在的政党已经变成克里姆林宫操纵的无能的傀儡时，倒说这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最刻薄的讽刺家即使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一个更奇怪的公式来。

斯大林命令他的御用教授们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出历史先例来粉饰他的罪行。然而，连他们也变不出一句列宁的“引语”，可以用来证明那种解散是正当的。列宁主张用随即建立新的国际的办法来埋葬蜕化堕落的国际。那个决议显然希望没有什么工人会知道一个早期“先例”的事实真相，于是举出了“由于建立群众性工人阶级民族政党的条件成熟”因而曾解散第一国际的“伟大马克思的例子”。这个谎话里的唯一诚实的一条是说第一国际在1876年解散。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革命领袖之所以不得不解散第一国际，是由于它已经遭到致命的失败：巴黎公社的瓦解所造成的客观形势已使国际陷于瘫痪，而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冒险主义分子的内部斗争又使它有进一步衰败的危险。并且，它的解散不是发生在像今天这样世界革命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代，而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仍然在扩展着的资本主义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而社会主义运动也相应地有重新集合它的力量的机会。第一国

际的领袖们也没有把它的解散说成是一种胜利，而是老老实实地把它叫做失败。它在遭受挫折但并未蜕化的情况下离开了舞台，它的旗帜依然保持纯洁，并且它的历史教训成为全世界的工人们的一种鼓舞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决不像斯大林那样摒弃国际主义，而是立刻着手积聚力量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由他们的门徒在十三年之内完成的一项任务。第一国际的光明正大的死亡根本不能同第三国际臭尸的过期的埋葬相提并论。

确实同斯大林的行动相类似的，乃是第二国际在 1914 年 8 月的可耻的死亡。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第二国际的明确的考验，同样地，这一次的战争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的严峻的考验。斯大林的模范不是马克思或列宁，而是考茨基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这些第二国际的声名狼藉的领袖。这种雷同是无法避免的。硬说共产国际所具有的“政治上的成熟”，同列宁称之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是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沙文主义者——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暴露出来的政治腐败是一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胡说 1914 年两个交战的阵营之间有着基本的原则性区别；斯大林主义的关于解散的决议也说现今交战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有着“一条深刻的分界线”，并且硬要英美集团的工人承担“民族团结”的“神圣职责”——即放弃阶级斗争。

许多抱有革命情绪的工人看不清这种叛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径像第二国际的叛卖勾当一样骯髒，因为斯大林主义把它说成是保卫苏联的手段。这些由于共产国际的解散而猛然省悟的工人，现在必须把有关的基本问题重新彻底地考查一下。

怎样保卫苏联

第四国际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虽然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

使苏联蜕化变质，苏联却仍旧保留着十月革命所创造的国有化的财产作为它的基础。每一个工人必须捍卫无产阶级第一次成功的革命的这个残留的收获。可是，要真正地保卫苏联，就应当采用一些和 1924 年以来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所采取的错误方针迥然不同的方法。

每一个严肃的工人必须努力了解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会彻底理解列宁的保卫苏联的方法和斯大林的错误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斯大林的错误方法使希特勒有可能侵入苏联，劫掠它的最富饶的地区，摧残它的壮年时代的精华，并且，虽然希特勒终于失败，却为“民主”帝国主义者利用“和平”或战争手段进一步重新推行私有制敞开了大门。

当第二国际在 1914 年 8 月和战争贩子同流合污时，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立刻宣布它不再是一个革命组织，并且声明有必要代之以一个新的国际，即第三国际。新国际的纲领是在战争年代拟定的，十月革命就是根据那个纲领才获得胜利的。当时布尔什维克了解：这个胜利不过是世界革命的第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其他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就无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无限期地保持自己的生存。因此，作为苏联宪章的《劳苦和被剥削人民的权利宣言》（到了 1936 年，它为斯大林主义的“宪法”所代替），规定新政权的“基本任务”是“确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并在一切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就是列宁的保卫苏联的方法。实现这一世界任务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则是在 1919 年 3 月正式成立的第三国际。

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所有的资本家和他们的改良主义代理人、他们的和平和他们的战争，反对他们的“民主”和他们的镇压，争取以革命手段来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

和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简单地说，这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第三国际的纲领。它在 1919 至 1922 年召开的头四次代表大会集合了全世界的革命的参谋本部。它所领导的革命攻势几乎结束了全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从那些资本主义的头目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他们在那以后承认他们几乎被无产阶级的起义所挫败。那个革命浪潮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可是到了 1923 年，资本家在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的帮助下暂时遏阻了革命的浪潮。在第二次浪潮掀起以前，第三国际这一革命武器已经钝得不中用了。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作用

它是被一个在苏联兴起的官僚机构弄钝的。苏联官僚机构在其享有与工人不同的较高生活水平和其他特权、思想保守、害怕和不信任工人等方面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官僚相类似。它的兴起和取得政权，一部分是由于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贫穷与落后。然而，这个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主要是由于欧洲革命的失败。在第一个工人国家因受资本主义包围而陷于孤立的情况下，俄国工人们被连年血腥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內战弄得精疲力尽，让政权落进了一个以斯大林为其发言人的官僚机构的手里。这个官僚机构用以巩固它的地位的手段，是摧残一切民主工具——党、苏维埃、工会——而让斯大林和他的一伙完全掌握了东施效顰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

这个官僚机构歪曲和修正了列宁的思想，主要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问题。在列宁的理论中，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别处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斯大林提出了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列宁的理论，说什么用不到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也能在俄国建成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一种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论。

对人类的前途来说十分幸运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一直没有自己的捍卫者的。列宁的主要战友托洛茨基领导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中的左派反对派来对官僚机构进行斗争。

左派反对派提出警告：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正在把共产国际从一个世界革命组织变为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道地的工具，变为苏联的道地的边防哨兵。而且演变的过程还不会到此为止。从官僚集团对国际工人阶级发动世界革命的能力丧失信心到它对世界工人保卫苏联的能力丧失信心，不过是一步之隔。

从解散共产国际这一点来说，曾经依附于共产国际的工人们应当仔细考虑一下托洛茨基在1928年答复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所写的预言性的语句：“如果基本上反映着世界矛盾的我们(苏联)国内的困难、障碍和矛盾，只要依靠‘我们革命的內部力量’而不必进入世界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决斗场就能求得解决，那么共产国际就部分地是附属的、部分地是装饰的机构，它的代表大会可以每隔四年、每隔十年召开一次，或者也许可以根本不必召开。”

斯大林化的第三国际的历史，是一部使世界工人阶级不断遭受灾难的历史。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一些最可怕的惊人事件。

在1925—1927年，发生了走向战胜帝国主义者及其当地傀儡的重大胜利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它的真正的力量来自反抗一切本国和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工人和农民。斯大林希望削弱帝国主义，但他由于对群众特别缺乏信心，命令中国共产党屈从于蒋介石所

领导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蒋对帝国主义比对中国群众或苏联更加亲近，他在 1927 年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终于能够以血腥手段消灭那些由于斯大林对蒋的支持而已被解除武装的英勇的工农群众。

在英国，斯大林力求依靠工会的官僚，同他们组成了两国工会官僚机构的英俄委员会。英国的工人官僚这样就能在英国无产阶级奋起斗争（以 1926 年的英国总罢工达到顶点）的时候借用俄国革命的威信来掩饰自己。由于利用英俄委员会作为挡箭牌来抵御工人的愤怒，英国工会的官僚们叛卖了总罢工。甚至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还坚持要继续保存英俄委员会。不久以后，当遭到失败的英国工人阶级陷于消极状态时，英国工会的官僚们抛弃了这个曾经帮助他们实现反革命计划的委员会。

在德国，斯大林造成了所有失败中最可怕的失败。他对工人的缺乏信心在这里采取了一种自 1929 年开始的“过左的”形式。他提出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把社会民主党和它所领导的工会称做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由此就产生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这个名称。这个理论否定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有可能同共产党的工人组织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正在抬头的纳粹分子。这个理论坚持一切的工人必须首先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因而它的假激进主义实际上造成了分裂和消极被动的局面。托洛茨基曾经提出警告，说明当前的任务是要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成反纳粹的统一战线。如果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加以拒绝，他们就会在党员面前暴露自己的面目，而那些党员也就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为了这种忠告，托洛茨基也被扣上“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帽子，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则继续实行它的灾难性的方针。仅仅由于这个错误的政策，希特勒才得以在 1933 年接收国家的政

权。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向希特勒投降，它虽然拥有六百万名追随者，却连一年以后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工人们对于道尔弗斯所作的那种抵抗也不想一试。

德国的灾祸证明斯大林主义已经把第三国际败坏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在那以前，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虽然被官僚集团排挤出共产国际，却竭力主张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并加以改革。当时必须宣布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即第四国际。在以后的五年期间，这个运动积聚了力量，于1938年在巴黎举行了第四国际的成立代表大会。

出卖给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

建立第四国际的正确性，从1933年以后斯大林主义的第三国际所造成的种种失败得到了证明。斯大林以前曾同中国资产阶级、英国工会官僚机构等等缔结机会主义盟约，这时他又追求同帝国主义国家结成同盟。斯大林主义从对工人的能力缺乏信心转变为蓄意出卖工人。

自1935年5月的斯大林-拉伐尔条约开始，公开的出卖相继不绝。为了追求通过直接军事合作的途径来履行那个条约，并同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缔结类似的条约，斯大林表明共产国际可以怎样为资本家效劳，借以向那些国家阿谀献媚。1935年8月，他经过七年以后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命令各国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只有名称是新的，阶级合作与政治联盟的政策却是始终被革命派称为叛卖工人阶级的政策。

其结果如何，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出来。在法国，共产党议员投票赞成资本家政府的军事预算——和列宁称为宣判第二国际死

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 1914 年 8 月 4 日的行径如出一辙。斯大林主义的领导集团公开地参与破坏 1936 年 6 月的著名的静坐罢工——本来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道路的一次革命发动——并由多列士发表了有名的叛卖公式：“同志们，我们必须懂得在什么时候宣布停止罢工。”斯大林分子宣称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是苏联的真正的朋友，这样，正因为斯大林分子已经在工人们面前把法国说成是朋友，它才能够镇压工人运动。

西班牙在 1936 年 7 月已经发生内战，工人们不但在战场上、而且通过展开社会革命来进行抗击，这时斯大林主义公开地暴露了它的反革命的性质。为了证明他对“民主国家”大有好处，斯大林自告奋勇地充当西班牙私有财产的监护人。作为向政府军提供少量武器的代价，斯大林硬要得到一些政治上的让步，这些让步使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能够扑灭工人的工厂委员会、阿拉贡和卡塔洛尼亚的农民团体，暗杀几百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斗士，并建立一个由内格林领导的、能够赢得“民主国家”赞许的“绅士派头”十足的政府。可是这种镇压西班牙革命的做法摧毁了工人、农民和政府军的士气，而并没有从“民主国家”争取到任何武器。这样，斯大林就为弗朗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这些叛卖行为也没有使斯大林达到他的目的。尽管他摇尾乞怜，英国却回避缔结军事同盟。斯大林-拉伐尔条约订立之后根本没有再进一步举行军事讨论，结果便变成一纸具文。因此斯大林的阿谀“民主国家”的 1935—1939 年政策终于失败。接着，斯大林违反全世界工人的反法西斯情绪，又向希特勒献媚了。

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时期使共产国际堕落愈深。它的事业连同谷物和石油一起出卖给了希特勒。共产国际给希特勒的反对

者扣上“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的帽子，而斯大林在1939年12月写给李宾特罗甫的信中则欢呼斯大林-希特勒同盟是“由鲜血凝成的”，这可能指的是他们在共同瓜分波兰时所流的鲜血。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的特征可以从美共的“美国人落后”这一口号中充分地看出来，那是一个不革命的失败主义政策。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看不见局势的真正的发展方向，竭力向纳粹分子献媚，莫洛托夫公然宣称“一个强大的德国是欧洲持久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个卑鄙的政策在1941年6月22日也垮台了，那时希特勒在完全征服了大陆以后，能够选择他自己的入侵苏联的时机。在前一天，斯大林主义的报刊还拚命辱骂那些散播纳粹德国即将进攻的“谣言”的“战争贩子”。隔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傀儡们又变成“民主国家”的拥护者了。

这就是斯大林和他的共产国际的明明白白的记录。这些错误的政策使苏联陷入了困境。即使希特勒被消灭，在纳粹侵略下流血牺牲和变得虚弱的苏联势必还要对付它的资本主义的“盟邦”，因为它们像希特勒一样，也是国有化财产的反对者。

在其蜕化变质的过程中，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机构已经凝结成一个同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冷酷无情的阶层。对它来说，根本不可能恢复列宁的方法。这个官僚机构将成为欧洲一次成功的革命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因为到那个时候，苏联无产阶级既然不再担心入侵并受到新的工人国家的支持，就不会再容忍极权主义的官僚政治。克里姆林宫一定会竭力把它的讨好和迁就帝国主义者政策贯彻到底。

这就是解散共产国际的用意所在。它不过是克里姆林宫对资本主义世界一系列让步中的最近的插曲。共产党在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等等国家已经成为最狂暴的罢工破坏者。在印度，斯大林分子公开地充当英帝国主义的工具有来镇压印度群众的反抗。斯大林主义的反对德国的宣传不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而为帝国主义复仇性质的第二个并且更坏的凡尔赛条约铺平了道路；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只字不提同德国无产阶级团结一致。二十年的英苏条约给人们在斯大林的合作下复兴资本主义欧洲的计划提供了基础。共产国际的解散不过是斯大林发出的另一个信号，表示他准备更进一步地迁就资本主义的统治。

像他以往的一切政策一样，斯大林现今的“结盟”对苏联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并且把主动权让给了这个工人国家的势不两立的帝国主义敌人。它使它们能够抓住最有利的机会，步步进逼地要求从经济上侵入苏联，以便破坏那里的国有化财产，并且重新企图把苏联完全打倒。像斯大林的以往的错误政策一样，这个政策在最不利于苏联的条件下也是会彻底失败的。

什么东西将拯救苏联

可是，在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战争、殖民地起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论斯大林对帝国主义主子们的让步或帮助都无法稳定社会。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不但已经成熟，而且是过分成熟了。世界经济已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三十年。马克思和列宁所指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客观条件是存在的；唯一缺少的东西恰恰就是斯大林所谓工人们并不需要的国际。

从1914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发生危机，消耗了它的潜在力量。资本主义在其衰落过程中已使人类遭受两场世界规模的帝国主义的巨大火灾，并且在这两场大火之间还发生无数次较小的战争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侵略。资本

主义的堕落已经表现为法西斯主义这一最残暴和不可救药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其目的一方面在于粉碎国内的工人组织，另一方面在于对外展开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

欧洲这一所有大陆中最文明的大陆的可怕命运，已经表明人类在上次战争以后由于没有扩大十月革命而正在付出怎样的代价。在这方面昭然若揭的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千千万万的受害人中间，工人们一定会痛心地想起社会民主党和人民阵线反对“流血”革命的论证。除非通过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办法来结束这个大陆的巴尔干化，各国人民将不会有实际得救的希望。

1917—1923年的欧洲第一次革命浪潮唤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庞大人口——人类的绝大多数——进入政治舞台，勇气十足地向他们的帝国主义奴役者挑战。未来的浪潮将更加迅速地蔓延到亚洲和非洲——印度的广大群众已经在勇往直前去迎接这个浪潮了。

其他大陆的形势变化将对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最近十年间，美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体会到它不能避免它的欧洲弟兄们所受的危害。它亲眼看到了美国的欧洲化——在丰裕当中的不断失业和饥饿。只有在军需工业骤然扩大时才获得他们的第一批工作的千百万工人，以及那些比千百万长期失业而等到当兵以后才免于冻馁的人较能苟延残喘的人们，除了重新经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而外，没有其他指望。对于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前途所抱有的幻想既然遭到破灭，美国的穿着军装的工人就不会成为反对欧洲革命的禁卫军。

这就是那种能使苏联免受资本主义包围的肯定要来的革命发展。苏联将在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得到

拯救。

第四国际

尽管世界大战随着第二国际的崩溃而告爆发，革命的浪潮毕竟在 1917 年掀起来了。在 1914 年，只有少数的工人领袖还忠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他们从第二国际的废墟下发掘工人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任务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无法完成的。但历史是在这少数人的一边。

第二国际在 1914 年的崩溃使工人的先锋队措手不及。他们必须在战争当中开始建立新的国际。但是，这一次革命的先锋队预先得到了警告。在所有的大陆和所有的主要国家，早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就安置了第四国际的干部。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经受住了战争的的决定性考验并始终忠于他们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第三国际在战争期间只是为了自行解散才打破沉默，第二国际已经毫无生气，甚至缺乏埋葬自己的精力，而另一方面，第四国际在战争期间却一直发表意见，为即将来临的革命浪潮积极工作和预作准备。

像托洛茨基在小小的第四国际被改良主义的领袖们嘲笑时所正确地预言的那样，战争的严酷考验已经摧毁了除第四国际之外的任何国际和国际组织。无论什么事情和什么人，都瓦解不了这个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继承者。

各国的工人们：集合到第四国际的光荣而纯洁的旗帜下面来！我们正在接近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第五年。它在人类屠杀和物质破坏方面肯定要超过其他的一切战争年份。可是，在战争结束以前，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批的伟大战役也许已经开始了。从人类所受的无边苦难中将再度产生国际无产阶级的遏制不

了的精神，决心在这一次把十月革命开始的任务进行到底。觉醒的工人们将像脱掉外套那样抛弃充当奴隶的习惯，敢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斗争中间，广大群众将在自己身上发现革命的刚毅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无穷泉源。比你们许多人所料想的还要来得快，第四国际的干部在那些日子里将迅即变成领导千千万万人进行最后斗争的群众性大党。同志们和战友们！各国的劳苦人民现在首先需要国际去领导他们。现在只有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即第四国际了。加入它的队伍并且同它一起来领导这个为了世界革命而进行的成功斗争吧！

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

1943年6月12日

五、欧洲成熟的革命形势和 第四国际的当前任务

——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政治决议
(1945年1月)

1944年2月欧洲会议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总的来说，已经证实了会议的看法是正确的。

1944年6月美英帝国主义放弃了他们的观望态度，把全部武装力量投入欧洲战场，其目的在于消灭德国帝国主义，同时遏止和击败革命的潮流，削弱苏联的影响，从而确保战争给他们在欧洲带来的多重收获。

美英帝国主义干涉的反动的和明显地反革命的性质已经到处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干涉

在意大利，美英帝国主义为了反对意大利人民群众的民主和革命的意愿，支持巴多格里奥——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和破了产的王国的一个主要的支柱。巴多格里奥由于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被迫辞职之后，英美帝国主义把波诺米推出来，并继续在他身上和整个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实行它们的反动指导。

在比利时，美英帝国主义支持比利时大金融资本的代表比埃洛。它们毫不迟疑地以它们的大炮和坦克的火力来维护他那遭人鄙视的伪政权。

在希腊，他们公开保护以巴潘德鲁为中心的反动资产阶级以及在希特勒分子占领时期杀害希腊人民的那些法西斯组织。美英帝国主义极其残酷和野蛮地使用飞机、坦克并出动舰队进行封锁来击溃这个小国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力量。

在西班牙，美英帝国主义一方面继续支持刽子手佛朗哥掌握政权，同时它们的政策着眼于减轻因佛朗哥政权的必然垮台而带来的打击，并准备利用一个由军警支持的临时政府来渡过佛朗哥政权垮台后的过渡时期。

最后，在德国，随着它们的军队深入德国境内，美英帝国主义的措施处处表现出它们处心积虑地要防止德国人民爆发革命，并在一旦爆发时加以镇压。他们防止革命的手段是强行成立一个压迫和恐怖的政权，这个政权一部分以希特勒行政机构的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党特务警察为基础。由于英国帝国主义更直接地关心欧洲局势，由于它了解情况较多，由于它一向具有更丰富的经验以及态度更为冷酷，它显得是侵略性最凶狠的帝国主义力量，但是，它和美帝国主义比起来，在对欧洲人民群众革命运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尽管美英帝国主义彼此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和严重的对立状态，虽然他们在欧洲各国的利益有些时候并不一致，他们双方却都认为必须在欧洲各地维持反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在群众的革命潮流冒头的时候便把它打垮。

斯大林主义的政策

苏联斯大林分子的官僚机构已经明确表明它对欧洲任何革命发展所抱的敌对态度同美英帝国主义一样强烈。这种态度是预料到的，并且它已经在比较复杂的方式下表明出来了。其表达方式之所以比较复杂，是由于苏联在欧洲各国的利害关系各不相同，由

于群众对各国共产党的机构施加或多或少的压力。在红军占领下的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芬兰等，资本主义制度被保留下来；军事机器以主人翁的姿态掌握统治权，参加对苏战争的反动将领和法西斯分子如曼纳海姆、米克洛斯、拉德斯库等，在资产阶级政客和共产党代表组成的“人民阵线”的支持下，仍然处于领导地位。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中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使自己在世界帝国主义面前显得是一个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因素。

在法国，为了和这个国家缔结军事同盟以便共同掠夺德国并把法国从美国的势力范围中拉出来，共产党正在带头实行全民团结的政策并且有意识地牺牲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

在意大利，共产党通过它的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追求资产阶级对它的信任并且要和梵蒂冈达成协议，以便在意大利也成为一个大“全民族”的大党，足以按照亲俄的方向更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意大利共产党宁愿和社会党决裂，取消同盟，而不愿意和波诺米决裂。在意大利的工人政党中只有共产党拥护赫姆伯特亲王的摄政。

在西班牙，共产党显得是“民族团结”运动的鼓舞者。这个运动在特别丑恶的情况下，再度对在內战期间和战后拥护佛朗哥的天主教徒、保皇党人和其他反动的或糊里糊涂的分子实行“伸出友善之手”的政策。

在比利时和希腊，共产党被迫暂时反对比埃洛和巴潘德鲁的政府，这一方面是由于群众压力大，有不受领导约束的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要对抗美英控制这个国家的计划。但是，正当广大群众的起义、特别是希腊的起义由于内因而发展起来，变成一个反对全体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并明确地提出夺

取政权问题的时候，比利时和希腊共产党的领导背叛了正在开展的革命运动，他们转变了立场，愿意以成立一个包括由外国帝国主义撑腰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新政府为基础，实行妥协。但是，希腊的经验教训表明：虽然各国共产党普遍实行背叛路线，它们在群众中的根基还是深厚的；由于各国共产党利用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声誉，又由于党员们和下级干部的英勇行动，它们所获得的群众对它们信任的老本钱还远没有消耗净尽。

希腊的经验同时表明：面对一个以群众普遍起义和决心斗争为特点的革命局面，各国共产党的态度不仅仅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反映。群众的压力影响到共产党党员和下级干部的态度，并且带来要和领导们的官僚主义恶习决裂的警告，它使领导受到它的影响，不得不把他们的背叛路线伪装起来，以便最后能够遏止群众和党内基层成员的离心力量。

内 战

然而，无论是英美帝国主义积极的反革命干涉或是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官僚机构的背叛行为都不能阻止欧洲革命局势的成熟。

正如 1944 年 2 月欧洲会议的提纲所着重指出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势所必然地变成内战”。

欧洲的国家正在一个随着一个地被卷入革命的漩涡。当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着的时候，在那些被红军或盟军“解放”的国家中，内战不断爆发并且蔓延开来。

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一些被红军所占领的国家，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农业在经济结构上居重要地位，那里，由于战争的后果以及纳粹侵占期间的凶狠残暴而格外加剧的土地问题的尖锐

化，主要推动着广大群众起来采取革命的行动。在另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等，由通货膨胀、大规模的失业现象、食品缺乏等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崩溃是革命激流的主要因素。五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完全扰乱了整个欧洲的经济生活，耗尽了物力财力，破坏了流通系统，带来了灾荒和苦难。

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局面笼罩着所有“解放”的国家，看不出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另一方面，在这次战争的打击下陷于贫困的英帝国主义对它自认为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一些国家如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已经显然无法再给与任何物质支援，而美帝国主义也不肯在通货急剧膨胀并被第一批革命袭击所震动的欧洲冒险投资和做买卖。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了资产阶级重新建立其被战争摧毁了的经济的可能性。

今天这个局势的革命特点是由这样的一个事实决定的：群众在反对生活费用高涨、反对饥荒、反对失业时所提出的最轻微的要求都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本身打上—个问号，并且不可避免地引起—场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今后的几个月将使这个已经极端紧张的局势更趋恶化。

去年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状态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对立状态都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

随着二等帝国主义的崩溃，随着俄国、美国和英国军队更深入地进入欧洲，而德国的战败看来已无可避免并已日益接近，因此引起了安排今后欧洲和世界秩序的问题——随着这种局面的发展，“战胜国”将感到自己不得不表明它们真正的“作战目的”，具体说明它们的要求，并通过外交和武力来直接巩固它们的利益。

为了进一步削弱英国的力量和保证美国的货物和资金畅通各

地，美帝国主义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对英国企图成立几个专门从属于英帝国经济的集团的政策（在芝加哥举行的民用航空会议、斯退丁纽斯关于英国对意大利和希腊政策的声明）。

另一方面，随着红军深入中欧和南欧，美英同俄国关于解决德国、波兰和巴尔干问题的分歧越来越扩大了。

英国得到美国在这方面的支持，企图限制俄国胜利的范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维护着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作为抗拒俄国夺取整个波兰的斗争工具，利用南斯拉夫国王彼得的阴谋诡计来反对铁托，并粗暴地使希腊屈从于它的支配。但英国最主要的手段将是在德国战败之后公开反对俄国关于德国命运的计划。

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愈来愈尖锐，又由于德国人对美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摆在他们面前的被瓜分、被掠夺的前景增强了抵抗，战争旷日持久，物资上和财政上的损失不断增加。

可是，纵使德国早日败北，欧洲也不可能马上出现社会改善的现象。德国的失败将解放一千二百万的外国工人，将使欧洲失业的人数大大增加。

但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情况将把广大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因而自动地加强在整个大陆上的革命斗争。但是，这些群众由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叛变行为，仍然把执行战争任务放在争取他们自己的种种要求的斗争之上。

资产阶级制止生活费用上涨、降低物价、遏止通货膨胀的所有措施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不扩大生产和恢复国际贸易，任何行政措施也无法恢复货币的真正价值。工业一天不能够以廉价和大量的产品供应农民，行政的措施也就一天不能够消灭黑市。最后，如果不能够同时使工人获得丰富的营养、满意的工资和一个可以

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任何行政措施也无法恢复工人的体力和增加生产的决心。

革命运动的性质

欧洲的革命高潮是发生在帝国主义战争继续进行和各国由盟军或德军占领这种情况的总的框框之内的。正是这个事实仍然抑制着广大群众的革命努力，歪曲斗争的真正的阶级性质，分散斗争力量，并规定革命的第一批浪潮相对地归于失败。

在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由于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控制之下，由于国内有占领军存在，又由于在叛变的工人党所执行的全民团结政策下任何独立的阶级运动都受到仇恨的压力，广大群众过去和现在大体上仍然在一种不利的气氛中进行斗争。

革命运动吸收了大部分的贫农和因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而破了的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有时与工人阶级并肩前进，有时甚至走在它的前面。小资产阶级的酝酿革命是现在欧洲各国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它使资产阶级的危机恶化，正在加速并扩大工人阶级自己的运动。

然而，如果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法找到一个胜利的、比较迅速的解决办法，大批急躁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将免不了像过去一样，转而依靠反动的和法西斯的解决办法。

在红军和美英盟军所“解放”的国家中，破了的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力对群众作出最轻微的让步，又直接受到群众日益激动的情绪的威胁。经验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的资产阶级首先采取的是“强硬的”解决办法，求助于以占领军和在纳粹占领期间被用来击溃群众运动的本国法西斯分子为其基础的警察和军事独裁。

看来在决定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还是法西斯再度得势的重

要关头之前不可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的“民主”时代。但是，不能认为“民主”的阴谋活动不会在某些地方发生，在这些地方，资产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下，能够首先以残酷地反击群众革命初期的进攻为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能够重建它自己的压迫群众的机器（军队和警察），来解除群众在纳粹占领期间所建立的义勇军、游击队等等这样一些自发组织的武装并解散它们——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来恢复它的有恃无恐的心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产阶级再度面临人民群众一次新的、猛烈的革命进攻的威胁，它可能开辟某一个战场来施展它所常用的“民主的”阴谋诡计。

但是，这些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超过在极有限的时间内虚伪地解决问题的范围。

我们对前景的看法以及由此而作出的对不久的将来我们工作任务的规定，千万不要以某些国家可能在群众咄咄逼人的压力下暂时出现一个“民主”时期为依据，而必须以资产阶级的总路线为依据，因为这条总路线是从欧洲各国、特别是从那些具有客观革命形势的国家的最近经验中得出来的。根据我们在比利时以及特别在希腊的经验，我们必须强调有发生下列情况的危险：某些国家可能像第一次大战后匈牙利（霍尔蒂政府）和波兰（毕苏斯基政府）一样，在革命第一次失败之后直接演变为在独裁政权统治下的国家。它们只有靠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直接支援才能摆脱独裁政治。

另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的和侵略性的干涉（最主要的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一些欧洲国家如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希腊等毫不犹豫地使用对待殖民地国家的最凶狠的暴力和屠杀办法）显示出帝国主义如何深切感觉到欧洲各国资本主义政权面临的危险，如何坚决地想用最大的力量在革命泛滥到整个欧洲大陆和世

界其他部分之前遏止革命运动的潮流。

面对着群众的直接威胁，欧洲的资产阶级虽然明知道外国帝国主义的积极干涉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会产生多大危害，还是毫不迟疑地求助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并且主要地依靠这些军队来帮助他们重建他们自己的由军警组成的镇压机构。

在一些国家里，革命的危机是显然以两方面的冲突为起点的。一方面是由抵抗纳粹占领的组织合并起来的群众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决心恢复对群众武装力量的统治权的资产阶级国家。实际上，这种冲突乃是拒绝重新服从旧的资本主义秩序而一心向往于革命的解决办法的人民群众和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集团之间的冲突。

虽然人民群众的意识仍然受偏见、幻想、混乱和无知所蒙蔽，以致惶惑不安，虽然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任何政治纲领、没有任何革命眼光的被阶级合作政策所腐蚀的共产党仍然受人民群众的拥戴来领导他们的斗争——虽然如此，比利时和希腊最近发生的事件却构成了在这些国家确已发生的革命的初期阶段。通过这些斗争和不可避免的将来的斗争，人民群众将抛弃一切衰老腐朽的东西，并将获取必要的经验来引导他们的斗争达到必然会达到的最高峰——夺取政权。

我們在现阶段的任務

欧洲总的说来已经进入一个革命的时期，但革命危机所涉及的范围和一起一伏的节奏却因地而异。在主要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些国家，历史仍旧给我们一段有限的时间，使我们各支部为了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能够加速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另一些国家，如比利时和希腊，我们各支部已经有机会来迎

接开展中的革命运动的初期浪潮。但是目前的形势不是一个朝着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的或反动的结局单方面演变的问题。由于欧洲的一般情况,较长或较短时间的停顿是不可避免的。

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的历史条件不仅是毫无例外地在客观上成熟了,而且是在由熟到烂的过程中。所缺乏的只是在欧洲各主要国家中的真正的革命政党。

虽然我们在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由忠实的革命者所组成的坚强核心,但是不可否认,第四国际在欧洲的各支部中没有一个支部已经能够变成一个在内部机构上和工作方法上都无愧乎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

虽然时间紧迫,并且我们不应当忽视即将发生的事件迫使我们担负起来的任务是多么重大,但是每个支部最重要的任务是毫不留情地根除小资产阶级组织方法的任何影响,扫除讨论小组时期遗留下来的任何痕迹,而用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工作方法来代替它们。

我们各支部必须利用连续发生的各革命阶段中的间歇时间来消化既得的经验,改进它们的处境,为下一阶段作好准备。总的说来,我们欧洲的各支部一定要把即将来临的时期看作是预料到全欧洲将发生更广泛和更尖锐得很多的斗争而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的一个极端紧迫的时期。

在每个国家,第四国际的政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从政治上武装它的成员,加强它的技术上和物质上的力量,扩大它的以合法报纸为主的发表意见的场所,并在所有的工会和政治组织里获得坚强的据点。

同时必须从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拟定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在这个计划里要把过渡时期纲领中的主要口号生动而具体

地表现出来。

下面是在现阶段欧洲各个不同国家里所提出的主要政治问题，我们的行动纲领必须与这些问题相呼应：

一、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由此而发生的失业、生活费用高涨和饥荒。

二、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府的不稳定状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危机。

三、由于抵抗纳粹侵占而出现的群众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命运，以及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四、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干涉。

五、帝国主义战争的继续和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的计划。

我们欧洲各支部的行动纲领一定要以这些问题为中心，以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为基础，并以下列所考虑的一般性的问题作为指南，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从事恢复和发展经济生活的工作。工人阶级将通过它的各个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拟定一项以居民的需要为依据的计划，并在它的各个组织的控制下执行这项计划。

这项计划的意图在于由工人阶级控制经济，同时把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适当地组织起来。

在每一个“解放的”国家，资产阶级已经表明它自己是无力恢复经济生活和改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的。

在一些国家里，资产阶级政府的不稳定状态显示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

由这种从根本上反映出资本主义政权的社会危机的总的局势着眼，我们欧洲各支部将提出“工人政府”和“工农政府”的口号(与该国的性质相适应)。但是，这个在目前完全正确的口号，如果不

与各个国家独特的情况相适应，在群众中无论怎样也是引不起响应的。工人政府并不立刻表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各个国家里只能由一个以工人和农民苏维埃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党来实现。工人政府是一个由所有自认为工人的政党组成的政府。这些政党暂时还获得群众的信任，并且宣布它们准备要实现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最低行动纲领。这样的政党就是今天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因此，我们各支部发出的工人政府的口号不外乎具有这样的含义：我们对工人的政党说，“断绝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联盟，夺取政权，实行你们的行动纲领。”

我们各支部的领导者必须随时抓紧每次政治局势恶化的时机，具体地提出这个口号。

这样一个政府必须以工人阶级和一般劳动群众的组织为基础，以民兵、工厂委员会、家庭主妇委员会和工会为基础。但是，我们各支部在这方面也必须能够在爱国民兵队、法国的地下军、希腊的游击队这样一些已经存在的组织中（不必计较它们的名字和它们的反动的方向）看到它们进步的社会内容，支持它们，改变它们的方向并使它们得到发展。

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对那些在反抗纳粹侵占时成长起来的民兵队和游击队的武装组织进行猛烈抨击，这说明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判断力在这方面比我们队伍内部和外部的极左派的政治直觉要正确些。

第四国际的追随者不应当不理睬这些群众武装组织，或是对它们一概加以责备，而是必须设法发展它们的进步的社会内容，引导它们成为一个反对资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独立的政治组织。

外国帝国主义的积极干涉，首先是英国帝国主义在比利时、意

大利和希腊的干涉，具体地说明一方面需要大力宣传同占领军士兵交朋友，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我们在英国的各个支部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

欧洲执行委员会号召欧洲各有关支部尽快地散发以士兵为对象的英文宣传材料，用各种手段增进它们同被占领国家的劳苦群众、德国群众和士兵交朋友的趋向。

最后，必需考虑到战争仍在进行这一事实，它将使群众付出比以前更大的牺牲。

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必须尽力反对全民团结的潮流，抓住一切机会对群众说明帝国主义者是不能使战争迅速结束和巩固一个民主的持久和平的。

只有通过各国劳动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欧洲的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联邦，战争才能结束，真正的和平才能实现。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必须无情地谴责“盟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和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那些外交官为准备对战败国、特别是德国进行抢劫掠夺而详细拟定的凶恶计划。

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强调指出，各支部必须赶紧放弃对群众来说仍然是抽象和难懂的纯理论性的宣传，立即详细拟定一个行动计划。在拟定计划时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要掌握足以发动群众并促使他们在革命上成熟的一切手段。

一个空前的革命形势正在全欧洲展开。

在这个时期的伟大的形势发展中，我们能否完成我们的任务，成为确能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的真正政治力量，其关键就在于我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能力如何。

第四国际欧洲执行委员会

六、只有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才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宣言(1946年4月)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以后的这个第四国际第一次世界会议，是在社会危机已经达到空前的深度和广度的时候召开的。

上次大破坏的那种余烬未熄的毁灭、糜烂和流血景象犹在目前，人们已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这几个帝国，已被“联合国”摧毁了。但胜利者之间已在进行一场猛烈的竞赛，争取掌握最完善的毁灭性武器——原子弹。经过用飞行堡垒和超级坦克、飞弹和反坦克火箭炮、火焰喷射器和卡秋莎进行的总体战而还能留存下来的东西，在一切致人死命的发明中的这一顶顶彻底的发明面前可能被消灭净尽。由此可见，人类的危机已经道道地地十足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四种自由”的欺骗

“联合国”的各国政府及其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首的仆从们，还有工会的官僚分子，都一本正经地把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吹捧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维护民主的战争。用这次战争的大头目、已故的美帝国主义首脑弗兰克林·罗斯福的话来说，这是争取“四种自由”的战争。

人类现在不是享受“不受忧虑困扰的自由”，而是面临着以原

子战争实行自我毁灭的威胁。

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地区现在不是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而是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

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现在不是享受“言论自由”，而是被迫服从军人政府或胜利者所扶植的傀儡的命令。

只有虚假的“信教自由”还存在着，它在统治者的手里始终是用来在被统治者中间制造仇恨和纷争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这就是所许下的几种自由的真面目。同时，在胜利者的仁慈的目光下，法西斯主义换上新装又抬头了，像意大利的“无论何人”（l'Uomo Qualunque）运动和其他地方这类的运动就是例子。

这些便是那次战争的所谓目的，是对人民群众夸下的海口。它们已经证明是一堆骗人的谎话。在1940年5月第四国际临时会议的宣言中，我们就预先拆穿了这些谎言。只有第四国际说了老实话：

“同旨在麻醉人民的官方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写的1940年的宣言说道，“战争的主要根源，像其他一切社会弊害——失业、高额的生活费用、法西斯主义、殖民地压迫——的根源一样，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连同以这一基础为依据的资产阶级国家。”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列宁一样，我们警告说：“可是，只要社会上的主要生产力掌握在托拉斯、即很小的资本主义集团的手中，争取市场、争取原料产地、争取统治全世界的斗争就必然会越来越带有破坏性。”

这些是真正的目的。这些在今天仍旧是引起一次战争的動力。

我們重复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话：如果工人阶级胜利的革命不去设法搞掉剥削性的私有制，建立一个适应需要的有计划的社会

主义生产体系，帝国主义战争是肯定还会继续发生的。这次是以核武器一下子消灭所有国家的全部工业地区的战争。

这个宣言因此是对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而发的。人类的命运操在他们的手里，并且只操在他们的手里。第四国际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的这次会议，正就是向他们来解释它对我们大家所面临的形势的看法的，而我们也正就是向他们发出号召，要他们起来反对世界的统治者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那次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争取市场、争取原料产地和争取世界经济霸权。两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斗争中对立起来。

一边是像英法这样一些旧的、趾高气扬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早就把世界市场的绝大部分瓜分为殖民地，但它们的陈旧的工业技术使它们的经济势力非常薄弱。

另一方面是像德国和日本这样一些比较年轻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后来才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崭露头角，因此在以最新工业设备装配自己方面占了优势，但它们发现世界市场已被瓜分，只有依靠武力才能从旧的国家手里夺取殖民地。

在前者的圈子里，也有像比利时和荷兰这样一些“吃饱的”次等强国。在后者的圈子里，有意大利这样的“饥饿的”国家。它们归属哪一方面，以它们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舞台上的先后为断。

在这一类国家的上空翱翔着的，是最新的资本主义大国、即美国的威胁。虽然美国也是后来出现在舞台上的，它却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就使它在—一个长时期内能够逐渐富裕起来而不必同其他强国直接发生冲突，同时能够建立世界上最新的生产设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第二次大战的前奏，美国只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才参加这个战争的。它想要阻止德国的并吞全部欧洲的威胁。

与此同时，世界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设备已经扩充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使现有的市场相形之下都比从前缩小了。争取市场的斗争因而就使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其他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诉诸战争的打算完全是由拼死拼活争取市场的程度决定的。“不输出毋宁死”是纳粹德国在其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中的口号。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英法两国打败德国的时候，它们在经济上就大大地遭到削弱而十分有利于美国，结果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捞到了最大的好处。

但是，使整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缩小的头等重要的因素是 1917 年 10 月在俄国爆发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废除私有制并使一切工业社会化，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这次革命一举而使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区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剥削。

在这次事件的影响下，远东发生了第一批大规模的殖民地起义运动，向帝国主义提出了烽火即将四起以反抗其统治这一警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 1917 至 1921 年力图用武装干涉来粉碎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在计划失败以后仍把贪婪的目光投向这个已经丧失的市场。它们担心革命蔓延到欧洲会使它们损失更多，同时还想收回原有的损失，因此它们在同伙中间所进行的斗争在二十多年的期间一直不是很剧烈的。这就是 1914—1918 年的所有的胜利者要帮助资本主义德国复兴的原因所在。它们打算利用德国作为反对苏联的撞墙车。同时，英国希望为这个目的出一份力量，以便削弱它的法国竞争者和寻找同盟来反对美国巨人。

法国和美国也抱有同样的目的。

纳粹德国的兴亡

可是德国资本主义既然经人扶植而站了起来，又掌握着它所已经达到的高度技术文化，就不会甘心充当这样的角色。由于没有发生一次席卷大陆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欧洲的统一，德国的资本家便用反动的手段把统一欧洲的任务担当起来。这将是他们争取世界霸权的跳板。为了实现这些野心，他们选择了前所未有的最残忍、最野蛮的政体——阿道尔夫·希特勒的纳粹国家。纳粹国家的任务是镇压国内的工人阶级，打倒苏联并同美国进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这个任务的最初阶段直接受到那些“民主”国家的援助。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分子和工会官僚机构的破了产的、怯懦的和叛卖的政策给这个任务提供了方便条件。甚至当后者的切身利益遭到威胁时，他们也无法组织一个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来反对纳粹主义。以后的阶段引起了同西方国家的冲突，最初是社会民主党人、接着是斯大林分子才站在西方国家的方面参加了战争。

在远东，帝国主义者同样把日本看作是反对苏联的堡垒。日本也是不甘心充当它的这个角色的。在得到其他国家的纵容而并吞了半个中国之后，日本天皇的帝国向英美统治太平洋市场的权力挑战，以便建立一个日本人的“大东亚”。

意大利、德意志和日本的经济资源是不足以进行接着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总体战的。它们终于一个接一个地在斗争中被打败了。可是英国、法国和其他二等强国不再能够参加这种世界规模的斗争了。英法两国在战后已经矮了半截，它们的经

济空前地遭到了削弱，它们的帝国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它们作战的真正目的——保留它们的市场，继续实行并扩大它们的殖民地剥削，捍卫它们的由来已久的利润制度——像德国和日本一样落空了。

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前途

只有美国在战后是大大地加强了。它的敌手日本和德国受到严重的破坏。它的盟国法国和英国对它负债累累，几乎处于附庸的地位。可是美帝国主义所能获得的胜利究竟是怎样的呢？

苏联这个在 1917 年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很大一部分世界市场仍旧存在着。它甚至就要并吞它的国境周围的其他许多国家，从而使资本主义市场进一步缩小起来。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其余的世界受到战争的糜烂，变得非常穷困，它的居民的购买力减少了一半。同时，美国的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

即使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是绝对的和不容争辩的，它也只能在短暂的市面繁荣时期获得利益，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全部工业都转向军需生产，国内和国外的货架还完全是空的。一旦恢复平时生产的工业开始满足郁积的需求时，美国资本主义就必须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一次十分严重的经济萧条，其结果使 1929—1933 年失业人数达一千五百万的往事相形见拙。

可是华尔街的霸权既不是不容争辩的，也不是绝对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活水平和工资较低，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使华尔街感到烦恼的竞争对手的地位。

苏联的重新开始它的计划生产，特别是加速以革命手段推翻斯大林的统治并重新建立工人的民主，是一个经常存在的威胁。

同时，殖民地世界不断地发生起义——起初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并且弥漫于印度和中国，更不必说近东和非洲了。

欧洲的群众已经显著地左倾，向包括英国这个世界上最老的资产阶级的制度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挑战。可是，工人们在这倾向的最初阶段所依赖的传统的工人政党（工党、社会党人、斯大林分子）的怯懦和变节，以及长期没有群众性革命政党这一事实，已经暂时阻碍了它的发展，使它不能变成成功的革命。

华尔街自己的军队反映出它的士兵所由产生的劳苦群众的心情，吵嚷着要从世界的一切前哨返回本国。士兵们不愿充当无数奴隶的监视人。在国内，财阀已经发动一次冻结工资和破坏工会的运动，其目的在于为低廉的生产作好准备，借以巩固那些由军事力量夺得的市场。可是老板们碰到数以百万计的罢工者的反抗浪潮，他们反对那个运动，争取使他们的工资同上涨的生活费用相适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即使就世界的统治者们的真正目的来说，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也丝毫没有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相反地，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尖锐了。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继续存在，只要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继续进行，只要在群众的购买力不断下降的当中寻求不可捉摸的市场的努力继续保持下去——那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苦难、混乱以及不可避免地徒劳无益地求助于战争的行径就不会中止。

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有五千万人死亡，另有五千万人残废，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城市和田野遭到巨大的破坏和糜烂，可是这个战争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它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结局只会是原子武器消灭人类，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这个战争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不要弄错。第三次世界大战在酝酿中。丘吉尔的反苏、反共的大声疾呼的演说，围绕着原子弹而发生的间谍恐慌，在美国军队中重新规定保守部队调动的机密和重新加强空军活动的命令——所有这些都是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声。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们一味贪得无厌地追求超额利润，完全不顾人类的命运。从1914年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异常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只有那些会把社会变成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人类野蛮的自杀。

马克思主义预测的力量

当纳粹的装甲车隆隆地开过欧洲而到达英吉利海峡，以及希特勒仍旧维持他同斯大林签订的盟约时，某些敏感的人摒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了“别开生面的”结论。按照他们的看法，欧洲面临着整整一个“新秩序”的时代。有些人甚至趋于极端，认为那些事件和苏德条约意味着兴起一个新的阶级，来代替固陋自守的资本家以及争夺社会统治权的无产阶级。他们谈到新的“管理人的社会”，这个社会概括在一个项目之下：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罗斯福的新政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这些别开生面的说法在小资产阶级中间获得广泛的流传，甚至渗透进工人先锋队的队伍。第四国际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创新者”以

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其 1940 年的宣言中写道：

“作为奴役各国人民的报答，希特勒答应要在欧洲建立一种持续几百年的‘德国式的和平’。真是毫无根据的痴心妄想！战胜拿破仑之后的‘英国式的和平’之所以能够持续一世纪——不是一千年！——完全是因为英国当时是一种新技术和一种进步的生产制度的先驱。尽管它的工业实力雄厚，今天的德国却像它的敌人一样，是一个注定要消灭的社会制度的旗手。”

这个评价被证实得何等快啊！修正主义者的评价又被驳倒得何等快啊！第四国际的力量在于它的能够经受巨大事件考验的纲领。

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崩溃只是证明了，即使是最残忍、最公开的国家独裁的形式也解决不了资本家阶级的复杂的矛盾。疯狂的法西斯主义和堕落的资产阶级民主是注定要消灭的，因为它们不过是早就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否定的同一腐朽的社会制度的不同形式罢了。

第四国际在 1940 年也驳斥这样的謠言，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英国将保证协助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国家同盟，并且和它共同参加世界市场。

“国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那个宣言说道，“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认为这个最强大的国家会自愿放弃它的实力所给予的利益，正如认为各托拉斯之间会自愿平分资金一样，是一种可笑的空想。”

至于说到美国本身的前途，那个宣言说：“然而，美国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工业、财政和军事实力决不能保证美国经济生活的繁荣，反而只会使它的社会制度的危机带有特殊的恶性和震动性。”

不妨把六年前的这些预测同今天的现实比较一下。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第四国际的分析都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今天世界上的基本对立：苏联对世界帝国主义

那时，以苏德条约为依据的形势考察引起了关于苏联“基本上”同法西斯国家站在一起的推测，正如后来条约的破裂以及缔约双方的发生战争引起了苏联“基本上”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这一断言。第四国际的提纲早就作出了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评价：

“资产阶级和苏联的插曲式的协定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从历史的范围来理解，世界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矛盾比那使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反对的对立要深刻得不可计量’。”

只有根据这个评价，希特勒在缔结苏德条约以后又对苏联发动战争的行动才能得到解释。只有根据这个评价，我们今天才能解释美帝国主义及其英国小伙伴为什么现在会发动贩卖战争的猛烈运动来反对它们昨天的盟国苏联。

我们当前世界政治的整个时期明显地具有这个基本矛盾的特征。尽管苏联在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统治下已经经历了越来越严重的蜕化，可是，只要苏联仍然存在而其现有的社会结构保持不变，它始终是帝国主义贪心不足地抢夺市场的道路上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解决这个矛盾而只是使它更加尖锐。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苏联西部整个工业地区的破坏，已经大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力量。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反动的、沙文主义的和掠夺的政策，则由于疏远了苏联的天然同盟的广大阶层、即东欧的群众，在政治上削弱了苏联。可是，苏联虽然经历了战争而依然存在，官僚机构没有能够从内部破坏它的社会基础，甚至被迫促

进红军在其指挥下所占领的那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经济方面的社会改造——这个事实已经增加了帝国主义的问题的尖锐性。所以帝国主义者提出了同苏联清算的问题，作为他们的最迫切的任务。

第四国际始终毫无保留地主张保卫苏联以反对帝国主义。但是这种保卫只能比以往更是一种革命的保卫。因此，它决不会和克里姆林宫的反革命政策有任何共同之处。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作用

“保卫苏联在原则上是同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一致的。我们断然拒绝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因为这是无知的和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产物。只有世界革命才能为社会主义拯救苏联。但是世界革命带有克里姆林宫寡头政治的不可避免的侵蚀。”

1924年，斯大林最初宣布了这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邪恶的理论，从那以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就用来阻止其他任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理论的用意是要为一个民族主义官僚们的特权阶层的筑垒自保的行动作辩护。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资本主义欧洲第一次革命浪潮的衰退中间处于孤立地位，俄国本身连年的内战使人们感到疲劳，苏联的官僚机构以这些情况为根据，力求牺牲它赖以爬上政权的群众来保证自己享有特权地位。列宁的国际主义政策曾经获得各国工人的援助，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头几年中挽救了苏联，斯大林主义集团却抛弃了列宁的国际主义政策，利用他所建立的共产国际来暗中破坏一系列革命的机会。

因此，在1926年英国发生总罢工时，它同英国工党的工会委员会作了一笔机会主义的交易，阻止大罢工浪潮的革命发展。在

中国,从1925到1927年,它让共产党被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策束缚了手脚,终于造成中国无产阶级的刽子手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从1929到1933年,它宣传了那种把社会民主党人和纳粹分子结合在一个目标之下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妨碍了工人组织的统一战线的斗争,从而使希特勒得以执掌政权。1936年,当静坐罢工的浪潮提出了法国的政权问题时,它同改良主义者成立的“人民阵线”努力使工人阶级受资本家的束缚。当西班牙在那一年爆发了内战时,“人民阵线”不遗余力地限制群众的革命行动,使他们不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控制范围,从而使弗朗哥有可能取得胜利。推动这整个政策的发展的,是这样—个愿望,即:讨好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及其在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代理人,借以防止外来的攻击,使那官僚机构能在苏联内部保卫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纯粹的工具。苏联的天然同盟者,即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被斯大林分子从失败导向失败。

在苏联本国内部,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对列夫·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展开了狂浪般的镇压。这是因为托洛茨基指出了日益发展的叛卖行为的每一步骤,从宣布“—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起,到扼杀西班牙的革命为止。只有集结在托洛茨基和国际左派反对派旗帜下的各国先进的共产主义斗士,才能最初就了解到这个篡夺了第一个工人国家政权的集团所作的这种演变反革命意义。可是,1937年的莫斯科审判案和对整个—代的列宁同事的血腥清洗,开始使工人的越来越广大的阶层看清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作用。

随着苏德条约而来的是瓜分波兰,以及把纳粹帝国主义形容为“爱好和平”的涂脂抹粉的宣传。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嗜好的问题”。各处的广大工人群众都厌恶克里姆林

宫的这种卑鄙的自我堕落。当希特勒开动他的全部战争机器来对付苏联，借以报答斯大林集团的这种揭开战争序幕的功绩时，克里姆林宫改变了主意。在一次最疯狂的沙文主义的运动中，斯大林为了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不但把昨天的“爱好和平的”纳粹匪帮而且把**全体德国人民**都说成是应该加以污辱的！

克里姆林宫的种种政策

今天，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红军在斯大林主义的命令下被指示着在德国、奥国和整个被征服的东欧去掠夺工业和打家劫舍。其目的据说是重建遭到破坏的苏联工业。这是令人作呕的谎话。抢劫和掠夺的目的完全在于遮掩斯大林政权的破产，因为苏联群众愈来愈不听斯大林政权的驾驭了。

专为官僚机构及其特权服务的现今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表面上是要加强苏联的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正如战前的全部政策是要使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中立”和防止战争一样。可是，同英国工会的骗子们勾结，向蒋介石投降，贩卖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让希特勒不经过斗争就执掌政权，最后是签订苏德条约——所有这些“聪明的”策略并没有阻止希特勒的战争和避免苏联一半工业的破坏。它们大大地削弱了苏联，使它的进展后退了好几年。与此恰恰相同，目前所采取的在东欧和亚洲进行抢劫和掠夺以及公然在这些国家镇压群众运动的反革命政策，势必只会加强美帝国主义及其为最后打倒苏联而作的种种准备。

托洛茨基在 1940 年写道：

“作为战争初期的结果，苏联尽管有一些装饰门面的成就，它的国际地位显然已经每况愈下了。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已使世

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各国人民的广大群众同苏联疏远……同时，德国已经获得了波兰的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和最重要的部分，并取得了同苏联接壤的边界、即通向东方的门户。”

一年以后，这个警告完全得到了证实：

今天第四国际警告说：尽管在领土方面有所扩展，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在此冲突的最近阶段仍然进一步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东欧各国人民对克里姆林宫的罪恶政策感到愤慨，并且像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选举所表明的那样，求助于最落后的政党来发泄他们的忿怒。在远东，群众的反抗情绪不仅在英国和美国所统治的地区表现出来，而且在红军所统治的朝鲜和满洲表现出来。同时，美帝国主义已经到处渗透进苏联的前哨基地，从战略上包围它的从东欧到中国的地区、即全球的整个范围。

这样，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只是便利了帝国主义的反对苏联本身这一目的，同时又担当了直接镇压群众争取解放的独立运动的任务，因而它和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一起承受着群众的憎恨和畏惧。

只有群众的革命行动才能阻止以掠夺为目的的帝国主义的计划，用扩大 1917 年 10 月的社会革命的办法来保卫苏联。但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有在争取推翻苏联本身的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政权并代之以工人和农民自由选出的苏维埃的斗争中才能取得成就。由此可见，保卫苏联就意味着直接保卫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欧洲和世界革命。

目前革命的形势

群众采取革命行动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一方面是斯大林主

义,另一方面是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帮凶,这两种力量是否会再度使革命发展不能得出成功的结论?第四国际现在所能掌握的力量很小,它是否能克服这些困难并领导群众?这些无疑是认真思考的工人们必然会提出的问题。

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下历来所遭受的失败确实令人痛心。那些失败是严重的打击。今天斯大林主义的庞大势力无疑地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可是,同这些情况相对照,还必须估量这样的事实,即现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危险局势远比以前来得严重。这是革命者的出发点,也是企图为群众指出行动方向的人们的出发点。

第四国际早就列举了工人革命的条件: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已为历史经验所证实并从理论上得到阐明:1)资产阶级已经是日暮途穷,统治阶级由此产生了慌乱;2)小资产阶级群众深感不满,他们力求断然地改变现状,而如果得不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就无法自存;3)无产阶级群众深感他们的处境难以忍受,准备采取革命行动;4)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明确的纲领和坚强的领导——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四个条件。”

资本主义的处境从来没有这样困窘,统治阶级的慌乱也从来没有这样普遍。许多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剧烈的通货膨胀。国债的负担达到天文的数字。整个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贫穷化达到空前的规模。尽管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却继续令人眼花缭乱地盘旋上升,并且当它在欧洲和各殖民地已经变得十分深刻时,其势就要袭击世界上最稳定的经济,即美国的经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重新建立处在肇始于俄国的革

命浪潮的威胁下的社会中的阶级均势，资产阶级决定对群众作大量的经济让步。这样，它就使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制度得到某种程度的稳定，而这种政治制度本来就是用来拯救资产阶级，使它免于毁灭的。在这次战争以后，这种策略是资本家阶级没有力量再供应的奢侈品了。特别是在欧洲，那里的适应战争需要的非生产性支出和资本价值的大规模破坏已经大大地削弱了世界市场上的经济的特殊势力，因此，资产阶级只有再进一步向群众的工资和生活水平进攻，才能希望重新建立起一点点谋取利润的资本。可是从广义上说，这种分析对英国和美国也是适用的。

所以，如果说英国的工党或法国、比利时等等的“人民阵线”中的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联合得以掌握政府，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意。统治阶级之所以容忍这些“左倾的”政权，是因为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压力十分强大，他们自己的势力还太薄弱，使他们无法实行公开的独裁。资本家们断定经济崩溃的结果将使那些被迫掌握政权的群众的传统政党信誉扫地。他们正确地估定这些政党的怯懦，因为它们害怕超出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范围，原封不动地保留反动的军队和警察的组织，敬畏资产阶级奉为神圣的私有制。

既然工人和农民对托拉斯的憎恨促使他们吵吵嚷嚷地要求实行工业社会化，执政的改良主义政党就不得不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并不触及大企业的财产权利。它们保证“国有化的”工厂的老板获得充分补偿，从而在负担已经过重的经济上面又加上新的负担。依靠发给他们代替从前的股票的政府证券，资本家保证可以得到源源不绝的利润。管理“国有化”工业部门的工作不是移交给工人委员会，而是实际上由那些服务于托拉斯的旧经理人员所掌握。利用这些虚假的“国有化”，资产阶级力求把支配

整个经济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手中。

当社会党和斯大林主义代理人解除那些在纳粹占领期间兴起的工人和农民的独立义勇军的武装时，当他们镇压武装部队中阶级反抗的一切表现时，资产阶级把国家的常设机关（军队、警察、特务组织）集中在它自己的手里。它暗中作好准备，同王朝和反动将军串通一气，以便在适当的时刻攫取对国家的完全控制，建立新的拿破仑式的独裁。

同时，资产阶级的全盘政策既然以恶化的经济情况为依据，就具有优柔寡断和迟疑不决的特征。经过一年多的利用种种独裁主义要求来支持他的地位的努力之后，戴高乐把位置让给别人，躲到法国的幕后去了。在比利时，资产阶级在其赞成国王莱奥波复位的运动中屡进屡退。在希腊，企图在英国刺刀保护下恢复君主政体的努力预示即将爆发公开的內战。如此等等。

小资产阶级的命运

与此同时，过去垄断资本主义赖其支持以推行国内方针（法西斯主义）和对外政策（战争）的小资产阶级，已经挣脱大企业的控制。在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形式的国家中，正如在“民主”国家中一样，城市中间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贫穷化的过程不仅没有停止，而且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储蓄的荡然无存和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而加速了。另一方面，农民虽然像在每一次战争中那样似乎已经从黑市买卖中获得好处，实际的生活却并不比以前好些。他们赚的钱主要表现为贬值的通货。虽然拥有纸币财富，他们却无力购买必需的、日益昂贵的农业机器、肥料、牲畜等等。这样，前途就出现一个新的和更加尖锐的农业危机。

而且，战争已使小资产阶级关于全国团结一致的旧的幻想归

于破灭。大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它是完全“通敌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及其要求彻底改变现状的努力表现在它的大规模地倾向于它一向称之为**劳工党**的政党方面。除非从这个角度来看，否则就无法理解英国工党的巨大胜利，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的获得大量选票，以及人们对希腊的民族解放阵线的大规模支持等等的事实了。

同时，高涨的罢工浪潮相继地波及欧洲和远东的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本身的美国根据地达到它们的高峰，并蔓延到它在南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这些罢工浪潮以其百折不挠和高度的战斗精神以及它们所提出的口号（“争取按物价规定工资”、“打开大公司的账册”等等）证明工人阶级群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不可忍受的处境。战争结束初期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民兵队和工厂委员会的初步组织虽然暂时由于斯大林分子和改良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有了默契而遭到遏阻，却清楚地表明是采取革命行动的预习。

如果说这些革命行动预习的成分在欧洲还没有实际成熟，这大部分是由于德国在实质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瓦解局面。人们本来认为整个大陆革命斗争加剧的导火线将表现为德国革命的爆发。克里姆林宫在战争期间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德国人民实施的罪恶的沙文主义运动——并且受到所有“民主”国家中变节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支持——使德国群众在灾难性的军事发展过程中手足无措，并使他们的行动随着纳粹政权的日趋崩溃而陷于瘫痪。同时，“三大国”串通一气，用预先商定的空前的具体破坏手段来阻止革命的爆发（其规模比在法西斯主义垮台后对起义的都灵和米兰进行的轰炸要大得多）。

对德国的展望

在欧洲，德国工人阶级具有最强大的潜在力量和悠久的革命传统。在它能够走上它无疑地愿意走上的革命道路以前，必须实现一些具体的先决条件（重新确立最低限度的食物、住所和交通工具，从战俘集中营接回几百万青年）。可是，没有能够在德国立即爆发革命这一事实只是影响了发展的速度。它丝毫没有改变那个趋势。

尽管有这种事实，尽管工人的民兵队被解除武装，尽管希腊群众的武装斗争被镇压了下去，我们却没有看到有转向反动方面的迹象。这些失败没有一项是有决定意义的。相反地，反动势力方面想要筑垒自保的一切企图（通过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的君主政权，通过法国专制政府部门的建立）至今都遭到群众方面最猛烈的抵抗，没有达到目的。

另一方面，工人们并不限于同所有这些反动的企图作斗争。他们转而采取攻势。针对他们“自己的”政党所参加的资产阶级政权而举行的反对冻结工资的罢工，在客观上提出了国家政权问题。

固然革命的发展在欧洲放慢了速度，它们在别的地方却加快了步伐。美国的军人示威和罢工的浪潮证明美国群众革命意识的迅速发展，而过去在这方面要比欧洲落后得多。但甚至更为重要的，乃是现今殖民地革命斗争的成熟。远东的斗争浪潮开头是举行不屈不挠的起义以反抗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的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主义，并且甚至在菲律宾初步掀起了反抗伪善的、“放松统治的”美帝国主义的运动，现在这个浪潮已经渗透到印度群众中去，在那里，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和叛变预示将爆发目的在于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全国性的起义。在中国和以后在日本的影响

肯定是会让人认识清楚的。在近东，埃及群众持久性的大规模示威和罢工是所有阿拉伯国家群众革命起义的序幕。

这样，世界形势表现出了实现 1940 年宣言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头三个条件的一切特征。第四个条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和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坚强领导”呢？

这个问题是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在一个由于它的深刻的危机性质及其普遍的程度而无疑地比以前更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为成功地领导革命所必需的政党是否存在？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能够把目前革命的少数派变成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还是改良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旧的政党再度能够出卖革命？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它所特有的背景里来加以考察。目前的形势并不是以一个紧急关头为特征的形势。它不是在一个特定国家里发动一次起义的问题。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个整个革命时期的问题。除了临死前拖长的痛苦而外，资本主义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出路。在这种时期，旧的政党——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的纲领在群众中间不会有丝毫效力。所以那些纲领必然同群众相抵触。另一方面，我们的纲领恰恰是为了这个时代而规定出来的。在我们面前展开的种种动乱中，我们的纲领已经获得并将继续获得越来越热烈的响应。

不过在短短的几年以前，一些门外汉和怀疑论者嘲笑过第四国际的过渡时期的纲领。今天，它的主要口号——“争取按物价规定工资与工时”，“争取无偿的国有化”，“让工人委员会检查大公司的账册”，“争取成立工人民兵队”，“争取建立工农政府”——正在开始得到世界各地千千万万人的共鸣。这个纲领是清楚明了的。它所得到的越来越热烈的响应证明完全有可能建立第四国际

的群众性政党。

可是，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建立群众性政党也是一个会碰到很大困难的过程。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组织问题要求具有熟练的技能。领导人员和党以及党和群众之间必须互相信任。这个过程并不到处都是一样的。毫无疑问，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和一个革命的领导机构的不能及时产生，会造成局部的失败。可是，恰恰是因为牵涉到一个整个的时代，这种失败才是局部的，迅速建成群众性政党的任务才经常重新提到我们面前，机会才有所增加。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年轻的政党所依据的希望。

首先，为了保卫这个纲领，正在产生一个坚强的革命领导机构。如果说第四国际的这个纲领今天正在开始深入人心，如果说它正在开始从行动的考验中得到证实，这首先是由于第四国际各个党的年轻干部有能力抵抗人们对国际的基础所进行的一切攻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继续存在。

第四国际经受住了战争和反动势力的考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继革命浪潮的衰退而来的反动的年月里，第四国际的干部集合起来从事反抗逆流的艰苦斗争。第四国际的创始人托洛茨基的“回到列宁！”这个口号是在1923年斗争开始展开的时候提出的。这是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在反对斯大林以及当时通过修正列宁和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而开始走上反革命道路的整个集团时提出的独创性口号。这是以后几年表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忠于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能怎样获得成功的历史上第一个和唯一政党的纲领和概念的口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第四国际再度有机会同其他那些

想要修正革命纲领基础的企图进行斗争。这次是在它自己的队伍中。正是在那场斗争里面第四国际从内部武装了自己，以对付随之而来的几年战争的痛苦的考验。“回到列宁”，回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回到交战各国人民的友爱互助，回到对苏联的革命保卫，回到阶级斗争的继续，回到未来革命任务的准备工作——这就是第四国际在纳粹恐怖下和“联合”迫害的包围中的黑暗年月里的口号。

第二国际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个国际里面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变成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可怜的宣传机构。这次瓦解更加可笑地重复了它在 1914—1918 年的行为。

在受到好几年的叛卖行为的腐蚀之后，第三国际被斯大林做了交易，以交换华尔街的租借办法，不复存在了。

所有像伦敦局那样的中间派组织干脆分裂成为它们的组成部分。

只有第四国际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的旗帜。只有第四国际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只有第四国际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忠于十月革命的传统。“回到列宁”始终是我们的口号，因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口号。

我们的英雄烈士

这场战争是对第四国际的一次可怕的考验。现社会的一切势力，从帝国主义及其战争机器起到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及其国家政治保安部为止，都站到一条线上来反对它。

就在战争的第一年，在 1940 年 8 月，第四国际丧失了它的创建人和组织者、当代伟大的革命天才。列夫·托洛茨基是在墨西哥被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个特务卑鄙地杀害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们的敌人以为这是可以致年轻的国际于死命的。可是托

洛茨基的出色的建党工作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托洛茨基是死了，但是他所建立的国际把这卑劣的打击看作一种挑战。第四国际以远远地超过以往的扩大和发展来纪念它的伟大的烈士。

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希腊，在欧洲整个大陆，第四国际的干部曾受到希特勒秘密警察的残忍的恐怖行动的迫害。

莱昂·勒斯瓦尔、马塞尔·希克、潘特利斯·波利奥博洛斯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整个一代英勇的托洛茨基主义领袖们，牺牲在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兽性之下了。

就在纳粹统治欧洲的局面下，法国和德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起组织了士兵和工人之间的友好协作关系。他们出版了并在希特勒国防军内部散发了《工人和士兵》这个出色的报刊，它甚至在沙文主义的暴风雨还很猖獗的时候就高举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有六十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士兵和工人在不屈不挠的维克托·威德兰的领导下为这项工作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当第四国际胜利的时候，他们将被所有的工人所怀念。

在希腊，斯大林的无恶不作的特务就在1944年12月的内战期间杀害了一百多个第四国际最优秀的战士。

但是他们无法消灭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尽管遭到摧残性的惨重损失，第四国际各支部仍然在欧洲整个大陆有了发展。

在英国和美国，“民主的”资产阶级唯独在所有的工人阶级政党中把托洛茨基主义的领袖们投入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监狱。他们力图扼杀我们的这些党。可是英国和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像他们欧洲的弟兄们一样，把这种迫害看作挑战，更加奋发起来。

甚至更加歹毒的，是在印度和中国以及在殖民地国家对我们的同志们所施加的迫害和囚禁。可是在那些地方，第四国际的战士们也证明是能够经受统治者的挑战的。

就在恐怖和迫害达到最疯狂程度的战时环境下，在印度、埃及、意大利和南美洲产生了第四国际新的支部。

无论斯大林、希特勒或“民主”帝国主义者都无法阻挡第四国际的奋勇前进，这个事实是未来的保证。它给工人们指出，挫败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叛卖行为的最可靠办法是团结到我们的新党、即懂得怎样抱着第四国际的纲领逆流前进的政党里来。

战争的考验已经证明，第四国际不仅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具有那种即使是最严重的逆境也无法阻挡其发展的生命力。这次会议在几年失掉联系之后查点了各支部，可以自豪地对全世界的工人们说：

你们的国际活着！第四国际已经经历了反动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凶险的年月而继续存在着！第四国际的各个党到处都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

不仅如此，这次会议还能报告全世界的工人，第四国际的各个党虽然在战争期间彼此隔开并且没有直接联系，却发现自己在纲领上比以前团结得更好！第四国际本身的经验已经证明，它的力量在于它的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第四国际在对反动势力和战争的斗争中的生存和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它的各支部完全能够发展成为把目前有利的革命形势变成胜利的革命所需要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推翻资本主义，接着建立非如此不足以防止另一次毁灭性战争和解决人类危机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联盟——这是第四国际根据它的全部历史经验已经有所准备的任务。

第四国际的纲领

第四国际的这次会议是在所谓“联合国组织”已在伦敦休会并

准备下月在巴黎秘密会议上举行其“和平”会议的时候召开的。联合国组织的会议的特征是以美英帝国主义代表为一方、以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为另一方的冲突。对小国命运的虚伪关怀是用来掩盖这种冲突的。“工党党员”贝文哀叹掌握在克里姆林宫手中的伊朗、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命运，同时却继续全部地推行丘吉尔在英帝国和希腊的极端帝国主义的政策。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代表人物维辛斯基哀叹英国手中的希腊和印度尼西亚的命运，同时克里姆林宫却由于它在东欧和亚洲采取可耻的行动而污辱了全世界工人们的心。这两个踏着工人的脊背爬上权力地位的官僚，根据帝国主义腐朽的外交权术所规定的办法，作为“世界统治者”互相逐鹿。联合国组织甚至推选比利时“社会党人”斯巴克充当它的主席，推选挪威的“工党党员”利充当它的秘书长。

但是这种“左倾”的伪装丝毫也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即联合国组织不过是列宁把它叫做“盗贼的厨房”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的翻版。这个会议的任何一项决议都引不起全世界广大群众的一点热情。世界各国人民怀着忧虑和不安或者至多是以漠不关心的态度注视着它的种种辩论。谁也不抱有什么希望，认为它会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任何问题。人们干脆把它理解为敌对的强国之间的新的决斗场，认为它完全辜负了它的名义。人们对巴黎的“和平”会议也并不怎样乐观。

可是，甚至当外交家们在伦敦或巴黎互相诘难的时候，印度和埃及也正在酝酿着革命的风暴。那里正在发展的事件所遵循的，不是失败的联合国组织或其任何参加者的纲领而是第四国际的纲领所说明的型式。所以我们能够满有把握地说，尽管资产阶级的“国际”装饰了富丽堂皇的门面，尽管居心叵测的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给了它工人的伪装，我们这个会议所审议的事项却比资

产阶级的那个“国际”所审议的事项要重要得多。

第四国际的这个会议号召一切工人、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不要对他们的统治者的行径感到灰心气馁，而是要起来同他们斗争。不仅要蔑视他们的错误领导人员，而且要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意志。目前世界的控制者玩弄可怕的原子弹的威胁来恐吓人类。可是他们忘记了，原子弹也需要工人的双手才能制造出来。他们忘记了，他们也需要穿军装的工人们来掌握那些可怕的武器。工人们既然不信任他们的贪得无厌的老板，就会懂得怎样在原子弹工厂以及其他生产据点实行罢工。士兵们既然对他们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充满着仇恨，就会懂得怎样来防止使用这种自我毁灭的武器。他们需要了解的，只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这是对付原子弹威胁的不二法门。

必须行动起来

第四国际的世界会议在号召国际无产阶级采取行动的时候，首先为印度和埃及群众的英勇斗争高声欢呼，因为他们在这会议开会期间已经走上了以革命行动推翻英帝国主义奴役的道路。它满意地指出，在这些群众性的发动中，已经有迹象表明，美帝国主义想要从它英国竞争对手的困境中捞取好处的打算正在遇到公开的反和断然的抵抗。它预先提出警告，要提防资本主义利益使其共同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殖民地资产阶级想要抑制斗争和出卖斗争的种种企图。不要信任甘地、尼赫鲁、巴特尔这一流人物！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以及其他每一个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只能通过对压迫者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才能获得成功。只有受到农民群众支持的年轻的工人阶级才能把斗争引导到胜利的高峰！

成立你們自己的工农委员会来組織斗争！沒收土地供耕种土地的人使用！通过工人委员会确立对工厂的监督！不要让资产阶级领袖和斯大林主义背叛者同帝国主义达成肮脏的妥协！立即召开一个会表达人民的意志及其随心所欲地实行自治的权利的制宪会议！

殖民地群众争取自由的斗争，是英国、欧洲、美国的工人反对同样的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斗争的一部分。第四国际号召主要的殖民地宗主国的工人团结起来保卫殖民地群众！

不准干涉印度的革命！不准干涉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埃及、远东和近东的革命！这必须成为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工人反对他们的资本主义统治者的阴谋诡计的明确呼声！

旧殖民地的压迫遇到反抗，而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统治者同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互相勾结，正在企图把同样掠夺性的压迫偷偷地加在战败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的群众的头上。第四国际号召“民主”国家的工人们起来反对这些反动的计划。

为了反对那种企图把所有帝国主义者的战罪放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无产阶级头上的沙文主义谎言，第四国际号召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工人们表现出他们同战败国工人們的阶级团结。把军队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撤出去！给与这些国家的群众以决定他们自身命运的充分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自由的选举！

只有对帝国主义压迫者及其克里姆林宫的仆从提出这些要求，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群众才能被“盟国”的工人们争取过来，以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建立欧洲和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

在所有的国家，世界资本主义正在打算利用剧烈的通货膨胀

和庞大的税收计划把它的战债负担转移到群众头上，对于这种通货膨胀和税收计划，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群众予以反击。第四国际号召工人们通过下列口号来保卫自己：

爭取按物价规定工資以应付不断上涨的生活費用！向富人而不是向穷人課稅！沒收大公司的战时利潤！

同时，资产阶级正在打算利用使无数群众失业的办法来摆脱迫在眉睫的经济萧条的困境，从而使工人阶级意气消沉并使它陷于分裂而遭受损失。第四国际号召工人们通过下列口号来同资本家的经济萧条计划作斗争：

爭取按物价规定工时！在一切有工作能力的人中間分配工作！在不减少工資的前提下减少工作周！

这次战争已经暴露出现代的工业生产能够完成多么巨大的功绩。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巨大的生产力都用于战争、用于破坏。由于战争结束，工厂空闲下来了——资本主义不能为和平而生产。第四国际号召各国的工人们提出要求：**让闲置着的工厂开工生产！在工人的监督下經營那些工厂！**对于资产阶级所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破产”的悲鸣，第四国际号召工人们提出要求：**打开托拉斯的賬册由工人委员会进行检查！取消商业秘密！**这样，垄断资本主义的抢劫和掠夺的行为就会暴露在所有的人的面前。

在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群众中的左派已迫使垄断资本家及其托拉斯采取守势。对于工业社会化的日益高涨的要求，工党政府以及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行动正在用那种不触犯资本家利益的“国有化”作为答复。这样，垄断资本家能够利用这种“国有化”的幌子来加强他们对经济的控制。第四国际提醒注意这些骗人的措施，号召工人们提出要求：

实行沒有賠償和补偿的国有化！爭取工人监督国有化工业！

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措施，就无法防止世界规模的危机把人类更深地投入资本主义的临死挣扎中，而要贯彻这些措施，工人的组织就必须同资本主义政党决裂，必须实行独立的工人阶级政策。因此第四国际号召群众向他们的传统组织提出这样的要求：

同资本家一刀两断！取得充分的权力！组织工农政府！在工农委员会的监督和保护下采用一个真正反资本主义的纲领！

第四国际提出这些口号，同时积极参加群众的日常斗争，和他们一起取得经验并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训。在共同斗争的过程中，第四国际的各个党阐明它的最高纲领，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在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联盟内部建立自由的工人共和国的纲领。在为实现这个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第四国际号召工人们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变种的沙文主义。特别是在东欧国家，它号召工人们采用同红军部队友好交往的办法来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可恶的沙文主义。为了同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劫掠政策作斗争，他们必须开展他们的工农委员会的独立运动来把工业收归社会公有并把土地分给贫农，同时争取他们的民主权利和各民族的自决权利。为了顺利地实现这些要求，东欧的劳动者将和苏联的工人同心协力以推翻斯大林领导下的反动官僚机构，重新建立具有真正苏维埃民主制度的工人国家。

在反对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分子的过程中，第四国际所拟订的政策不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外交计划为依据，而是以作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工人们的迫切需要为依据的。它的纲领是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剥削下完全解放出来、把殖民地各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把苏联群众从那使一切陷于瘫痪的官僚政治的阴影下完全解放出来的纲领。第四国际决不支持任何现有的政权。它号召工人们推翻这些政权并建立他们

自己的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工人政权，是一种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完成的任务。

只有团结在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世界联盟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永远消灭战争，组织充分地供所有的人享用的产品的生产，缔造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联盟才能把原子能从它现今作为消灭人类的威胁的地位变成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空前福祉。

全世界的工人们，这是我们的纲领，并且出路只有一条：团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的国际会议

布鲁塞尔，1946年4月

七、新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 和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

——第四国际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1946年4月）

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后时期的最初几个月已经清楚地表明，这次战争所带来的深刻的变化远没有消除，特别是自从1914到1918年的战争以来深深动摇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尽管革命的工人运动存在着某些缺点，我们仍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资本主义日趋稳定和发展的新的时代。

相反的，这次战争只不过是更加增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和世界市场销售量无法适应的失调现象。这次战争已经更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并彻底消除了在社会和国际关系上得到相对的稳定和平衡的一切可能性。

这次战争，由于它的全面的世界范围的性质，由于它的长时期的拖延，更由于它通过技术发现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原子能爆炸力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以比任何一次历史事件都更为严重地破坏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在经济的领域中，某些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生产机构的几乎临于彻底的毁灭，以及世界市场的停滞和衰落，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在社会领域方面，这次战争已经一方面加速了财产在少数金融资本家手中集中的过程，一方面，或者是由于工厂工人愈来愈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者是由于歉收和通货膨胀造成了小资产阶级的

经济破产,进一步加速了广大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最后,在国际关系问题方面,这次战争给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带来了严重的失败和彻底的解体,给法帝国主义带来了危机和部分的解体,并造成了英帝国主义的严重的削弱和衰颓。

可是相反的,这次战争却使得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另一方面,使得苏联完成了领土的扩张,增强了它在欧洲和亚洲广大地区的影响。

世界的经济局势

在这次战争期间世界经济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彼此矛盾的发展过程:

生产机构已经较前扩大同时变得更集中在某些国家中,有些新的国家也慢慢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可是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却遭到了削弱,日益解体或甚至完全被破坏了。

由于战争期间的特殊情况使美国担当了一切“同盟国”的债主和物资供应者的角色,所以美国从这次战争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战争使它能够更进一步发展了它的工业机构,使它的生产力进一步增加,以至和 1939 年相比起来,生产增加了一倍。

加拿大,由于它的经济大部分是和美洲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也同样跃进了一步,工业生产比 1940 年增加了一倍,变成了世界第三商业国家,它的地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南美国家,特别是巴西和阿根廷,由于在战争期间被迫采取自给自足的政策,因而也就被迫加速了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情况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埃及也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同时在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某些地区也约略可以看到。

另一方面，这次战争带来了欧洲经济的毁灭，而且特别是作为欧洲经济主要基地的德国的经济。

由于缺乏动力(煤、电)，缺乏原材料，更由于工业装备的日趋恶化而带来的生产力的下降，欧洲的工业机构已经全被破坏或至少是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许多的海港，以及大部分陆地和海上的运输系统都完全被破坏无遗。

尽管从外表上看农民阶级似乎更富裕了一些，但欧洲的农业情况却并没有得到改善。

由于缺乏肥料、机器和劳动力，农业生产实际正日益下降。

富裕的中农阶级，尽管他们手里拿着大量已贬值的货币，他们既不能改良或添制新的生产工具，也不能增加牲畜或修建更多的房屋。

所有的欧洲国家欠下的巨大的债务，以及它们的无法平衡的预算和通货膨胀的情况完全足以说明，它们在财政上已经彻底破产。巨大的战费支出主要是依靠不正常地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他们依靠仅得不死的定量分配过活，依靠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赋税和公债吸收小资产阶级租金收入者的进款，以及依靠愈来愈大的预算赤字来应付的。

人民群众消费品日益缺乏和非生产性的战费支出日益增大，最后使得所有的欧洲国家纸币疯狂地贬值，生活费用一日千里地增高。

就因为这种情况，欧洲的战费支出造成了它的前所未有的贫困，使得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因而最大程度地迫使它在经济上倚赖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

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战争造成的后果，遭受苦难的并不只是欧

洲。日本、荷属东印度和中国的经济也多少同样受到严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战争时期贸易关系的中断以及原材料和资本的极端缺乏，结果必然造成了高度的剥削，并通过食物缺乏、饥馑和通货膨胀，给殖民地群众带来反常的生活水平的下降。

这样，战争加速了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生产机构的发展和集中，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的生产能力达到了超过1939年的水平，但同时，战争也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发行了大量的国家公债，都发生通货膨胀现象，农业生产出现危机，国际市场吸收商品的能力也急剧下降了。

战争不但没有解决市场危机的问题，相反的，却大大加深了这种危机。

在美帝国主义能够利用战争期间它在国际市场上积蓄的财政和工业潜力以前，在它能够缓和由于这个危机和它本国的社会斗争所造成的威胁以前，它必须首先，通过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欧洲的，而且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置于适当的分配原则之下，以建立对这个市场的统治。

而这些由于战争带来的极端的贫困已经大大降低了购买力的国家，相反的，如果不能重建它们的经济，不能至少恢复从前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那它们的购买力就不可能得到恢复。

根据这些情况，世界经济的最可能的发展前途大致可以概括如下：被战争削弱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的国家的经济能力的复苏，总的特点是，步调非常缓慢，几乎使它们的经济接近于停滞和衰颓的水平。

美国经济将很快有一个相对的繁荣，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满足世界市场当前迫切需要的国家。这种情况将使它的生产机构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可是，这种日益增加的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遇上国内和世界市场吸收货物的能力不足的困难。

到那时候，美国就会面临一个较之 1929—1933 年的危机更为深刻和广泛的经济危机，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并不会有利于推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复苏。由于苏联正力图建立自己的经济领域，其中将包括目前在它的控制之下的一切国家，它实际是进一步加深了帝国主义的商业危机。

国际关系

战争赋予美国和苏联的力量，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完全支配着世界的局势。

美 国

美帝国主义的无限制的扩张是目前不稳定的局势的根源，而且不可避免地还将日益加剧这种局势。美帝国主义，托当时的战争情况的福，已经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其规模之大是过去任何其他帝国主义都不可企及的，事实上，美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的工业生产者和主要的银行。

美国已经把所有其他帝国主义竞争者远远地抛在后面了。由于它的工业机构的发展和较高的生产率，由于它垄断了最主要的原材料和运输工具，并由于它占有极充裕的资金，它目前的经济力量已经达到资本主义市场无法长期予以抗拒的程度。此外，美国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它在这方面的无法争辩的优势是由它的新式武器，特别是那些利用原子爆炸力的武器

造成的。

美帝国主义过去为了便于经济扩张而戴上的和平和“自由”的面具，目前已经不适用于它现已取得的在世界各地扩张的局面。为了取得和巩固对世界市场的控制，美帝国主义将会越来越被迫公开使用武力，或者恐吓，或者在情况必需的时候，攻击和消灭任何一个反对它的计划的国家。对和它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对苏联，美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政策不外是经济讹诈和军事压力。

不仅如此，美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了最自觉的和最强大的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且是政治和社会保守主义的主要支柱。一种垄断一切和反动的倾向已经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其他地区渐次形成，并一天比一天加强了。

战争时期，美国外表上作为临时性质执行的反劳工法案（反工会和反罢工法令，工资冻结）现在已慢慢将变成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永久性的法令。

在中国，美帝国主义公开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府进行军事支持，以使之粉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将全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在日本和德国，美帝国主义操纵着旧的反动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机构，并尽量利用中间和右派的反动势力。

在意大利，美帝国主义在支持自由主义分子和天主教徒的同时，更在财政上支持“无论何人”（l'Uomo Qualunque）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

在西班牙，它一方面尽可能保留佛朗哥的统治，一方面又积极准备最后用一种专制政体或者一种“专断的”民主政体来代替他。

在一切南美国家中，它尽量扶植和支持军事独裁政治，同时也一般地支持拿破仑式的政权。只有在那些它企图取代其他的帝国

主义竞争者的殖民地国家中，它才戴上“自由主义”的假面具。

美帝国主义的“和平”计划主要目的就是完成和巩固对世界市场的占领。

美国通过它的一系列的政洽经济组织，诸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币值稳定基金、世界复兴银行、在旧金山建立的联合国经济委员会以及它的辅助组织进出口银行等等，所有这些机构，在一支常驻的军队和一系列陆地、海上和空军基地的支持之下，从每一个国家夺得它的部分的主权，其长远的目的，乃是要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

然而，这种要想把整个世界变成美国殖民地的努力，在国内和国外都遇到了困难。

在国内，战时经济的复员工作和随之而来的工人的解雇和工资的降低，引起了社会斗争，这种斗争反过来又阻碍着经济的恢复。

在国外，美国的压力，引起了其他帝国主义，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帝国主义的相当剧烈的反抗，并迫使后者组成自足自给的集团，和美国进行经济战。

此外，各中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斗争活动、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苏联和苏联控制的地区的存在，都作为一种新的因素阻挠着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同时推动了美帝国主义的危机的形成。

因此，美国的世界扩张政策只不过在抽象的意义上使它便于执行可以无限发展的帝国主义开发政策。事实上，这种扩张同时包容了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必然特点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就使得美国处于最严重的痉挛状态之中，对世界任何地区发生的任何动乱现象和危机都会发生病态的反应。

苏 联

和美国对立的是苏联，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更由于苏联本身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它已经能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尽管德帝国主义在其公开的反苏斗争中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帝国主义之间敌对情绪的尖锐性，使得世界资产阶级终于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反苏联合阵线。这种帝国主义内部的分化对于苏联是极为有利的，同时依赖它自己的国有化经济和计划生产，苏联终于能够在和构成轴心国的那一部分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可是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结果，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获得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有利的条件来进行步调更为一致的反苏斗争；这一次，这种斗争是在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必须联系到由于战争引起的国内和国际间一整套复杂的变迁来看，才能够完全了解目前苏联的真实处境。

不管怎样，尽管战争使得苏联占领了更多的土地，它同时也给苏联带来了以下的不利的后果：1. 这次战争大大削弱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因为它“阻止了它的发展”（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因为它将乌克兰的经济已破坏了十之八九，而将苏联的有效人口消灭了六分之一左右。而在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却在生产方面和 1940 年相比增加了一倍，和同一时期的苏联相比竟超过了四倍。2. 战争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这是因为它，特别是在农民阶级（堪称百万富翁的一些农民）、军人集团和官僚主义的政府上层领导中，增强了资产阶级化的民族主义的反动分子的力量。

另一方面，这个战争：1.推动了苏联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过程；2.唤醒了各阶层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抛弃了在对待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政府方面采取的保守主义和消极的态度，并让他们了解到其他一些生活方式和观念（红军战士、战犯、不同的欧洲国家中占领军的士兵），这就加强了他们的批评能力，并刺激他们倾向于提出自己的主张。

对苏联来说，这次战争标明了以“在一个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彻底破产，同时也标明了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这个新的时期将最后肯定地决定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这一政权的命运。

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为了执行它对人民群众所提出的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逐步地和和平地建设计划性和国有化经济的政策，同时既牺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也牺牲了苏联无产阶级逐步改善生活条件的利益。可是事实上，这一政策只不过符合了克里姆林宫——这一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本身的利益。

这次战争终于使这个悲惨的经历告一结束。尽管革命一再退却、让步，一再被出卖（斯大林相信这样就可以使得世界资产阶级保持中立），苏联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仍然受到了极大的灾害。

这次战争把苏联人民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许多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部分全给破坏了，这就使得苏联的经济忽然又退后了许多年。

为了让苏联的经济再度上升，为了不完全依靠，或主要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来完成这种经济复兴的工作（因为如果这样，美帝国主义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消灭苏联的独立），为了让苏联具有某种保护性的外壳以便反抗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苏联官僚机构感到有必要把它的战略地带伸展到其他国家中去，其中既有欧洲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同时从那些国家取得经济资源。

既然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始终能够保持力量对比关系上的优越地位，这个官僚主义统治机构一直就总以如下的几种办法来抗拒这种压力以及国内的反动势力的活动：

一、加速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建设工作（实行新的五年计划，1946—1950年）。

二、实行土地扩张。

三、把一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受到它的控制的国家也置于自己的经济控制之下。

四、通过各共产党进行活动以图使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并防止它们完全变为美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的奴仆。

这个官僚主义统治机构在这一方面要防范外来的帝国主义压力，一方面要抵制国内反动势力，同时还要迅速恢复苏联经济的活动中要想取得成就，就必须依赖现在在苏联控制之下的那些国家为它作出经济上的贡献。

苏联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所进行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掠夺的性质，表现出了它的政策上的保守性、怯懦和反动性。

这个官僚机构完全没有积极地援助那些国家的群众运动以使它迅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积极争取这些国家和苏联进行自由的联合，协助它们的经济的发展并使它们的经济和苏联经济进行互利的合作，它只是把这种群众运动当作一种可以用来威胁首先受到它的扶植的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的后备力量。

在它开始对那些国家实行经济控制时所进行的活动——土地改革、没收外国资本、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实行工业国有化、从上而下采取官僚主义的办法，而不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办法来破坏资本主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它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苏联的占领和控制，在不同的程度上刺激了内战，刺激了双重政权的发展。

苏联的官僚机构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一方面既害怕无产阶级革命的扩张，又感到有建立它自己赖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必要，因而在那些它所控制的国家中实行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尽管目的在于在结构上对它们进行同化，实际只取得部分的成效，而且进展非常缓慢，前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前进和后退、犹豫和动乱，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和军事的危机，而这一切的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它自己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情况。

直到现在，苏联的官僚机构似乎决心要按照自己的办法来保卫在苏联的它自己的经济基地，来保持对于它认为属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那些国家的控制。在苏联国内，这种倾向表现于中央的控制地位的日益加强，这个中央的具体代表就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日丹诺夫、安德烈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等），他们越来越加强了对政府、对行政机构和军队的控制；这种倾向也表现在官僚机构企图重新和人民建立联系的问题上，它所使用的诱饵是来一个新的左转以反对右派势力。在为苏联所控制的那些国家中，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是，由共产党的领导人，完全脱离他们在各该国中代表的真正的力量去争夺控制政府的权力；消灭反对派、收回外国租界、加速经济改革、鼓励双重权力的领导机构（既有控制生产和贸易的委员会，也有推动土地改革的贫农委员会）。

最后，在国际关系上，苏联的官僚机构在许多外交会议上（伦敦会议等等），在它的报纸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所使用的强硬的调子上都表现了它对帝国主义压力的决不屈服的态度〔例如：莫洛

托夫在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斯大林的最近的一次讲话，某些共产党（美国、英国、希腊和殖民地的党）略略向左转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这种防卫工作仍由官僚机构来进行，它就总不会有力量有效地打败帝国主义的阴谋，抗拒帝国主义的反苏的压力，实现苏联的建设计划以及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因为能使它具有这种力量的只有世界革命运动的积极支持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活动。官僚机构在苏联国内以及在它所控制的地区的活动，正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共共产党的活动一样，不但没有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反而只是阻挠和打击这种运动并到处为反动势力的反击活动创造条件。因此，目前保卫苏联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立即推翻拿破仑式的斯大林主义集团的斗争，并大力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这种要求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了。

尽管苏联进行了土地扩张，经济的后退，以及更重要的，由苏联官僚机构的政策造成的劳工运动的力量衰弱，已经使苏联失去了反抗帝国主义长期坚持的压力的最有效的武器。军事力量的竞赛是目前帝国主义和苏联的关系上的主要特点，在这种竞赛活动中，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与能够挽救苏联，使它不致走向不幸的结局。

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外表的后面，隐藏着一种现实，那就是，苏联和苏联的官僚机构已经面临一个关系着它们生死存亡的危险阶段。

第四国际，在向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所奉行的反动政策将为世界革命带来危险的时候，在号召立即推翻这种官僚机构的时候，并没有改变它对苏联国家性质的认

识，它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已经堕落的工人国家。第四国际并没有忽略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进攻，以及在苏联控制的国家中实行苏联式的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经济，实行逐步的经济改革等等对无产阶级的重要性。第四国际的所有的小组，其中更重要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负起责任来有计划地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反苏计划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活动；必须向群众解释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敌对情绪的社会意义，以及它的阶级性质。

英 国

在上一次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变成了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强国。

尽管这样，它在世界问题中的特殊地位又一次遭到了相当严重的削弱，战争给它带来的损害实际已使它面临一个在它的整个历史中最为严重的时代。

为了支付巨大的非生产性的战争费用，它欠下了美国以及一些殖民地国家(印度、埃及)和属地许多债款，并对殖民地人民群众进行了超级的剥削。英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由于失去了大部分的对外投资，由于美国在海上、商业上和财政上的优势使英国大大减少了它通过它的舰队以及通过它过去作为世界掮客的地位而取得的收入，它的收支表几乎永远不可能得到平衡了。此外，这次战争也加速了英帝国肢解的过程。

殖民地(印度、埃及)和属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工业和财政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离心的倾向，大部分都受到了美国的吸引。

在印度、在埃及、在远东，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民族解放运动

正动摇着英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动摇着它的整个经济结构。

为了防止这种衰落趋势并竭力使自己恢复原来的力量，英帝国主义采取了极为不利于战败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意大利）或那些在战争中大为削弱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荷兰）的，残酷地扩大殖民统治的办法；它加强了对大城市和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剥削，发动了经济战。采用经济战、维护以关税壁垒和英镑集团为基础的有利于帝国统治的体系、建立其他一些由独立国家组成的集团——这就是英帝国主义为了反抗美国的压力，为了和它讨价还价以求在国际市场上分得即使是极有限的一部分利权所可能使用的最好的武器。“西欧集团”的政策充分地表现了英帝国主义力求自卫的手段。

为了一方面抗拒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一方面防止苏联对大部分欧洲地区政治和经济的控制进一步扩张，英国已经制定了要把一个经济地区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计划，这个地区包括从挪威到希腊的那些西欧国家，德国也包括在内。和华盛顿的妥协可以改变“西欧集团”在经济上的反美倾向，可是丝毫也没有改变它的反苏的政治性质。

华盛顿协议，对英帝国主义来说实际是一次“经济上的敦克尔克大败退”，英帝国主义所以接受这个协议只是由于它希望，这样在下一个阶段它可以再重新开始保存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的斗争。

可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已经远远地跑在英国的前边，英国目前宁愿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和华尔街进行妥协，而不愿对它发动一次长期的具有决定性的斗争。另一方面在一切使得英国和苏联发生冲突的问题上，英帝国主义必须依赖华盛顿的直接支持。从这

个意义上来看，尽管在英帝国主义要求分享世界市场的利权的问题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部的摩擦，而当前阶段的整个世界局势中的主要特点，仍是英美帝国主义密切合作，以反对苏联，反对殖民地的解放斗争以及欧洲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法 国

法帝国主义尽管在这次战争之后也算作是“战胜国”之一，实际在国际的地位上它至多也不过是一个第二等的国家。

这次战争已经最后确定了它的衰落的地位。它在战争中所受到的破坏已经极其严重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生产潜力。

它所支出的非生产性的费用，再加上普遍的贫困、生产的下降和商品的缺乏已经使它的预算失去平衡，通货日益贬值，并使人民的生活费用日益增高。由于缺乏原材料、资金和机器，经济恢复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简直看不出有任何前途。

那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落入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掌握之中的殖民地国家，丝毫没有能够帮助宗主国的复兴，而且它们自己也正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正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处于动乱状态中。

为了至少部分地避免由于战费开支而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法帝国主义企图大大利用美国、英国和苏联彼此之间的敌对情绪。可是它原来希望借此保持它的帝国的统一和经济上的独立，希望借此从被征服的德国的手中夺得萨尔和鲁尔地区大部分资源的希望，最后被证明不过全是幻想。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扩张的需要并没有给法帝国主义留下可以活动的地盘。“三大国”达成的协议归根结底必然是不利于法国，同时也不利于其他一些二等国家的。

法帝国主义很长一段时间来已经进入一个充满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的危机时期；这个危机如果再发展下去肯定将会影响整个欧洲的局势。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现在兼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和德国局势中的各种特点。它现在正经历着一个“民主的”和议会政治的不稳定时期，其结果只可能是独裁政权或者革命。

中 国

在这次战争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之后，中国似乎变成了世界的第五强国。事实上从它目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来看，它差不多完全和过去一样根本无力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也不可能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独立的角色。

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贫农和无产阶级独立进行的活动，又由于它和帝国主义有着经济上的联系，它最关切的问题是巩固它的剥削政权以反对人民群众的进攻，因而它和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尽量从美帝国主义求得物质和军事的援助。具有四万万居民、极其巨大的自然资源以及能供应无限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市场，在美国看来正是它的过剩的生产的一个主要的出路，正是它可以取得原材料的供应地以及一个输出资本的市场；此外它还可以拿中国作为一把钥匙来取得整个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中国的资产阶级当然极其乐意支持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因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反人民、反延安政权以及反对苏联扩大影响的威胁的武装斗争中，提供给它充足的援助，而仍然让它保持着独立的、统一的外貌。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以及它的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延安的斯大林主义者最近已接受的国民党的民主化路线，最后结果只可能是中国人民的失败和革命士气的衰落。

此外，中国在亚洲和在太平洋地区，必然会变成美帝国主义和苏联进行角逐的主要猎场，而且在进行公开敌对行动的时候，将变成一个最重要的反苏堡垒。如果再重复一次1925—1927年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清算独立的人民群众运动，而使它从属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其结果将是不可避免的消灭新的中国的革命，抛弃掉使苏联得到保卫的最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一个以明确的英勇的纲领为基础的面向工农群众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提出土地改革、民主权利以及选举立宪会议等等作为过渡时期的要求），一个贯串着社会主义内容的政策就可以把中国人民在战争期间和胜利之后积蓄起来的巨大的革命动力全部引上正当的轨道，再一次把中国革命推向高潮。这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应该担当起来的任务，他们完全知道中国的运动能够对国际无产阶级产生无比巨大的影响。

德国-意大利-日本

帝国主义的冲突已经大大地削弱了，甚至差不多完全消灭了最强的国家中的三个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世界市场和国际范围中的地位。

德国帝国主义所受到的破坏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史无前例的。德国的生产机构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一片灰烬。它的最大的城市、海港和运输工具全部都被破坏。除了战争带来的巨大数量的死亡之外，军事上的失败和军事占领差不多使得具有活动能力的男性的全部进了监牢。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占领军所

进行的掳掠和破坏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的解体。从军事失败的最后一天起,德国人民不论从物力和人力方面来讲,都已不可能进行任何重要的革命活动了。

此后德国劳工运动的再次兴起将表明这个国家在经济生活的恢复方面已有所进展,表明无产阶级又重新在生产中联合起来,也表明占领军的新的的高压的政权已得到逐步改善。

派出占领军的国家,不管是苏联还是那些各自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待德国的问题上各自奉行着一个适合于自己利益的政策。

美国企图通过这个战争消灭德国经济,使它不可能再在国际市场上和美国竞争,结果它完全达到了这个目的。现在对德国的占领满足了美国的两方面的需要:

第一,控制着德国的潜力,只容许它的经济在美国资本的滋养下得到有限的恢复。其次,通过对中欧的军事占领来不断地对苏联和苏联所控制的地区施加压力,同时对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实行有效的反革命的控制。

从这些考虑出发,美国将来可能越来越倾向于使德国变成一个只有一个中央政府的统一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计划和另一种相反的计划(法国)之间的冲突,那个相反的计划是要维持一个肢解的无能的德国。

英帝国主义对于德国经济的复兴和使德国在它的控制之下实行统一也抱有同样大的兴趣。

已经失去扩张能力的德国经济,对伦敦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欧洲市场,让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在英国的保护下形成一个财政和关税的最惠国体系,它就能够在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能有助于一个集团的形成,这个集团最后将能抵制美国的经济压力,而且特

别还能变成一个反苏的堡垒。法帝国主义在德国实行一种掠夺的政策，目的在于借此补偿它自己的贫乏的经济的不足，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防止这个国家的统一，维持和进一步加深这个国家的分裂状态。

最后说到苏联，苏联一直犹豫于两种政策之间，一种政策是维持和进一步加深德国的软弱无力的地位，唯恐它又变成了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主要反苏堡垒；另一种政策是把大部分德国和奥地利争取过来，使它居于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

在苏联占领的地区，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争取建立联合政党的运动，以及在这里进行的土地改革活动，目的都在于建立一个群众基础，并消灭那些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的力量，或至少使这些力量中立化。特别是土地改革运动，主要是为了粉碎普鲁士军人集团和容克贵族集团的力量，并借此取得分得土地的农民们的同情。可是，如果苏联的经济不能廉价向农民提供大量的工业产品，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那么这种希望仍然是会落空的。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官僚机构对待人民群众的总的政策的认识——这种政策是扼杀他们的以要求自决权为起点的民主权利，使工人运动官僚主义化，残酷地大量转移德国人口，撤出整个一个工厂的装备等等——我们才能正确地估价这些进步的经济措施。这种政策使得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苏联在群众的眼中失去了威信，并且唤醒他们，使他们起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同时也反对苏联。

在战前已经为深刻的危机所震动的意大利帝国主义——由于这次战争的失败，由于实际上失去了一切殖民地、由于财政上临于破产、整个国家遭到严重的破坏——已经退居第二流国家的地位，完全落入英美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所遭到的破坏，在许多方面差不多可以和希特勒的德国相比。

由于它所遭到的破坏和殖民地的丧失，由于它完全变成一个失去主权的国家，以及由于它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支付的巨大费用，它的经济潜力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原来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杂的联盟所控制的，在阶级关系上充满爆炸性的危机的社会结构，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已经彻底动摇了。

尽管多年来既得利益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着恐怖政策，而使人民群众的力量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从上次战争失败之后，革命的力量虽然缓慢地，但肯定正一天一天壮大起来。美帝国主义由于希望加强和巩固它对整个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完全把日本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支持着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旧的反动压迫机构，把它看作是社会制度的支柱。

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推迟、削弱和最后消除任何革命性的爆炸事件，对人民群众只作一些次要的和没有重大意义的让步，同时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虽然使日本经济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力量向前发展，但也决不会严重地改变那个反动的社会结构。

在日本到现在一直还从未进行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现在是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懂得在它的以工人和农民苏维埃为基础的专政之下，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它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联系起来。

* * *

目前世界经济的一般局势、欧洲遭到的破坏、帝国主义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加深，在战争期间部分被“美国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所掩盖的潜伏着的敌对情绪的爆发、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紧张

关系——所有这一切已经决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一定会有严重的经济上的困难和动乱，一定会有部分和全面的危机。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普遍遭到破坏、其他帝国主义都日益衰落和崩溃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单独获得的无限制的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重新建立资本主义世界平衡状态的条件，那就是说，除了让美国居于几乎完全控制一切的办法之外，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平衡。

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越是不能聚集更大的力量，而是相反地日益削弱或者日益丧失信心，那么国际经济和政治局势中的矛盾，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敌对情绪，将越会鼓动帝国主义，在比过去更短的间歇期间之内，再一次试图通过一次新的世界冲突使一切问题明朗化。

人类究竟将走向野蛮状态和毁灭，还是将通过社会主义走向解放自己的道路，决定性的因素将是革命运动的发展程度，而决定革命运动的发展的则是在随着新帝国主义的“和平”必然出现的无数社会动乱的过程中，真正的革命领导力量的加强。

社会敌对情绪的紧张化和革命的前途

使人民群众遭受到巨大牺牲并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更加下降的战争，同时也保证了目前时期的“和平”。

生产机构的大量破坏、巨大数额的外债和通货膨胀已经使世界经济陷于瘫痪状态，现在要使它得到恢复，最主要的先决条件，是创造出巨大数量的新的资本。

要作到这一点，只有无产阶级甘愿在比战前更为恶化的生活条件下仍然继续工作才有可能，这正是资本主义分子们的要求。

心怀叵测的改良主义的领导人们劝工人们这样作，斯大林主义分子也这样劝导工人，而且甚至还叫得更响：先帮助重新建立和加强资本主义，然后再要求和争取改善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的生活。

战争使一切国家在以纸币和国家债务(国库公债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虚假的资本获得了巨大的增长，而实际能用于生产的资本是大大减少了。

这种情况的实际结果就是，物价直线上升、预算无法平衡和贸易趋于停顿。通货膨胀在每一个欧洲国家中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甚至英国和美国也在所不免，只是形式上比较缓和一些罢了。

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采取通货贬值、增加税收、冻结工资和提高消费品的价格等办法来应付这个局面，而所有这些办法实际是进一步降低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这里的真正企图是要重新分配国民收入，通过进一步压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便获得资本的再生。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正像我们在许多地方已经可以看到的，必然会招致人民群众的剧烈反对；它日益破坏了阶级的平衡；它强有力地刺激了工人的斗争。要想了解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再次获得相对的稳定，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决定性的因素：无产阶级的抵抗；无产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这种改善和资本主义复兴的可能性是不能相容的。

虽然战争并没有在欧洲创造出—一个在范围和进展速度方面如我们所期望的革命高潮，但是不可否认，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毁灭了资本主义的平衡，因而开始了一个长远的革命时期**。今天我们对大战期间我们所作的展望能够而且应该作的一切自我批评（当时我们认为，特别是在欧洲，将会出现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具有更大广度和深度的群众革命活动），所有这类批评应该只限于发展速度的问题上，而不应涉及紧接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的这一时期的基

本特性的问题。

只有那些带着肤浅的和怯懦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才会认为应在以下的这些方面否定我们对革命所作的估计：战争，不论在进行时期或者在它结束之后，并没有在欧洲创造出革命的形势；德国革命并没有发生；传统的组织，以及其中最主要的，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已经有了一次新的强有力的发展。第四国际，一方面认识到所有这些事实都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失败，但同时它也决不会忘掉，资本主义的有关生死存亡的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平衡的消失以及它的根本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都是一些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正是我们估计革命形势的基础，也给我们建立革命政党的工作带来了较前大为增加的成功的机会。

资本主义目前正企图使自己获得恢复，而它所处的实际经济和政治情况都预示着革命将日趋发展的前景，尽管它会有暂时的后退和起伏不定的状态出现，这种状态，只要新的革命的领导在斗争的过程中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就一定会逐渐消失。

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看到人民群众为反对资本主义利用加强剥削的办法以图恢复自己的经济力量的意愿而进行的第一次战斗，但这些斗争已经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绝对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革命的潜力。

在未处于苏联控制下的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在被迫进行本身的重建工作时所处的经济条件正推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采取行动。

尽管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们有计划地进行反对，罢工运动在所有的地方仍然日趋高涨，这种运动的推动力就是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降低工资、要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费用的意志。由于同样的理由，小职员和一些白领工人常常甚至会比工人

更积极地参加这种斗争。其他一些城市和农民小资产阶级阶层，由于通货膨胀和无法负担的赋税使他们濒于破产，慢慢正变作革命的催化剂，这种力量已逐步加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使它面临毁灭。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民主主义的势力要想长时期、相当稳定地发展下去，似乎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问题了。

在战争结束以后，资产阶级所作的很少的一些民主方面的让步，一方面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一方面也是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和解政策和投降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当德国的占领机构彻底崩溃的时候，革命的第一次浪潮震动了欧洲大陆大多数的国家。

可是这一浪潮在性质上说是支离破碎的。双重权力的机构都是在自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国革命的未能实现阻止了这种革命运动的蔓延和扩张，使得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党把人民群众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而使得英美的军事统治很顺利地就代替了德国的军事统治，本国的资产阶级因而也就获得了必要的喘息的机会，使它能够在斯大林主义分子的直接帮助下（法国、意大利）或者在占领军的支持下采用暴力的方法（希腊、比利时），重建自己的国家机器、迅速清算了双重权力机构中的成员，并解除了工人的武装。

为了阻止第一次革命浪潮，资产阶级不得不付出代价以求通过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政党来进行统治，或者通过主要和它们进行联合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统治。这个代价包括：容许范围广阔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人民群众的活动存在（罢工的权利），保存资产阶级并不能完全掌握的“民主”机构。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产阶级，由于人民

群众的压力同意成立一个“民主”政府，那也是被迫于它所处的具体的物质条件，由于它必须牺牲工人群众的利益来重建自己的经济，以便向极权主义政府的形式过渡。在“议会立法”和“社会和平”的烟幕的后面，它已经成功地重新建立了它可以完全控制的军事和政治机构。以这种机构为基础，同时以社会上的各种传统的保守势力(教会、贵族、王室等等)为支柱，金融资本集团，由于战争使它获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彻底的对国家的控制，已准备毫不掩饰地建立起拿破仑式的军事专制政体。只有无产阶级的压力能够防止资产阶级完全抛弃所剩无几的古老的“资产阶级民主”，而这种无产阶级的压力在欧洲任何国家中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

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在政权方面的经历，在各个情况不同的国家中，在各自不同的程度上，为无产阶级带来了新的失望。只要革命的政党由于本身过于软弱不能把群众的这种失望的感觉转化成一种发动新攻势的动力，那么在客观上就是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而这情况一般说来是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特点。另一方面，虽然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压力仍然局限在工人政党和民主主义的政党之内，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的无法克服的危机、经济的破产以及这些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长此下去，不可能不又一次产生同样的那种导致法西斯运动的各种因素。在意大利就正是这样，正是工人政党的软弱无力和打击士气的政治活动已经使得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聚集在“新法西斯主义”“无论何人”(l'Uomo Qualunque)运动周围。在比利时，这类中等阶层的群众，不久以前，非常倾向于斯大林主义的政党，现在也都跑到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内去了。同样的转变过程在希腊、法国和在其他一些地方也都已经出现。但是，我们决不能忘了，目

前欧洲工人政治运动的这种迟缓的进展，不仅以世界革命高潮作为它的背景，同时也是以欧洲大陆本身劳动群众日益激化的情绪作为它的背景的。在这种情况下，像希腊那样的部分的失败，像法国和比利时那样的暂时的后退，都并没有使无产阶级丧失信心。相反的，在正在进行的经济斗争的过程中，各种经历已经又一次暴露了斗争领导人们的不良的居心。由于资产阶级一次再次表现自己无能重新建立一个具有丝毫稳定性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机构，这就为工人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他们把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如果第四国际终于不能建立坚强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小组，如果工人斗争的接连兴起的浪潮都以失败告终，强有力的法西斯组织就会在各地出现，目前我们所经历的这个革命高潮时期就会以在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中节节败退而告一结束。

在为苏联所控制的欧洲地区，工人阶级的运动在许多地方都达到了具有双重力量的水平，可是它同时也感受到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给它带来的官僚主义的枷锁和低落的士气。

在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解体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阶段，造成这种情况的，除了它过去所经历的都是失败之外，更有在高压的纳粹政权之下无产阶级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战争期间斯大林官僚机构所执行的沙文主义的政策、财产的毁灭、生命的丧失以及目前帝国主义和苏联的占领等等。这一事实已经给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一般情况带来极不利的影响；它使得欧洲的革命运动只能以极缓慢的步调发展，使它不能以正常的节奏前进，并暂时抑止住了革命运动的爆发。直到革命运动的物质条件已经在德国存在，直到以百万计的德国战俘重新回到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去，我们就不能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会进行革命的活动。

而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大陆，在意大利和法国，以及在大陆之

外，在英国、美国和殖民地国家中，其他一些革命的火焰愈来愈具有了重大的意义。

英帝国主义的迅速的衰落、它的经济基地的缩减、它的日益贫困化的趋势以及它为了抗拒美帝国主义的压力的有使生产机构集中化和现代化并大力降低生产成本的必要等等，现在正鼓舞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对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发动疯狂的进攻。后者的还击是极为有力的。1944年已被证明为自从上次战争以来，除开1926年的总罢工之外，罢工次数最多的一年。1945年，工党在选举上获得胜利，这就表现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已开始向激进的方向发展。这一罢工运动，虽然由于这次胜利暂时停止下来，但它仍然在继续显示自己的力量。由于它始终包含着人民群众跟工会和工党的官僚主义机构之间的直接冲突，建立革命政党的严肃的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美国，由于失业、由于取消加班工作而造成的工人收入的减低等等而在工人中重新鼓起的新的热情，使得史无前例的最强大的工人运动正在形成。

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使自已成为美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坚强的维护者，必须负起最大的责任来，在美帝国主义由于在世界市场上——这个市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缺乏平衡和统一的组织——进行扩张而面临的长期危机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

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目前已经达到了过去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

这是殖民地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和由于战争帝国主义统治遭到削弱的结果。

殖民地的工业化过程决定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而战争又加速

了这种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情况特别在埃及、近东、印度、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某些地区以及在荷属印度等处更为显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也促成了某些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商人、职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具有不同程度重要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

另一方面,战争加强了对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超级剥削,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低落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这些事实,再加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它们自己的斗争和敌对情绪的结果而遭到削弱,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失败之后,已经加速了殖民地人民群众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趋于成熟的过程,形成了他们的要求通过武力来取得独立的意志。

由于缺乏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由于斯大林主义分子重犯了1925—1927年中国革命所采取的孟什维克政策的错误,因而使得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主要落到了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中。尽管有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种领导对于殖民地革命的发展具有真正的危害性,这些运动,只要它们能够加深帝国主义的危机并能对大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那么这些运动就已经可以算作是世界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在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颇为发展的资产阶级,当然同时也就有一个先进的产业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和外国帝国主义对人民群众所进行的联合剥削,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创造了条件,这一运动吸引着追随在它后面的农民群众,将能够获得高度的发展,变成世界革命主要中心之一。

因此,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视线限制在欧洲范围之内,只注意到

某一特定时间之内，德国革命仍然没有出现（尽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就不会对革命浪潮的真正的动力作出结论。

我們目前所面临的是一个超过过去任何时候的世界性危机和一个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这一浪潮，毫无疑问，将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并且肯定会继续不断在不同的革命中心之間彼此互相影响，这样就决定了一个长时期的革命的前景。

我們党的建設工作和我們的政治任务

人民群众已经充分表露了他们的巨大力量，他们的斗争的决心和牺牲的精神，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只要有一个国际的真正的革命的领导，一个有充分准备的意志集中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以及它的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意志和力量是永远也不会衰竭的。

建立革命的领导的问题，现在仍和过去一样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第四国际充分了解革命政党的任务，不仅在于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同时在于加速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过程。从客观上来讲，革命条件，不管有没有一个革命政党，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可是由于没有这样一个政党，那些条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以人民群众的退却、丧失信心和失败而告终。

在战前时期，建立革命领导的客观可能性的确受到了限制，可是现在我们却不能把组成革命领导的工作停滞不前或进展缓慢的责任归之于客观条件。一切国家中目前的事态发展都证明建立第四国际政党的客观可能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巨大，而且正有增无已。在所有那些国家中，其中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南美国家、澳大利亚、南非和一些殖民地国家，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所

造成的障碍并没有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欧洲的群众队伍和传统的组织，其中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日趋扩大，反映了人民群众已开始向激进的方向发展，现在差不多在所有的地方都达到了顶峰。**衰落的阶段已经开始了。**

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改良主义的政党在它们的社会基础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同时争取到愈来愈多的纷纷离开旧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激进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斯大林主义政党已经把社会党中的工人分子争取过来，同时还得到了城市和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的最激进的阶层的支持。

可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目前赖以达成协议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希望愈来愈不能相容了；它们无能为目前的危机寻找出路的情况将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在人民群众的眼前。这些政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它们只是维持着目前的地位，将被看作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政党，为了维持和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不得不阻止，有时甚至反对人民群众为求满足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并使它们，在人民群众的眼中看来，应对所谓“结构改革”的种种实验的不可避免的失败负责。

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另外还遭受到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给它们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迫使它们尽一切可能推行机会主义政策，并且使这种政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摇摆不定和充满矛盾。

另一方面，在为苏联所控制的国家中，特别是在德国、奥地利、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甚至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政策的具体经验已经慢慢变成了防止人民群众遭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意识污染的最好的药方。

在这种情况下，在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互相敌对的力量。

希腊的内战、意大利的长期的政治危机和英国的情况已经使得这种力量在“共产党”内产生了。

荷兰共产党最近经历了一系列的派别斗争，其结果则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反对派现在建立起来了。

法国、比利时以及整个西欧的一般局势都正为改良主义政党的解体创造条件。

可是这类反对派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们一般说来都比较迅速地 and 官僚机构的决裂却并不完全决定于一般的政治局势。我们小组的积极参与在促进这一过程方面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只要它们能够把纲领问题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巨大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在行动上能够取得反对派中最优秀的成员的信任，那它们就能够使这些新的力量参加我们的队伍，而防止它们转化为新的中间派势力。

能够让我们以充分的热情和信念去进行建党工作的最主要的先决条件就是，首先我们必须毫不怀疑地相信，目前在这方面的确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

目前，对这一首要任务的最大的威胁，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了抱有失败主义思想的派别，它们由于看到欧洲革命形势的趋于成熟的过程比较缓慢，同时看到我们的进展也比较迟缓，因而竟多少近于公开地主张把我们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的纲领降为单纯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并主张采取大批或甚至全部“加入”欧洲的改良主义政党和中间派政党的政策。这是由于这些派别，在战争期间和在战后的第一阶段，对于左派夸大事态发展的速度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批评，因而对于我们现在正进入的一个新的时代的

性质作了不同的、错误的总的估计。

大体说来，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上，我们的建党工作目前应该是通过这样一条道路来进行，那就是，把我们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自主权已给予保证的独立进行的工作，和在改良主义的、中间派的和斯大林主义的组织中进行的耐心的、有计划的、坚持不懈的分化工作相互结合起来。一切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必须在非常仔细地分析了全国的一般情况和工人阶级运动的条件，它的组织，那些组织内部的空气等等之后，定出方针，具体地组织自己的工作，妥善地在独立进行的工作和分化工作两方面分配自己的力量。

我们现在发现，和战前的情况不同，我们的欧洲小组的独立进行的工作以及它们脱离传统的组织、维持自己的主权单独存在的情况，和分化工作相比起来，越来越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对于那些愿意斗争以及由于受到打击或失望已和传统的组织断绝关系的先进工人阶级分子来说，那种工作已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面具有吸引力的旗帜。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希望不管怎样，群众一定会有一天自动发现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的纲领的正确性，勇于战斗的工人有一天会自动全跑到我们的队伍中来，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好好抓住我们能够影响他们的真正的机会，也不可能正确估计我们的发展的真正可能性。

大批大批的工人需要斗争，他们怀疑或甚至已抛弃了那些心怀叵测的“社会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他们正在寻找另一面旗帜，而我们却不十分愿意让他们看见我们。

为了争取他们，我们在行动和斗争中，必须成为一个有效的革命的政党，有严肃的组织、有具体的政策、有经常的报纸，更重要的，积极参与他们每日的斗争。我们必须以行动来表明，我们打算

要,同时我们能够成为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的旗帜,我们一定要在行动中真正达到这一日的。

问题是我们必须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通过耐心的、系统的工作来建立这个革命的政党,对这种工作,作长时期的打算,而决不是去寻找一种什么新的“奇妙的公式”,以求发现一种如何让“群众性的党”自动产生的秘密。

我们在欧洲大陆的任务

在现阶段,所有欧洲地区的各个小组必须依据以下的几个因素,来决定它们的政治任务:

1. 对革命斗争的发展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2. 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仍然依附于改良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政党。
3. 在许多国家中(德国、意大利、希腊),英美联合部队实际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主要支柱。
4. 东欧地区的苏联占领军表现在行动上的矛盾。
5. 我们自己的组织力量有限,经验不足。

在一切非苏联占领的国家中,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正越来越公开地表露出来,尽管它所采取的方式是彼此不同的。我们的小组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消除现在仍然掩盖着英美军事占领的实质以及美帝国主义种种经济干涉的幻想。它们必须尽量让群众了解,这种占领只能加速欧洲经济的衰落,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威胁着某些能够存在下去的国家的独立,同时让他们了解这种占领的目的是要有计划地扼杀社会主义革命。

一如德国人的占领一样,目前英美联合部队、法国和俄国的军

队对欧洲的占领同样也是某种民族压迫的根源。如果我们假定欧洲的革命运动会一天一天低落下来,那么,这种占领只要再延续几年,就可能会使某些国家又回到从前的殖民地的地位,从而导致一个新的民族斗争和民族战争的时代。

可是,在现在,也正和在大战期间一样,我们在进行活动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决不是估计到革命运动会日趋低落,最后肯定归于失败,而是相信革命一定会继续下去。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风险虽然使得某些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被德国军队暂时占领下来,但是并没有把那些国家拉回到被压迫国家的地位,因而可以使我们把那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称作“民族战争”。

那次战争从交战的双方来讲仍然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而,无产阶级的任务则是确保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推行它的反资本主义的、国际的和革命的纲领。

那时,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职责在于和一切抗敌组织中的资产阶级领导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因为它们一直在利用群众的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跟群众合作的许多社会阶层的反对帝国主义占领军的正当的仇恨情绪,来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力图把阶级斗争转化为“民族”斗争。

为改变长期被敌人占领的地位、为重新恢复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这是各国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意志,革命的无产阶级则正是代表着他们的这种愿望和意志,因为人民群众的这种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因为它公开宣称为独立而斗争乃是它自己的纲领的一部分,只不过它将采用它自己的一套方法;因为它要在德国内部进行斗争,以求用革命的方式推翻纳粹政权,并争取从被占领的国

家中撤退德国军队；也因为它在被占领的国家中提倡以阶级和国际的精神进行的群众反抗运动，一方面反对占领军，一方面反对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职责，首先，最主要的，是和传统的工人阶级中的沙文主义思想和“阶级和平”政策作斗争，因为这些东西正在把工人阶级运动领上失败的道路。

为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和平”而斗争

在“三大国”的领导下形成的帝国主义的“和平”正在欧洲建立起来一套民族压迫的体制，而特别以德国和意大利对这种压迫感受最深。

第四国际公开主张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决的权利，并为这种权利进行斗争，它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中提出的口号是：“要求立即撤退占领军。”

在作为压迫者的国家中（美国、大不列颠以及和德国问题有关的法国），第四国际积极维护被占领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并要求尽快撤回占领军。

在被占领的国家中，第四国际强调在阶级斗争的国际精神之下进行反抗占领军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确保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反对同资产阶级进行“民族的”联合。第四国际竭力为建立占领军与各国被剥削群众之间的友善关系而进行斗争。它同时强调如果不消灭帝国主义、不让欧洲国家自由联合起来建成“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达到的。

另一方面，正当“和平”会议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就已经了解到，就在“联合国”中，在“联合国”

成立前的一切接触中，正日益发展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也理解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我们的小组必须坚强地揭露联合国的欺骗性质，它和国际联盟一样，目的不过是为了改变人民群众的观念，使他们同意用一种在“三大国”控制和指挥之下的包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国际联合组织，来代替革命的工人共和国的国际组合。

它们必须反对一切吞并和赔款的计划。它们必须要求结束秘密外交，公布秘密协定。我们的小组应该尽量利用列强之间的一切冲突，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保留下去最后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世界大战，而使整个人类面临彻底毁灭的威胁。

它们应该具体地向群众说明，只有和殖民地人民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是防止新战争爆发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才能一劳永逸地消灭战争。

我们小组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具有明确的、有教育意义的性质。战争的经验已经使人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政治事件的重要性。他们对于战胜国要“最后”决定世界命运的企图所抱的怀疑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新的世界性冲突所感到的恐惧，在目前正是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一。

德 国 问 题

一个没有强大的工人运动的德国仍然严重地影响着欧洲革命斗争的发展，因而德国问题，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日趋衰落的欧洲身上的一个最大的脓疮。

在对德和约的问题上，第二次大战的各战胜国在同一个时期，完全表露了它们在使用压迫的方法上的野蛮性，表现出它们彼此之间缺乏适当的配合，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它们

的经济和政治“计划”已彻底破产。

第四国际的每一个小组都有责任强烈地反对强加于德国人民的人为的饥馑、反对强迫把德国人民迁入和迁出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等),并反对其它一切不利于德国人民的“种族”措施。

第四国际坚决反对占领,反对军事统治以及掳掠德国的人民和财物。它彻底反对把这个欧洲的工业心脏变成为农业的荒土的计划。它具体昭告欧洲的人民群众,这类计划的结果只能表现为整个大陆的彻底衰败。它主张一切国家的工人都和德国工人、战俘、被放逐的人们结成兄弟般的友谊。它一直在为使德国工人能够加入工会,使他们能有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工人一样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和他们享受同样的权利而进行斗争。

欧洲社会主义联邦

在目前欧洲的经济已彻底解体、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战胜国对许多能够自立的国家进行民族压迫的情况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具有极其重大的宣传价值的。

我们的各个小组必须具体地向群众说明,求得欧洲经济上的统一,对于所有组成国来说,是一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而这一任务却只有依靠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该大陆被剥削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帝国主义的利益以及欧洲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都是和欧洲经济的统一不相容的。它们鼓吹并推动欧洲经济上的割据局面、企图消灭欧洲的生产力、欧洲的文明和文化。

针对着帝国主义分子的“和平”纲领,我们的小组应该提出以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为号召的纲领。

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必须建立在整个大陆在经济上得到统一

的基础上，必须消除一切关税壁垒，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创立一种适合于民族文明和文化昌盛发展的最好的形式。在这个新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的边界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依据语言、民族文化以及各地人民自由发表的意见来划定。

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将容许一切殖民地享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利、和它们保持友好的经济关系，不用暴力，而以示范和与之合作的方法，领导它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世界联邦的道路。

已经消灭了居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苏联将会加入社会主义的欧洲联邦，这就将帮助联邦克服许多困难，而使它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反动势力的计划正把欧洲大陆日益领向野蛮和混乱的境地，“**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是唯一的另外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府

在目前客观条件对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革命危机的发生正极为有利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仍然追随着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他们和他们所奉行的政策实际是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主要障碍。

另一方面，鉴于资产阶级目前的尚不稳定的政策以及它和以工人为基础的政党之间的力量上的对比，“**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正是具体地体现了过去我们一直对旧的保守主义的领导提出的那些口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断绝关系！夺取权力，夺取一切权力！**”这在政治上是绝对必要而且是具有莫大的重要性的，它同时也构成了“揭露第二、[前]第三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叛卖性质的一件极其重要的武器”。（《过渡时期的纲领》）

在整个目前这段时期中，这一口号应在我们的欧洲小组所提出的一切口号中占据中心的位置。这个口号，不仅决不会加强人民群众对于民主主义的幻想，相反的，它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那些幻想。可是关键问题要看我们能不能够不断地充分强调，这样一个政府的基础必须是人民群众的独立自主的行动，而且他们的目的是要实现真正的工人的最低纲领。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口号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口号，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为革命行动作好准备，并且帮助他们，通过他们的行动的必然逻辑，了解到他们为什么必须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范围。

正和联合阵线的策略一样（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工人政府”），这一口号是一个具有双重作用的武器。我们的小组必须一方面随时警惕，防止机会主义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单纯从通过议会选举的意义上提出这个口号——拿可能建立的一个以议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府作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各种问题的一个办法。可是，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竭力强调这一口号的“策略”性质，强调它的目的在于揭露传统的领导和这样一个政府的无能和不切实际——这样就会使这个口号失去了它的真正的重要性。

“我们只是在 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所了解的意义上来接受‘工农政府’这个口号，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它决不代表后来的一些继承者加之于它的‘民主政治’的含义，那些继承者实际是把它从一个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对所有那些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并自认为代表他们讲话的政党和组织，我们要求它们从政治上和资产阶级断绝关系，并立即

走上为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保证给它们充分的支持，和它们一起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动活动。同时，环绕着这些，在我们看来，实际代表着‘工农政府’纲领的过渡性的要求，我们将进入不倦的宣传鼓动工作。”（《过渡时期的纲领》）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机械地运用这个口号那将是极为危险的。因为不用说由于各国的具体政治情况不同，它的实际意义彼此是可以完全不同的。

民主口号

作为目前这一时期的中心口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府这一口号包含着整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的要求。

在欧洲大陆的一切国家中，民主口号是整个这一套纲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像经济方面的过渡时期的要求一样，这类口号，在每一个国家，可以以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程度上，形成一个起点，以使我们每日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提出工农政府这个中心口号。

在现阶段，这类口号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现在的“民主”政权具有极端严重的不稳定性，由于资产阶级的最根本的倾向是拿破仑式的政权。而恰恰只有环绕着这样一些，对现阶段人民群众政治觉悟来说，最易于为他们所接受的口号，广泛的动员才有可能（为反对比利时、意大利、希腊的君主政治而进行斗争）。

1. 立即通过普选选举**国民议会**，一切年龄在十八岁以上的男人和女人，包括士兵在内，全都有选举权，投票采用不记名方式。

一切政党都将享有充分的宣传自由，它们可以自由散发文件，出版报纸、使用电台和会议厅等等……

2. 消灭一切欧洲国家中的君主政体。

3. 根据北意大利的经验成立人民清洗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查清政府机构、公安部门、军队和经济机构中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把他们提交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的人民法庭公审。

解除反动的和法西斯的军队的武装,并解除雇用警察的武装。反对解除游击队和其它人民组织的武装。重新建立工人阶级的民兵组织。

4. 恢复一切民主权利和工人的自由,在对待国家和大资产阶级的关系上,他们有出版自由,同时他们可以享有集会、言论自由,组织工会自由,罢工权利;消灭一切形式的检查制度。

禁止一切公开或隐蔽的反动的、法西斯的组织,取缔它们的出版物。反对以任何强制的方式迫使工人永远在一个地方或某一特殊工业部门工作;反对国家通过任何形式控制工会、报纸和工人阶级的组织。

5. 主张解散常备军;赞成把人民武装起来。

不管怎样,为了使这些民主的口号能够变成推动革命行动的杠杆,而不致成为套在无产阶级的脖子上的绞索,在具体运用这些口号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点:

1) 这些口号在任何情形下都决不能作为孤立的口号提出,而必须和整个过渡时期的要求联系起来,特别必须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府**并以之作为产生双重权力机构的工具的宣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在环绕这些民主的口号进行宣传的同时,必须不断地发起运动,清除人民群众对议会制度的幻想,并为成立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宣传。

3) 至于在这些民主口号中究竟哪一个应特别予以着重,则应当视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整个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必须贯穿着一种战斗的革命精神，完全避免那些必然会使得我们的政策显得像半中间派的例行公事而归于失败的畏首畏尾的作风和消极态度。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局势中，猝然的事变非常可能出现，而且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某些过去曾经强调过的口号现在也可能暂时不必再提出，它或者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了时效。

过渡时期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特别提请我们的欧洲小组的全国性领导机构注意，争取实现这些口号的斗争必须和争取实现以下的一些过渡时期的口号的斗争密切的结合起来，这些过渡时期的口号对于整个当前时期是完全适用的，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重建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彻底推翻它。

1. 在一切国家中，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差不多一直处于稳定状态的工资和不断上升的生活费用之间的愈来愈大的差距。

我们的小组必须要求**立即停止对工资的冻结**，并且依据各工会确定的物价指标，制定一个**物价工资比例表**；并确定最低水平的生活标准。

2. 为了反对生活费用的高涨，我们的小组应当提出由**户主、贫农和小商人组成物价和市場控制委员会**的口号，这些人也可以逐步扩大控制的范围，直到对一切商品进行合理分配。

3. 食物价格的上涨肯定只会有利于零售和批发的居间的商人和运输托拉斯。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和生产者所得到的售价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为了把城市和农村的生产者统一组织起来，我们的小组应当提出成立**物价控制委员会**的口号，委员会将由被

选举出的工人和农民代表组成。他们将要求完全取缔一切居间的大商人，同时组织农民的售货合作社和工人阶级的收购和运输联合会。

4. 一般经济上的萧条，结果总表现为失业人口的增加。我们的小组则应要求真正实现工人的“工作权利”，提出**随物价转移的按时计算的工资表**的口号，要求按现有人手分配现有工作，并强迫工厂在工人的控制下开工。

• 5. 针对着显然无力使已被破坏的经济复兴的资产阶级的无能和冷漠态度，我们的小组应当积极维护重建农村的计划，这种计划将由工会制定，在工人的控制下进行。它们应当揭露那些排除工人的干涉、完全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各种计划化诺言的欺骗性和虚假性。它们应当要求那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使用唯一可能有效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计划化的诺言：那就是，通过**工厂委员会**的组织，由**工人来控制工厂的行政管理**，控制供应、工人的雇用和解雇，以及最重要的，控制生产；同时通过由称职的职员组成的委员会来控制同银行的往来。

这种工人控制的观念和官僚主义的机构是完全针锋相对的，那种机构是要通过一个混合的委员会把国民经济完全置于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因为在那种委员会中，正如传统组织中的居心叵测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工人只占少数。

我们的小组还应当向群众解释，有必要把有关一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和一切属于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的互相调节的经济合作计划，联系在一起。它们必须强调，没有这样的前景，任何认真的恢复国家经济的企图结果只会归于失败，它们同时还应揭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所执行的“民族的”、沙文主义的政策反动性和欺骗性。

6. 它们应当要求立即沒收一切从战争取得的利润。针对着资产阶级的欺骗活动,它们应当要求消除一切商业上的秘密;它们应当鼓动工人强迫资本家公开他们的真实的帐簿。这样,他们的寄生性、浪费生活,以及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损害就将充分地暴露在人民群众的眼前。

7. 计划化经济道路上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工人的控制下、**无偿地不容有贖回权利地**将银行、矿山、保险公司和主要工业(只有小股东和少量存款的存戶除外)全部收归国有。我们的小组应当揭露自由资产阶级以及那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国有化计划”,他们显然是要让已经陷入瘫痪状态的经济再担当起赔款的重担;他们希望让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执行“管理”和“控制”“国有化”财产的任务。

8. 至于代表中、小农民利益的过渡时期的要求,我们应当强调消灭中间人和调整批发价格;我们应当为反对肥料托拉斯进行斗争;我们应当争取低利息贷款、降低生产工具价格、在中、小农民中公平分配农业装备、免除小农民的赋税,并勾消他们的一切债务。

一直到通过革命将土地和附属土地的一切全部沒收,转而分配给真正耕种土地的人以前,我们的小组应极力争取:

1) 通过减少交付给地主的租税数量改善佃农的生活。

2) 减轻小农民的租税负担,农民在合同期内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等等,应强迫地主予以适当的补偿。

3) 以保证贫农能维持生活的低价,将土地、牲畜和机器租给所有的贫农使用。

9. 至于有关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新兴的中产阶级(职员、技工、白领工人等)的要求,一般工资收入者的要求对他们都同样

适用。对那些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他们的处境虽然各国不同,但一般总日益恶化)来说,反对金融资本在货币方面的欺骗活动的斗争以及反对大商人和托拉斯的斗争则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在苏联所占領的国家中的任务

在为红军所占領的欧洲地区,我们的小组,一方面首先要重视完成土地改革,使大工业、银行、运输业国有化的斗争,并争取实现我们所提出的从第2到第5条民主口号,同时也应提出各民族均有自主权的要求并尽量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它们应当反对强迫其它民族和苏联民族混合或联合,反对强制移民以及其它一切民族压迫手段。

它们要求给工人政党、工会和苏维埃自由组织和自由活动的权利,以保证这些国家中工人运动的自由发展。它们对红军的容忍有一定的限度,那就是:它只是作为一支友好的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存在,目的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分子的干涉,保证实现土地改革和生产手段国有化的工作,而丝毫不损于工人阶级运动的自由发展。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红军服从苏联官僚机构的反动命令,反对人民群众的起义运动,反对争取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我们的小组则必须为红军的失败和工人的胜利进行努力。他们应当同时采取军事手段和对红军士兵进行友好宣传的办法来击败红军,尽量说服红军士兵起来反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每一个反动命令的执行人,参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群众的行列。

組織任务

我们的欧洲小组,在战前有很长一段时期只进行一些一般的

宣传工作,后来在战争期间又在生活上和群众隔离,既缺乏经验又一直处于严格意义的非法状态,所以今天,它们始终感到很难抛弃一些已经过时的有关组织和活动方面的观念和方法。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我们的欧洲小组有必要尽快使自己适应目前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情况,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这里提出以下的建议:

1. 我们所有的欧洲小组在现阶段必须以最大的努力紧抓住它们已经获得的合法地位,并尽量避免任何错误的发生,以使资产阶级不能借以重新将它们置于完全非法的地位。

凡是尚未获得合法地位的小组必须立即进行一次积极的、明智的、严肃的全面斗争,以争取得到资产阶级法律的承认。

2. 必须密切注意出版问题。我们的小组必须努力争取中央、区域和地方机关报的合法的出版权利,如果在这方面不幸失败了,它们必须毫不犹豫地不以党的名义出版一些地方性报纸,以便向群众传达我们的宣传和纲领的中心内容。

3. 另一方面,如果资产阶级有计划地禁止我们举行政治性集会,我们的小组就应该转而采取其它形式的集会,如讲演会、私人茶会、文化艺术会议、体育活动等等,以便和我们的同情者保持联系,扩大我们的影响。在工厂或居住地点在群众中较有影响的同志应随时以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纲领的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决不能在政治上采取模棱态度。

4. 我们的小组,对于现阶段在一切欧洲国家中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高潮时期的工会运动,必须予以最大的关切。我们的积极分子必须使自己表现为工会运动以及群众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各种斗争的最优秀的组织者,并在这些活动中提出我们的纲领。

一般说来,在所有的国家中,它们应该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来争取工会的团结、争取以一种工业为基础重新组织工会、争取工人

阶级的民主、争取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争取制定目的在于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为反对生活费用高涨、反对失业威胁而斗争的具体的行动纲领、争取使工厂开工、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活动和警察的镇压。

我们的小组不论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尽量争取把总工会的工作交托给由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同志们组成的委员会去担任。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工会内部，以我们上面所规定的纲领为基础，组成一个反对目前趋势的运动。

5. 我们的小组在一切政治的、文化的和文娛的工人阶级组织中，应尽量创建和巩固我们的据点和外围组织，目的是要通过耐心、系统和坚持不懈的工作，使那些组织中出现的进步倾向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纲领。

对于青年组织更必须特别注意。

6. 改良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的活动，正有计划地破坏工人阶级干部中的一切社会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教育，因而在自己的队伍中(通过干部学校)以及在工人阶级中(通过马克思小组、出版马克思著作、设立图书馆等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工作，乃是各小组的迫切任务。

7. 从非法变作合法的时候，必须彻底改变进行非法工作时的各种方法和组织形式，以便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避免无意义的拖延。

但不管怎样，这种从非法到合法的转变决不应使我们的小组忘掉，它们随时仍有又变成完全非法的可能。每一个小组的组织系统，我们这里指的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我们的欧洲小组的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充实和加强它所领导的各小组的布

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并坚决反对一切宗派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弄着玩儿似的小资产阶级的组织观念和工作方式。

我们在英国的任务

工党的当权要求我们的英国小组重新确定它的宣传和鼓动工作的方针。直到 1945 年的选举以前，它们的中心口号一直是“**争取工党执政**”。

现阶段的情况要求我们制定一个能够符合群众利益并能动摇资本主义势力的有关过渡时期要求的具体的明确的纲领；它让我们必须要求工党执行这个纲领，在维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对工党的某些活动进行批判，并尽一切努力使它的运动和组织的运动和组织朝着双重权利的形式(工人管理委员会)发展。

此外，我们的英国小组必须加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积极支持殖民地人民，特别是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发动一个广泛的运动，迫使英国从它在欧洲占领的国家中撤回自己的军队。

在美国的任务

伴随着美国经济从战时状况过渡到“和平”状态，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从此彻底失去平衡，因而为它带来的充满危机和动乱的前景而进行的争取实现工人要求的运动所发生的威力，已经为我们的中心口号：**建立独立的劳工党**创造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个党应以工会为基础，以尽快提高美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为主要目的。美国的革命政党必须动员全国的无产阶级来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反苏计划、对中国的军事干涉以及在日本、德国和其它的亚洲和欧洲国家驻扎占领军。

我們在殖民地的任务

目前在各个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为革命政党的建立提供了极有利的基础。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只是把自己放在民主和民族运动的范围中，就能变成一切被剥削阶层的革命的领导，就能在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同时，担当起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民族独立的任务。使它能够取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条件则是：保证它的政党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保证策略上的灵活性，保证能够使农民阶层接受自己的领导，以及依据斗争的力量的强弱和群众觉悟程度的高低，明智地把那些基本上属于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范畴的口号同过渡时期的口号和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联系起来。

我们的殖民地小组，在保证它们的政治上的独立和不丧失自己的革命面貌的条件下，必须毫不犹豫地和那些正进行有效的反帝斗争的城市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建立切合实际的联盟。

这种联盟的目的是和那些力量联合起来以便打击共同的敌人，但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的小组仍必须保留批评的权利和阐明它们的全部纲领的权利。我们的小组还必须在这些国家的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组织中进行有计划的和耐心的拉拢活动，目的是要在这些组织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势力，推动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向左发展，以及打击和破坏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计划，使他们和他们的组织被置于一种思想意识的钳制之中。

我们的在帝国主义宗主国以及其它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小组，有责任积极支持殖民地人民为求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获得解

放的斗争，即使这种斗争是由民族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领导的，也完全一样。它们应要求立即给殖民地人民以不加任何限制的自决权，并通过呼吁国际工人阶级采取一致行动，大力反对向殖民地运送军队和武器去镇压革命。

八、世界局势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总政治决议

第四国际 1946 年 4 月会议的文件，分析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一些变化，正确指出了由此而来的革命前景，并且确定了第四国际的下一段时期的任务。这些在现在大部分仍然都是正确的。

德国和日本的惨败，法国的垮台，英国的衰弱，完全破坏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旧均势，为美苏之间的尖锐对立开辟了道路。美国从战争中走出来，成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强国，着手进行统治全世界的工作。它遇到苏联这个主要的敌手；苏联虽然有着内部的弱点，可是控制大部分欧洲和亚洲。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基本危机的基础上，这次战争又为世界资产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不稳定均衡的长时期。这就是说，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不断发生经济的和政治的困难、骚乱和危机的时期。这种情况必然促使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群众进行巨大的斗争。随着这些斗争的发展和尖锐化，它们就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在这一时期中，制订有过渡时期纲领的第四国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把它的各个地方组织从宣传团体改变成为群众的政党，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群众的日常斗争，组织他们，并领导他们争取政权。

自从四月会议以来，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了一系列的

发展。这些发展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说明当前的时代和前景，以及我们在最近将来的任务。这些发展，在这次战争所开辟的那种不稳定均衡的新时期的框架之内，又开辟了一段远未结束的时期。

一、经济局势

1. 西欧和美国

在欧洲和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这次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贫困和通货膨胀，以及因此而来的世界市场的脱节，乃是这些国家中经济活动的恢复的性质非常不一致的原因。这在四月会议的文件中都已预见到了。由于这次战争而造成的所有这些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不平衡的经济关系，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情况。

1945年中，一些受到这次战争影响的西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促进经济活动方面作了努力，可是效果十分缓慢，而且小得可怜。生产提高了（各国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特别是在1946年初期。但是只是在极其特别的情况下，有些国家才超过本来就很低的1938年的生产水平。在所有这些国家中，特别是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生产的发展主要是靠由美国信贷来提供的美国粮食和工业设备。

从1946年第四季度以来，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生产有下降的趋势。在这以后的一年中，由于最后的一些美元储备已将被用光，经济情况有变得十分严重的危险，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英国也是如此。

而且，英国和美国在恢复德国经济生活，和加速它的重建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带来任何可以看得出的成果。

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对于西欧国家的新的经济援助再延长若干年的计划，目的在于延缓灾难的来临，和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不违反美国经济利益的范围之内，发展欧洲的经济。但是，在若干年内继续补贴对欧洲国家输出的一些主要出口货，决不意味着有可能恢复即使是战前的经济均势。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衰退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逆差，是靠着国外投资的收益和所提供的服务的收入（运费、佣金等等）来弥补的。这次大战大大减少了这些收入来源。

只有相当大量地增加生产和开辟新的市场，才能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弥补这些损失和恢复有利的收支差额，使它们不再必须总是依靠美国的贷款，这种贷款已经堆积得很多了。

马歇尔计划并没有终止货物和服务的单方面地流向欧洲，也没有终止对美国欠债的增长。这就是战后世界经济完全失调的根本原因。

在美国方面，它必须维持（即使不是增加）货物出口和提供服务，以便把生产维持在现有的水平，并推延经济危机的爆发。

但是，即使美国依靠放出更多的信贷把出口维持在现有的水平，同时借此剥夺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其本身发展所需要的市场，这对于预防美国经济危机来说，也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美国出口总额在这一国家的总生产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美国的主要市场大半是国内的。

有一个时期，美国经济表现出有衰退即将到来的迹象。

美国的生产，在 1947 年第二季度达到很高的水平以后，就停滞下来，可是价格继续上涨。国内市场的购买力的下降趋势越来越明显，可是在出口方面并没有什么可以看得出来的增长。

2. 亚洲各国

亚洲各国的经济在战前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很大份额，它现在继续遭受着这次大战及其内部不安局势所带来的损失。

日本在战前是一个主要的工商业国家，和远东其他各国都有关系；其经济地位和德国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在中部及东南部欧洲的经济地位相类似。它现在几乎完全退出世界市场；它的经济几乎完全依靠来自美国的、受到信贷奖励的进口货。

印度正在力图填充日本的地位，但成效不大；它是在战争时间工业和经济地位得到相当发展的唯一一个亚洲大国。

中国由于长期抵抗日本的统治而弄得筋疲力尽，现在又是一次残酷的内战的战场。这次内战在消耗着它的资源，从而破坏着蒋介石独裁政权的稳定性。

荷属东印度、缅甸、印度支那的不安定的局势，推迟了所有这些国家（它们都是主要原料的生产者）的经济重建工作，并妨碍它们参加世界贸易。

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局势，就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复兴，面临着很多经济的和政治的障碍。这次大战不仅加深了资本主义的临死前的痛苦，而且使得它不可能恢复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的均衡发展。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主要依靠的美国经济，其本身就受到在最近的将来要爆发一次经济恐慌的威胁，这就有在世界经济还未达到相对稳定之前就弄乱世界经济的危险。

3. 苏联及其卫星国

苏联经济在 1947 年获得了小麦和其他农产品的丰收。这使

官僚机构能够改善对人民的面包和其他食品的供给。

据报告，五年计划所获得的成果似乎指出，一般工业生产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但有些关键工业，例如木材、农业机器、建筑材料、熔炼、造纸、橡胶、某些煤矿，却落在后面。然而，这种生产成绩主要是由于官僚机构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而劳动生产率则是继续下降的。为了克服劳动生产率的这种下降趋势，苏联官僚机构曾进行全面修改决定工资的生产定额。这种修改是在工业和农业中都建立了计件工资制，其出发点是要提高相对于既定工资而言的强迫生产的最低要求，从而它意味着加强剥削苏联工人的劳动力。因此，复兴工作的发展，只是有利于苏联官僚机构和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而广大工人群众则不得不在更坏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生活和工作。

在为苏联所控制的欧洲国家中，可以看出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这是由于实行了由斯大林分子控制的政府所强迫施行的各种“计划”，特别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斯大林主义的政党维持了社会安宁。

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影响，苏联官僚机构力图发展苏联和在它控制之下的各个国家的贸易关系，并建立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闭关自守的经济区域。然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保留其基本的资本主义结构，不但不鼓励这样一种计划，反而强调需要和西方贸易，需要输入美国资本和工业品。

二、国际关系的发展

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的对立，在世界关系中占最主要的地位；它使得华盛顿和莫斯科都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美帝国主

义成功地收紧了对苏联及其控制的国家的包围圈，并且继续从各个方面对苏联发动攻势：外交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和宣传的。

联合国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美国外交代理机构，它破坏着斯大林的外交官打算实行他们的政策的一切努力。“小型大会”的建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抵消了作为斯大林外交政策主要靠山的否决权。对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目的就在于把这些国家完全放在美国控制之下，同时把共产党逐出政府。

在美国扶植之下的西德的复兴计划，要在欧洲的中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以便在将来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化苏联“缓冲地带”内的国家。而德国的在远东的对应物——日本——则已经完全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在整个世界的美苏战线上最敏感的各点上，在希腊、土耳其、伊朗、中国、朝鲜各国中，美国都在施加它的外交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压力，同时也使用纯粹的军事手段。

美帝国主义用它可能用的所有手段，发动了反苏反共的宣传运动；这种运动无论在美国或在受它影响的国家中都正在积极进行着。它的目的就是要赢得群众，使群众赞成美国正在对苏联进行的冷战，同时准备在华尔街认为必要的时候进行射击战。

随着美帝国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扩张主义的要求的增加，随着军事生产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美国政策的侵略性也越来越大。

在现在，华盛顿从各方面使用更大的压力，要根本改变大战结束时建立起来的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使之对自己有利；并劝诱苏联对它作尽可能有利的妥协。当然，美帝国主义更愿意通过

和平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它还没有完全荡尽和平的世界扩张的可能性；只有当危机实际爆发并且规模扩大的时候，它才感到自己是处在经济的死胡同中。美帝国主义愿意推迟军事摊牌的时间，还有另一些理由。虽然它在原子武器方面占有优势，可是在世界战线上，美国的战略地位还是很弱的。西欧和亚洲各国中情况都很不稳定，这就使得从这些国家取得反对强大的苏联军队的直接有效援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了。苏联的军队就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边境，而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现已很强的军力又加强了苏联军队的力量。

在目前情况下，要爆发一次战争，那一定会转变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内战，其结果如何，是难以逆料的。

在进行战争冒险以前，美帝国主义首先要在欧洲和亚洲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便使它能够应付这种战争必然会造成世界“混乱”。

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战争是帝国主义者的最后手段。它是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周期的末端到来的。不论这一周期可能结束得多么迅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它的初期阶段。

经济危机什么时候在美国爆发，以及它的规模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政策的发展，并且一定会促进战争和革命之间的竞赛。

面对着美国的侵略政策，苏联官僚机构的反应是：巩固它对于在它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的控制；并且在那些溜入美国轨道的国家内，使共产党加紧反对各该国家的政府。

1947年，在苏联区域中大多数国家内，对于顽抗的或对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带有敌意的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都加以威胁和清洗，其目的在于消除和粉碎任何来自右方或左方的反对意见。这

种威胁和清洗的结果是，共产党在各该政府中占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苏联官僚机构还直接地或通过它的代理人——共产党——在所有这些国家内加紧采取经济措施。他们强迫实行各种各样的生产“计划”和贸易协定，目的在于使这些国家更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并把它们紧紧地和苏联绑在一起。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企图使它们成为一个自主的区域，离开马歇尔计划各国的吸力。

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的增强的压力，面对着共产党被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且和那些它们曾与之携手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隔离开来这一事实，也就是说，面对着自从“解放”以来它们的政策的明显失败，各国共产党决定要作一番改变，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宣布了这一点。

美苏之间的对立，虽然在国际舞台上占极其主要的地位，但却不能掩蔽列强之间的一些次要矛盾，也不能消除其他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些其他重要因素。

欧 洲

德国仍然是问题的焦点，不仅在美苏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中是如此，而且对其他强国来说也是如此。在德国问题上，英国和法国越来越依靠美帝国主义，这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依赖性在过去一年中变得更大了。在大战结束时，这两个国家打算采取的政策，是要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以一个西欧集团为形式来维持一种中间地位。但这种政策完全失败了。

英国已经衰弱的世界地位，使得它不得不接连从印度、从中东、从欧洲撤退，并且部分地放弃帝国特惠制度，让位给它的强有力的伙伴；此外，它还不得不勉强地把对德国“共管区”的控制权让给美国。

法国越来越不能不依靠美国的援助，只能对美国在德国的政策提一些口头抗议，实际上已根本不希望取代德国的地位，作为在美国控制之下的欧洲复兴工作的枢纽了。法国不得不只满足于把萨尔合并到它的经济结构之内，并且继续要求在鲁尔的“国际控制”中占一份额。

美 洲

在西半球，美国对这两个大陆的其他国家所施加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压力，成功地把这些国家团结为在美国庇护之下的反苏集团，在皮特罗普利斯会议上统一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组织。与此同时，在中美和拉丁美洲各国，当地的资产阶级还对无产阶级力量加强了攻势。

亚 洲

不同的局势在发展着，总的迹象是，不论是经济或是政治，都一直是不稳定的。

日本严格地受着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美国政策的目的在于把日本变成为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主要经济和战略基地。

在印度，由于英国硬把这一国家分成为巴基斯坦和印度，就使得它发生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从而有利于英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反动力量。

印度的资产阶级已经证明不能始终一致和有效地领导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也不能解决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数目上和在社会重要性上都已大有增加，而且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反对当地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印度革命的动力，领导它去

建立印度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在**中国**，由于在北方有来自延安的军队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心有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因此，蒋介石已经不再实行“民主化”措施，这种措施原本是他打算用来为他那摇摇欲坠的独裁政治赢得社会基础的。

靠着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他打算越来越依靠暴力来维持他的政权，但是他成功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小了。

到目前为止，美帝国主义在稳定中国政权方面、在开辟它的广大市场以便加强剥夺方面所做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华盛顿以后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日本身上，其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在中国的这种失败。

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无论是荷兰帝国主义或法国帝国主义都没能依靠武力取得任何有决定意义的成果。在这些国家中现存的僵持局面，只有依靠当地资产阶级的背叛，才能得到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解决。

在**中东**，美苏之间的对立特别尖锐，它对于广大回教人民群众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晌。

差不多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都有着巨大的群众运动的浪潮。但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主要或者是由于缺乏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或者是由于现有的这种领导十分软弱。但是，帝国主义者也没能重新建立起稳定的剥削关系。

三、社会矛盾

在各种世界关系之中，以苏联及其卫星国为一方，和以在美国

的庇护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为另一方之间的偏极化，是和大多数这些国家中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同时发生的，也是和它们内部的更加严重的偏极化同时发生的。

进行统治全世界工作的美帝国主义，必须设法在国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主人。然而，在战争终了时，它受到十分巨大的罢工浪潮的挑战；这种浪潮向整个世界显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潜在的革命力量。华尔街不能不暂时让步，用一些阴谋诡计来应付这种挑战，而不和它硬拼。

但是，这种强有力的美国工人运动仍然局限在经济领域里。最高工会的官僚机构和一些旧的资本主义政党联合在一起，使得这种运动不能在政治方面有所表现。这就使得资产阶级能够不受阻碍地组织反攻，终于出现了恶毒的反对工人的塔虎脱-哈特莱法案。结合着反工会运动，资本家们还发动了一次恶毒的扣红帽子运动。这两者都是美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对外政策的在国内的对应物。

虽然由于工会官僚机构的反动和怯懦，美国统治阶级的反攻在各个方面都多半是成功的，可是它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并不是一种致命的影响。对于塔虎脱-哈特莱法案的一些压迫性的条款的反抗，是比较弱的。大多数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包括在从前十分进步的联合汽车产业工会的成员，都服从它的规定。只是矿工、钢铁工人、铁路员工等等都坚决反对这一法案。但是后者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是关键工业中的重要成员。比较年青的美国工人阶级不完全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反攻的含义。革命的政党还太小，不能进行有效的干预。可是华尔街在国外的反动活动和它在国内的反对工人的运动之间互相联系，却变得更为明显了。美国工人不像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那样，他们不

但没有从这种帝国主义的活动中得到好处，反而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为它付出代价，并成为它的最初的牺牲者。

对于这点的朦胧的认识，以及侵蚀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通货膨胀过程，为美国的新的社会矛盾的爆发铺设了道路。经济危机的逼近，只能加速这种爆发。这次劳工运动的浪潮将采取政治形式；从工会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总趋势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现在这种趋势在地方规模上是最为强烈的，只是仍然彼此孤立着。但是，在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前次全国会议上，已经放弃了它的“不问政治”的传统，并且仿效比较进步的产业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它自己的“劳工政治和教育联盟”——这一事实乃是这一时代的一种主要迹象。在下一时期里，在美国很可能看到工人阶级的惊人的政治化，并且再度出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业工会联合会初起时的暴风雨般的情况。

在**西欧**，虽然资产阶级自从“解放”以后获得了很多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利益，美帝国主义也还没有找到支持现有政权的坚强的基础。自从“解放”以后一个跟着一个成立的联合政府，在一段时期里都有共产党和社会党参加在内；这类政府已证明是没有能力的。在某些这类国家中(如意大利)，持久的、有时是越来越恶化的通货膨胀、食粮缺乏以及失业，乃是人们越来越感到不满的原因。这不仅使工人们不满，而且也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不满。小资产阶级曾经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希望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现在他们都向右转，要在别处寻找一个稳定的政权。在某种范围之内，在英国也是如此。在英国，群众的急进化表现在一次选举的大胜利上，这次选举使工党在 1945 年取得政权。工党政府的政策是以这样一种“社会主义”为特点的，它允许资本家们保持他们的利润，却要使刻苦生活“平均化”，这就意味着越来越限制广大

群众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向右转了。正如上次地方选举所表明的，丘吉尔的保守党从这里得到了好处。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情况也在工党——它保有对工人阶级政治的垄断权——内部造成了更大的偏极化。代表工人的社会主义愿望的左翼，和构成政府的右翼之间的冲突，即将到来。

在法国和意大利，这种偏极化正在以比别的地方都快的步伐进行着。在法国，反动力量围绕着戴高乐重新组织起来（法兰西人民联盟），在意大利发展着各种新法西斯主义运动，这都说明小资产阶级群众采取了新的反动的方向，他们由于传统的工人政党的失败而感到失望了。然而，在欧洲任何地方，即使在希腊，资产阶级都还没有给无产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也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工人阶级仍然保持着它的精力和战斗精神。1947年法国和意大利工人的伟大斗争说明了这一点；比利时、荷兰和英国工人的斗争也在较小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斗争在阶级关系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其传统领导之间的关系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广大的工人阶层都投入这种斗争，来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不受物价飞涨和食品缺乏的侵害。他们迫使他们的领袖采取行动；当领导人拒绝行动时，就越过领导人向前行进。

一方面是人民群众从这些斗争过程中取得了经验，另一方面是反动迫害越来越严重，这就使得工人的斗争更加政治化了。

资产阶级了解经济方面的不利局势，也了解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他们只是十分小心地推进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攻势。他们力图尽可能地延长“中右”内阁的寿命；这种内阁在法国和意大利，在把斯大林主义者排除出政府以后，已经取代“中左”内阁了。他们

希望，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会在最近的将来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并且希望，和苏联的可能和解，将会缓和共产党对他们的反对。

然而，只要扩大和调整工人的斗争，根据一种革命的纲领，把群众的经济要求及基本政治要求和导致建立工农政权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能够阻止反动力量。只要进行勇敢的争取政权的斗争，就能够把小资产阶级引回工人阶级的轨道。

但是，如果工人的政党以及一般工人阶级运动继续衰弱无力，如果西欧的经济局势越来越恶化，那么，法国和意大利很可能变成资产阶级独裁力量和群众之间一场残酷内战的舞台。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斯大林主义的党别无选择，只有战斗，甚至是用武器战斗，例如在希腊；即使在法国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法国，戴高乐要通过“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

社会对立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也发展得十分尖锐。在**拉丁美洲**，昙花一现的战时繁荣已让位给一种很深刻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上，一部分也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失业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自从大战以来已经大大加强，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加强的经济和政治攻势，他们正在进行伟大的战斗，特别是在智利、玻利维亚和巴西。

在法国帝国主义的非洲殖民地，在埃及，以及在**整个中东**，自从大战以来，年轻的工人运动是以第一次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因素而著称的；它不仅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且也和自己的占有阶级作斗争。

在**日本**，尽管在美国占领之下，工人运动也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会运动的高涨、大罢工的范围以及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的政治胜利。所有这些构成日本人民群众急

进化的头一个阶段。

在印度，各大工业中心的集体罢工——常常是由托洛茨基主义的斗士领导的——标志着工人阶级的觉醒，他们反对跟封建主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印度资产阶级。

在中国，蒋介石独裁政权所采取的新的反动措施，远远没能征服华南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他们正在为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不受惊人的通货膨胀的破坏而斗争，也在为他们的民主权利而斗争。

总之，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的特征，一直是群众活动十分高涨，这种高涨远远超过战前任何时期。对于西欧、拉丁美洲、亚洲各国来说，尤其是如此。

四、劳工运动的局势

在上次大战中出现的劳工运动，主要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之下进行的，在欧洲和亚洲尤其是如此。然而，在其成员内部，正在进行着一种不断的分化。

无产阶级原来心向共产党，希望它们会扮演革命的角色。在这一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的巨大发展，再一次说明无产阶级决心要克服战争，也再一次说明无产阶级决心要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血腥的混乱情况。然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共产党都没有证实被压迫的群众的希望。正相反，它们的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在一种需要一些彻底的解决办法的局势面前，逐渐在无产阶级中间播下了不满和混乱的种子；而原先相信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则向右转了。

1. 社会党

各社会党主要在欧洲各国中还保有一定的基础，虽然它们已经把它们的工人成分让给了斯大林主义者。这证明人民群众如果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是不能完成他们的改良主义的体验的。传统的保守作用，以及一个组织机构的存在，也是发生影响的因素。各社会党所以仍然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主要社会基础在帝国主义时代包括有小资产阶级成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总是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者之间。只有在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政党，能够克服他们的狐疑态度，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要不然就中和了他们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被吸引到无产阶级这边来。

在大战结束时，社会党人让共产党夺走了他们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基础，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和在世界其他各地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这一普遍趋势的例外，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这些地方，社会党的传统是最强有力的，而资本主义的客观局势也比较好。在这些国家里，人民群众的急进化，主要表现在社会党的发展上。

在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在苏联“缓冲区域”的某些国家中，社会党由于共产党而受到的损失最大。不过后来的发展改变了这种局面。在处在苏联控制之下的国家里，人民群众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政策都有比较明确的体验，工人又重新转向社会党。无产阶级不满意斯大林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官僚主义的警察统治，他们使社会党重新活跃起来了。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包括德国和奥地利在内，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的任务就在于特别注意到各社会主义组织内部去工作，并

具体研究局部参加策略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妨完全参加。

在其他国家里，这些组织对于我们的国际运动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场所；法国、意大利和印度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只要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除了传统的一些政党的吸力以外，不会出现其他巩固的吸铁石，那么，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力量将总是来回变动的。

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不但没能使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孤立，反而有利于保持它原有的基础，甚至使它得到相对的发展。在相反的意义，这一说法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

只有由于第四国际的吸引力，这些传统的政党才能发生真正的分裂。只有第四国际的吸引力，才能使这些政党内部必然要发展出来中左分子偏极化。

2. 共产党

1947年9月贝尔格莱德共产党情报局的设立，标志着共产党政策的改变。

由于美帝国主义加强它对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攻势；由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展开反共产党运动；由于共产党被排出各国政府；也由于群众的压力（群众已显示出越来越不满意这些共产党的迹象）；因此，斯大林的官僚机构决定“向左转”。

在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的框子里，斯大林主义者现在强调动员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利用工人的基本要求作为压力，来讹诈美帝国主义和当地的资产阶级，借以抵制他们的反苏方针，并诱使他们和苏联进行和解。

这一转变的幅度，将决定于美苏关系的发展。如果现在的世

界紧张局势坚持下去；如果各国资产阶级在美帝国主义鼓动之下，继续加强它们的反斯大林的政策，从而威胁各国共产党的存在；那么，各国共产党就很可能越来越采取不可和解的反对态度。它们甚至可能仿效希腊的榜样，乞援于内战。这并不是说，这些共产党能够回到阶级政策上去，那怕是 1928—1933 年那种“第三时期”的阶级政策。只有在真正爆发战争的情况下，这才是可能的。

然而，希腊的经验，以及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最近发生的事件都表明：在一种阶级合作总政策的框子里，斯大林官僚机构的政策是能够作一些明显的改变的。这些改变甚至是要准备总罢工和武装斗争。但是，斯大林的官僚机构使用这些武器，并不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为了有限的目的要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因此，归根到底，它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和失败主义的精神来领导这种斗争，随时都准备着停止和背叛这种斗争。

由于它似乎是要承担起保卫工人的要求的任务，反对议会中的所有其他政党，所以共产党的新政策在一开始时显然有助于加强斯大林主义者和工人之间已经松弛了的联系。可是当人民群众一投入战斗时，它的那种机会主义和策略主义的精神马上就变得更加明显。斯大林主义者害怕真正的革命行动，这就使他们不能坚决地真心真意地领导这些斗争。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们很有些怀疑他们的动机，特别是当回想起过去几年中共共产党的十分糟糕的政策（“生产第一”，“罢工是信仰的武器”，等等）的时候。工人们对于服从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也是迟疑不决、三心二意的，即使当斗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合法要求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的控制权就开始垮台了。特别是在西欧，共产党已经不能动员群众。只有出现一种新的领导，才能办到这一点。然而，工人们的情况使得他们不能

不再三再四地进行斗争。这就使第四国际的各地组织有机会进行有效的干预,争取群众运动的领导权。

斯大林主义者的这种“转变”,由于促进工人斗争的爆发,就能够被用来加强第四国际的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必须懂得如何把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策略(主要用在地方上、工厂里和工会里),跟一种明确的政策和毫不客气地揭发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这些乃是赢得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信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3. 中間組織

一度集拢在伦敦局周围的残存的战前中间组织,现在已经大大衰退和瓦解了。

例如,在英国,独立工党在把它以前的领导核心丢给工党官僚机构以后,就一直在无所事事地生活着。

在法国,自从工农社会党完全解体之后,马尔索·皮维尔就和里昂·布鲁姆联合在一起,使衰老的社会党承担了“第三种力量”的任务。这种“第三种力量”在理论上应该无所轩轻地既反对戴高乐也反对共产党。可是实际上,在市选举中,它却和戴高乐的候选人们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者。

在希腊,旧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反对内战,在官方工会的领导部门里和反动君主政府所委派的特务合作起来。要在斯大林主义和“美制资产阶级民主”之间“进行选择”,它实际上已经投靠后者了。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于一场严重而连续不断的内部危机而分裂了。在头一次和右翼分裂之后,它的政治独立和组织独立现在完全为它的主要领导人摩林所破坏。摩林主张和西方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看齐,并溶化到西班牙社会党里面去。

所有这些组织现在都反对斯大林主义，改变了它们从前的赞成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但这决不意味着是一种进步的发展。正相反，这是它们的倒退的一部分，只是加强了它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原则的传统，并加深了它们的政治混乱。

其他 1939 年以前的中间组织，没有在战后还存在并保持其重要性的。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新的战后时期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社会矛盾都更加严重——再加上传统的工人的政党破产和叛变情况越来越明显——主要在各社会党内部，甚至也在某些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一些新的中间的趋势。这些趋势正在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着。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而经常地注意这些新的中间趋势，并协助它们朝向第四国际的革命立场前进。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作得成功，就能大大加速把我们的各小组变成为真正的群众的政党。

4. 第四国际

自从大战时期起，第四国际各个小组的成员人数都大大增加了，它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也大大增加了。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国际规模上，要比战前任何时期都更为广泛，更为团结。但是所达到的进步，还没有能和客观可能性相适应，更没有和历史必然性相适应。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几乎在到处都要应付把自己变成真正的群众政党的问题。

许多组织正在越来越成功地完成着这一任务；它们以它们的经验向我们指出了通向群众的道路。我们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印度和法国的小组，都取得了它们自己的深入群众的经验。有些

其他小组正在这条道路上跟着它们前进。

而且，在某些国家里，我们将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进步的中间趋势那里得到的资产，将会大大改变这些国家里我们的运动的面貌，从而也会大大改变我们整个国际的面貌。

客观条件对于完成这一任务仍然是有利的。主要障碍来自我们主观的缺点。一方面，这是由于能够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有效地参加工人斗争的干部为数有限；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有些小组的方针受到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的影响。这一国际的经验表明，我们既需要反对宗派主义，也需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意味着要坚决摒弃从过去流传下来的小集团习惯，也就是要坚决摒弃那种口头上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躲避实际群众运动的思想方式和组织方法。反对宗派主义，意味着要坚决摒弃过去的这样一种小集团习惯：在过去，客观局势使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活动主要局限于拟制自己纲领和批判劳工运动中的一些背叛的倾向。在目前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我们的纲领。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有停滞不前和后退的危险。

反对宗派主义，意味着要反对无益的、空洞的宣传。要反对那种认为我们的运动只有依靠逐渐招募新兵和日常教育才能搞起来的想法。一个群众的革命的政党，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建立起来。这首先需要深入到现有的工人运动里面去。必须选择特定的工作场所，在这里，我们运动的发展的可能性是最有利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必须具体化。具体的口号必须考虑到群众的基本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我们的革命的目标必须写成工人的生动语言。我们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到工厂里去，到工会里去，并在那里发展一种在将来能够在每一步骤上向传统官僚机构挑战的广泛革命倾向。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我们的小组必须完全地大胆地支持人民群众的一切民主的和民族的要求；组织并领导他们为此目的而进行的斗争；渗入所有民众组织，以使用一切办法为我们的革命方针而战斗。

反对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向机会主义的压力让步。问题是在革命斗争中领导群众的问题，而不是使我们自己去适应中间立场的问题。第四国际的党的战士，有责任参加每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和每一个集合和动员群众的组织，而不必在地方规模上、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在任何时刻都维护他们的党的全部纲领和政治路线。但是，不管政治局势是不是前进的，这样的党永远要在工人阶级面前维护一种共同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之下，我们的全部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和适应特定局势的传统口号密切相联的。党决不能把它的政策降低到简单的工会主义的水平，或降低成为民主的最低纲领。

所有我们的小组的经常任务，必须是把它们围绕着当前口号而进行的鼓动工作，和关于我们的全部纲领的宣传工作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一定时期以内的中心口号，不是来自似乎是在传统领导之下的群众的暂时政治觉悟，而是来自这一时期的性质，来自群众的生活条件和群众的需要。人民群众，通过他们自己的斗争经验，必然会了解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性。我们的任务是要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和深入，不断大胆地提出更高的过渡的口号；要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政治内容。我们最近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经验特别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小组在寻求通往真正群众运动的道路的努力中，必然会发生一些偏差——表现出过去的惯性的宗派主义偏差，和反映群众压力以及干部思想的弱点的机会主义偏差。

只有由我们整个国际运动来对每一国家的经验进行民主讨论和批评，并进行深思熟虑的干预，才能把这些偏差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使我们能够赢得人民群众，不是以一种中间的纲领赢得人民群众，而是以一种由于工人运动的新发展而更加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赢得人民群众。

随着大战的结束，有必要重新建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组织方面的统一，有必要和所有自称归依第四国际、并同意它的原则的组织恢复联系。

在现阶段，第四国际必须制定它的活动计划，目的在于在某些条件比其他国家更为有利的国家里，使我们的运动得到更快和更有效的发展。这意味着要把注意力和支持都集中在那些最有可能变成群众政党的小组上。其他小组在其发展过程中将会通过这一国际的某些组织的生动事例和经验而得到帮助，因为这些组织可能已经成功地找到通向群众的道路了。

五、前途和政治任务

第四国际的全部战略一直是以准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枢纽。只有它能够使人类免于再度陷入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开辟了一段不稳定均衡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伟大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段时期现在还没有结束。美苏对立的压力，以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持续的危机，加强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偏极化。这种危机已证明不是传统的政党所能解决的，它要导致更大的阶级斗争。在目前国际局势下，在许多主要国家中，这些斗争的结果，将决定资本主义能不能得到相对的

稳定,或革命运动能不能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

不论美苏之间的关系如何紧张,不论为下一次战争已作了多少经济的和思想意识的预备工作,在马上爆发战争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十分巨大的障碍。在这两个大国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妥协是可能的。在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并且随着这种危机的发展,战争和革命之间的竞赛极可能增加速度。但是,即使在这以前,世界资产阶级也将遭受到很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困难、混乱和危机。这将导致伟大的工人阶级斗争。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新的革命力量将从传统的领导力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把它们自己重新组织在第四国际的纲领的周围。

在苏联,由官僚机构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发展方向不但无助于它的巩固,而且还积累并加深它的矛盾。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表现出它的经济基础越来越不均衡的迹象,这就缩短了可能有的相对稳定的期间,而延长了混乱和危机的期间。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第四国际的政策必须从这些考虑出发,并且着重在必须的和可能的动员工作上,动员工人和殖民地人民采取革命的解决办法。

总的说来,四月会议决议中所制订的各种实际任务(它们是由于具体应用过渡纲领而来的),在现在仍然有效。时代的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

第四国际在其宣传工作中不断攻击帝国主义的第三次大战的计划。它说明只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阻止这场只能给人类带来悲惨后果的大灾难。

同时,它还不断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进行斗争,这种反动宣传目的在于在人民群众中间创造一种对于另一次战争的宿命论的

看法。第四国际以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每一次斗争和每一次胜利作为它的政策的依据，并且信赖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计划的革命行动。

在西欧国家里，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偏极化发展得最快，而反动的威胁也最直接，我们的小组在其宣传鼓动工作中必须大胆地提出政权问题。它们必须号召各种劳动阶级的统一行动和建立统一战线，以一种把群众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跟工人管理、工人国民军和工农政府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纲领为基础。

它们必须不断鼓吹扩大和调整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必须不断揭发反对这样做的传统的领导人。它们必须特别揭露新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精神，揭露它那东拉西扯的社会宣传鼓动工作，揭露它缺乏一种纲领和远见，最后要导致人民群众的沮丧和反动派的胜利。

我们的小组要抨击这样一些国有化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些国有化是由以“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为首而没有工人管理的政府实行的，硬让这些国家的已经支离破碎的经济担负巨额的补偿费。

它们要抨击这些政府的官僚主义计划，这种计划将加重强加在人民大众身上的已经很严重的贫困。为了对抗越来越混乱的资本主义管理生产和分配的方法，它们要提倡由群众制订和为群众而制订的社会主义计划，这种计划首先让人民群众管理生产、粮食分配和物价。

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就在于把欧洲的经济变成为附属美国经济的一种经济，从而有害于它的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自由发展——来控制欧洲经济，我们的小组要不断宣传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军队和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军队继续占领德国、奥地利和苏联“缓冲区域”里的国家——这种占领威胁着要把这些国家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我们的小组要为争取撤退所有占领军队而斗争，要为被压迫人民的所有和他们自决权和民族独立权利相一致的民主要求而斗争。

在为苏联官僚机构所控制的欧洲国家里，第四国际的战士，要协助所有为保卫其生活水平和自由、反对由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官僚警察政权而进行的群众运动。

在美国，任务是加速渗入各工会组织，并加强争取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政党的政治运动。必须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并抨击它准备进行第三次帝国主义大战的计划。必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美国爆发萧条和危机作好准备工作；这种危机的爆发，将使托洛茨基主义者居于即将到来的伟大群众斗争的领袖地位。

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半殖民地国家里，第四国际的战士要坚决保卫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民族要求，使不受帝国主义的侵害，也要坚决保卫人民群众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使不受当地资产阶级的侵害。

总之，第四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政党，在现在所面临的任務，就是要比过去更为坚决地加入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群众运动，以便推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是更为必要的了。在衰退和腐朽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在苏联为官僚机构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它们的内在矛盾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尖锐。这就使生产力的发展陷于瘫痪，降低了全世界千百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官僚和警察国家对于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压力——这就妨害了各个方面的创造性活动——并且把像德国和日本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

加强了民族压迫。

根据所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无产阶级已证明是唯一的社会力量，它能够把已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所破坏了的所有被压迫被剥削阶层的共同斗争，放在它的领导之下，并能够得到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意义上，第四国际必须而且能够完成它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的任务。根据它的干部的成就和经验来看，根据他们的越来越大的影响来看，第四国际能够比以前更坚决、更坚定、更带有明确政治目的地走向群众。

和斗争的人民群众一起前进，为他们赢得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吧！

1947年11月

九、苏联和斯大林主义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綱

I. 俄国問題

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1. 三十年前，俄国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政权，剥夺了剥削者并在旧俄国一切社会领域中奠定了史无前例的变革的基础。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特别是对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说来，这只能算是革命的世界发展的一个起点。只有同具有先进技术基础和较高文化教育的中欧和西欧各国的先进无产阶级汇合，才能使俄国工人克服那些由于他们在一个生产力、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比重和工人阶级本身的文化发展各方面都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而产生的难以解决的困难。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说来，如果没有革命的国际胜利，代之而来的历史选择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复辟，是俄国沦为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地。

过去三十年的演变清楚地表明，要在一个落后民族中建成没有阶级的社会，那是一种空想。在俄国，今天阻碍社会主义胜利的障碍比它 1917 年以来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多。但是与此同时，1917 年 10 月以来被剥夺的阶级的政权并没有在俄国复辟，而且俄国不但没有沦为帝国主义的弱小殖民地，反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军事和经济强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工人运动的任何其他派别

都不曾预见到这种历史的变迁。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俄国问题的中心困难所在。

2. 用一个公式来总结苏联在这三十年间的演进方向,或者用“进步”或“退步”等抽象的标准来衡量苏联,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国家的巨大发展、历史上最集权的警察专政、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压制、对一切独立思想的扼杀、文化水平的灾难性下降、对异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东正教教会的新的活跃、对只有在矿山和在工地才是与男子“平等”的妇女的奴役、在庞大规模上实施的强迫劳动——这一切同革命最初几年的苏维埃民主相比,当然是一种非常大的倒退。但是,根本铲除一切半封建的残余、彻底排除世界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掠夺、工业的飞跃发展、成百万不识字的落后农民被培养成为适应现代需要的工业无产阶级、旧城市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新城市的迅速涌现、电气和拖拉机的深入农村——同革命最初几年的半野蛮的俄国相比,这一切无疑是一种进步。这些互相矛盾的发展过程使人不得不谨慎地避免使用一切公式化的判断,以便更深入地分析今天的苏联社会并断定它发展的内在倾向。

3. 历史尚未对苏联作出最后定论。它的经济、国家政权和文化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远远还没有成为定型。它的社会阶层的构成遭到继续不断和迅速的变动。从沙皇政权下涌现出来,对十月革命记忆犹新,并曾在二十年前热烈地投入工业化道路的无产阶级已经让位给农民出身的新工人阶级,他们的巨大的创造能力正受着斯大林独裁的粗暴压制。今天的农民首先受拖拉机、集体农庄和放逐恐怖的影响,因此同俄国的旧农民只是依稀相似。由革命“投机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官僚分子正在形成一种多少是排他的社会等级,他们正想恢复旧统治阶级的风尚和民族主义的传

统。

这一现象尽管复杂，却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全部生产关系，证明它具有比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到的还要无比强大的耐力。这次革命的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此。但是同时，在经济等一切领域内，**在生产关系的范围中**，反动和倒退的可能性已经显得比人们所能预料的远为广泛，远为危险。从我们的分析里应该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正是这两种因素。

从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的最初几年中产生出来的苏联的目前形势，也表现出同样的复杂性。虽然苏联在战后成为欧洲大陆的第一个军事强国，但是它既没有改善它的国内形势，也没有在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上改善它的国际处境。在国际方面，官僚机构的掠夺和扩张主义政策丝毫没有改变由于帝国主义形成单一集团而变得对苏联更为不利的力量对比。在国内，经济恢复是经过强烈的、形成一种真正的危机的一系列冲突而完成的。官僚机构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只是因为一方面，在俄国本身的无产阶级同复辟倾向之间，以及另一方面，在世界无产阶级同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稳定平衡，还没有遭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破坏。但是官僚机构已经表明它比任何时候更无能消除那破坏它的政权的任何矛盾。苏联的前途，现在比任何时期更加依赖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前途，而这一蜕化的工人国家的基本选择道路依然还是：**要末向社会主义前进，要末向资本主义倒退**

苏联的社会性质

4. 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有意识的行动，在1917年铲除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土

地、地下资源以及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对外贸易的垄断，剥夺外国资本，开始自觉的计划化经济——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根本不相适应，因此不能依靠经济的自发发展。从历史上来看，这些生产关系，只能在工人管理生产以及无产阶级日益从经济的客体变成经济的主体这种越来越深刻的转变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和发展。废除这种工人管理，把无产阶级完全排斥于计划制订之外，只能使已有的生产关系日益远离那些保证废除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的演进在俄国已经根本改变了方向。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果实，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动力意义正在日益缩小。这些生产关系之所以还没有完全崩溃，那不是因为我们面临着他们的经济的“稳定”这一事实。相反，像在1927年和1937年那样，俄国的自发经济一旦摆脱了政治独裁的因素，今天还是会迅速导致手工业和农民小生产的优势，实现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完全的合并。十月革命残存的胜利果实之所以得以保持，那是因为剥夺了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不是以前的有产阶级或者新的农村资产阶级，而是苏联的官僚分子，他们的社会特权要求保持这些生产关系。正像二十年前那样，今天的政治专政成为阻止计划经济的全部崩溃，阻止小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的渗透，阻止外国资本进入俄国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官僚统治的形式下，这种独裁本身正在日益破坏作为它赖以维持的基础的生产关系。

5. 由于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的动力，官僚机构曾能粉碎1927年农民和新资产阶级的压力。随着革命在世界范围的后退和俄国无产阶级因此而感到的疲惫和失望，官僚机构得以在政治上剥夺无产阶级。它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来丰富十月的胜利果实，使俄国的生产力取得了初步发展。就这个事实来看，这个国家比沙皇俄国、天皇日本和希特勒德国，具有占压倒优势的

发展能力。在这些事实面前，把赖以建成斯大林俄国的经济基础同那些骇人听闻的蜕化变质的社会表现简单化地等同起来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导致或者是把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或者是把“新剥削阶级”这些概念加以理想化。

但是在这同时，官僚机构没有能够保证生产的协调发展，减轻城乡矛盾，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要达到这些目的，经济本来应该首先是为了满足群众的需要，计划的目标应该由成千上万的生产者自由参加来计算和管理，而经济的进展应该以群众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来衡量。但是官僚机构所保卫的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是把它作为他们自身的特权的基础，而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的。在这些情况下，政权的维持不能不有赖于建立历史上最专制的警察专政。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同时也发展全部居民的需要，却只保证满足一小撮特权阶层的需要，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社会上的不平等。官僚主义政权用牟利思想、强制、专横和恐怖来替代作为计划经济动力的群众的革命热诚、创造能力、批判精神和自发主动性，从基础上腐蚀了计划经济，越来越消除计划经济保证生产力新高涨的可能性。

6. 目前俄国经济的基本矛盾如下：

一、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同国家和经济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之间的矛盾。要维持这一生产关系就迫切地要求恢复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和逐步实行工人对生产的**管理**，而官僚主义的管理，使得受到官僚分子的掠夺（官僚分子就像从自己口袋里掏钱那样从集体财产里拿钱）和在生产力发展的越来越停滞不前的威胁之下的集体所有制，日益处于危险的境地。这可以从积累率的越来越明显的下降具体表现出来。

二、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那种经济的集中、协调和自觉计划性的倾向同由于官僚主义的经济管理不能满足需求而产生的原始积累、“平行”经济的形成和无政府倾向之间的矛盾。“由需求所产生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全部毛孔显示出来”（托洛茨基）。官僚机构越是设法把全国的全部生产力纳入它的计划之内，生产力就越是逃避官僚机构的控制。庞大规模的盗窃，上百万工人、农民甚至技术人员的迁移，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由市场的发展，这些都是这种倾向的最明显的表现。为了扼制这种倾向，官僚机构不再能用利益来号召，而只能使用恐怖手段。大规模的强迫劳动、全部社会生活的军事化、生活和工作的一切准则的强制性规定，这些使俄国社会越来越具有等级社会的面貌。这个特点概括地说明官僚机构的反动性质，同时也说明它没有能力真正挫败它自己引起的那些瓦解力量。在这些情况下，生产关系的进步性质并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是意味着，要推翻官僚机构根本不需要改变所有制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俄国经济的进步性质，——在这个经济中，生产关系同官僚主义的管理越来越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由它的保证生产力发展（哪怕是不协调的发展）的能力所决定的进步性质，越来越有被官僚机构消除的倾向。这一发展过程应该予以绝大注意。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同时也是劳动群众对异常低的生活水平广泛不满的表现。在现阶段，群众既不能用公开方式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情绪，他们就用在生产上只使用最低限度的劳动量，忽视劳动工具的维修，一有可能就离去工作岗位这些办法来抗议官僚分子的特权和他们自身的贫困。

7. 1936年，托洛茨基曾给俄国的社会性质作出下列定义：

“苏联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社会，在那

里：

一、生产力依然远不足以给予国家所有制以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质；

二、由于需求所产生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全部毛孔表现出来；

三、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准则是社会分化的基础；

四、经济发展虽然在很慢地改善工人的情况，同时也在很快地形成一个特权阶层；

五、官僚主义分子利用社会敌对情况，已成为一个不受约束、与社会主义格格不相入的等级；

六、在生产关系和工人意识之中，还保存着被统治党背叛了的社会革命；

七、累积起来的矛盾的演变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把社会抛向资本主义；

八、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们应该推翻官僚机构。这一问题将由两种有生力量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而得到最后解决。”（《被出卖了的革命》第 287—288 页）

8. 随着过去十一年的演变，对这一分析应该作出哪些修改呢？

像以前那样，资产阶级的分配准则还在产生社会分化；不过它还没有深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领域。但是官僚主义分子已越来越试图把他们的全部特权稳定下来，保持在一个排外性的等级的圈子之内。这是可以从新的继承法、新的有关家庭立法和完全排斥工农子弟得到高等教育的努力等方面清楚地推断出来的。实行国家公债制度应该被认为是扩大和巩固官僚主义分子的那些特权的一种措施，它丝毫也不是一个什么“分享”由公债所构成的实际资

本(相当于名义资本)所获利润的倾向。

原始积累的倾向已在农村中大为发展，并已通过合作社的工商业重新公开渗透到城市。在城市和乡村，私方招募职工的范围已越来越扩大，但是它的作用还局限于供应特权分子的私人消费需要以及供应市场需要的手工业生产。在广大范围上所实施的强迫劳动制表现为国家所持有的最后手段，用它来强迫劳动人民在国营部门付出他们的全部劳动。经济发展不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反而使它恶化下去，而只能维持官僚分子的特权。俄国的集体所有制不但没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在政治上不推翻官僚机构的情况下，它越来越不足以保证新的经济进展。战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后退只是加剧了官僚主义管理所固有的那种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阻力的趋向。

社会革命还在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残存部分之中以及在先进工人阶层中保持它的生气。但是官僚机构通过对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那一代人进行肉体消灭的办法，成功地在群众中铲除对真正革命的回忆。来自农民中间而在凶暴的斯大林独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新无产阶级，现在对他们的切身利益有本能的意识，对官僚分子的篡夺者有着无限仇恨，只有在俄国以外的一次强大的革命浪潮才能激起俄国群众的新的奋起，带来一次新的革命淘汰。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无产阶级对它的历史使命有一个明确的意识。

我们对这一社会机体继续使用“蜕化的工人国家”这一公式，同时我们完全意识到有必要对这一公式给以更详细明确的补充。事实上，不用一些繁杂的语句是无法对目前的苏联社会作出确切的定义的。这一公式，同至今提出的其它公式相比，具有下列这一优点：它既强调苏联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又强调它的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性。苏联的社会关系至今尚未具有确定的历史面貌，在今后

几年里无疑也将不会具有确定的历史面貌。

斯大林政权的政策

9. 官僚主义分子已从一个不受控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等级，成为一个无法加以控制、成为在俄国和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死敌的等级。它具有旧日有产阶级的一切反动特点：寄生性、浪费社会的剩余生产、对被压迫者的残暴、对生产者的厚颜无耻的剥削——却没有它们的进步特点：为了推行和保卫从劳动分工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观点来说具有优越性的那种经济制度所必需的历史任务。如果说官僚机构显得比没落的资本主义统治“更加稳定”的话，那纯粹是由于它为了自身的利益，成功地利用了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比优越的生产关系。但是事实上，官僚主义分子这二十年间在俄国所处的地位，比较即使是最没落的资产阶级在它的社会内所处的地位，还要不稳定得多。他们的特权并没有任何法律上或经济上的保障。他们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不仅害怕丧失他们的特权，而且害怕丧失他们的个人自由和性命；笼罩着特权阶层的恐怖是与压在群众头上的恐怖同样地沉重的。每一个官僚主义分子的成功既不取决于他的出身、他的财富，也不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或工作的成绩，而是由那无法理解的等级专断性所决定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制订出它本身的意识形态，也不具有任何社会阶级都有的那种本能和特质，而且在它所经历的不断改变中，通过对它说来是接二连三的“清洗”的那些血腥的恐怖，它甚至在意识到它的本身作用以前就已经意气沮丧了。

斯大林独裁表现为一种波拿巴式的政治统治，它的职能是在特定生产关系的框框内保卫官僚主义分子的特权。私人盗窃集体产品和集体生产资料的倾向曾经遭到斯大林独裁系统的打击和抑

制,但是依然在那些最有便利条件的官僚主义分子阶层中出现。官僚主义分子处在独裁的重压之下,经常害怕外国干涉夺去他们的全部特权,他们的组织经常被粉碎,恐怖又使他们意志沮丧和分化,因此没有能力形成那种自觉的政治倾向,使他们能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着与他们有利的方向重新建立起来。最强有力的离心倾向特别出现在官僚主义分子的中下阶层,他们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原始积累的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破坏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的危险,并不首先来自高级官僚主义分子把自己变成“国家资本家阶级”的那种倾向,而是来自官僚主义的管理所产生的那些败坏性倾向,这些倾向有使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民和他们的活动逃避国家的控制和操纵的危险,而官僚机构却徒劳无功地竭力要把国家变成全能的国家。

在现阶段以及这个政治独裁的尖锐的社会的和国际的矛盾这些已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政治独裁的相对平稳反映出:

一、国际革命失败和斯大林胜利以后,工人阶级的迷失方向和意志消沉;

二、农民没有能力站起来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反对力量;

三、历史证明,官僚主义的复辟势力没有能力按照他们等级利益的彻底的逻辑,以有组织的形式来反对斯大林。

10. 斯大林政权的经济政策,十年以来完全取决于独裁政治克服危机的必要性;这种危机是由于积累率的下降趋势和维持或增加平均生产率的日益增大的困难所造成的。这就产生一系列的强制性措施,在这些措施下,工人们就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一样,被束缚在他们的劳动地点。稍为违反“纪律”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劳动日实际上已延长到体力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最低的实际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之下,以便刺激个人生产量

的提高。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失调、所有工业部门之间联系的松弛、通货膨胀的加剧、自由市场的发展、集体农庄庄员中百万富翁的出现，这些大大地减弱了官僚机构对全部经济生活的控制，并使越来越多的部门逃脱它的掌握。

在官僚主义的管理的框框内进行提高生产率的斗争开始直接破坏集体所有制。在手工业和轻工业方面，这个斗争是在加强合作社内私人占有的倾向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农业方面，随着计件劳动制的实施而来的是把集体农庄的土地实际上分成小块，分给各户耕种，这就加强了重新使农业生产者同他所耕作的土地直接联系起来的倾向。集这些经验主义的措施的大成的是斯大林政权在“缓冲地带”实行的掠夺政策，它清楚地说明官僚主义没有能力在俄国经济原有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而它同时试图使集体经济同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并存，从而败坏了十月革命的残存果实。官僚机构现在是十月革命胜利果实在俄国的头号敌人，并在今后的年份内有把俄国集体经济引向彻底瓦解的危险。必须来一次新的革命，才有可能出现向社会主义的新进展，才能拯救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官僚机构的对外政策有了根本的、决定性的改变。大战以前，这一政策是以抵消资本主义包围苏联的压力为基础的，它运用了敌对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摇摆政策并在较少程度上借助于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这一政策的主观反映就是“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理论曾设想俄国生产力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之外的或多或少的逐渐发展。

作为第一流强国的德、日、意、法帝国主义的消亡和英帝国主义的极度削弱，使苏联官僚机构面对着业已多少成功地建立起反对苏联的“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美帝国主义。这一统一战线根本

不是建基于资本家们对斯大林的“革命”性的“恐惧”，而是建基于为资本主义剥削重新开拓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市场的必要性。官僚机构最初试图用同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来应付这种新形势，给帝国主义提供帮助来压制在欧洲和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内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的革命愿望，来换取它在东欧的“放手”扩张（德黑兰、雅尔达、波茨坦政策）。它竭力设法建立服从斯大林的政府，越来越加紧掠夺这些国家的经济资源，来巩固它的势力范围。

在全部力量对比上占优势的美帝国主义的强硬态度，很快就抑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在这同时，“缓冲地带”外的某些资产阶级（法国）“中立化”的企图也遭到可悲的破产。这就迫使官僚机构越来越在扩充军备和准备军事冲突方面寻找出路，尽管它同时指望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各斯大林分子政党应该在可能范围内促使这些危机的爆发——将使世界帝国主义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一直瘫痪，并将使妥协成为可能。

但是从今以后，如果世界无产阶级在这段期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使帝国主义真正陷于瘫痪的话，军事干涉就不可避免。在革命动员的道路上，斯大林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头号障碍。同样，在这意义上，为了保卫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就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争取一次新的俄国革命

12. “保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是革命政党的一个战略路线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一战略路线必然有它的历史根据；但是在每一个具体形势上，应该探索以什么战术，在第四国际世界革命的总战略范围内运用这条战略路线。这一战略的历史根据是从四点基本考虑出发的：

一、俄国的生产关系比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历史优越性；

二、由于俄国被排除在帝国主义市场之外，世界帝国主义客观上削弱了；

三、就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向后退一大步，而对广大劳动群众来说，这并不构成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是共产主义本身的失败；

四、有必要保存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不充分但是必要的条件。

在捍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时，我们并不把苏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相反，我们所想的是，斯大林官僚机构的政策和它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对我们认为还值得保卫的一切东西的持久的威胁。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它的一切丑恶的表现，其中包括它在对外和军事政策范围内的表现，在战前就是我们保卫十月革命现存胜利果实的斗争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在苏联疆界之外，这一战略主要表现为争取世界革命的斗争，这是在长期内阻止俄国革命所遗留下的生产关系遭到崩溃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德俄战争是在工人运动在欧洲已经达到后退和消沉的极限的时刻爆发的——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斯大林战争政策是反动的，武装保卫苏联就成为阻止在苏联立即重新实施资本主义和把这国家变成帝国主义的遍体鳞伤的殖民地的唯一手段。任何其他政策实际上意味着让希特勒来完成无产阶级推翻斯大林的历史使命。德国帝国主义厚颜无耻地消灭大批劳动人民，掠夺工厂、矿山和最肥沃的集体化土地，这就激发了俄国工人阶级进行无比激烈的抵抗。这种抵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它激起了欧洲广大地区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恢复。在这意义上，保卫十月革命遗产的政策在实践上已证实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

的完整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随着欧洲革命高涨的开始，用军事行动来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剩余部分的重要性很快地减弱了。从军事形势转变为对俄国军队有利时起，俄国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和破产了的政策就成了十月革命遗迹的头号威胁。从这时刻起，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保卫苏联这一斗争在战略范围内的首要任务。如果把保卫苏联这一斗争从属于世界革命的斗争，那就使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更加势在必行，因为在世界革命的道路上，斯大林主义构成主要的障碍。

如果不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美国领导下发动的以世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为形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倘若苏联同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只限于军事行动，那么苏联的战败和毁灭将是肯定的。

由于这个原因，如果发生一次新的战争，苏联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密切地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致命敌人，这不但由于各个斯大林主义党的反革命行动，同时也由于克里姆林宫利用它的军事力量来镇压东欧的革命行动，而这在明天将在欧洲和亚洲的更大范围内重演。这就要求进行大量的准备和最大的努力，来保卫将来的革命爆发，反对斯大林的反革命暴力。

从这些考虑可以看出，即使在发生一次战争时，我们还是继续坚决地在苏联境内进行斗争，争取政治革命和这一革命所包含的一切：推翻斯大林统治，争取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波罗的海各国等国家独立的斗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条件保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战略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不受帝国主义侵犯这一斗争，意味着更迫切地要

求消灭苏联的官僚机构和它的反动政策。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这同样意味着,保卫十月胜利果实的任务可说是同在一切国家内加强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完全一致,而在帝国主义阵线后方用军事手段来支援俄国军队的问题则将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如果某一国家遭到俄国军队的占领,将有必要坚定不移,毫不间断地进行这一革命的阶级斗争,哪怕因而使革命力量会同俄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也不管这将会给俄国军队在同帝国主义军队之间的战斗中带来军事上的后果。在一切情况下,不论在哪一国家之内,军事斗争的手段的使用是从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需要的。因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保卫苏联是与坚决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完全一致的。

13. 1944年以来的这种必要的转变,并未被整个国际以同样的老练和同样的灵活战术来执行。在这问题上,有必要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特别有必要强调下列各点:

一、人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在于把“保卫”官僚机构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各种权术,“保卫”它在与国际列强逐鹿争霸中被迫同帝国主义所作出的暂时后退、暂时让步,看作是实施“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保卫现存的十月革命胜利果实”意味着在这些问题上谴责斯大林政策的反动性质,这一政策为在帝国主义阵营内小资产阶级、农民等力量的集结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并使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心目中信誉扫地。这就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对官僚机构的任何一个罪恶都不能置之不理,对它的政策的任何一个丑恶表现都不能宽恕;官僚机构的政策是工人斗争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像“革命的最后堡垒”、“社会主义经济”、“工厂属于工人”、“工农政权”,这样一些用语,粗暴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定

义，使人对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性质产生错觉，从而使第四国际名誉扫地，应该从我们的词汇里彻底根除。

更有害的是那些庸俗和错误的用语，像“赤色法西斯主义”、“俄国帝国主义”等等，它们出自小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之手，同样散布混乱思想而无助于先进工人们更好地认清苏联的现实。特别该受谴责的是那些把官僚机构的政策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混淆起来的用语，把它说成有“称霸世界的趋势”，这些用语直接来自杜鲁门主义宣传人员之口。即使当我们需要复杂的解释，要求很大努力才能使工人们正确地听懂，我们也宁可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而不用那些比较简单但是完全没有科学意义，还给斯大林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帮忙的那些用语。

14. 官僚主义政权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消极态度。灰心的群众，由于看不到别的出路，就“容忍”官僚主义。战争本身更加强了群众对待斯大林的这种消极态度，好像这是一种“较小的害处”。只有至今还没有到来的国际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才能使这种态度彻底改变。随着战争结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深刻倾向。群众对他们异常低的生活水平的不满情绪对官僚机构施加了强大压力。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较为“繁荣”的生活的接触，深刻地动摇了成千上万士兵对政权的忠诚。出现了新的一代工人，他们较少地感受到过去的沮丧和失望的压力。官僚主义分子的很大一部分中间阶层正设法不惜任何代价来摆脱恐怖统治和警察怀疑的恶梦。对这些阶层说来，美帝国主义比昨天的德帝国主义有更为强烈的吸引力。因而很快地形成了第三次俄国移民，其中包括被德军胁走，不愿再回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逃亡的士兵和军官以及在国外避难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外交官。这种移民的形成是一种警报，它清楚地显示着群众对政权的忠诚正在开始迅速减退。在最近的这些现象和警察

专政在一切领域上的加剧面前，还要谈什么政权的“稳定性”，这就意味着运用最庸俗的印象派的概念而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标准，这标准恰恰指出独裁专政的压力是同它所要压制的矛盾的剧烈化成正比例的。

15. 在史无前例地强大的镇压机器面前，工人反对派的逐渐发展，小资产阶级各种倾向的复辟分子在政治上的联合，都是极其不可能的，过去几十年的一切演变也证实了这一点。粉碎斯大林独裁的铁板一块的力量，一方面来自机构本身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能由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缓冲地带”之外可能发生的一次挫折等等而突然表面化，而另一方面则来自群众仇恨在某种危机时刻，受到国际局势突然转变的鼓舞而猛烈地爆发起来。历史很可能同时提供这两种过程。但是更可能的是俄国的第四次革命并不在开始时就有清楚的布尔什维—列宁主义的性质，而将是以工人和农民反对可憎的独裁统治的全面突击开始，然后有某些特权阶层参加进来。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在这次突击中运用政治分化政策，使斯大林的倾复有利于苏维埃民主而不利于复辟分子的意向。

“保卫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意味着，在面临目前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倾复时，要耐心培养干部，使他们在下一阶段群众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并阻止官僚机构的垮台为帝国主义干涉和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跟昨天一样，我们仍然无条件地支持一切工人斗争、一切反对斯大林独裁的工人反抗表示，使新生一代通过这些斗争，将能重新找到列宁主义的道路，将能通过长期的地下发展过程来培养现在已经开始的反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

16. 俄国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正是载入“过渡纲领”

的下列任务：

“毫无疑问，苏联革命的新高涨将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下开始。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联贵族和它的级别及勋章制度！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话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正如过去不容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现在必须把官僚分子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许有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士兵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无法想像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

“彻头彻尾修改计划经济，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的权利。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检查产品的质量 and 价格。

“改组集体农庄以符合农庄庄员的意志和利益！

“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保守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热月官僚主义分子进行的一切政治案件必须在完全公开、自由考查的条件下重新审查。伪造证件、证词的人必须给予应得的惩罚。

“如果不把依靠暴力和伪造维持统治的官僚主义推翻，就不可

能实现这个纲领。只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起义获得胜利，才能复兴苏维埃政权，保证它向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只有第四国际的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举行起义。

“打倒该隐-斯大林的波拿巴集团！苏维埃民主万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这个在苏联进行斗争的纲领，其大部分在俄国依然是有效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应该以纲领为基础，制定适应形势的具体发展的特定口号。

他们将首先要求俄国占领军从所有被占领的国家立即撤退并实施民族自决的民主权利，其中包括居住苏联境内，为独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立陶宛等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斗争的一切少数民族脱离苏联的自决权。

II. 俄国以外的斯大林主义

“缓冲地带”国家的性质

17. 在被苏联官僚机构并入它的“缓冲地带”战略的那些国家里，最清楚地表明这个官僚机构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也是在这些国家里，最清楚地表现出斯大林统治的反动特征的加深，同计划经济以及有效地保卫十月胜利果实的需要之间发生的永久冲突是何等严重。

苏联经济，在战争带来巨大破坏之后，空前迫切地要求把欧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和平方式合并起来，以便实现一次新的跃进。苏联被单一的帝国主义集团所包围，空前迫切地要求进行欧洲和全世界群众的革命动员，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官僚机构的特殊利益则迫使它采取违背苏联基本利益的行动。官僚机构不是去促

进东欧和中欧经济的大发展，却首先用各种形式的征收使这些国家沦于破产，随后又对它们强加一种剥削的框框，在这框框内生产力的任何认真的发展都是注定要被窒息的（特惠税率、单向的商业活动、削除传统的市场、工业装备的不能交货，等等）。克里姆林宫原本可以推动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革命动员，不费很大劲就可以在大多数这些国家内扫清濒临垮台的资产阶级，可是它却一开始就同最糟的反动派结成同盟，并通过那些反动政党的政治、军事和外交行动，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内粉碎以这一或那一形式发展起来的革命高涨。

但是，正像在俄国那样，苏联的官僚机构是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维持它自己的地位的，纵然事实上他们本身的特权和反动的政策正在日益破坏这种所有制的基础，但是它在“缓冲地带”国家内的行动依然还带有它自己的社会性质的标记，尽管它的政策具有反动的性质。

最初，官僚机构努力在同民族资产阶级残余合作的范围内，维持它对这些国家的剥削并逐渐控制它们的国家机器，后来，它在实现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时候，越来越遭到私营经济和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抵抗。对这些障碍所进行的斗争，采取的方式是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逐渐从政治生活中彻底排除出去，同时对私营工业越来越明显地加以限制。这个斗争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结构和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性质依然未动。因此，从斯大林分子的行动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性质上，可以看到苏联官僚机构本身固有的矛盾充分发展了，这个统治既不能引导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又不能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按照这个名词在历史上的意义来理解）。它在“缓冲地带”的政权和掠夺的混血形式并不是别的什么

东西，恰恰就是它在不同的客观环境下，相应于在苏联的政权和掠夺的混血形式。

18. “缓冲地带”国家的资产阶级到处都竭力企求并接受同苏联官僚机构达成妥协。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他们不得不接受苏联官僚机构，认为同革命的胜利相比，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资产阶级在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成功地进行了联盟的转变，从而保证把政权从一批资产阶级手中转到另一批可以被官僚机构接受的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主要社会特权曾付出这样的代价：

一、在停战条约以及和约的条款内，答应官僚机构没收德国在这些国家内的财产并承担沉重的、长期的分批赔款；

二、组成合资公司来开发最重要的原料资源，等等；

三、从它的国家机构里清洗所有敌视苏联的分子，并把军队、镇压机构、行政机构等等内的一系列关键职位交给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斯大林主义代理人之手。

19.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或者不如说，那些在俄国占领下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曾不得不在革命高涨和苏联占领的双重压力下屈服，并毫无抵抗地接受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中一部分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需要（由于有补充资金、代替德国业主的必要，等等），另一部分则是苏联官僚机构的压力所强加的。这种接受或者采取了自觉的妥协方式（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干脆是强制接受（南斯拉夫），这依当时资产阶级所尚有的相对力量而定。根据这一个因素以及群众运动的独立程度，斯大林分子能在不同程度上迅速占据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些关键性地位。

20. 在整个第一阶段，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它的反革命

性质。这一性质主要表现为：

一、斯大林主义党的民族主义的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这些政党致力于妨碍、抑制和阻止群众的一切独立行动，同最反动的力量（罗马尼亚王室、芬兰的大资产阶级、保加利亚斯凡诺党^①的半法西斯分子、波兰格拉勃斯基^②的国家民主主义分子）缔结同盟；他们致力于粉碎由工人建立的并存的政权的一切核心，日益镇压一切工人的反抗表示、独立组织等等；

二、特别是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俄国军队借助于恐怖政权或军事独裁，亲自粉碎一切革命的首创行动；

三、苏联官僚机构经济政策对这些国家中的好几个国家的掠夺（赔款、合资公司、商务条约，等等），苏联官僚机构在好几个国家内建立的不同程度的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

整个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努力开发“缓冲地带”的资源并取得对它的战略控制，而同时在那里保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传统形式下的资产阶级国家结构。

21.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对苏联官僚机构的反抗随着群众运动的低落而加强。这种低落是由斯大林分子的政策和俄国占领的反动性质使无产阶级意气沮丧而促成的，这也同苏美矛盾的加剧直接有关。“缓冲地带”的资产阶级知道得很清楚，没有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它是永远推翻不了俄国的监护的。但是苏联官僚机构根本不能像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殖民地资产阶级同它自己联系起来那样，用任何方式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它不能向这些“缓冲地带”国

① 斯凡诺党(Zveno)，保加利亚的反动政党，成立于1946年。——译者

② 格拉勃斯基(Grabski, 1871—1949年)，波兰国家民主党首领之一，第二次大战后期曾是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主席。——译者

家提供为恢复经济所需的资金或工业设备。恢复经济的需要越是迫切，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就越是厌恶俄国的勒索。他们在政治领域上对这种勒索的反抗也随之加剧。在这同时，“国有化”工业的日益加深的困难、通货膨胀和财政上的紊乱、由于土地改革对富农有利而农业生产迅速集中在富农之手、投机事业的发展、商业资产阶级手中外汇的积累、饥荒等等，这些都给苏联官僚机构和它在当地的斯大林分子代理人增加了困难，使他们难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框内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按期支付赔款、增加商业上的交换、增加合资公司的生产，等等）。

22. 面临这些困难，官僚机构被迫越来越坚决地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反抗的中心进行干涉。在资产阶级衰弱所不能进行真正有组织的抵抗时，这种干涉就限于使用警察行动或者纯粹的外来压力。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斯大林分子的官僚机构不得有限度地动员群众（捷克斯洛伐克）来支持警察行动，同时竭力把群众行动保持在它所能控制的狭小范围之内，并且立即转过身来反对群众方面的一切“过火行为”。

这些干涉产生了下列结果：

一、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那些反对中心从政治生活中逐渐排除出去；

二、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建立斯大林分子官僚机构和它的“本国”代理人的逐步控制，在不同部门采取不同的方法：

把“苏联公司”和合资公司从这些国家的国家经济中分离出来。设法把它们同苏联的计划直接联系起来；

国有化的部门归“本国”斯大林分子控制；

通过原料的分配、价格的规定和控制、银行借贷等等来间接控制私营部门。

23. 由于它的社会性质，苏联官僚机构非把这些国家内的资本主义彻底破坏，就不可能把“缓冲地带”国家确实合并到苏联经济之内。这样的破坏已经在波罗的海各国、东波兰、比萨拉比亚和卡累利实现。在这些国家内，以资产阶级(已经非常弱小)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为一方，以官僚机构为另一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些国家中工人运动内部的力量对比和斯大林分子对群众运动控制的程度，这些因素决定了这种破坏实现的可能性。

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也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要把相当于半个欧洲那么大的“缓冲地带”各国的结构按苏联那样改造，那是不可能的。官僚机构被迫对私营工业部门加以越来越大的限制，但是它是根据每一个特定国家在特定时刻内的现状而进行的纯经验主义的尝试，而且丝毫也没有从根本上破坏这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行动的理论根据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缓冲地带”国家的所有那些斯大林主义政党所采取的一切立场，它们全都肯定这些国家内的资本主义的实质。力量对比的某种特定演变，会使“缓冲地带”的这一或那一国家有必要以苏联为榜样，进行真正的结构改造，我们不能事先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必须清楚地指出，直到现在为止，逐步限制私营部门的政策并不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而苏联官僚机构实施的那些特殊的剥削形式，构成走向这种改造道路上的强有力的和前所未见的障碍。

“缓冲地带”国家的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表现在下列因素上：

一、无论哪里，资产阶级并没有被当作一个阶级来摧毁，也没有被当作一个阶级来剥夺（除了被划在“通敌分子”一类的某些人）。

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官僚机构进行了一些特殊形式的剥削(合资公司、苏联股份公司、特惠关税的商业条约，等等)，就官僚机构的社会性质而言，这些形式虽然是特殊的形式，但是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范围内却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三、广大的资产阶级，在辅助性轻工业部门或在分配部门依然存在，这些部门一共雇用着几乎占全国半数的劳动力。私营部门通过多边商业关系和银行借贷等继续分享国有化部门劳动力的剩余价值。

四、国有化部门本身继续保存资本主义的结构(损益账、货币的功用、会计制度、保持个体成分，等等)。

五、由于苏联没收的德国财产甚至根本不受“本国的”斯大林分子代理人的控制而在其他经济部门之外独立经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了。这一个事实，再加上“缓冲地带”国家保持着狭隘过时的国家疆界，使得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所有制的性质这个因素姑且不去管它。

六、任何外债都没有废除。外国资金没有被剥夺；凡是被收归国有的外国资本的财产，都已缔结了或正在缔结赔偿协定。

七、土地并没有国有化；在这些国家里，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中占决定性比重的是农业，它依然全部保留它的资本主义结构。

因此，“缓冲地带”国家的特殊性在于苏联官僚机构目前已经给资本主义经济确定了一个方向，使之首先符合官僚机构本身的利益。这种情况只能是过渡性的。它势必导致或者是官僚机构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的后退，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彻底摧毁，但后者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和取消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内实施的特种剥削形式，才有可能实现。

24. “缓冲地带”各国的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国家：

一、因为它的**结构**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旧官僚机器并无一处被打碎。斯大林分子只是占据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的某些层次。

二、因为它的**职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人国家所保卫的是从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缓冲地带”各国的国家所保卫的那种所有制，纵然有各种混杂的形式，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苏联官僚机构过去和现在都被迫保持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和职能，这不但因为要想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就非把群众动员起来进行革命不可；而且也是因为它要维持它对这些国家工人的特种剥削。当苏联官僚机构被迫在潜存的双重政权的机构内（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委员会）进行有限的群众动员时，它总是既用行动也用宣传来强调，这些机构的职能并不是替代国家机构，而只是支持国家机构。

“缓冲地带”的国家，一面保持着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和职能，同时也表现为一种**极端形式的波拿巴主义**；这是因为，斯大林化的国家机器不但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势均力敌和逐步屈服而取得了对这两个阶级的很大程度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它同苏联国家机器紧密联系着，而由于国际力量的对比，苏联国家机器现在在东欧具有决定性的分量。鉴于“缓冲地带”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要想在这些国家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条件就是要把官僚主义机器彻底打碎。

“缓冲地带”国家内的革命战略

25. 第四国际应该据以制订它的革命战略的“缓冲地带”国家的政治形势，是由下列三个因素所决定的：

一、在这些国家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斯大林分子的警察专政(芬兰除外)；

二、资本主义在战争结束的翌日的异常虚弱，到处促使保守分子阶层退向中间派的组织中去(农民党)；

三、斯大林分子的反动政策所导致的无产阶级的意志消沉，促使了工人群众从政治舞台上后退，大大地打乱了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在1944年意志消沉的资产阶级各阶层恢复对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的信心，并且把小资产阶级引向极右的组织中去。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议会方面或在合法政党方面表现出来的力量对比的图景是极其不真实的。现有的那些联合政府的主要支柱，依然还是苏联官僚机构的力量和影响。只有在芬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匈牙利，资产阶级中过去的通敌分子能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维持自己的政权。在别的国家，这些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代表就是农民党——则在斯大林分子的恐怖铁锤和为直接重建战前政权而斗争的保守力量的铁砧之间粉碎了。

26. 群众的精神状态是受两种在某种程度上互相矛盾的关心所支配的：

一、工人和贫苦农民群众坚决反对回复到战前情况的任何企图。一般说来，他们都热烈地接受了1945年的改革并且幻想在这些改革带来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有可能重建国家。

群众深怕反斯大林分子反对派的胜利意味着回到以前的情况，而正是这种恐惧，在很大程度上瘫痪了他们的努力并滋长了他们的消极被动。贫困以及对纯粹经济问题的集中关心，也在这方面起着作用；

二、群众对斯大林化政权的独裁倾向和对官僚机构在其中所

起的反动作用的敌视日益增长。最先进的工人阶层（在波兰、芬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反应特别强烈，他们反对那些旨在压制对私人雇主和国家雇主进行阶级斗争的自由表示。由于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来试图在革命政策的范围内支持这些群众的正当意向，这就有把广大劳动阶层抛入消沉和屈服之中，把“活动分子”中在政治上最模糊的那些人推到民族资产阶级保守阵营中去的危险。

27. 因此革命先锋队应该制定一个符合于群众的这两种基本关心的政治路线。

一、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应该坚决地在一切为保卫生活水平和民主自由的群众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他们应该站在那些旨在改善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对结社、集会、言论和出版等等自由的任何限制提出抗议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最前列。他们应该提出为从这些国家撤退俄国军队而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并把这一斗争放在整个欧洲革命纲领的范围之内，以便让这些国家通过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自由合作而重新建设国家。

他们应该把这一斗争同对俄军士兵所作的经常工作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同被占领国家的工人友好，向他们解释，在这些国家内阶级斗争的自由发展，比俄国的军事占领和因此而引起的对苏联的仇恨更能建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壁垒。

二、布尔什维—列宁主义积极分子同时应该以最坚决的方式宣告，反对任何向过去局面的倒退。他们必须经常提醒群众，警惕反动力量的出现和发展，并清楚地揭发斯大林分子对这种局势应负的责任。如果反动复辟分子在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指使下发动政变，企图复辟旧政权，他们应该动员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粉碎那些一定会在国内建立血腥的法西斯独裁的力量（例如希腊）。在这种

情况下，对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革命动员，将很容易地铲除残存的斯大林机构。只有在无产阶级不采取行动和缺乏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斯大林分子的独裁才会在反动资产阶级力量失败后增强起来。

这一政策同“第三阵线”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这是一个积极干预的政策。

在以工人和贫苦农民为一方，以斯大林机构为另一方的斗争中，我们的政策是站在工人方面进行积极干预。在这一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是完全给予现政权方面的。如果反动资产阶级武装进攻现政权，我们的政策将是动员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这将是同时清算资本主义和斯大林分子独裁的最可靠的方法。它保卫群众的历史利益，并在任何地方都着眼于把每一个局部斗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一政策同我们对苏联的分析丝毫没有矛盾。它只是在实践中运用了下列两点而已：

一、俄国占领的反动方面远远超过进步方面；

二、保卫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是从属于国际革命的利益。

28. 但是，这两个相互结合的政治任务只能在下一阶段才能提到行动日程上来。目前阶段是“缓冲地带”群众正在后退和迷失方向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先锋队有下列双重任务：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干部，准备在正在到来的浪潮中进行有效的干预；通过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每次斗争，使这些干部和无产阶级的最先进阶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些国家，工人的政治生活今天集中在社会民主党内。这种分化是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革命的倾向而错误地形成的。因此，最积极的反斯大林派工人被那些正在设法同资产阶级“左翼”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吸引过去了。在“缓冲地带”国家内，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责任

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建立一种革命倾向，来同时对付投降资产阶级的人和投降斯大林主义的人。只要这一倾向保持着如上所述的正确面貌，它就将成为把所有厌恶斯大林主义的先进工人都吸引过来的一个磁极。

就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来说，他们今天所关心的是国营部门的那些经济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的基本路线应该是向国家雇主进行斗争以捍卫群众的切身利益。但是在这同时，哪怕只是在宣传中，也必须提出同彻底解决目前问题相联系的一些历史问题，也就是说，要提出一个过渡性要求的纲领来动员这些国家的群众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布尔什维—列宁主义者应该提出下列要求：

取消和约、赔款，等等；

由被占领国家的工人没收一切“苏联的财产”；

工人管理生产；

剥夺一切大中资产阶级；

把工业、银行集中在托拉斯和国家银行手中，实施真正的计划经济；

剥夺外国资本；

工厂厂长由工人选举；

把厂长的工资降低到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人可以撤换厂长；

在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积极参加下，制订符合群众利益，协调发展城乡经济的发展计划。

29. 在“缓冲地带”国家内，经济生活民主化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内提出的，它既不同于“殖民地国家”，也不同于官僚主义化的苏联社会。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

同斯大林分子官僚机构的剥削同时并存，这一事实应该成为决定我们战略的基础。基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有必要在战争时用最严格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来对待他们本国的政府。同样从这一性质出发，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毫不寄托以任何“进步”的使命，对那些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组织独立行动的可能性也不存任何希望。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群众在反对警察统治、掠夺、压制工人自由、加强剥削劳动者的斗争道路上的每一具体行动，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刻也不中止我们对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的不屈不挠的政治斗争，它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根本不是群众斗争意志即使是模糊的“表示”，事实上是冲淡和粉碎新的工人高涨的工具。

同样地，我们不指望俄国占领军或纯粹反动的斯大林化的政府剥夺资产阶级、建立对外贸易的真正垄断、有效地取缔投机倒把和黑市。我们呼吁俄国无产阶级士兵不要受官僚机构利用，成为罢工的破坏者和反对工人的宪兵。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革命行动上，希望他们在铲除苏联官僚机构在这些国家内设置的剥削和压迫的形式和工具时，同时也把资本家依然保持的权力铲除掉。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支持劳动群众在反资本主义斗争道路上的每一个向前推进的要求的同时，经常要他们警惕斯大林分子的政策和组织的反革命和反工人性质，而且我们始终不渝地认为有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的必要。必须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寄托希望于美国的干涉，斯大林分子把赌注押在俄国的力量上，针对他们，我们则提出保卫群众利益的独立的战略，它的主要支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力量。因此，我们战略的根本目标仍是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范围内，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共和国。但是

如何在战术上运用这一战略路线，就取决于具体情况了。

30. 在东德和奥地利的斯大林政策是官僚机构在“缓冲地带”所起的反动作用的最明显的表现，而这种反动作用又是官僚机构的寄生性质使现存的十月胜利果实逐步不发生作用的最明显的标志。在所有占领这些国家的列强中，斯大林俄国对待德国人民和奥地利人民最为野蛮。工业设备和劳动力毫不容情的迁出、对平民的掠夺、强奸和绑架、把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无耻地置于官僚机构利益之下、在奥地利不断发生的反民主的专横行为，以及在德国东部地区迅速建立事实上的独裁政权，这些都使劳动群众打开了眼睛，看出官僚机构的真正性质并激起了一个空前猛烈的反苏浪潮，以致不但斯大林运动受到损害，连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受到损害。坚决制止对德国和奥地利群众所犯的罪行、毫不含糊地要求立即停止拆迁任何装备、把一切日用品生产留在德国和奥地利、取消一切赔款协定、把全部“苏联财产”移交到德国工人和奥地利工人手中，这些构成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前提，而只有一个革命政党才能阻止美帝国主义充分利用群众的反斯大林主义浪潮。

斯大林分子政党的性质

31. 由于第三国际的蜕化变质，自由意向被抑制，批评精神被窒息，最有文化教养、最自觉、最有独立精神的分子受到排挤的结果，在所有这些国家内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分子政党的官僚机构已经把这些政党的性质完全改变了。

这些政党本来是遵循着错误程度不等的“中间”政治路线（这反映着斯大林领导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动摇不定）的革命政党，现在已经变成以为苏联官僚机构的外交策略服务为惟一任务

的组织。从这一事实来看，斯大林分子的领导，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领导一样，也是“反革命的”，它要用一切手段来阻挠群众革命运动的爆发或胜利发展。但是，当人们使用下列标准来衡量的时候，这些斯大林分子政党同那些社会民主党一样，也仍然是——十分蜕化的——工人政党：

一、参加这些政党的工人把它们看作是工人的组织，而且他们之所以参加，乃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

二、资产阶级把这些政党看做是“阶级敌人”的政党，代表着无产阶级，虽然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政党是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

三、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的官僚机构本身也意识到，要以有效方式来完成其任务，就必须依靠工人群众并保持他们的信任。

32. ——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在战争结束时的异乎寻常的高涨，只能把它放在工人运动的高潮的范围内加以考虑才能了解。就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和贫农来说，他们之所以从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或者从政治上的消极转向斯大林分子政党，那是表示他们走向激进化的第一阶段：

一、在这些阶层看来，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依然是革命传统的代表；

二、在二十年间，群众已对斯大林分子下级干部的忠诚和勇敢有过经验。群众在一切阶级斗争过程中都曾和他们经常保持接触；

三、群众对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物的阶级背叛还没有亲身的经验（这需要长期的政治经验）；

四、在群众的抗敌运动中，斯大林主义积极分子的主导地位——首先表现为比他们的机构有更大的团结一致、更强有力和更

有活力——以及苏联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都曾使群众充满新的幻想，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可能进行社会大变革。

33. 但是，德俄战争的爆发对全世界斯大林分子政党来说，是它们政治上的一次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从这时候起，这些政党成为“神圣的全国团结”和“为战争而努力”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它们的宣传抛弃了阶级语言的任何外表。最卑劣的沙文主义竟成了一条“路线”。在殖民地（印度等等），共产党成了帝国主义的最有效的代理人。在东欧各国，它们成了纯粹是保守党人政府的喉舌，其任务是扼杀无产阶级的一切独立活动的意念，同时在资产阶级同官僚机构保持的“现状”范围内维护资产阶级。

在西欧国家和在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内，共产党成了高涨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掘墓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重演他们在西班牙革命时所起的超诺斯克^①作用。从资产阶级方面来说，共产党参加政府一事，表现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主义已成为工人运动中最有效的反革命因素。从斯大林分子方面来说，这反映了苏联官僚机构的根本需要，即：

- 一、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 二、利用它扮演的“资本主义救主”这个角色，来从资产阶级那里换取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经济上，特别是外交上的让步，
- 三、深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内部，从而占据“战略”地位，使之在发生帝国主义反苏战争时保持中立。

这种转变是斯大林主义政治演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时候起，那些共产党所追求的目的越来越纯粹是对资产阶级进行讹诈，以便使它采取中立的或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倾向，同时保持斯

^① 诺斯克(Noske, 1868—1946年)，德国社会党人，1919年任柏林总督，血腥镇压1919年1月的工人起义。——译者

大林分子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内所“占据”的地位。斯大林分子的政党变成新改良主义政党，所不同于改良主义政党的只是它们同苏联官僚机构的联系。正像所有旧改良主义政党致力于把工人官僚主义同民族资产阶级两者的存在调和起来一样，斯大林分子政党致力于把苏联官僚机构同全世界资产阶级两者的存在调和起来。通过时局的动荡不定，可能会在这一根本方针的范围内发生或右或左的转变。除非美俄战争爆发并事先粉碎了群众运动，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回复到可同 1939—1941 年相比拟的假革命的方针。只有在不冒挑起一次真正的工人起义的危险时，斯大林分子才会拿起武器来。只有在使用“革命”语言不致冒当真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时，他们才会重新用“革命”语言讲话。

34. 由于苏联官僚机构实施新的外交政策而在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内产生的这种根本转变，同样也从这些政党的社会成分和征募党员方式的改变上得到说明，并在这些政党的完全新的理论基础表现出来：

一、从 1944 年起，斯大林分子政党第一次深入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去；在这同时，资产阶级思想也第一次有机地深入到它们的行列之中。随着斯大林分子官僚机构开始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它所要保卫的“特殊”利益，它的政策的改良主义性质也就必然加深。在 1939—1940 年，斯大林分子的机构差不多完全效忠于克里姆林宫，因为它们的全部利益是和苏联官僚机构相联系的，它的独立程度现在比起那时候来当然是更大了。斯大林官僚机构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既越来越尖锐，克里姆林宫就有必要对“各国”斯大林分子政党的领导进行更加直接的控制。但是，我们却不能期待万一发生战争时，在这机构内会出现很大的裂痕，因为这些共产党的领导阶层都意识到只有同苏联联系，才能使他们有

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起“独立”于其他改良主义流派的政治作用；

二、从1941年起直到1945年，这些共产党吸收了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农民等。它们从掌握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时候起，就集中努力在这些阶层内吸收党员（在“缓冲地带”内吸收富农，在法国“保卫产权反对托拉斯”，等等）。力量对比的改变，无疑地会促使小资产阶级退向右翼方面去，这将会削弱这些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的一翼，并将促使它们采取典型的改良主义倾向，用加剧右倾宣传（沙文主义、保卫国家主权、保卫中间阶级等等）来“重新掌握”这些已经失去了的阶层；

三、这些共产党在党员成分和政策上的这些变化，在它们的新的理论基础上也得到表现。这些党现在是从这一观念出发的，即阶级斗争正转移到国际列强斗争的范围内进行，特别是以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一方，同以英美集团为另一方的斗争范围内。一个国家只要被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就能通过进步的、和平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作为毁灭资本主义的最有效途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过时了”。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那些国家中，还因为国际力量的对比，这一途径已经“走不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在那里致力于加强这些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这种运动应该包括一切阶级，开始以争取这些国家的中立化为目标，然后争取把它们并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主义的这种改良主义新理论，构成这些政党放弃革命的阶级斗争，完全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目标的最明显、最无耻的招认。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

35. 正像托洛茨基过去曾正确地把希特勒和斯大林比作一对“孿生明星”那样，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力量和世界帝国主义能够继

续生存下去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在群众意识上所起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随着美帝国主义加强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敌对，民族资产阶级加强反对“本民族的”斯大林分子政党的运动，群众必然倾向于把苏联官僚机构和斯大林分子看成是反帝国主义的和革命的力量，而继续给以多少是消极的支持，即使他们对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的阶级合作的叛卖政策已经有过初步体会，也将是如此。

另一方面，随着群众——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政权之下的群众——把“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看成是可恶的斯大林分子独裁的现成的替代物时，他们将会倒流到替帝国主义服务的那些“民主的”和社会民主的组织中去；战争将结束时，这些国家内的这些组织已经完全丧失群众的支持，到那时候又将取得新的群众基础。

但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所以曾是“孿生明星”，只是因为他们出现的历史时代是工人运动低潮和停滞的时代。新高涨的时期，由于它本身发展的逻辑，具有一种力量足以破坏那使人类的生存有毁灭之虞的恶性循环。只有在他们的斗争过程中，通过斗争的扩大和普遍化，群众才能同时积累他们的革命经验和革命动力，而这些正是他们为摆脱斯大林分子的影响，同时又加强他们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所必需的。我们的远景完全建立在**阶级斗争必将最后战胜斯大林主义**这样一个考虑的基础上。但是，很明显，从现在起，建立一个扎根于群众中间，受到群众重视的革命政党这样一个主观因素，在把工人运动从斯大林分子的脓疱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一解放又是无产阶级从腐朽的资本主义中取得革命解放的必要条件。

36. 不论是殖民地国家或是法国的最近例子清楚地证明，从现阶段起，斗争中的工人有可能在一定限度上越出斯大林分子机

构设下的轨道。但是由于下列一些因素，这种越轨必然还是有限的：

一、斯大林分子政党，通过它们的施政行为，虽已“磨损”，但还没有到必要的程度；

二、由于资产阶级加强了对它们的敌视，它们有着更大的施展手腕的余地；

三、它们曾能把革命后俄国所用的一系列口号和改良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改良主义“恢复青春”；

四、还没有一个被群众认为在行动中有足够的实效来真正替代共产党的革命政党；

五、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只是在经济领域中（冻结工资、生产第一、破坏罢工，等等）意识到斯大林分子的背叛。

在这些情况下，斯大林分子的组织的更大规模的越轨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和建立革命政党的过程合而为一的。革命的积极分子应该通过在一切工人斗争中、在一切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运动中的坚持不懈、明智和耐心的干预，逐步获得最先进的工人阶层的信任从而成为下一次革命浪潮的真正的新的领导。他们只有在以他们的真正面貌出现，使群众决不致把他们误为“左翼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担任这一角色。

37. 因此，在“缓冲地带”国家以外进行反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主要经过下列各阶段：

一、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毒化工人阶级的思潮，需要进行经常的斗争，其内容首先是摧毁群众对“缓冲地带”国家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的错觉。在这同时，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最基本的战斗手段之一，就是耐心地、以群众所能理解的、不是教条主义而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方式，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基础（阶级斗争、

国家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工人民主的原则、国际主义,等等);

二、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工人阶级的占压倒之势的组织,革命的政党需要逐步深入到一切群众组织中去,首先是深入到工厂和工会里去。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主要是从斯大林分子那里夺取他们在工人群众中的优势影响的斗争;

三、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需要对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的反工人政策进行非教条主义的而是有教育意义的并为群众所能理解的经常性的揭发;进行革命的宣传,使群众能亲身体会到斯大林分子领导人的叛卖性质;进行不倦的鼓动,争取在一切阶级目标上的无产阶级统一行动;进行宣传,争取在适当情况下并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条件下,结成统一战线;

四、第四国际应该通过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进行经常的斗争,来反对作为斯大林分子谋杀犯工具的秘密警察。斯大林分子利用一切社会危机,试图暗杀许多托洛茨基主义积极分子或工人运动的其他反斯大林分子的人,从而在肉体上消灭所有能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领导的干部(西班牙、希腊、越南)。应该经常揭发秘密警察的全部罪行。应该用最大的警惕性来发现斯大林分子进行新的犯罪准备并加以暴露。应该最广泛地动员各方舆论来反对这些罪行。第四国际也必须学会细致地、全面地采取一些必要的自卫措施。为了对付秘密警察冷酷地使用的那些暗杀办法,应该使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

38. 从历史上来说,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途有赖于它及时摆脱斯大林分子的监护的能力,以免帝国主义把无产阶级同苏联一起粉碎。

第四国际体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必要性。它对现世界的

分析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即是在沒有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正在同时瓦解。第四国际的进程是，走向世界革命的进程，在当前群众斗争的发展阶段上，绝不容许进行任何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或苏联官僚机构的战斗。不论在“铁幕”内外，我们的政治路线取决于被压迫群众当前和历史的利益，是一条被压迫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路线。因此，对我们说来，希腊游击队同索福里斯—查达里斯政府的斗争，基本上不是“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而是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我们站在“缓冲地带”的工人群众一边，反对斯大林分子政权，并反对可能发生的帝国主义的反动阴谋。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从这一阶级斗争的无比重要性出发的，把它看成是政治演进的决定性因素。

III. 关于俄国问题的讨论

这一讨论的历史意义

39. 最初在托洛茨基运动中，现在在全世界工人和资产阶级舆论中进行的关于俄国问题的讨论，它的特殊重要性是由于俄国社会从十月革命以来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以及它现在在国际关系上所占的头等重要地位而来的。“俄国问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中所占的重要性，反映了十月革命的历史重要性以及斯大林独裁在世界事务中的政治重要性。

但是在革命工人运动的内部，俄国问题的历史意义远远不止于对俄国和斯大林现象本身进行一番解释。从“左翼反对派”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的斗争时起，这一讨论的目的，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下，在

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那些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倾向。

40. 浸透着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十九世纪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相对“和平”演变的反映。只要“运动”似乎能经常给无产阶级——首先是给工人官僚的新禄蠹们——带来新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种错误思想，就会在工人贵族和激进小资产阶级的，最心满意足的阶层里激起很大的共鸣。

今天的修正主义深深地浸透着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这是过去三十年灾难性的演变、工人的不断失败、苏联的骇人听闻的蜕化以及当代世界的野蛮倾向的反映。只要决定性的革命胜利还没有在一个先进的国家内取得胜利——而小资产阶级只是当切合实际的想法和实力相结合的时候，才被切合实际的思想的力量吸引过去——那么把苏联的蜕化看成是并非许多形势因素的产物，把工人运动的低落看成是“已成定局的历史现象”这种错误思想，势必在激进小资产阶级和老一代工人中最灰心失望的阶层中间拥有相当大的市场。

今天的修正主义，经常是在“俄国问题”的讨论上集中表现出来，这也并不偶然。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在一个坚决的革命政党领导下，夺取政权的可能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实际例子中汲取巨大的力量，而所有那些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的人，只能用工人国家和第三国际的蜕化变质来反对十月革命的经验。

41. 今天的修正主义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极端平行地表现出来的，总的说来，它是以下列一些概念作为特征的：

一、俄国工人国家之所以蜕化并不是由于一些形势的特点

(革命的孤立、俄国的落后状态、俄国官僚化和第三国际官僚化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政党)所固有的性质,或者是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性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二、俄国官僚机构的独裁并不是最后将被证实为人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纯粹偶然阶段的历史“意外事件”。相反地,它是人类历史发展(或者是人类向野蛮状态的堕落)的必然过程;

三、1923年至1939年间工人运动之所以低落,并不是由于革命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于这一阶段还没有足够的革命先锋队(这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反映着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或者没有能力选择革命的领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42. 这种修正主义的“反斯大林”性——这是帝国主义压力在美国的产物,充分体现在伯恩赫姆(《管理人员的革命》)^①以及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言论中。他们运用上述那些概念,得出下面这些结论:

一、苏联的官僚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其统治将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经历的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苏联、德国、日本、美国,等等,有相似的国家控制);

二、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不能预见到这种新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完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作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已被证实是一种空想并且已经破产。应该制订出“新的”社会改良的最高纲领。到现在,这些“新纲领”已被证实为向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倒退——就麦克唐纳来说,这已经是一致公认

^① 伯恩赫姆(Burnham, 1905—)美国反动政论家。三十年代曾参加托派,后脱离。所著《管理人员的革命》出版于1941年,鼓吹在美国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只有“管理主义”;管理人员代替了资本主义企业主。——译者

的了。

这种修正主义的“亲斯大林”性——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压力在法国的产物，充分体现在贝特罕姆、马丁纳^①之流在《国际评论》上的言论中。他们也把上述那些概念运用于当前国际形势，得出下面这些结论：

一、工人阶级由于缺乏内部的一致，缺乏技术文化，在取得政权后，必然经过一个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阶段。历史的进展是由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官僚分子）来保证的。国家的职能在于保卫这些特权；

二、在帝国主义衰落时代，无产阶级在人数上和思想上都停止发展而后退，以致它的力量日益削弱，它的社会结构日益腐烂。1918—1923年各国“经典式”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已经过时。面临着无产阶级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上的这种无能，人类没有别的进步道路可走，只有尝试“参预”苏联官僚机构在越来越大程度上的生产资料的国家化并制订一个新的最低纲领来缓和这一过程的剧烈性质。

修正主义的这两种平行表现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十足的修正主义倾向在革命运动中是没有它们的地位的。但是在我们队伍中在俄国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错误观点的深处，也出现这些倾向的某些特点。重要的是，首先要揭露这种修正主义苗头的内在逻辑，使它们的拥护者们意识到这种逻辑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后果。其次应该仔细区别那种竭力把自己局限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我们时代这一范围内的那种在俄国问题上的修正，以及趋向于全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在俄国问题上的修正。

^① 贝特罕姆 (Bettelheim, 1913—)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丁纳 (Martinet, 1916—) 法国新闻记者，统一社会党人。——译者

“国家资本主义”

43. “国家资本主义”存在论的拥护者，一般都竭力把他们的观念保持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我们的时代这个范围之内。他们支持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策略。他们并不怀疑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也不怀疑以阶级斗争和工人斗争的经验为首要依据来建立革命政党的可能性。但当他们把苏联说成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逻辑地认为苏联的现社会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写照”，并像伯恩赫姆那样强调俄国和俄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化”倾向的类似性的时候，他们的修正主义就表现出来了。这是以一些表面的和形式的类似为基础的，既完全曲解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远倾向，也完全曲解了十月革命这样一个彻底的天翻地复。

44. 那些类似之处主要如下：

一、苏联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资料国家化倾向之间的类似。

这个例子最鲜明地说明了这种类似的形式主义性质。事实上，在俄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通过工人国家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来剥夺，来消灭。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这是对某些无利可图的资产阶级经济部门的国有化——付给赔偿——是有利于大垄断资本的。俄国的“国家和经济的合一”意味着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特别是在德国和在美国——国家和经济的合一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独立性，使他们完全服从垄断资本。这两种过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表现“剥夺垄断资本的倾向”；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这种倾向而且表现出相反的倾向，那就是使直接控制一切社

会生活的垄断资本更强大和更富有；

二、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世界市场的分割倾向同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对外贸易垄断之间的类似。

事实上，关税保护政策和“自给政策”倾向是战争经济的内容，是没落资产阶级的危机的缓和剂，并不使这些国家免于外国资本的剥削，相反地，这些国家越是致力于“自给自足”，外国资本的利润越是增加。“自给政策”实施到最高潮时，资本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给美国资本带来了最大的利润。至于苏联，这是一种彻底消除外国资本对本国的剥削。世界市场对它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只起间接作用；

三、垄断资本固有的“计划化”倾向同苏联计划经济之间的类似。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垄断资本的国家“计划化”就是“人为地限制某些部门的生产并同样人为地用巨款来建立别的部门”，它是“国际范围内不断增长的混乱，国内范围财政制度的彻底动摇（这是实施社会主义计划化绝对必需的条件）的产物，而那种不经常的调整的代价却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下降。”与此相反，苏联的计划化虽然远不是一种协调的计划化，却实现了巨大的和真正的经济进步，发展了所有各部门的生产力，而且至少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初期，提高了千百万男女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需要。

两种倾向的质的差别，在于一个是以利润作为经济的调节器，把“计划”和全部经济不是从属于抽象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是从属于垄断资本家的具体的和特定的利益，而苏联计划经济之所以具有深远的推动力，恰恰因为那里彻底消灭了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并开始由思想觉悟来代替利润作为调节经济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这种替代进行得还很笨拙）；

四、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为生产而生产”同苏联生产力（首先

是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之间的类似;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所起作用的类似,等等。事实上,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前提不当的问题。从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假设出发,主张这种理论的人用价值法则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字眼来说明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生产力的奇迹般的发展,首先是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过渡时期社会的特征。而“价值法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或者依然存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在俄国,“价值法则”当然适用,而从1917年以来从未停止适用过,但是那种适用跟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一样。价格并不是由利润的平均率决定的。货币已不再具有变成资本的性质。这些错误观点都是由于对阶级完全消亡和真正达到共产主义之前,在所有工人国家都将存在的过渡经济的特殊形式根本没有进行分析而产生的。

45.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拥护者指责我们,说我们是“经济主义者”,说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国有化财产拜物教”,这种指责是荒谬的。实际上,我们的分析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英国、法国、“缓冲地带”国家)同俄国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以剥夺和摧毁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以及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为其顶峰的全部天翻地复的变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拥护者应该给我们解释解释,既然官僚主义分子保持着摧毁了资本主义才产生的所有制关系,既然他们自己消灭了新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怎能构成一个“国家资本家”阶级?他们应该解释解释,如果没有改变所有制关系,没有新的社会革命,怎么又出现了十月胜利果实的破坏?他们应该解释解释,他们怎样把苏联的“资本主义”性质,同德帝国主义在它占领的苏联地区对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

系不得不进行的彻底改变，以及苏联官僚机构在它重新占领的地区和在并入苏联的各省内对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又不得不进行的彻底改变，调和起来。在所有这些点上，这一理论明显地表明它没有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解释苏联生活的现实。

46. 但是这一理论最明显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它对那些斯大林分子政党的看法上。他们在这问题上设法把革命战略的需要和他们理论的结论调和起来。革命战略的需要使他们不得不接受斯大林分子政党是蜕化变质的工人政党这样的看法，而他们理论的结论则把斯大林分子政党看成是资本主义——法西斯强国的代理人。这种调和论得出一个荒谬的结果：斯大林分子政党从他们夺取政权之时起，就一个“筋斗”从工人政党翻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这种理论无法把激进的群众纷纷涌向那些竟是资本主义强国代理人的政党这样一个现象，说成是革命高涨的标志。单单这两点就再明显不过地驳倒了这个理论。

“官僚集体主义”

47. 有一种理论认为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是“官僚集体主义”。赞成这种理论的人，比起那些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倒有这样一个优点。他们清楚地认识苏联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能够了解资本主义在苏联的渗透在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方面产生的变化以及它后来的倒退。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却并不只停留在俄国问题上。他们不但被迫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观点整个推翻，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根本基础全盘表示怀疑。他们当然有权利这样做。只是必须要求他们对自己应该多讲点逻辑。正如托洛茨基曾经指出的那样——，也只有那些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麦克唐纳、伯恩赫姆

之流)才能直言无讳地说出来——,官僚集体主义之说的合乎逻辑的推论,那就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空想。

48.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里,阶级这个名词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观的存亡就在于这个基本概念。由于这一缘故,它是十分肯定,十分明确地被界定着的。把这种界说运用在官僚分子身上就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那就是把官僚分子看成是不具备历史上其他阶级的任何特征的一个“阶级”:

一、历史上每一个阶级的特征取决于它在生产过程——在历史过程的某一特定阶段——中的独立的、基本的职能,取决于它本身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根基;

二、历史上每一个阶级代表着历史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其中包括在历史倒退时期产生的,以保卫技术知识为其职能的那些阶级。每一个阶级各自代表着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特定阶段,代表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

三、历史上的每一个阶级是一个历史地必需的机体,担负着为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职能;

四、历史上每一个争取政权的阶级——更不必说,每个统治阶级——都意识到它担任的角色,有它的意识形态和它本身的特定标志,而在组织上已经取得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并竭力把这种稳定性传给它的后代;

五、按照马克思,任何社会组合显然都不能只以他们的优厚收入、他们的政治特权或他们的垄断(对教育等等)为基础而成为一个阶级。

显然,苏联官僚分子只具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不足以

构成一个阶级的一些特征。它丝毫不是一个“历史地必需的机体”而是无产阶级的一个赘瘤。它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根基，它的地位纯粹是从分配中的特权得来的。它丝毫也不代表历史上的“进步”，而是破坏和腐蚀由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所代表的进步。它丝毫也不代表所有制发展的任何阶段，而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关系。它并没有它本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俄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而是一个被寄生组织败坏了的社会，关于这一点的最好的标志，那就是与一切剥削社会的情况相反，俄国经济的稳固性不是同官僚分子特权的发展成正比，而恰恰是成反比。

49. 如果把阶级的特征老老实实，前后一致地运用到官僚主义分子身上，那就只能得出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结论。如果官僚主义分子的确是一个阶级的话，那就意味着社会发展中的官僚机构阶段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而无产阶级还没有领导世界的能力。这正是伯恩赫姆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也正是在革命运动中拥护“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人们还不敢引申出来的结论。他们指出官僚机构的“独特”性质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试图以此闪避他们的看法的这种基本矛盾。由于同一原因，他们提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在集体所有制“时代”——倒像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时代似的——阶级统治不再改变所有制关系而只是改变对国家的控制。但是官僚机构在苏联疆界以外的扩张迫使这些理论家对他们的理论作出新的修正主义的发展。他们现在把全世界共产党都看作是一个新阶级的“核心”。用了这一定义，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全部定义完全垮台了。因为，很明显，共产党和它们的党员在生产过程上并不起独立的作用，那就只能是仅仅由于政

治特权而成为一个“阶级”了。然而很明显，只有当无产阶级证明自己不能推翻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才能取得那些特权。

他们说，在人类历史上将开始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多少同“野蛮时代”相同的，在一个洲的范围（甚至在世界范围）的官僚集体主义。主张这一理论的人们，从来没有试图分析这一新社会的发展规律，从来没有指出将来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矛盾的运动使它中止存在。他们在强调无产阶级的“腐化”和沦于“奴隶”地位时，只好强调从这一理论得出的结论：那就是这一理论是以无产阶级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为基础的。主张这种理论的人，如果他们对自己讲点逻辑的话，至少应该主张在那些官僚集体主义将会成功的国家内，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而代之以“保卫奴隶利益的新最低纲领”。这一理论暗示要在这些国家内取消第四国际的存在，而它的合乎逻辑的运用，则将使第四国际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针对斯大林分子政党问题的行动陷于瘫痪。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断革命

50. 所有被剥削阶级，当它在一个生产能力的发展还不足以保证满足一切社会需求的社会取得政权时，不可避免地会开辟一条新的阶级剥削的道路。建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要求社会财富有很高的水平。俄国的经验只证实了这条马克思主义规律的第二项。因为，如果说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容许逐步向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过渡，那么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却是早已熟透，足以建设社会主义了。正像斯大林不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同苏联的发展之间有相互依赖关系那样，那些把在世界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但远远还没有占上风的那些力量撇在一边，却

想在俄国发现新的社会形式的人们，也不懂得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正因为我们是确信世界无产阶级依旧完整地保持它的革命潜力这一点出发，所以我们也不认为十月革命的历史阶段从此已被埋葬，也不认为俄国的例子是这样——一个实证（不管只是具有偶然性也好，是具有普遍意义也好）足以证明无产阶级没有能力保持政权，足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生产关系是不稳定的。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那些当权而心满意足的官僚主义分子的近视和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根本无视相结合的产物。苏联扩张主义的实践，表面上似乎否定这一理论的“理论”前提，实际上是它不可避免的逻辑结果。那些把苏联描写成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理论，合乎逻辑地至少引起这样一个疑问，即无产阶级是否有能力在社会上捍卫它从革命胜利中产生的生产关系：他们认为反革命可以不经公开的和长期的内战就有胜利的可能。我们的**不断革命论**既肯定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也肯定资产阶级不经过反革命暴力就没有能力推翻工人国家。这一理论包含着世界阶级斗争的全部动力，它根本不把俄国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研究的范围以外的“独特”现象来对待，而把这个俄国问题摆在我们时代的各种决定性问题的范围之内。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对苏联的分析中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遗产：把历史解释成是阶级斗争而用科学地精确的阶级的概念来界定阶级斗争；把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为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这个革命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它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争取人类新的进步所必需和可能进行的一次革命。建设第四国际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并领导工人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主要条件。胜利完成

了这一任务,就将通过第四次俄国革命的成功,用事实来“解决”俄国问题。历史将表明,对斯大林主义这一现象的正确分析是实现我们历史使命的前提之一。

十、国际經濟和政治前景

——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綱
(1957年10月)

緒 言

下列提綱的目的是在判明未来若干年内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人国家经济的一般趋势，凡是我們能夠根据这两种类型的經濟的现状及其动态，并在这个时期內沒有重大冲突的純粹理論的假設下加以推断的这种趋势，我們都要加以判明。此外，本提綱还想就这种趋势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出估計，以便从此推究出某种一般政治前景。

这种根据外推法，从两类经济的现状和动态出发进行研究而不顾发生重大骚动的可能性的研究方法，是唯一可能的判定一般趋势和前景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作出的预测当然只有相对的价值，这就是说，只有当据以判定趋势和前景的那些互相发生作用的因素的演变能够粗略地产生那种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现状和动态的分析来加以揭示的总结果的时候，这种预测才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某一因素在未来若干年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有其他沒有预见到的因素插入进来，估计的基础就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预测不同于教条主义的预测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估计到，特别在作经济预测的时候要估计到政治、特别是帝国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常影响着经济，同时政治可以加强或突然阻断所谓资本主义稳定化的过程。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各国的阶级斗争经常受到经济局势的影响，但经济局势反过来也常常受到阶级斗争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稳定化的可能范围总是极为狭隘的，爆发一次广泛的斗争就足以破坏“稳定化”的一切成果，并引起一个新的“衰退”或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如有助于总趋势的预测的话，总是具有十足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即使由于中间有相反的因素插入进来因而趋势的最终结果（例如冲突、战争或革命）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生。

从马克思本人和《资本论》起直到今天，在无数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预测中都有这种典型的事例。

马克思主义的估计的错误应该从下列两方面去寻找其根源，不是由于对所分析的各因素的当前动态估计错误，便是由于没有及时地注意到一定会造成不同于最初的预测的总结果的这些因素的根本改变。

* * *

1. 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1946年以来）的十年中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复杂的经济情况，大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总的局势的演变。这种复杂情况有助于说明在这个时期里发生的某些政治发展和对不久的将来的政治预测。靠着这种对既往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在世界经济的根本性的演变方面和在现在开始在表现出来的趋势方面实际发生的情况。

2. 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里的经济演变，通过小的危机和“衰

退”使资本主义走向改造和加强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道路，这整个复兴和加强工作已使工业产量比 1938 年增加一倍，现在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① 虽然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和欧亚两洲的各工人国家没有联系，但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能力甚至比这个数字还高。

3. 在这种普遍的向上的演变中，必须区别三个互相依赖的部分：美国部分；资本主义欧洲部分；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各国或正在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各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部分。

此外，还必须把在所有这些国家（美国除外）里大体上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为止的一个相当混乱的复兴时期和此后的一个时期区别开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走向发展和繁荣的上升运动就是在这第二个时期里变得显著起来的。

4. 在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的第一个时期里，受到战争破坏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渐渐站稳了脚跟，同时美国本身也受到了战争给予它的经济的推动力量的支持。

在由朝鲜战争开始的第二个时期里，资本主义经济中三个部分的不同过程变得明显起来了：

美国巩固并加强了军火经济部门，从那个时候起（正和战时一样）军火经济部门已成为该国整个经济的头等重要的推动力量。

已经复兴的资本主义欧洲受到了工业投资繁荣和内部需求的刺激鼓励，靠着增加它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和国际贸易中的份额

^① 工业生产，从 1938 年的指数 70，达到了 1948 年的 100 和 1955 年的 146（根据联合国组织的数字）。在 1938 年到 1955 年的这一时期里，正像 1948 年到 1955 年的这一时期一样，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 左右。

而得到了相对的进展。^①

各殖民地和附属国,虽然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但仍远远落在各工业国的后面,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份额同各工业国的贸易比较起来日见减少。^②

这些过程的转折点约在 1953 年。在这年之后,资本主义欧洲经历了一个它的机器和人力的生产能力几乎得到充分使用的时期——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仅有的一个时期,当时美国迅速地克服了从 1953 年到 1954 年中期的轻微的萧条而又走上了繁荣的道路。另一方面,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却在贸易平衡和财政方面经历了一个恶化的过程,陷入了越来越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困境之中。

从资本主义欧洲和美国的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来看,最高点在 1955 年。此后,发展虽然一般仍然继续着,但其节拍已趋缓慢。

5. 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在 1953 年以后的扩张基本上是受到了生产资料投资和耐用消费品投资的刺激的工业生产的扩张。它已经得到了房屋建筑和军事开支等先前的刺激因素的作用的支持。

美国经济在 1954 年以后的扩张,其原因除军事开支和建筑工程以外,也是在于工业投资的刺激和国内需求的维持,而主要由于消费者信用的大大扩展。

① 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占比重下降情况从下表中就可了解:

1947 年	58.6
1948 年	56.4
1952 年	52.6
1954 年	49.4
1955 年(第一季度)	50.6

同时,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比欧洲减少了。

② 工业地区与非工业地区的贸易所占的份额在 1937 年是 55%, 1950 年下降到 53%, 1955 年再下降到 50.7%(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1955 年世界贸易报告)。

另一方面，各殖民地和附属国贸易平衡的不利的演变，它们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以及工业化速度的相对减低（由于民族资本积累速度的减低）都应归因于世界贸易方面发生的变化。

6. 不同于大战以前的世界贸易的那种贸易结构的这些变化，我们可以加以概括并说明如下：

各工业国的生产资料和耐用消费品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输出额正在以减少半制成品或消费品部分而增长起来。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加快了。

另一方面，殖民地和附属国同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额跟各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额对比起来显得减少了。这主要可以用各工业国的天然原料生产的增长和人造原料的日益居于重要地位，^①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本身的工业化来说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业化吸收了一部分以前输出的原料。

虽然如此，但不能根据这种看法作出推论说，对各工业国来说，殖民地和附属国作为不可缺少的原料的贮藏库和作为工业产品和资本的出路的仍然极大的重要性已经减少了（工业国的天然资源由于经济扩张中的大量耗用而已日渐枯竭，故殖民地作为原料贮藏库的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见增加）。实际上只能由此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工业国和落后国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虽然各落后国家都有绝对的进展，它们都在不断地工业化。现在的技术革命（自动化和原子能的利用）有使局势严重化的危险。

7. 在政治上丧失某些殖民地——由于当地资产阶级接管了

^① 化学制品、五金制品和其他生产资料现在在欧洲是用欧洲原料制成的。非工业化地区的天然原料和燃料对工业国的输出总量至多比1938年增加10%，而世界贸易总量在同一时期内却增加了70%。另一方面，据估计，如果没有工业国生产的原料的话，工业地区对非工业化地区输入的天然原料的需要量将比1955年的实际输入量多40%左右。

政权——之所以直到现在没有深深地撼动宗主国的国基，一部分是由于战后世界贸易的结构方面的这种变化。也有其他因素在这方面起作用。

帝国主义放弃给这些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这一份(以原料、工业产量和资本计算)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份，并且是可以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市场的发展来加以补偿的。

无论如何，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里仍然保持着重要的经济利益。丧失殖民地并不会影响帝国主义，除非殖民地的政治独立和社会革命是在能使殖民地在结构上和资本主义路线分离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发生的。或是，从长期观点来看，垄断着这些国家的原料市场、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重大的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发展。

8. 世界贸易的另外一个特点(特别是1953年以后)是工人国家和附属国之间的贸易之增加。^①这种趋势由于工人国家工业能力的加强及其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而得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工人国家能够输出生产资料和技术人员，向落后国家提供他们着手进行和促进工业化所需要的物质援助和技术援助。这种趋势将来只会越来越加剧，其全部政治后果将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重大利益发生正面冲突。

9. 资本主义的扩张，特别是1950年以后的资本主义扩张，无疑地已经采取了罕见的规模。这种规模已经推翻了第一次大战后的一个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我们的运动——和最有能力的资产阶级专家所作的预测。

^① 苏联、东欧、中国与世界其余部分之间发展贸易的趋势是在1953年第二季度开始的。那时以后，在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叙利亚、日本和阿根廷等国家方面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

此外，资本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大的经济危机，尤其在1953年以后甚至还走上了一个看来是典型的工业繁荣的时期。这一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对发生这样一种演变的原因及其前途应如何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的问题。这首先引导我们去弄明白美国“繁荣”的基础。

10. 政府开支在美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政府开支所采取的形式有：购买军事物资、投资于政府军事设施、维持军队、^①以及对外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偿还国债、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大规模公共工程。使美国经济不致越过“繁荣”与危机之间的界线的仍然是美国经济的这一主要刺激因素。

靠着具有像军事用途那种可靠出路的生产事业的超额利润，帮助了私人资本对工业的投资，从而扩大了整个美国生产设备并使它现代化的也是这个刺激因素。

以核子能之用于生产和自动化为代表的真正的技术革命的开始以及南部各省工业化速度的加快乃是整个工业所受到的推动力量的一种表现。

^① 特别是，美国经济军事化的整个规模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评价，一方面要同它的战前情况相比较，一方面要就其绝对意义来评价。这里是一些能够说明本问题的资料：

在1937—1938、1938—1939、1939—1940三个财政年度中，美国的直接军事开支只有三十六亿美元，此数尚不及预算的15%，只等于国民收入的1.5%（特别是1937—1938年的国民收入）。

在大战末期的1944—1945这一财政年度里，整个政府开支增至九百八十七亿美元左右，其中八百四十六亿美元即86%是直接军事开支。

在1948—1949年，直接军事开支减至一百四十五亿美元，即国民收入的6.5%，只是在朝鲜战争中又有所增长，并在1953—1954年增至四百七十七亿美元，即国民收入（官方数字）的15.8%。

况且，实际上政府用于直接、间接军事用途的总开支甚至还高于此数，近几年中约为政府总开支的75%。

这种投资以及对消费者信用的扩展^①自1953年以来支持了美国经济(它虽有战争的刺激但已耗竭),使它能够熬过“衰退”时期并开始一个新的繁荣。

但是在这开始于上次大战初期的“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巨额的公^②、私债务和加速的通货贬值。^③

此外,越来越成为整个经济的负担的农产品生产过剩在美国已经成为不治之症。^④

① 因分期付款购买汽车和其他货物而欠的私人债务在1955年增至二百八十亿元,债务利息和其他费用达四十亿元之巨;全部银行贷款和抵押借款在这一年(1955年)内为一千一百二十亿元。

1956年,在分期付款购买方面欠的私人债务又增加了三十亿元。其他私人债务则增加了约一百五十亿元。

据估计,1957年消费者债务的增加额将不少于1956年(虽然大大地低于1955年比1954年的增加额——六十多亿元)。

从1945年到1955年,私人债务总额由一千四百亿元增加到三千六百元,即每年约增加二百五十亿元。

② 美国的公债在1956年增加到二千八百亿元,而1902年为十亿元,1932年为一百九十亿元,1942年为七百二十亿元。自1945年以来它已增加了三百亿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不同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等)持有的,它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息。

1955年,公债的利息增加到六十五亿元,达联邦预算的10%。

战争的费用大部分是靠异乎寻常地扩大公债来筹措的,在1940到1945年期间公债增加到一千九百四十亿元之巨。

③ 自1941年以来,美元的购买力已降低了50%以上。从1946年1月到1956年12月,美元购买力约降低了30%(根据国际专家法朗茨·皮克的最近研究)。

从这一点看来,美国的按每一人口计算的国民总产量从1946年到1956年按1946年的购买力计仅增加了16%,如按名义上的美元计算则增加了83%。

④ 要了解预示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机械化农业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美国长期农业危机的全部意义,某些统计资料是必需的:

美国的农业人口在不断地减少。1956年,它共计有二千二百万人(而1950年有二千五百万人)或总人口的13%,而一个世纪之前为60%。它集中在约四百八十万个农场里。仅仅其中二百万个就提供了商品农产品的85%。这就是说二百八十万个农场生产了其余的15%。

政府用津贴的办法支持着六种基本农产品和少数其他农产品的价格,这些农产品约占农业生产的50%。显然,这一巨额援助(1956年政府储存了价值八十五亿元的剩

11. 不成问题的结果是：大量的权力和财富集中在一小撮垄断组织和屈服于它们的国家之手，这就使它们借助于 1929—1933 年的危机的经验来制定整套的“反萧条”措施，缓和这种经济危机这种突然的压力的影响，使这种影响的迅速的、累进的、不可控制的扩展不致于过于越出范围。

资产阶级政府密切注意着经济局势的发展并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加以干涉，以避免这样一种结局。政府除了利用自己预算支出的规模和弹性这一武器之外，还利用鼓励投资的政策，利用扩大足以保证最低购买力的社会保险的办法，最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限制扩张并限制证券交易投机和金融崩溃危险的信用政策来加以干涉。

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在美国都曾加以仔细研究，并由美国政府的顾问、专家和大资本家智囊团巧妙地加以应用。此外，各银行对于突然来临的危机都早已有所准备，它们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是投资于国家证券的。

最后，美国企业的不断集中于庞大的垄断组织（石油、钢铁、汽车等）使这些垄断组织可以自由支配巨额资本准备，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付商情的波动。

12. 结论必然是：大部分利用资产阶级政府所定的“计划”行事的美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有可能击破有限的经济危机的发作力量，并把这种危机转变为相当深刻而普遍的“萎缩”（萧条与“萎缩”的区别主要在于这一点，即萧条不是累进地发展而是很快就达到了景气的最低点并停留在那里，停留时间的长短视促成它的原因

余农产品，1957 年储存了一百亿元以上¹）主要落入了二百万个有特权的农场主的口袋。但是政府无力抑止农产品市场所特有的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农业收入不断下降，农产品生产过剩乃是美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出路的缩小的结果。

和能够克服它的新的力量的大小而定)。

这是美国经济从战后直到现在所经历的道路。

(1949年的和1953年的)“萎缩”是增加了的生产和相对地落后的消费之间暂时失去平衡的表现。它首先被朝鲜战争的景气(景气主要刺激了国家的军事开支)所克服,其次被私人投资的繁荣和消费者信用的扩张所克服。

但是这些方法对付大规模的危机是不起作用的。必须大大增加公共开支才能缓和可以破坏整个货币制度的危机的影响。

这种限制甚至对于有限的危机的长期再现也有效,因为正像军火生产和军火储存(以及一般军事开支)有一个限度一样,公共债务也有一个限度,这种限度就是通货贬值的某一个点,超过了这个点就有陷入财政破产的危险。

此外,只要生产能力不断地增加,同时消费能力(即使不谈失业)不断地被通货贬值所破坏,“萎缩”出现的频率和深度就只会日益加强。

美国的生产能力,仅仅由于生产率提高,现在平均每年要增加3%。现有的关于自动化的技术计划以及不久终将实现的原子能的大规模使用,将起维持(即使不是增加)这一百分比的作用。

如果在生产方面没有适当的不变的增量(至少4%),则这将意味着至少每年有三百万工人(其中七十万是每年投入美国劳动市场上来的新手)参加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因此,美国经济处于两种互相矛盾的过程的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是它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力的扩张过程,另一方面是由于货币的贬值、农业收入的减少和技术的得不到使用而造成的相对的收缩过程(相对于生产设备能力的扩大而言)。

因此,不可避免的前途是“萎缩”的加速和恶化。

13. 实际上，这些考虑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只要作某些个别的修改就行了。

它今天的繁荣是由投资繁荣、国内需求和对外输出喂大的。投资的目的是在一种经常使国际间的竞争尖锐化的气氛中扩张生产设备并使它现代化。其结果是欧洲经济的生产能力大大增长。^①

国内需求主要是在房屋建筑和耐用消费品方面，国外需求主要是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方面。

在这一生产成绩中，资本主义欧洲耗尽了它的动力资源，在某些地方甚至耗尽了人力资源。它对来自美国的煤和石油产品以及来自中东的石油产品的依赖加深了，同时它的美元缺乏的情况也有所增加。

此外，为了改善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对付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欧洲的资本家又深深地陷入了自动化的技术改造之中。但在欧洲生产设备的扩展和它的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上表现出来的这一面是和国内市场的饱和化趋势相一致的，国内市场现在又一次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增长以及殖民地和附属国在从工业国吸收更多的进口货方面日益加深的困难的破坏。

因此，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中，现在繁荣也有黯淡下去的趋势，同时也在等待着“萎缩”的来临。

14. 为了更精确地估计短期内经济的前途，必须比较具体地知道尚未实行的工业投资的容量和新投资的容量。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开支已经达到了顶点（美国 1957—

^① 电力生产的增长是生产能力扩大的标志。英国的电力生产从 1936 年的二十亿瓩时（每月平均数）增至 1955 年的六十四亿瓩时。德国的相应数字是从二十六亿瓩时增至五十八亿瓩时，法国是从十五亿瓩时增至三十八亿瓩时。

从 1948 年到 1955 年，电力生产的增长量高于战前生产的总数。

1958年预算中所应用的增量除外), 则现在经济的主要刺激因素仍然是**工业投资**的刺激因素。现在, 和近几年来已经实现的或正在实现中的投资比较起来, 其目的特别在于发展自动化和实现原子发电站计划的新投资并不见得可以鼓励特别有利于市场的重大发展的预测。对自动化的投资, 由于它们的性质的缘故, 受到很大的限制。^① 另一方面, 对原子能的投资却可以大得多, 并对经济起补充刺激因素的作用, 如果这些投资处于其他公共开支和私人开支之外而不是替代它们的话。^②

① 某些自动化设备的费用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太贵了。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事实, 即费用正在不断地降低, 而对许多工业部门来说, 自动化只在它们的总的设备费用上增加相当小的一个数目。据估计, 一个工厂的自动化的平均费用是其总设备费的6%。

因此, 不能指望自动化会引起投资的重大发展, 甚至可以和很久以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拟。

② 就原子装置来说, 无疑地存在着新投资的另一种可能性。但它们主要也是属于受限制的一类。在这一点上, 刚刚宣布了一个无疑地比所有其他国家(美国和苏联除外)都要庞大的原子建设计划的英国的例子是意味深长的。据1957年9月号《经济学者》记载, 1957—1965年的投资如下(单位: 百万镑):

年 份	新 动 力 设 备			电 力 传 送 与 配 电	总 设 备
	普 通 的	原 子 能 的	合 计		
1957—60	320	90	410	400	810
1961—65	310	730	1,090	800	1,890
总 计	630	870	1,500	1,200	2,700

为了更好地判断这些作为对经济的一般发展的刺激因素的投资的影响, 必须想到, 英国每年的军事预算达十六亿镑, 而麦克米伦所宣布的预算减额每年达到的数字同现在被电力站计划所吸收去的数字极为相似。

与此有关, 受到三个欧洲“贤人”重视的关于发展原子电力站并在1967年左右满足“欧洲六国”在电力方面的需要的计划, 每年要吞掉五亿五千万美元, 其中大部分将用来供给在美国和英国的开支。

此外，除非资本家能保持高额利润，否则他们就不会进行这种投资——能否保持高额利润决定于能否减低群众现在的消费水平，而群众的消费水平现在正在被通货膨胀的增长所破坏。如果工人们力图保持（如果不是增加的话）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真将使资本家的利润率降低，也可能使投资容量减少。

因此，在生产方法的新的技术革命（自动化和原子能）中所投的较少的投资将和欧洲生产设备的长得相当快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率（这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形成对照。

15.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面临着人类掌握的新生产力（自动化和原子能）所引起的生产设备技术改革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

如果在目前的十年中，资本主义迫于竞争的需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自动化和原子能计划，那末，由于表明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群众消费力的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根本矛盾的危机的日益频繁和严重而只能使自己的演进趋于恶化。

这最后一个因素将是下列各项因素的合成结果：不可避免的技术失业（包括白领工人的失业^①）；被一个战争经济和有过多的公债的制度所固有的通货膨胀所破坏了的通货的购买力；农业收入的减少；和不可避免的农业生产过剩的损失。

16. 正当资本主义在战后的新的十年里面面临着扩大和改造生产设备的问题，且不得不设法调和现在在进展中的技术革命的时候，苏联和（在较小的程度上）其他工人国家却作出了巨大的实际

^① 自动化的结果之一将是扭转办公室工作者、银行职员、和其他服务部门的职员人数增长的趋势，这些人最近几年中在美国非常广泛地增加了，从1940年的五百万人增至1954年的八百万人，即从每一百个产业工人有十一个白领工人增至每一百个产业工人有十六个白领工人。大批采用电子机器之后，这些白领工人很大一部分将被代替。

成绩并解决了一些新问题。

克服了巨大的战争破坏的苏联，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以一个平均比资本主义的高一倍的工业产量年增率发展着。^①

同时，它的生产率（它在这方面落后于美国的程度更甚于其产量方面的落后程度）每年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一倍。^②而且苏联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只有国家化的和计划化的经济才有这种可能）已能建立一个先锋工业，这一点由于最近洲际弹道导弹和地球卫星的出现而得到证明。

由于这种进展，苏联现在已能直觉到在今后几年中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欧洲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产量，且在较长时期内，在某些产业部门的总产量方面接近美国的数字的可能性。^③

① 自1930年以来，苏联的工业生产已增加了二十倍，平均每年增长12%（美国为3.5%，英国为2.4%）。这一事实在已被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所承认，如：赛尔顿（《对苏联工业扩张的一个估计》，载《苏联研究》，1955年10月）；威勒斯（《调整后的卢布合理吗？》，载同上刊物）；盖尔逊德隆（《关于苏联工业现在增长率的意见》，载《实用经济学》，1953年10—12月）；甚至美国人霍治曼（柏格森主编的集体著作《苏联经济的成长》，1953年出版，和同一著者《1928—1951年苏联工业生产》，1954年出版）。

② 苏联的生产率虽然现在仍比美国的低二至三倍，但其发展速度比美国的快一倍，比西欧的快二至三倍。现在苏联每人时生产量的年增长率约为6%，而美国为3%。（哥伦比亚大学西摩·梅尔曼教授最近研究的结论。）

③ 预言苏联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对比情况，当然像任何一种以过去的平均速度为根据的外推法那样，总是危险的。可是我们可以谈谈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个方面作出的工作而求得的结果。

第一，在国民收入问题上：据国会图书馆法制咨询处（1955年）所作的《经济成长趋势》研究，“在1938—1953年这一时期，美国的国民收入比西欧的国民收入增长得快二倍，比苏联的快一倍。从1948年到1953年，它只比欧洲快30%，只比苏联快三分之二。”

在钢的生产问题上：到1960年，苏联的产量加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产量虽然仍然低于美国的产量（约低40%），但已赶上并超过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产量，包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在内。最迟到1970年，美国和苏联的重工业将不分高低。而到1975年，苏联的重工业将超过美国，包括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在内。

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谈到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前途的问题，下面是最近关于

另一方面，它在农业生产和轻工业方面仍然非常落后。

在这个时期里，其他工人国家的工业生产和生产率也以比资

这个主题的两说法：

摘自诺夫载于《劳埃德氏银行评论》(1966年4月号)上的研究报告：“苏联的工业生产和美国的比起来怎样？不可能提出一个精确的答案。在提出了各种限制条件之后，让我们采用霍洛曼暂时提出的看来非常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1950年，苏联的产量约为美国的产量的35%。仅仅为了说明起见，让我们作某些谨慎的假设：第一，美国的工业产量仍按照1950—1955年的速度有规律地增长，即每五年增长24%。让我们用75%这个保守数字而不是苏联人自己认为能够达到的85%作为这个时期内苏联的增长百分数，即使我们的假设似乎是不公正的。再假定苏联的发展速度有很大的下降以致从1955年到1960年只增长了60%，而从1960年到1965年只增长了50%。我们将得出下列结论：

苏联和美国的工业扩张(以1950年美国工业产量为100)

年 份	苏 联	美 国	苏联占美国的百分数
1950.....	35	100	35%
1955.....	61	124	49%
1960.....	98	154	64%
1965.....	147	191	77%

“此表是根据基本上有利于美国的假设推得的。但是虽然苏联远远落在美国后面，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表里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即苏联可能到1963年达到美国今天的产量。”

摘自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于它的1957年1月18日的《周报》上的研究报告：

“我们必须特别记住对于估计发展前途极为重要的三个密切相关的因素：苏联的比美国高得多的工业发展速度；苏联工业生产在绝对价值上的增长几乎与美国相等，虽其目前的水平显然很低；最后是仅仅在五年之中苏联工业产量和美国工业产量之比例关系已经从三分之一增加到接近50%。所有这些说明苏联的‘成长力量’强于美国，同时为我们估计苏联究竟能不能赶上美国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基础。

“假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目标能够达到，同时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速度按照上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同一比例下降，那末苏联的工业可能在七八年内达到美国今天的生产水平。

“即使假定在苏联使自己提高到美国的水平所必需的时期里，苏联的极高的发展速度降低到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美国的平均速度(即4.4%)，也可以在1965年，即在十年内达到美国现在的生产水平。”

本主义各国高出一倍以上的速度发展着。

至于中国，只能和它的革命前的发展或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印度的工业化相比较。^①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化的有计划的经济显然占着优势。虽然如此，但如果对中国在以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仍然十分落后这一点估计不足也是不智的，这种落后情况使它不能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除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得到迅速的发展。

17. 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这一发展都已实现，虽然普遍存在着过度、胡搞、错误以及官僚主义管理的制动作用和斯大林主义者的统治。

在一方面，如果说由于把群众的消费和他们的一般福利降低到极低的水平并使他们过度地劳动，这个政权一直都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积累率，那末，在另一方面它也浪费了很大数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使群众的创造能力和主动精神萎顿消失，妨碍了各工人国家整个经济部门的和谐而合理的计划工作，妨碍了与世界市场的其余部分之间的联系。

仅仅它的农民政策无疑地已经引起了妨碍经济的和谐发展的最严重障碍之一，而经济的和谐发展乃是使生产力在某一个时期更迅速地发展的前提。这就是说，斯大林的统治已很快地成为在生产的量的发展和质的发展方面的一个障碍——对于这一点群众已越来越意识到，而这正是使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越来越高涨的基本动力。

① 印度的投资的比重(对国民收入而言)和工业生产的比重(特别是钢的生产的比重)仍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其人口数相等于中国人口数的三分之二)。这种比例失调可能随着时间的进展使原来就比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大得多的中国新计划的规模和发动力量益见增长。

18. 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经济中由于这种情况而造成的失调,现在变得更为显著了。因此,不考虑人力物力资源、不顾生产成本而充分利用了发展的可能性的经济现在终于走上了它的合理化的阶段。

此外,在整个时期里受到压制的群众,现在在这一方面正在施加他们的社会压力。

苏联经济如果不除掉它的各个基本方面的官僚主义管理制度,就不可能以过去那种速度继续发展。

关于节约原料、人力和财力的问题、生产成本的问题、产品质量的问题以及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的问题现在都迫切需要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双重意义上也和人的因素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密切地联系着:如果这些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它们就会激起和加深人民群众的不满,因为群众对自己在官僚主义管理下所处的地位已越来越感到气愤了。此外,如果群众不能民主地参与经济和国家事务的管理,这些问题也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不仅从政治上考虑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政权的民主化已成为迫切的事了。

官僚机构为了至少纠正官僚主义经济管理某些方面的弊病,为了减少失调情况,为了恢复计划的某种弹性,为了铲除掉过分集权化的非生产性的、使人瘫痪无力的压力而作的努力,充分证明官僚主义管理曾经陷入了怎样的一条死胡同。

在公开讨论赫鲁晓夫的“分权化”提纲时和这个提纲被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时所提出的事例和数字,都充分证明了这种管理在财政上和经济上都做得过分了。

可是,由于“分权化”只有利于工厂中的经理和技术人员而不利于中央机关里的人,也没有群众真正民主的参与,所以它只会扩

大官僚机构的基础、从而巩固官僚机构。

但是,另一方面,争取企业和整个经济由工人来管理而不是由官僚来管理的坚决的斗争仍然是值得鼓励的。

19. 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不同,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远比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使自己顺利地适应于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向原子能和自动化进展。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正在领导这个革命,而资本主义却仍然停留在这个新时代的边缘上,由于某种原因而还在这个新时代的边缘上踌躇不前。

苏联早已着手使自己的生产设备自动化,发展一个原子能发电站网,并研究廉价生产原子能。

经过了一个意味着稍稍降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技术变革时期之后,它就能够对资本主义国家作决定性的进攻,并带来这样一个重大事变对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所能发生的复杂影响。

假定在现在开始的十年中,尤其在这十年的終了时期,并没有爆发战争,那末,经济实力的这种决定性的考验就会发生。

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帝国主义一定密切注意这种发展,并认为它是作出关于战争的决定的另一个理由。

20. 美国^①和欧洲^②资本主义经济现状的特点是:工业生产增

① 我们有许多理由作出这一结论,即1956年美国工业生产的实际增长率低于3%。而在1956年第四季度,它实际上不超过2.2%。如果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并不高,这大概是由于官方的失业数字并不包括已大为增加的部分失业在内,同时他们也没有把那些登记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期的增长率登记下来。第二种解释是这一事实,即“生产率的实际增长速度1956年比平均长期增长速度(估计为3%)慢得多,并且也比可望从已持续了好几年的对新工厂新设备的巨大的日益增长的投资取得的增长率低。这说明就业不足和不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的情况日益增多;这就是所谓隐蔽的失业。长此以往,生产率的一个高的增长率必然会占上风,而‘隐蔽的’失业最后会明白地显露出来,包括在统计数字之内,因而显著地增加表面上的或登记的失业数字。”(根据法国驻美大使馆商务参赞1957年2月1日的报告)

关于今年和1958年美国经济活动的估计数字是根据公共开支的增长和新工厂新

长率渐渐降低,通货膨胀日益加强,严重的失业情况一再出现。繁荣景象的日渐黯淡是十分明显的事,而事实上唯一留待解答的问题是:活动的这种减少会不会转变为萎缩,且将在多么短暂的一个时期内变成衰退,或者是否会有一个新的高涨出现。

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的政府开支和投资在起着促进下列短期前景的作用: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低于1956年,同时通货膨胀过程和失业都有所增长,即一个走向新的“萎缩”而不是走向突然到来的危机的演变。

情况大概是这样:开始时这个过程在美国比欧洲更为显著,而在欧洲内部则在英国、丹麦、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西班牙较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希腊更为显著。

长期前景将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设备(包括农业)的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尽管群众的购买能力也在不断下降。

第一个因素将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第二个因素(已加以分析)将是就业进步以及通货膨胀和农业生产过剩对劳动群众购买力的影响的结果。

设备中的基本投资(仅比1956年的低10%)作出的。据估计,1957年全国私人总投资将在实际数量上比1956年的多3.5%(1956年比1955年增加4.1%)。所有这一切并不能使我们预言有一个高于4%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更不会有消除失业危险所必需的4.5%的经济增长率。因此,最可能的前途是:今年和明年失业数字将有显著的增长。

② 欧洲各国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一般说来,除法国外都比前几年有所减低。投资的数量也是如此。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又在各处以不同的程度向上旋升。1956年的真正有意义的新事实是德国经济活动渐趋缓慢、投资数量减少和失业显著增加。

看来“从1956年3月到10月,工业生产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进展。”(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资料)投资数量在1955年曾增至国民总收入的25%,可是现在也减少了。

德国企业家似乎已在减少借贷并把他们的开支限于新工厂和新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和明年的前景是:现在拥有的生产设备能力比希特勒统治下强大得多的德国正在向一个比较平庸的增长率推进,这必然将带来失业的增长。

可是,军备生产仍然是德国经济的一个还可以利用的刺激因素。

长期的前景如果在政府开支和投资容量方面没有新的重大的增长,它是一个“萎缩”的前景。这一萎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除了它的发展采取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发的过程之外,简直与真的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区别。

21.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农业生产有停留在通货膨胀和相对停滞的现状的危险。这是由于它们和工业国的贸易情况不可能有所改善,恰恰相反,多半有恶化的可能。这除了其他情况之外,可能造成能刺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的民族资本的积累的逐渐下降。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这将改变它们与各工业国的贸易的目前的结构)不能迅速实现,则它们的落后(与工业国相比)程度可能会增加。

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的可能性将处在一个高的爆发的水平上。

因此,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影响这些国家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只能用输出生产资料和技术人员来影响这些国家,并用大量投资来实现这些国家的工业改造,投资则根据这些国家的实际需要和可能由这些国家在长时期内用实物来偿还。从这一点看来,除了大量现货工业投资而外,工人国家处于有利的地位,叙利亚最近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如此,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和财政援助方面的短期可能性,我们不应低估。

22. 无论如何,对这些国家的兴趣只能增加,正如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以及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把这些国家争取过来而进行的斗争只会愈演愈烈一样。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之间的斗争的主要赌注将是中东地区和整个非洲大陆,其次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而且,这些地区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垂涎的对象。中东的经

济利益在于这一事实，即它的巨大的石油蕴藏量可以满足整个未来的十年、甚至更远的十年中对石油的越来越大的需要（由于煤的缺乏和原子能尚未能大量生产以代替石油）。

非洲的经济利益在于它的巨大的尚未被利用、甚至尚未开发的资源、各种原料和水力发电能力，以及它作为工业品和资本的潜在市场的作用。

此外，这两个地区的战略利益还在于它们提供给帝国主义的基地离苏联都很近，以及它们的地位正处于苏联、美国、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之间，控制了这片地就能够决定战争的结果。

23. 这些地区的经济利益也说明了各帝国主义强国之间正在进行的争取对它们发生影响的斗争。如果没有中东的石油，特别是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就要听凭美国的支配（因为它们都依赖后者的石油并靠美元援助来购买石油）。

此外，非洲是它们保留到最后的殖民地，它们指靠着对它的剥削来弥补它们在其他地方所受的损失。

但是，英法两帝国主义除了它们在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心目中十分没有威望而外，它们的未能满足这些国家对资本的需要又使它们和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潜力比较起来处于一个非常恶劣的地位。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这些地区不客气地、蛮横地排挤它们。

目前，德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它在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就经济上来說是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连同它对美国的世界政策和美国的对苏关系都有明显的政治上的牵连，是我们应牢记在心的一个重要之点。

美国资本在德国工业企业中的投资在重要性方面日益增大，因为这些企业往往受美国资本家的委托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包

括拉丁美洲国家)供应不可缺少的工业设备。

24. 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相对经济繁荣,特别是由于可以保证充分就业,自然对工人的斗争的水平、广度和深度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资产阶级的一般政策,国内的温情主义者,国外的有忍耐心的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都有重大的影响。

资产阶级一旦面临可以影响其重大利益的国内革命或国外革命的时候,就会离开这条路线。

这种经济局面当然是有利于国内和国外的“和平”的。虽然如此,但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仍然有利于无产阶级和革命,虽然无产阶级和革命到处都遭受到有限的失败。只是由于存在着改良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才使群众不能更为根本地利用那些有利于从资本主义夺取利益、有利于在世界上更大的地区扩大革命的胜利的客观条件。

也只是由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产阶级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才使这些国家的群众不能更从根本上利用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困难来推进革命。

在充分就业时期,各宗主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在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保证不失业等方面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重大的让步。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对这种要求如此有利的客观条件。虽然如此,但由于缺乏对群众的革命领导,结果使工人们满足于微小的目前利益,并从这一点滋长起关于幸福生活的幻想,因为现在有可能加班加点和全家老小都出去工作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在美国,工时甚至还要少些)和基本上有保证的年工资实际上是被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工会领袖破坏掉的。

25. 但无产阶级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它大概会看到充分就业让位给增加了的技术失业,它的购买力进一

步被由于军事化而陷入了破产境地的国家的过多的债务和对一个先天不足的经济给予各种支持的那种做法所破坏。同时它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损害，且它又比过去更加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在社会中的相对的重要性。因此，前途是严重的社会斗争，随之而来的则为从“繁荣”到萎缩的过渡。

斗争的浪潮由于东西方关系的重新恶化所造成的危机而得到加强，且在后一阶段受到了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作出的他们力能从事技术革命的事例的刺激，使斗争有可能恢复力量并巩固几个国家的(特别是英国的)社会党政府。在美国，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上的一个工人政党的思想这时也能得到一个决定性的推动。

这些是比较短期的展望，正如佛朗哥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下台一样。

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对非洲的剥削和发展自己的原子工业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共同市场”协定和“欧洲原子”协定符合于这些打算。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的某种程度的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符合于已经确立且渐渐巩固的欧洲经济趋势和商业潮流。此外，任何欧洲国家都不能单独地对非洲地区进行经济剥削而不冒丧失这些地区(包括经济方面)、使其落入美国手里的危险。

同样，发展一个能满足欧洲资产阶级军事和民用需要的真正的欧洲原子工业，而不完全依靠美国，只有依靠欧洲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除了这些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欧洲一体化也符合于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军事的需要，借以更好地对付“苏联危险”，同时使自己至少部分地摆脱对美国的过于紧密的依附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低估欧洲真正一体化道路上现有的和将来必然会出现的（特别当经济局面发生不利的变化时必然会出现的）一些障碍，以及来自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互相敌对的本性（主要是以德国为一方和以英、法为另一方的敌对）的一些障碍。

26. 在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经济上的各种困难将在保持和促进目前的动乱方面发生作用。动乱的主要中心将在印度尼西亚、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各国、以及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西等国家。殖民地革命的中心将特别转移到这些国家去。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对付一个要求有效地消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影响，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给予真正的自由的有力的群众运动。与此不同，印度的情况很特殊，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由于北京和克里姆林的共谋以及群众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能够使一切反对势力在一个时期里保持平衡。可是，只要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同时又不能实行土地改革，资产阶级的政权就是坐在火山上的……。

这是从1957年的选举和目前该国五年计划所遇到的困难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27. 以上的分析和由此产生的展望，正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考虑到实际上存在于以纯粹经济趋势和为这种趋势所决定的政治发展为一方，以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的的发展为另一方的双方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而作出的。

这些都是以东西方关系不会过于恶化、不会迅速地向战争演变为前提条件的。但这种前提或假设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因为在殖民地或宗主国里可能发生真正重要的革命的发展，或者在其他国家里苏联式的政治革命会取得胜利，或者资本主义会进入一

个长时期的深刻的“萎缩”。

总的情势是这样：这些互相关联着的可能性将既在长期的基础上又在短期的基础上继续存在下去。

两个国家阵营之间争执的一些问题没有一个解决了的——不论欧洲的还是亚洲的。此外，争取使原子武器越来越完备的军备竞赛掌握真正的“原子”武器正在继续进行，并以削弱昔日的武器和昔日关于战略和战术的观念而日益普遍化起来。一切关于“裁军”的讨论和妥协方案实际上只集中在已被原子武器时代弄成多余的那些方面的“使用特权”上。

事实是：苏伊士危机和波、匈事件以及中东的新危机和苏联工业的惊人发展又一次破坏了最近在两个阵营之间建立起来的不稳定的平衡，并揭开了一个紧张的新时代，“冷战”的新时代。

双方都力图从打破平衡方面取得好处，以便改变均势有利于自己，而任何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的任何重要收获都会激起另一个阵营的最猛烈的反应。

但我们也得考虑到群众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也能够深刻地改变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像 1956 年 10 月和 11 月发生的事件那样。

在这些情况下，总的结论可表述如下：经济和政治的前途往往随着总的局势而发展，如果各种力量之间的现在关系发生了任何真正严重的改变，那末这种总的局势就会突然向决定性的冲突方面演变。

十一、关于国际經濟和政治 前景的报告

——巴布洛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这个报告是以国际秘书处在为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准备的讨论中提出的题目叫做《国际经济和政治前景》这一文件为基础的。它不打算再度论述正文所包含的一切思想内容，而只是谈一谈其中那些必须进一步加以阐明的問題。

接下去的一段将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现今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在结束的部分，我将根据我对未来局势的看法谈一谈整个的問題。

首先我将说明为什么在为世界代表大会准备的讨论中要提出这个文件。这主要有两层理由：为了更好地理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经济演变中所发生的事情，从而使我们能够辨别某些接着又必然会影晌国际政治前途的世界经济的长期总趋势；为了答复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今的“繁荣”在包括我们自己的队伍在内的国际工人运动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我还要稍稍谈一下进行深刻经济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可能遭到的困难，因为在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局势显然十分错综复杂，可能并且有时候确实难免要犯一些错误。

进行深刻的经济分析之所以发生困难，是由于经常互相起作用的许多因素以及政治和经济之间经常发生的相互影响所决定的

问题的复杂性；并且还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世界的经济文献资料都不完全。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文献资料的这种不够充分的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使人格外惊异的是，在俄国革命四十年之后，苏联的经济学还没有达到那种能够弥补这一缺陷的地步——这只能用这样的意见来解释，即苏联的经济学已经变成苏联官僚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婢女。

例如，瓦尔加同志就是这样地根据哪一种解释在任何特定时刻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政策有利这一点，变成了忽而预测要发生经济危机、忽而预测会出现和缓局面的专家。统计资料可以用来作出你所希望作出的任何解释：只要以某种方法选择数据并以某种方式加以说明就够了。我们的运动手头的资料十分有限，自然不能被要求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不得不涉猎来自资本主义世界或苏联世界的现有的经济文献资料，以代替我们的文献资料。

然而，这种深入的经济分析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不但一般的和国际的政治展望、而且工人阶级的每一个组织的日常工作也需要这种分析。比如说，如果一个革命组织不是很深刻地了解那种由于经常改变而决定着斗争的这样或那样的性质以及斗争成败的可能性的经济局面，它就不可能决定一个正确的工会策略。

在那文件的绪论里，我们曾经力求说明所有这些促使我们起草那个文件的理由，并且坦率地承认，特别是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文件里，我们对某些经济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因为那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事实上没有预料到经济局面的可惊的和出乎意外的转变，以及从那以后在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和西欧——达到最大规模的“繁荣”。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文件里，我们关于经济向危机发展的问题自然有一些保留。我们并没有说经济危机是

不可避免的。我们在这方面比工人阶级世界的其他任何流派有了大得多的保留意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没有预料到经济局面会发生如此惊人的趋向繁荣的转变。四年以来，西欧的经济一直在经历着可以称为典型的工业繁荣的局面；在最近三年左右，美国的经济也经历了这种经济周期。

所以，我们在这正文中特别注意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这种局面转变的原因，以驳斥有些人的看法。这些人处于目前经济平稳的环境，认为他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大概会在将来使典型的危机不致发生，因此他们认为在这方面可以找到一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论据。就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力图证明这种局面的转变是极端不稳定的，并且说明新的萎缩和真正的经济萧条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可以引证工党理论家斯特拉彻的思想作为例子，他在他的近著《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方面摒弃了他在1929—1933年经济萧条期间提出的看法，实际上为工党领导方面最近起草的供几天以后在布雷顿召开的工党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那本书里，所强调的不再是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深刻的、彻底的结构上的改变，以便引起真正的制度上的改变，而是下列的思想：市场和价格现今受他所说的以寡头垄断和巨大独占组织的形式出现的机构的控制；必须重视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民主制，因为它能使工人阶级逐渐地引导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演变。在斯特拉彻最近发表的这本著作里，甚至没有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字眼。他代之以一个比较空泛的说法：“走向一个具有较多的正义和平等的社会。”根本毋庸置疑，美国和西欧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繁荣已经把人们的脑子搞糊涂了——不仅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性组织里。（我必须补充说明，现今英国工党领导方面所发生的事情，也以同样的形式在德国社

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正在萌芽的思想和相当具体的计划中表现出来,他们或多或少地准备放弃马克思主义纲领,在自由企业社会的制度下求得容身之所。)在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中,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存在着普遍的动荡不安。当然,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工人阶级和革命斗士生活在另一种经济环境中,他们对今天世界的现实的看法当然是根本不同的。但是,那些同美国或西欧的今天的现实有关的人,却不得不提出一个要判断我们是否面临资本主义新的长期稳定局面的问题,并考虑这种意外形势的前途如何。我说,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在我们现在要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正文中解答这些问题,尽量彻底地考查美国繁荣的基础以及西欧现今市面兴旺的原因,以便说明它们的限度和前途。

特别关于美国的经济,我们曾经想用一系列的观察报告和数字,来具体地解释什么样的根本原因使美国经济直到目前为止不过经历了它每次都能克服的萎缩而不是真正的萧条。我们认为我们那时能够证明,可以说明美国的“奇迹”的,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真正的健全,而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给予它的经济以援助之后所造成的临时的平衡。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援助,那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本身肯定不足以使经济萎缩不转变为美国资本主义在过去、特别是在1929—1939年期间所经历的那种严重的灾难性的萧条。

我已经说过,继美国经济在1953—1954年期间所经历的萎缩而出现的最近的繁荣,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工业上的繁荣;关于这种局面,我们的解释是:从那次萎缩以后,工业投资的范围扩大了,对于消费者的赊销大大地增加了。这就是说,尽管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给予它的经济以十分重要的援助,但是每逢美国经济跑得气无力而进入所谓萎缩的阶段时,就需要有另外一些重大的助

力来克服这种萎缩。美国在 1954 年开始的繁荣,主要是由于大量扩大工业投资和对消费者的赊销而促成的。至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也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增加工业投资的结果,而这些商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找到了扩大的销路。

正文中的一个重要之点是:它承认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国家在现阶段的干预在某些情况下事实上产生这样的效果,即经济上所经历的并不是一次真正的萧条,而不过是一次萎缩——至于经济危机同萎缩的根本区别则有如下述。经济危机是从经济高涨降到局面的最低点时所发生的突然而迅速的变化;它不是逐渐发展的,而是很快地就达到局面的最低点的。当然,后来由于一些新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它再度开始向上移动;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战争以来所经历的萎缩则具有与典型的萧条截然不同的性质。怎么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呢?

正文根据观察的结果作出这样的解释:事实上,当产生一次真正的萧条的经济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时,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在巨大垄断组织手中)——它根据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前进道路的充分的新的经验,异常敏感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能够用一系列的措施进行干预并产生这种效果。比如说,这些措施就是:给予预算以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弹性,使它能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增加预算支出;实行旨在鼓励新的投资的财政政策;在调整信贷的扩大和限制投机性金融破产的危险的精神下维持信贷,等等。

我们已经看到,就美国而论,它曾特别广泛地应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并且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有效的成果。

正文在注意这些事实的同时,也指出这些措施完全不足以避

免萎缩的加深及其最后变为真正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我们驳斥这样的论据，即资本主义大概会进入一个实际的处境，在那个处境里，它不再遭受经济危机而只是经历一些简单的萎缩这种说法。相反地，正文的全部分析旨在证明：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高涨只会趋向这样的境地，在那里，萎缩将变得更加频繁、广泛和严重，以致那时实际上将没有十分严重的萎缩和真正的经济危机的分别了。

正文有一章探讨了不可避免地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力和实践、采用自动机器和原子能的后果，并得出结论，认为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只有在经济危机加剧的道路上才能发生作用。我在这个报告里不预备详细地阐明正文所分析的可以作为这个结论的理论根据的一些理由。总之，正文从目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得出的最近的看法是：“繁荣”正在成为强弩之末，我们正在接近一次新的萎缩。

这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是现阶段不能再正确的看法。我将在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正文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经济特别有关的问题。正文所包含的一系列的意见据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因为，根据这些意见来看，某些革命的前途变得十分明显了。我们并不否认大多数这些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普遍展开的工业化过程的特点，但同时我们却坚持这样的意见：这些国家和那些宗主国之间的隔阂不但没有缩小而且相反地扩大了。这种隔阂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商业交换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并且与第一个原因有关的是，这些国家越来越难以用资本主义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

商业交换结构的改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贸易的一些

新特点中的一个显著的事实,它是这样两种情况的结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输入的一系列天然原料的生产,以及这些国家扩大了人造原料的利用。它也是由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随着它们本身从事某种工业化的程度的大小而把若干数量的可以输出的原料留供自己的工业需要这一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新的资本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形成的速度相对地放慢了,并且,由于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开发自己的资源,这些国家绝对不可能找到为大规模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本。

让我们举出印度的情况作为例子。为了给工业化提供资金,印度实际上把外债看作主要来源。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需要外援约二十五亿美元,即超过原计划十五亿美元,这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一部分是由于五年计划的其余部分的资金必然要从超额税收方面得来的缘故。

十分明显,如果印度找不到二十五亿美元,它就不得不修改计划的全部指标,否则就有使经济陷于真正的解体的危险。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尼赫鲁要改变政策,拼命寻求外债了。

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尽管主要工业国家的资本有了异乎寻常的积累,资本的输出却并不按照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的节奏进行:首先就美国来说,资本在美国国内市场、给与美国政府的借款以及像加拿大这种不能算作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中最不幸的国家方面找到远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我们不妨说,如果在一个整个的时期内资本必须在不能期望立即得到赢利的情況下投资出去,最小的份额才会实际上投入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事业。例如,据目前估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已经以私人资本的形式输出了大约三百亿美元;拉丁美洲

是美帝国主义为扩大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一系列原料的基地和销售工业产品的市场，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这个主要经济区域只得到了七十亿美元；而且，这种给与拉丁美洲的经济援助的较大部分与其说是用来有步骤地发展这些国家的工业（它们的工业如果得到发展，就会摆脱美帝的经济保护），还不如说是首先投入那些从事提炼原料的企业。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工业化问题无疑地是同它们的社会改造问题有联系的。非常有趣的是，这不但是我们这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是美国的观察家自身所得出的结论。我指的是美国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出版的两本著作。第一本是麻省理工学院两位教授马克斯·米利坎和罗斯托著的题目叫做《对外政策的建议》一书，这两位先生在书中承认美帝国主义无法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家获得和巩固持久的同盟，也不能赢得群众的同情并把青年争取过来。他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美帝国主义没有好好地利用它的外援，怪它把大部分的拨款用于军事方面而只把很小一部分用于生产性的经济方面。可是当他们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时，他们的怯懦和偏狭反映出美帝国主义在结构上是完全不可能用它的援助去真正发展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经济的。他们对那些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人们提出建议，要求每年拨出二十亿至三十亿美元这一十分可笑的数额，认为这笔款项足以促进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援助政策，但同时他们特别说明，这笔每年二十亿至三十亿的美援当然在授与时必须附有条件，能够保证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对美国表示同情，并且这项援助当然必须投入那种不同美国工业或美国农业生产竞争的事业。

相反地，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另一位美国教授巴兰所著的题为《成长的经济学》的一本书。这本著作令人发生兴趣的是它的结

论：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家来说，唯一可能达到大规模工业化的办法是着手改变结构，使其在体系上具有经济的平衡化和计划化。

帝国主义现在觉得愈来愈不容易满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需要，因为这种困难是同那些工人国家、特别是在这方面已经开始竞争的苏联的经济发展中一个新局面相联系的。

目前在中东发生的事情尤其可以说明这种明显具有政治关系的新的特征。我们不妨拿叙利亚作为例子。苏联不久以前答应给叙利亚一笔数目相当于叙利亚向复兴银行恳求了多年而没有得到的贷款，而所附的条件分明是能适应这个国家的实际需要的：贷款的期限很长，利息很低，以农产品偿付。

帝国主义在争取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竞赛中所以处于不利的地位，是由于它的本性所致：帝国主义无法按很低的利率对那些不是由它自身及其专家而是由有关国家决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提供长期贷款；它也不能在那些同它自己的经济竞争的部门中提供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来帮助那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在这竞赛中，工人国家由于其结构不同，所处的地位要有利得多，并且事实上能够赢得这种竞赛。苏联究竟能把这种竞赛推进到什么地步，也就是说，它在这方面所掌握的资金和原料的储备究竟规模多大，那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目前在中东进行的斗争、双方在那竞赛中获胜的机会以及竞赛的革命政治后果，我们就一定会了解，仅仅由于中东这些国家蒙着一层美国石油托拉斯的坚实的髒垢，帝国主义要帮助它们进行真正的工业化，就会遇到另一种障碍。因为，无论从经济或政治观点来看，这种工业化势必要触犯石油垄断组织的利益。在那些国家中，真正合乎帝国主义的理想的是它们现今的封建形式及其在圣经所描写的背景下靠椰枣生活的游牧民。

十分明显,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旦当那些国家得到改造并变成现代工业国家的时候,群众最初的想法将是掌握那种由他们的石油构成的、一定有助于祖国国内发展的绝非寻常的财富,从而严重地威胁帝国主义在那个地区的垄断特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东这个越来越倾向于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地区,完全可能产生一次长期的和爆炸性的危机。当然,问题在于了解帝国主义是否会愿意让这个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极端重要的地区真正摆脱它的控制。

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研讨一下正文中关于殖民地的丧失对宗主国的影响的一段话。

实际上,只有当殖民地和附属国家在一个从结构上使其脱离资本主义范围的无产阶级社会制度下得到解放的时候,这种丧失才对宗主国产生真正的影响。假如不是这样,这种丧失就不会立刻带来十分严重的灾难。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继续保持着残余的重要经济阵地。而且,这种形式的解放无疑地会在一个时期加速工业化的过程,在一个时期扩大那些工业国家的资本商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市场。由于殖民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现了这种形式的解放,这些国家的丧失实际上只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以后使帝国主义受到影响,那时正在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将自行垄断原料市场、工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

可是,我并不是说殖民地的丧失不会直接给予宗主国的经济以严重的打击。我们可以拿法国作例子。现在,法兰西联邦为法国获得如下的好处:大约有百分之二的法国农业是为法兰西联邦经营的,有百分之七弱的工业是为法兰西联邦经营的,大约有百分之五十强的法国的航空和海上运输事业是为法兰西联邦经营的。可是主要依靠法郎区,法国可以购买在另一种情况下不得不以坚

挺的通货向别处买进的一系列产品，从而每年节省大约五亿美元的外汇。显然可见，法兰西联邦的瓦解将直接给予法国经济以十分沉重的打击。

关于工人国家的经济，正文包含一系列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看法。我们特别强调了两点。其中有一点详细说明苏联的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我们不妨称之为它的合理化的阶段；这种合理化必须考虑到劳动成本、原料和生产费用——与这些考虑有关，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必须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官僚集团力求用它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新的经济现实和需要包含许多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要求群众以民主方式参加生产管理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一个因素正在促进现今在苏联酝酿着的政治革命，并为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毫无疑问，特别是苏联，它已经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地吸收了自动化和原子能的新的技术革命，并且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十分重大的、确实是惊人的进步。例如，最近访问了苏联的英国专家对工作母机制造业的自动化的发展感到惊奇。他们承认，在对工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部门，俄国比英国同样的工业部门占绝对的优势。当然，具有十分明显和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的洲际导弹的最新成就，可能也应当归功于苏联有着一门先进的工业。

正文所强调的看法是：在我们正在开始的这个十年中间，工人国家的这些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使它们接近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水平；包括经济方面的两个体系之间的决定性考验日益迫近。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个局面将在这十年的开头几年发生。如果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它将在现有发展速度的基础上不到十年终了就成为事实。正文引证了不是马克思主义

者、不是亲苏人士而是资产阶级专家根据现有统计资料和现有速度作出的一系列推论。

* * *

我现在开始谈到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特别就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及其前途而论，我刚才已经说过，在经济方面，我们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看到美国和西欧的经济“繁荣”事实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我并不是说我们正在亲眼看到一次真正的萎缩，我只是说现今一般的继续扩展的速度比过去几年受了更大的限制，比 1956 年受了更大的限制，而 1956 年的扩展速度已经低于我们认为是最高“繁荣”年度的 1955 年。

现在所有资产阶级的观察家一般都注意到的经济活动的放慢速度，在美国已比欧洲本身更为严重，在欧洲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除去挪威）更为严重，并且，部分地说来，在英国比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这样一些国家来得严重。

我想利用一些文件来说明资本主义机构或私人观察家关于最近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变所作的评价。例如，联合国在 7 月间公布的经济报告指出生产的增长速度已经不如前几年，同时指出 1956 年工业产品的增长率低于 1955 年。在西欧，工业的增长率在 1956 年平均为百分之四，而在 1955 年则为百分之九。在美国，1956 年的百分之三的增长率等于 1955 年的三分之一。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它在 1956 年的工业生产比 1955 年有所增加。我们说，经济在 1956 年继续扩展，但在西欧一些国家和北美，它的速度比 1955 年放慢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经济活动的放慢速度事实上在美国比在欧洲更为严重。

德国经济情况研究所出版的较近一期学报说，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今年的头六个月又减低了。十分重要而且为其他资

料所证实的是，它把这种发展速度的减低完全归因于产生“繁荣”的根源的缩小，即工业投资的显著下降。

这个看法在两星期以前联合国发表的较近的报告曾经再度提及，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活动普遍速度放慢，并且把这种情况同工人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活动的有利得多的成果作了对比。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特别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总的看法是我们亲眼看到一次新的萎缩正在开始发生。毫无疑问，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新的局面，其原因之一在于：它缺少新的预算支出的刺激，也缺少分期付款的商品赊销业务的较大扩展，而这些方面的大量削减，是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最近几年曾经起过作用的另一个扩展手段，即工业投资，现在也比以前削弱得多。例如，美国一千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在今年和明年的计划投资比去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九。汽车工业是美国的主要工业之一，由于开始生产 1958 年型的新式汽车，本来预料在这一时期会出现一年一度的新的起色，但是这种局面尚未形成，因为汽车公司还有大约八十万辆 1957 年型的汽车的存货没有脱手。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会不会出现经济萎缩的问题，而是事实上已经出现的问题，特别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是如此。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欧洲经济形势的图景，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虽然直到现在为止情况并不那么严重，并且这一国和那一国也有所不同。关于我将回过头来探讨的情形，德国无疑地占领先地位，其次是像挪威、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这样一些国家，甚至还可以加上法国。再就是像瑞典、丹麦、在某种程度上的英国、希腊和西班牙这样一些国家。

以德国的情形而论，我要说：甚至那里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已经不断地放慢了一年多。可是在德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仍能在

一段时期内刺激经济发展的新的手段，即该国的重整军备。虽然有一部分重整军备的费用在外国花掉，还有一大部分用于国内生产。而且，我们不该忘记，德国的经济正在以输出作为它的发展的主要基础而建立起来。一旦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普遍的萎缩，它将是首当其冲的国家之一。

至于说到通货膨胀的趋势，我们在目前提出的文件中以及在国际的一系列其他文件中都已指出，通货膨胀的现象或通货膨胀的威胁仍然存在。在美国以及一般地说在欧洲都是如此。关于美国，我想多讲一些。据我看来，那个国家现今正在继续出现的通货膨胀表明，美国的经济已经达到某种最高的限度，如果超出这个限度，不冒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就不能通过大幅度地重新增加预算支出的办法来刺激经济。通货膨胀的危险现在严重地限制着美国的这种刺激物的利用。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国内议论纷纷，有些人认为通货膨胀的现象是由工人的生产率跟不上劳动价格在工会的压力下不断上涨这一事实所造成的；不消说，那是要求冻结工资并且同时促使雇主加紧向工会进攻的一种手段。工会利用路透社作为发言人回答说，如果通货膨胀，那是因为物价上涨的缘故。这当然是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解释，因为路透社并不攻击这个祸害的根源。

美国现今通货膨胀的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公私债务的异常庞大。我可以就这个问题列举一些数字。从1947到1956年，美国的政府开支超过八千亿美元。这些开支的百分之七十即五千三百三十亿美元用于军事，也就是说，或者充作军费，或者用以偿付军事债款。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要想了解它的真实的意义，必须拿它——因为它在想像中还是抽象的——同欧洲一系列国家在整个十年中的总预算而不是支出比较一下。我举出这个数字，是

为了表明这些开支的规模并解释美国经济多年来所受的刺激；但在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明美国现有的通货膨胀现象和真正的通货膨胀危险的规模。在1956年6月30日为止的一个会计年度内，联邦和各州的全部政府开支达一千一百四十亿美元以上。这些数额来自捐税和公债。现今美国的公债已经超过二千七百五十亿美元的大关，而这笔数目的下层则是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私人债务！

这些数字既说明在美国经济活动中起了作用的通货膨胀刺激的规模，也说明这种经济“繁荣”在某个时候开始出现的危险。它们也说明，尽管存在着产生一次萎缩的真正的危险，那里为什么还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遏制通货膨胀的过程。这个解释证明了，以不断增加国家支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美帝国主义的资源是有限度的。

通货膨胀的现象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各国也是严重的。它们已经发生了某些影响。在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看到一些欧洲国家不断地出现十分严重的财政不平衡现象，这个现象已经引起法国通货的贬值，给了英镑以极大的压力（所以工党要求下议院开会讨论英国的财政状况），使荷兰的弗洛林和丹麦的克朗趋于疲软，并且实际上正在发展成为欧洲通货的全面贬值（除德国的相当特殊的情况而外）。

十分明显，这种局势变成了欧洲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有一些国家缺少外汇来维持它们的输入，另一些像德国和比利时这样的国家在输出方面受到这种局面的影响。而且，现今在欧洲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又给予储蓄和投资计划的继续执行以十分严重的打击。

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着战后经济形势的转变，一种脱离“繁荣”局面的转变。我们现在还不能估计这种形势的一切后果或者正在

开始的衰退的规模，但是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出，这事实上是一个转变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后退问题。而且，势所必然的是，市面的“兴旺”将辩证地向前进展，由于并通过“繁荣”而造成一个新的失调的形势。曾使西欧经济活动受到阻碍并使美元入不敷出的原因之一已经再度出现了；美国对欧洲的援助以及欧洲国家一方面对美国、另一方面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贸易的顺差曾在一个时期掩盖了这个原因，现在它又赫然在目了。

宗主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贸易已经按照我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解释的途径进行，达到美国力图在输出方面以远比过去更大的努力应付萎缩危机的程度，达到欧洲经济的“繁荣”必须由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大为增加的输入加以支持的地步，但是除了这个事实以外，美元的入不敷出的现象又已出现了。这一点证明了，美元的这种入不敷出的现象实际上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贸易的新结构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暂时的原因，而实际上是一个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以上所述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当前经济形势的概观。

现在再来谈一谈那些工人国家的经济的平行的发展。联合国最近的报告指出，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比前几年稍稍缓慢了，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活动缩小的程度要比它们大得多，它们还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在这方面，根据苏联的统计数字，今年的生产有了意料不到的增长，即超过了百分之七，达到了百分之十的光景。

显而易见，我们必须准备根据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参照我们各支部的活动，得出一切的结论。显而易见，形势的改变——如果这种改变不过表现为通货膨胀的恶化和失业现象的某种威胁，

特别表现为工厂老板利用各资产阶级在遭到困难时经常企图用以扭转局势的那种手段来冻结工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工人们得到充分就业的帮助已经惯于认为他们的要求可以很容易获得满足的时期之后——表明未来斗争的规模是很大的。这种结论已经从英国这样一个介于繁荣和衰退之间的国家的情况得到了证明。

至于说到目前的政治形势、即关于国际形势，那么，按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国际关系始终具体地以两个问题为中心：中东的局势和裁军问题。

让我们先探讨第二个问题、即裁军问题。我们以前已经说过：通过不断举行的讨论对裁军问题所达成的任何带有条件的妥协是无关宏旨的；这些讨论实际上掩盖了——并且事实上甚至根本没有掩盖掉——比以往更激烈地竞相以原子武器普遍武装起来的行动，因此我们不应该为这些讨论所蒙蔽。我们现在看到裁军讨论的明显的失败，因为苏联惊人地宣布它拥有定向洲际导弹，裁军讨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在裁军谈判的历史上，近来的几次讨论为双方的核爆炸所打断，可以说是最特别的。实际上这里成为问题的并不是裁军的讨论，而是在核时代和洲际导弹的水平上进行的实力的较量。十分明显，在开始有了这种技术发展的成就时，对方就只有一个想法：弥补他现在看到的他自己和对方之间的差距，千方百计力求发现“绝对的武器”——所谓“绝对”，是说它能够摧毁对方，保证有效地抵御来自敌人的导弹——来超过对方。我们已经有了原子弹、氢弹，我们现在又有洲际导弹，我们还会有反导弹的导弹。根据技术进步没有止境这一点来说，绝对的武器是一种幻想、一种虚构的想法。无论如何，由于发现了更加强有力的武器，裁军的讨论已经结束了，而这种武器目前掌握在工人国家、掌握在苏联的手里，无疑地将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形成产生异常强烈

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中东的局势时，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了。

非常明显，使国际形势脱离原先的缓和状态的，一方面是苏联那边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中东在1956年10月至11月的事件。从那个时期以后，我们一直逐步地进入冷战中的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实际上比以往更剧烈的阶段，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苏联官僚机构在苏伊士战争期间以提出真正的最后通牒的方式所表示的态度；我们以前也没有见过克里姆林宫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如此坚定的立场，声明只有由两个德国本身进行讨论并提出将社会制度不同的两部分组成一个联邦的计划，才能谈到重新统一德国的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克里姆林宫在叙利亚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行动。它毫不含糊地向土耳其政府指出：如果它对叙利亚发动进攻，俄国将进行干涉；由此而在中东爆发的战争将不是一场有限的战争。另外，它调动自己的军舰来监视美国原子舰队在地中海的动向，苏联陆海军将领变得十分健谈，甚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一旦叙利亚受到攻击，他们将调动他们的军队和舰队去保卫那个国家。

在苏伊士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了约旦危机以及美帝国主义对艾森豪威尔原则、即在中东真正较量实力的想法。我们那时甚至说，当美国原子舰队在克里姆林宫反应微弱的情况下开往叙利亚海岸时，我们感到有点惊奇。现在看得很清楚，这种软弱的表现是由于那时在苏联官僚机构的领导中间正在进行着两派的斗争。但近几年来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一个不变的特征是，它不愿实行退却，特别是在中东这个地居中心而为两大集团的国家之间的对立所集中的地区。克里姆林宫对于叙利亚政变所引起的约旦政变感到愤怒，因此双方在中东的力量较量已经发展到了爆发的程度。

我描绘不出有关这个地区的形势发展的具体前景。我只能说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时期的爆炸性质。在双方的这种实力的较量中，每一方都冒最大的危险、即引导它走向“深渊边缘”的危险。我们可以赞扬这些至今能够走近深渊的边缘而不致摔下去的特技演员的灵巧手段。但是这显然并不是说我们能对时局的这种严重的爆炸性感到心安理得。我完全同意布尔加宁同志和比万先生的这样一些看法：在中东爆发的战争很难会只限于中东，局势——像赫鲁晓夫对比万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又紧张起来、特别紧张起来，我们必须根据这种情况来理解和了解问题。

我想稍为详细地谈一谈世界某些国家的具体形势，但可惜没有那么多时间。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讨论或在有关国际的活动的讨论中，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从革命前途的角度来看似乎最值得注意的某些国家的形势。在欧洲，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形势；在远东，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形势；在拉丁美洲，是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形势。

* * *

在结束以前，我想解释一下正文末段所说的话，即：只有在现今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在未来的十年内不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下，正文中对于经济和政治前途的看法才有意义。自然，这毋宁是关于一个理论概念的问题，因为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我们所处的时期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因为从那些可以说明这种性质的雄厚力量的角度来看，它们正在强调它们的彼此相反的发展。这是一个容易发生突然的变化、容易出现高度爆炸性局势而把两个社会阵营之间的决定性斗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时期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我们对于未来战争的看法问题放在这些推论的框框里。在我们的运动中，或者可以说是从谈

论战争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已经懂得这是我们认为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抗拒世界革命进展的问题。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现今的世界革命只有通过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才能取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斗争的世界，一个存在着比较尖锐和残酷的斗争的世界，一个存在着确实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世界。当我们谈到战争的威胁时，我们事实上是以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方式来谈论这种“威胁”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战争之所以出现，是先前的无产阶级的溃败所造成的局势的结果。那时的战争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失败。

现在我们走到相反的一面，即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削弱或崩溃、而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进展才产生的战争。当然，用现代武器进行的武装斗争是一件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并且，凡是性格正常的人，即既非疯子又非虐待狂者，都不会希望或愿意使世界革命的胜利从原子弹的爆炸中出现。但我们的希望是一回事，事实是另一回事。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实的特征表现为到处采取武装斗争形式的革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1950年，一般人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始终是无限的，可是从那时起，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首先指出，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变。从那以后，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个思想现在已经十分普遍，以致有些人完全转到另一极端，认为帝国主义不再能够抵挡革命的进攻了。我们不能像和人打赌的人那样在工人运动面前表明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对工人群众负责，我们就不能告诉他们：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从此以后世界革命实际上将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和平退却而向前挺进了。相反地，每逢力量对比在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发生重大变化时，每逢世界

革命在世界上有了重大的进展时，我们就看到包括武装抵抗在内的帝国主义对于这种进展所实行的抵抗。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原子武器，这个斗争对于人类的前途来说一定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在另一方面，现在正创造着越来越多的条件，可以使我们在帝国主义准备用武力来抵抗革命的进展时立即解除它的武装。

对我们来说，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是到处进行有效的革命斗争，从而创造那种使帝国主义的抵抗尽可能地遭到削弱的条件。我们从来不认为“战争危险”是一条直线上的每天都在增加着的一种不断的过程。相反地，我们必须按照我所解释的方式来理解形势，把它看作经常会突然发生变化的东西；在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刻，在某些条件具备的时候，形势就会变成爆炸性的并提出战争的问题，只是为了经历某种可以持续一定时期的平静状态。当然，我们还必须在我们的分析当中考虑到最近的前途，判断我们是处在危险的、爆炸性的局势之下，还是我们暂时又进入了一个平静时期。

完全应当考虑到一系列的因素，这些因素直到现在为止限制了并且可以说是防止了双方不由自主地互相向断然的冲突挺进的趋势。

曾经起了某种遏制作用的，是已经持续了几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确实的改善，是害怕群众的作用的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的保守主义，再就是两个阵营对于核战争的畏惧。

但是，同促使这些阵营互相对立并走向决定性斗争的一些较为深刻的原因相比，上述的遏制作用不过是相对的。

这只是说明了，尽管有着遏制作用的存在，为什么这个历史时期经常被一些危机所打断，而这些危机势必导致高度爆炸性的局面，事实上把一场决定性斗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十二、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 的动力和前景

——厄内斯特·杰尔曼在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57年10月）

自从斯大林死去以后，苏联官僚机构对苏联本国、对“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对全世界各共产党的统治，已经彻底动摇了。

苏联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进行的轩然大波的指责，在全世界各共产党中引起了巨大的动荡。在这些党里的坚强分子之中，愈来愈多的人开始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对所有具有根本性的共产主义政策重新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则是，在大多数共产党中出现了不同的集团、倾向，有时甚至是有组织的派别，而这些都是过去的三十年中从未有过的事。国际工人阶级使自己的命运依附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活动的作法——在苏联国内的一些严峻的共产党人，从苏联本国的利益出发，对这些活动的正确性提出怀疑的同时——也遭到了怀疑。

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多次发生，甚至也在苏联偶尔出现的，为实现经济要求而进行的斗争、罢工运动、工人起义运动，全都极其生动地强调了“非斯大林化”的要求。它们进一步肯定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那就是说，领导者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只不过是人民群众的渐趋成熟的反抗运动的压力、怒潮和精神的模糊的反映。匈牙利革命已经不容怀疑地表明，一次政治革命正在形成中，并表明推翻官僚机构的权力实为绝对必要。

在过去的四年中出现的这种引起巨大动荡的发展，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意外。我们已有充分准备，并对它完全理解，因为我们早就预料到它的出现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同时也不必故作谦虚地说，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我们是唯一的一派力量事先确切地预见到这些事件，至少预见到这些事件的大体的轮廓，同时也只有我们早已作好准备，来承担从这些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历史任务。

为了分析这些事件的意义和规律，我们不得不提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最困难的问题。我们又一次更清楚地看到，国际革命每前进一步，必然也会使革命的思想向前发展一步。反过来，整个革命政党对这种新发展的革命思想的接受，又变成了革命要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政治革命或社会反革命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这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所作的传统的分析，肯定这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历史前程只可能有以下的两种结局：或者是资本主义复辟，或者是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以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换言之，或者是社会反革命，或者是政治革命。

这里的二者或居其一的两个词儿的形成是和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的发展趋向密切相关的。或者，国际革命还将遭受一系列的国际失败，托洛茨基在 1935 年写道，法西斯主义将慢慢蔓延到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那么，工人国家将从此永远从地面上消失；我们将看到社会反革命的胜利。或者，国际革命的发展将改变 1923—1939 年间处于主导地位的反动倾向，而使政治革命在苏联获得一个可以取得胜利的良好机会。

二者或居其一的两个词儿并非代表同时可以解决问题的两种可能性。当托洛茨基第一次明确地作出这种估计的时候（即在

1933年希特勒获得胜利之后)，他不得不把未来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的发展动向当作是一个难以解答的疑问。革命将会再一次向前发展，还是会在世界各地一直遭受失败呢？在1935年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够负责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南斯拉夫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殖民地革命已逐渐展开，苏联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有利于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估计甚至是最近或不久的将来的发展情况时，仍然认为两种前景都有可能，那就等于是拿庸俗的折衷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如果在1953年再重复在1933年时完全正确的说法，就是说，苏联或者将重建资本主义，或者将经历一次政治革命，那就等于是要把作为一种分析现实的工具的托洛茨基的理论变成一堆教条。那也等于是把一个在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中，在斯大林格勒、贝尔格莱德、北京、奠边府以及在鸭绿江边已经解决的问题，硬说成是尚未解决。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已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因而短期内它要想在苏联复辟已经不再可能了。

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双重变化对于苏联的政治革命的发展一直都是很有利的。它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都已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托洛茨基始终预见到，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生产关系的长期存在最后一定会产生一种有利于推翻官僚主义独裁政权的客观条件。1933年年底，他在《第四国际和苏联》这篇论文中写道：

“尽管官僚机构会把极大一部分国民收入浪费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上，但它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高涨仍然抱有兴趣；国民收入数量愈多，官僚机构也就可以掌握更多的资金以维护它本身的特权。可是在苏维

埃国家的社会基础上，劳动群众的经济和文化的上升最后必然会动摇官僚机构的统治基础。”

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为苏联的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权敲起丧钟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在苏联社会中所占数量上的多数和它的特殊作用、它的高度发展的技术和较高的文化、它的生活程度的提高、它从最可悲的奴役和贫困中逐步获得的解放、它的政治眼界的扩大、它的需要的增高超过了官僚机构所供应的商品——一句话，首先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结果。

但是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这种政治革命创造了主观条件。托洛茨基在分析斯大林的独裁政权何以看来颇为巩固的《被叛卖的革命》一书中写道：

“如果在和农民对比之下，工人几乎可以说从来也没有跑到大路上去进行公开的斗争，因而使得那些进行抗议的农村陷于混乱和无能的境地，这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压制。工人们实际是害怕，如果他们把官僚机构撵下台去，那他们可能就会是给资本主义复辟打开了大门[……]工人是非常现实的。对于那个官僚机构，他们并不缺乏正确的认识——至少从那些离他们很近的最下层的统治者身上——他们看到官僚机构不过是暂时看管着他们自己取得的某一部分胜利果实的看守。等到将来，只要他们一看到有其他可能，他们就必然要赶走这个不诚实的、傲慢的、不可靠的看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等待在东方或西方出现另一个革命的黎明。”（美国版，第285—286页。）

这种革命的序幕已经在东方拉开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由于这个缘故，在苏联，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惧心理已经大大减少。工人阶级已经放弃了过去的那种消极态度。它对那个不诚实的看守已经不能再“容忍”了。相反地，它一天一天向他逼近，在工厂中以及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对他发动战争，强迫他放弃他的傲慢态度，并准备推翻他的权力。

对官僚机构的几种不同的理解

我们对于苏联及其外围国家的革命前途的展望，是和我们对于官僚机构所作的特殊分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那些认为官僚机构是一个新阶级的人除外，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对于官僚机构的本质问题，存在着两种错误的理解。

第一种是**主观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斯大林主义分子，或者说，从前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们经常提出的。在他们看来，官僚机构的产生乃是一种心理或伦理现象的结果，而并非社会现象的结果。这是一个习惯、仪态和习俗的问题：有人愿意坐在办公室里而不愿到实际进行工作的地方去乱跑；有人喜欢对工人们发号施令；不愿意“接受人民的启示”；天性“厌恶体力劳动”等等……等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为我们开出了一张大批罪证的清单，那也许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官僚主义”的基础。

和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解相反的，是一种客观主义的错误认识，这方面的典型的代表是那些布兰德勒分子(Brandlerites)，以及像哥穆尔卡分子们所代表的东欧的某些共产主义流派，此外还有多依彻，他至少在他最初的几部作品里表现如此。他们说：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能力很差，既没有技术，也没有文化。因此它没有能力管理实现工业化的工作。所以最后不可避免地要由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

但是，工业化过程既然牵涉到投资的大量增多问题，它同时也牵涉到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的问题。工人们不会愿意接受这种降低的生活水平，因此就必须强迫他们接受。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官僚主义独裁统治的客观需要，将随着产生它的历史条件的消失也立即消失。

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官僚机构这一现象的分析是和这两种同样错误的理解完全相反的。

以工作习惯和缺乏民主风气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在群众组织中不可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里，这种现象一般都能够通过自由选举和群众的民主监督而加以克服。只有在个人缺点在社会优越地位中生了根的时候，官僚主义才会变成一种严重的罪恶，换句话说，到了这时候，心理问题已经转化成社会问题了。在资本主义政权之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发展以及改良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得具有官僚主义倾向的人转变为一种脱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又依靠它牟取暴利的家伙。在工人国家中，革命的胜利和反革命势力的失败却容许那个官僚机构攫取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并从而享受着无比巨大的特权。寄生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它和某一特殊的社会体系联系在一起，随时消耗掉这一社会的一部分财富。

我们知道，正如列宁早已理解到的，完全消灭一切官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就是说一切领导工作完全由生产者自己来作，在革命胜利的初期，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一个穷苦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早在1918年，我们已经知道某种官僚主义已在苏联出现，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新取得胜利的国家中也同样会出现官僚主义。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越穷，它的无产阶级越落后、力量越差，那么，出现一个强大的、夺取各种特权的官僚机构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可是，我们所不同于那些“客观主义者”的是，我们，和列宁一样，和托洛茨基以及苏联的最好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完全相信，这种情况不是不可避免的，相信这种官僚主义的堕落倾向的发展可以通过主观因素的有效的作用加以遏止；列宁在他的晚年就一直

热情地坚持这种看法。国内和国际的力量对比关系都决不是永远不变的。在 1923 年的失败之后，中国在 1927 年，德国在三十年代初期，西班牙和法国在 1936 年都有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官僚机构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党从一开始并不了解这种危险的存在，或者低估了这种危险，由于它本身也官僚主义化了，而党内的部分干部想起来反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时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组织中已变成了少数，那时本来是无产阶级的工具，党已经变成了官僚机构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中的官僚主义堕落倾向问题所作的回答，完全是针对着，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今天在各共产党内出现的抱着批判态度的反对派群众们的心理状态而发的。他们全都在问：“这如何可能呢？”他们全都急于想弄清楚，在苏联，不利于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总的客观条件和无比罪恶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官僚机构的发展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只有我们提出的这种对官僚机构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解能够让他们清楚地认识这一过程，同时也向他们说明了，这第一个工人国家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为什么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社会中的不同潮流，党内的不同派别 和官僚机构内的分裂

我们对苏联官僚机构的这种传统的理解，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回答了自斯大林死后，国际工人阶级曾不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两个问题：

1. 在克里姆林宫出现的分裂是否可以解释为主要是由于争权夺利？或者这种分裂实际只是在整个苏联社会中发生的某些变化的具体反映？

2. 官僚机构，作为一个集团来说，对于人民群众的最后的进攻究竟能有多大的抵抗能力？

根据传统，我们知道，在所有一党专政的政权之下，社会中的一切矛盾都必然会在这个政党的内部反映出来。过去，在二十年代期间，我们对布尔什维克党这么说过。今天，我们对苏联的共产党也要这么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苏联共产党中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各种派别，和在苏联社会中已经开始显示自己力量的各种潮流决不是毫无关系的。

可是，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里有两种现象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当不同的派系在布尔什维克党出现的时候，我们肯定地认为左派反对派明确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要求。至于右派集团，那些布哈林主义者，他们只不过是**在农民阶级的压力之下**提出他们的一些策略问题，更特别是力图解决那些问题。可是托洛茨基从来也没有把布哈林说成是一种农民的倾向性的代表，或者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从没说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他是一个共产党人，那就是说，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战士，这一点是从来没有人加以怀疑的。

我们也同样以这种区分作为一个起点，来解释斯大林死后苏联共产党内出现的分裂。如果我们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派所进行的大量的反对活动来判断，我们会觉得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官僚机构中享受最大特权的阶层，它最主要的是那些托拉斯和大工厂的经理们的最忠诚和最直接的代表。至于其它那些派别和一些处于中间地位的派系，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受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压力，因为至少，它们曾经不得不提出了人民群众越来越坚持要求加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压力，因而提出了某些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的改革措施。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将来也决不会说，马林科夫、米高扬或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内代表着，甚至只是间接地代表着，一种无产阶级的倾向。他们所有这些人全都不过是官僚机构的政客，全都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手法力图保卫官僚机构的利益、权利和特权。

由于他们过去的历史，由于他们曾经对斯大林的许多罪恶活动抱着默许的态度，而这种默许是苏联人民全都知道的，更由于他们目前在苏联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一切主席团中成员，在人民群众的眼中，都被看作是和一个甚至更遭到人民痛恨的政权“僧侣”专政，一样的可恨，称他们是官僚主义分子，官僚机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肯定没有办法担任铁托、哥穆尔卡或纳吉担任过的角色，那就是说，官僚机构中某一派系的全国闻名的中央领导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设法导散人民群众对整个官僚机构的仇恨。他们也都曾或多或少企图这样做：贝利亚的办法是，宣称自己根本反对警察暴政，并推卸“医生案件”的责任；马林科夫的办法是，声称他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轻工业；米高扬的办法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发动一次决定的攻击；赫鲁晓夫，则是向人民保证充足的面包、黄油和肉类。

但是在我们看来，官僚机构并不是一个新阶级；它是一个扎根于无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如果我们来研究一下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成分，我们会发现它的三分之一的党员仍然是工厂的工人。即使他们都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或者工头，由于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他们跟工人总比跟那些整天坐着小汽车到处跑，每星期给儿子一千卢布作零花儿的大佬们要更为接近一些。

因此，各工厂中的工会干部、工厂中共产党支部的书记，甚至

各个区、一些小城市或甚至大城市里的领导，特别是那些政治委员们，都变成了在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各种无产阶级倾向的真正的传送带。而在他们的队伍中也可能出现未来的纳吉和哥穆尔卡，或甚至出现未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苏联共产党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在它们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上所表现的这种辩证的和双重的性质，反映出了斯大林主义和官僚机构本身的双重性，因为使它们和无产阶级相连的脐带始终也并没有完全割断。

正是以同样的这些前提作为一个起点，我们才能够解答了官僚机构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的进攻可能进行何种反击问题。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事先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解答了。他在1933年写道：

“我们知道，官僚机构的社会根源必须到无产阶级中去找。无产阶级即使没有积极地支持它，至少，事实上是对它采取容忍态度的。如果无产阶级再一次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就马上会失去依据悬在半空中了。如果它要反对它，那只要使用警察进行镇压就行了，倒不一定要进行内战。不管怎样，其结果决不是一次武装起义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从这一专政的躯体上挖除一个溃烂的毒瘤。

“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和起义的无产阶级之间决不会出现一次真正的内战，这种内战只可能是在无产阶级和积极的反革命力量之间进行。”

这种预见已经在1953年6月16日和17日东德的经验中以及在波兰和匈牙利革命的经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直到苏联军队进行干预以前，“本国的”官僚机构几乎对群众的行动并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抵抗就彻底垮台了。只有秘密警察的一些极小的核心组织还坚持着自卫的战斗。官僚机构的其余部分则立即自行分裂：一部分人完全参加了政治革命的阵营（在成百的工厂和几十个市镇中，罢工和示威运动都是由正式的工会组

织、党组织和青年组织的领导人领导的)，另一部分人则全都躲藏起来或者避开革命逃跑了(这里说的是真的逃跑了)。

在苏联,外国军队的干涉当然是不可能有的,所以那里的问题只能靠苏联自己的军队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呆一会儿再谈。可是我们可以预言,在苏联的政治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也许会看到,托洛茨基的分析将会得到最令人信服的证实。那时也将证明另一个事实,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反革命势力之间才会出现一次真正的内战。如果不是苏联军队进行罪恶的干涉,改变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条件,那么匈牙利革命差不多就已经使这个预言得到证实了。

军队的任务

如果我们来归纳一下,自从斯大林死去以后,在官僚机构的上层曾经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以下的两种不同的发展过程:

1. “斯大林的忠诚卫士”组成的“坚强的核心”逐渐分化为不同的派别,派别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主席团的领导接二连三一批一批地被清洗出去,但这些派别中的任何一派,由于不可能使自己的尽力维护官僚机构的特权的愿望和必须对人民群众让步的实际情况调和起来都相继垮了下去。

2. 军队的重要性迅速增高,具体表现是朱可夫将军的地位的增高, he 现在是主席团的一员,而且实际是“集体领导中的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①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这一个过程实际是在整个苏联社会中逐

^① 这个报告是在“朱可夫事件”发生以前提出的。报告中有关军队的一节正好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件。——原文编者

渐形成的基本潮流，在官僚机构那面三棱镜上的反映。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地讲一讲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在斯大林时代，决定权一直操在总书记一人手中。他死之后，他的一小撮卫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实际掌握着国家政权。贝利亚倒台以后，政权转移到由十多个人组成的主席团手中。当赫鲁晓夫发现自己在主席团中居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于是越过主席团向由一百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请求支援。为了使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具有权威性，他不得不到工厂中去向工人进行解释，同时向党员群众进行解释。到明天，中央委员会里的某一派的领导，如果在这一机构中处于少数地位，他也可能会想到要越过这个机构，去向全党党员、向工厂工人寻求支援。这将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将是斯大林时代之后苏联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军队地位的增高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总书记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万能的秘密警察来行使的；秘密警察控制着从党、政府和军队开始的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在斯大林死去、贝利亚被处决之后，由于党重新掌握了对秘密警察的控制，这个行使权力的体系便被破坏了。官僚机构，在行使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一般职权之外，在任命官员等工作之外，除了军队已再没有任何控制人民的有力的工具了。我们所得到的的一切情报都充分证明，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莫斯科的警卫军，在清算贝利亚的工作中担任着最主要的任务，后来在赫鲁晓夫始而战胜马林科夫，继而战胜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斗争中也担任着最主要的任务。

这是不是说在苏联可能会有出现军人专政的危险呢？我们并不希望事先假想一个前提，以证明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某种短暂的过渡性的局面，但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要

想使军人专政变成苏联官僚机构掌握下的一种稳定的政权形式肯定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苏联军队真正是苏联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现在已不再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它已经变成了一支由技工和司机组成的队伍，充分反映了这个工人国家在技术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当然，毫无疑问，这支军队里有一个享受着极大特权的傲慢的军官阶层。也许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又一个朱可夫集团出现在主席团中，竭力维护这一阶层的利益。可是，在苏联社会中日益形成的无产阶级倾向针对着官僚机构中拥有最大特权的阶层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也一定同样会在军队中出现。平等的观念将来也会深入到军队中去；军官阶层已经不得不开始让步了，特别是，单独开饭的军官食堂现在已经取消了。许多迹象都已表明，政治革命前夕的一个决定性的阶段的主要特点将是，革命观念已经深入军队之中，使它不可能再继续担任官僚机构的特权和权位的保卫者的角色。

苏联不同社会力量的形成

自 1953 年开始，我们一直就说有三种平行的势力已日益在苏联社会中形成了：

1. 官僚机构中特权阶层的势力；
2. 农民阶级的势力，这是三者中发言最少的；
3. 无产阶级的势力。

我们还说，这三种势力不仅在作家的作品和政治领导人的演说中间接地反映出来，同时也通过公开提出的，最初是经济上，接着甚至是政治上的要求以及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直接反映出来。这三种势力力求达到的社会目的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1. 官僚机构中享受最大特权的阶层力图扩大保障他们的特权的法律基础;他们竭力想把篡夺来的权位变成为合法的权利(特别是在各工厂中);

2. 农民希望保留住他们各自私有的那点土地,并要求有权享受他们的产品的全部收益;

3. 工人们则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求在经济和国家事务方面握有更大的权利(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求工厂的管理权)。

在为了给赫鲁晓夫提出的经济管理方面的重大改革方案铺平道路而进行的最后一次讨论中,这三种势力都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1. 和在1955年莫斯科经济会议上一样,各工厂经理,利用“分散管理”的原则的提出,又一次坚持要求增强他们自己和工头的权利,特别是开除和惩罚工人的权利。赫鲁晓夫在他向最高苏维埃提出的报告中也谈到过这些要求。享有最大特权的官僚主义分子们的这种压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就是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苏联,生产资料也应该看作是一种商品!谁都知道,工厂经理,不考虑计划规定,不合法地把某些机器设备在工厂之间任意转买已被看成是他们的正当权利了。

2. 赫鲁晓夫对农民的让步是使他们非常兴奋的:从1958年开始,他们可以不为自留地上的产品交税了。这位伟大的“坚持原则的布尔什维克”,就这样,在不几年的时间内,从为了满足集体农庄庄员的利益、为了严格限制自留地,争取建立“农业村”的计划,一转而采取了向强大的私人占有欲让步的策略,这种占有欲在集体农庄的农民中已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了。

3. 工人们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求增加实际工资,反对重新修改工资制度,因为那样作的结果将是全面减少高技术工人的工资。

他们要求更大的平等,并抗议滥用权力的官僚主义作风。1956年10月在顿巴斯发生后来蔓延到列宁格勒的罢工运动,使莫斯科的奥尔忠尼启则工厂以及其它许多大工厂陷于瘫痪的怠工形式的罢工主要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劳动》日报已公开报道,后来多依彻曾经加以引用的一件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有一个工人朝着位刚刚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走过去。他两手抓着他的衣领对他说,“这衣服真高级。一个工人可买不起这种衣服。”这件小事充分表明了,自斯大林死后,力量的对比已如何变得更对无产阶级有利了。可是,这个工人在作了这么一番表示之后却连忙混在人群中溜走了。这更表明工人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匈牙利的經驗教訓

无产阶级反对苏联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的具体形式将是什么样的呢?凭空猜测是没有用的,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谈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的经验中的一些突出的特点。

首先,这种政治革命将会有一种**永远革命的冲力**。人民中的各个阶层都将被动员起来反对官僚机构的独裁统治。在这一革命的初期,所有这些阶层都会实际参加进去。但是在革命前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和它的自觉的先锋队就将获得革命的**领导权**并把它推向实现苏维埃民主的**胜利的道路**。

各阶级间的力量的对比关系将决定这种胜利的取得,是否可以不必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来和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进行战斗(在东欧和中国是如此)。在苏联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那里已经完全没有组织的反革命力量了。这就说明,我们现在如果预言,从革命一开始,全部力量就会分成两个明显的阵营:一边是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另一边则是斯大林主义者、思想混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将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对政治革命抱着这样一种想法，那就等于是在实践中完全否认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统治，关于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概念，已经散播了多少混乱思想和歪曲的解释。

这一永远革命的过程将经历多长的时间以及它能否迅速取得成果，主要将决定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組織和领导**的强弱。工人阶级将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组织形式，那就是工人委员会。匈牙利和波兰的例子已经无庸怀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苏维埃民主的根本前提，这种民主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起来。但是，仅只是有这种委员会存在还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尽快**爭取掌握全部政权**。仅是工人委员会的存在并不能保证政治革命很快取得胜利。在过渡期间，也可以采用政治上的妥协、重建小资产阶级政党、试图使资产阶级议会制重新获得生命力等等作法……但一切工人委员会中必须有一个自觉的革命的**领导**，那才能够使它们变成整个阶级团结的中心，才能够在官僚主义独裁统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革命的民主力量，粉碎反革命势力的一切企图。

民族问题，在政治革命中将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外围国家”和苏联本身之间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在那些“外围国家”中，民族问题，觉得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压迫和剥削的那种感情，本身对革命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它会进一步激起人民群众反抗和复仇的愿望。到了后来，民族问题也会助长落后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偏见。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大胆的态度，就可以，如我们在南斯拉夫和波兰的例子中所见到的情况一样（尽管它们是处于铁托和哥穆尔卡的集权统治之下），把民族感情导向有利于工人所采用的革命策略的道路。

在苏联情况却并非如此。在这里,民族感情,觉得苏联已变成世界第二强国的那种感情,实际反而对官僚机构的极权统治是一种支持。欧洲的某些少数民族(乌克兰民族、波罗的海沿岸的各民族,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哥萨克民族)所感到的遭到民族压迫的情绪,只会在人民群众的运动中产生一种彼此隔阂的倾向和离心倾向,这种倾向官僚机构早已在设法加以利用了(比如像,在少数民族地区驻扎军队)。最后,关于亚洲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中有一些在对待官僚机构的态度上是和欧洲的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们所在的地区,即使在斯大林时代,也确有巨大的发展。这一事实也已被官僚机构巧妙地加以利用了(如动员邻近地区的作家来反对最有反抗性的莫斯科作家)。由于这些原因,在苏联,民族问题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推延政治革命的爆发,阻挠苏维埃民主迅速取得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不可克服的障碍是决不存在的。不管怎样,无产阶级重新组织起来进而采取行动的时间越快、它的先锋队能够组织起来,为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的纲领进行斗争的时间越快、不可避免的混乱和妥协的过渡阶段能够缩得越短,那么最纯洁的政治革命,即为工人委员会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就会越快出现。

政治革命的綱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政治革命的纲领实在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这次的代表大会也必须仔细地加以研究。当然,关于这个纲领,将来在政治革命开始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其中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一定还会热烈地进行讨论的。我们现在向诸位提出的这些纲要,目的只是想参照近几十年来各

方面的经验，作好这个纲领的初步准备工作。我们要特别强调两点。

我们的纲要说明，如果群众没有权利组成不同的苏维埃政党，苏维埃民主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已经是，而我们自己更显然地是，比第三国际和左派反对派的根本主张更前进了一步。我们相信苏联的经验已证明我们这一步是走得很对的。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权利组织不同的政党，那么在这个阶级的党的内部出现的不同倾向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的将受到窒息，因为这种斗争或早或晚会因为威胁着将造成党的分裂而告一结束。只有在革命政党衷心地维护一切权利归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政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先锋队，在工人委员会这个系统之内，竭力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斗争，但同时又不压制不愿接受它的主张的少数，有时甚至是多数人的意见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它既不同于斯大林分子的理论，而和他们的官僚主义的、冒险主义的实践更是截然不同。任何其它的解决办法，其结果只会是官僚主义的独断独行，从而以党代替阶级、以中央委员会代替党、以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代替中央委员会。

我们的纲要强调指出了，在传统时期中一直存在的，工人国家中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真正的困难和矛盾：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矛盾，增加社会主义的积累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等等。为了保证以最进步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我们的纲要提出了将权力分散，使几个权力机构独立自主的主张：那就是把权力分散给管理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维护作为消费者的工人的利益的工会，和行使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权利的苏维埃（区工人委员会）；同时使苏维埃、工会和党都能独立自主。

这种解决办法既完全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集权统治,更决非“南斯拉夫的分散政策”,南斯拉夫的办法是,一方面在中央一级维持官僚主义统治,一方面,通过工厂自治使经济部门由于彼此竞争重新产生许多浪费现象。比如说,南斯拉夫的工厂,为了赢得新形式的“社会主义竞赛”竟会彼此隐瞒技术上的新成就和组织工作的新方法,甚至要求专利权。

新的中間派

随着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倒台,一整套政治思想也跟着倒台了,这些思想,对各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纯粹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而对一般群众来说,则纯粹是欺骗性的和神话一般的:领导,或者说领袖(或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永远正确的……在这种一味服从的思想消失后留下的空隙中,由于缺乏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介于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的两种:

1. 右派反对派的**半改良主义**:这一派的代表是,意大利的基奥里蒂和雷阿勒,法国的埃尔维-勒戈尔,英国的某些机会主义分子,东德的某些海里希思想的“修正主义者”,以及美国共产党的盖茨路线等等。这些人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思想中获得灵感(如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等等),于是就一心只想着社会民主,而把列宁主义思想的一些根本的东西完全抛弃了。

2. 从前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新的中間派**:这些人在人民群众和事态发展的压力之下,一步深入一步地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官僚机构和苏维埃民主等等现象,其中包括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性质。于是哥穆尔卡主张给工人以罢工权利,毛在他的整风运动的第一

篇报告^①中也强调了这一点。毛甚至分析了官僚主义的根源，指出了“体力劳动者”(生产者)和“智力劳动者”(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都比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的贫乏的“理论性”的见解大大前进了一步。

当然不用说，这些中间派在实际行动中的表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非和他们所讲的话完全一致的。作为官僚主义倾向的代表，他们同样不可能真正彻底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南斯拉夫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弱小和文化水平的低下，中国发生反革命暴动的实际威胁的存在，更增添了主观上的困难，使这两个国家不可能走向使苏维埃民主获得胜利的道路。但是这种“新中间派”的存在确有其无比巨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使得世界一切共产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具有战斗性的党员们的头脑不能轻易安静下来；因为它会创造出一种可能性，使得一支革命的先锋队，在进行返回到列宁的斗争中，可以利用它作为一个开始发动的讲坛。

自1956年10月以来的波兰革命的經驗使我们可以客观地把这种新中间派的意义画出一个正反两面的对照表来。这个革命已经取得了四方面的成就：民族独立；在各工厂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强迫实行的农业集体化宣告结束；工人运动获得了某些出版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这些成就中的第一和第三两项现在依然存在，而且看来除非经过一次内战大概不可能会被打消。可是其中的第二和第四项却常常使人觉得并不十分稳定，而且如果革命再继续这样踏步不前(毫无疑问它已踏步不前颇有一段时间了)，便大有重新失去的危险。

哥穆尔卡和他的中间派集团，由于处于革命的左派压力和斯大林分子的右派保守势力的压力之间，力图以竭力避免向任何一

^① 疑指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译者

边再作新的让步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可是他们对左派进行的任何打击始终并不能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而只是增强了右派的力量：这便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所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这种别扭情况所以会产生根本原因是，由苏联使馆领导的右派有完备的组织，而左派，由于领导人失去方向和战斗意志，则完全缺乏组织性。但是，如果左派在“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的口号下重新振作起来，为实行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具体的纲领打开一个局面，那一定就会使得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清楚地显露出来，而使这个肯定并没有失败的革命有一个新的开始。

返回到列宁

斯大林的继承者，以“返回到列宁”作为基调，冒失地发动了反“个人迷信”的斗争。他们这样做，实际就是点起了最终将彻底毁灭他们自己的一场大火！赫鲁晓夫到处宣扬说，现在的这些领导人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全都是诚心诚意地相信他的。可是具有战斗性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先锋队中的群众已经发现，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发现，这完全不是事实。

由于波兰作家杨·科特(Jan Kott)曾经说，既然苏联文学在斯大林时代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那些罪恶，这就表明那种文学实际全部都是谎言，捷克斯洛伐克“文化战线”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符拉基米尔·多斯达尔(Vladimir Dostal)因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机关报《文学报》上反驳说：

“我可以想像到职责和良心的可悲的冲突使得许多作家都感到非常苦恼。可是我认为他们最后决定暂时沉默、等待时机，那不过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自然的、暂时的屈服，因为在那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大的年月，如果

他们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那就只会削弱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一方面是国家和革命的命运；另一方面不过是少数几个人[1]的生命，少数人的荣誉，和某些原则的纯洁性。在这两者之间，又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所讲的话，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直到现在为止仍是整个欧洲最为“斯大林化的。”可是在“返回到列宁”的口号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共产党员将会对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回答说，在列宁的思想中，对原则的维护永远也不会是违背革命利益的。

这新一代将驳斥那些任意践踏原则的人，指出他们这样作，决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给革命带来的损害实在是够严重的了，而是为了一个贪婪的、嗜血的新贵集团的利益。

它将发现，只有反对派，特别是左派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从列宁对原则的忠诚获得启示，既不屈服于威胁，也不为诱惑所动，始终高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帜，不使它受到任何玷污，它将立下一个花岗石的纪念碑，以纪念成千成万的无名英雄，由于他们在过去进行了看来决无胜利希望的反抗，才保证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列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蓬勃发展和永久长存。它将得出一个结论说，继承了这些传统的第四国际能够把这些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重新建立起来。它将在列宁的旗帜下，通过推翻官僚主义的独裁统治，重新建立苏维埃民主，为一次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扫清道路。

附 录

一、民主、社会主义和过渡綱領

——密歇尔·巴布洛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震动人心的崩溃，以及拿破仑式政权的成立造成事实上废除了议会民主制度，这件事原应该促使各国共产党至少对它们关于“民主制度”、“民主”资产阶级和关于“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一些理论，进行一番批判性的重新考查。

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举例说，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里面，我们甚至找不到对于法国的事变和国际工人运动目前局势所作的略为认真的分析。正相反，全部重点都放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进展上面，通过这些进展，明天社会主义就将打进全世界。从这种观点看来，“法国的插曲”当然就不值得多考虑了。

至于法国共产党，它是受法国事变影响最大的组织，它在新的幽灵议会里的议会代表，已经减少到极少数；法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文件草案里面，竟仍然自誉他们自从 1946 年以来便指出了“并不排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并且重申它的看法仍然是“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包括运用民主议会，而走向社会主义”。

在列宁的第三国际时代，这种“愚蠢”是适宜归之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们的特性。但是正统的共产主义已经陷入斯大林-孟什维克派，它长期以来都一直重复和加重着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

的这种“愚蠢”、罪恶和背叛行为。

然而，在顽强的事实的逻辑面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现在已显得进退两难了。他们在最近所写的各种文章里，力图把抨击“资产阶级民主”同争取“革新的民主”两者调和起来，并力图把“革新的民主”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维·琼纳斯^①告诉我们说，“一般的民主”是没有的，他忽然记起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民主”是一种阶级的政权，一种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式。琼纳斯接着让自己对工业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演变作了分析，企图证明在现阶段，“大垄断资产阶级”为什么已不能够继续在典型的议会民主制度之下维持它的独裁统治了。

琼纳斯这样地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极端反动的演变”之后，就来处理关于他的分析的结论部分。他写道，问题是这样的：

“什么将取得胜利：是反动的极权统治（例如法国）的目标法西斯主义呢，还是进步与新生的重要条件民主制度呢？”

由此看来，这位作者作了详细的分析，激烈地指出了“纯粹民主”虚妄、“民主”的阶级性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目前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危机之后，他出乎意外地重新肯定了抽象的“民主”，并且把它同法西斯主义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让步了，这种幻想智穷力竭地虚构了一种逻辑上毫无力量的政权，它介于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叫做“民主共和制”或“革新的民主”或者“进步的民主”等等。

如果把资产阶级的危机作为出发点，那末根据琼纳斯所提出的同样的理由，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不应该拿资产阶级也必

^① 他所写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某些趋势》，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59年3月号。

然要抛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而应该拿（受资产阶级剥削的群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来作为资产阶级必然发展趋势的拿破仑式或法西斯式强权国家的对立面。

在资产阶级民主陷于危机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办法，再没有其他办法可循了。

“那些社会主义者无法理解”，列宁在为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写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问题的总结中写道，

因而也就使他们在理论上目光短浅、在观念上逃不出资产阶级的各种偏见、在政治上出卖无产阶级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潜伏着的阶级斗争一旦尖锐化，就决不可能有什么介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中间形式。一切寻求调和的解决办法的梦想，不过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空喊。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观点看来，把民主制度同法西斯主义（或拿破仑主义）对立起来，这就是幻想有可能利用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来向另一个资产阶级作斗争，孤注一掷地假想大垄断资产阶级和“民族的”和“民主的”中等资产阶级（工人运动将成为它的辅助力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不用赘述，这种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之间基本的阶级内部矛盾是极端不现实的。

资产阶级的民主危机无疑是使得资产阶级的社会体制受到威胁的一种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必然反映——这表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压倒了不可否认属于本阶级内部的各支派的利益；这也表明，事实上，只有不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家会想到，有可能凭阶级内部的斗争建立起一个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中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共和国”，来反对大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强权国家。

资产阶级民主危机的时期，即尖锐的社会危机时期，实际上也表现为向左右两极急剧分化，议会民主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为空虚的躯壳。

“最近法国的经济再次完全证实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这个不变的逻辑，这个逻辑清楚地勾划出实际的可能道路：要就是拿破仑式或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强权国家，要就是无产阶级政权。”

自然，争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分不开的。

但是，民主自由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更不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社会权力的属性，而是群众在资本主义政权范围内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

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斗争中需要民主条件来发展它的行动和组织，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更为完全正确的是，这些民主自由必须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民主演变的坚定革命斗争去夺取过来。这就是说，决定和保证民主自由方面获胜的，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基本斗争，即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斗争，而不是争取抽象“民主”的行动。

创造和保存民主自由权利的条件，是在革命斗争中认识自己、壮大自己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所发挥的巨大的力量，任何以“民主”为目的的阶级合作政策就只能帮助毁灭这些条件。

因此，现在的问题仍然是应当提出的纲领的性质和赖以实现这一纲领的联合力量的性质问题。

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以包含在争取“民主”的初步斗争纲领的范围之内。目前各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一般就是这种情况，它们把目标订为“革新的”或者“进步的民主”，并且都有着大致在这个水平上的斗争的初级阶段。

相反地，爭取民主自由的必要斗争，则可以理解为爭取社会主义的基本斗争的一个附属部分，在社会主义斗争的引导之下，属于过渡纲领的范围之内。这样一个纲领会辩证地提出这样一些口号，它们既是民主的、又是过渡性质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过渡时期的口号是組織各工人政党的政府。

某些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已经被引向上述概念，但是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概念。距离还很远。在这方面，意大利人有的是先进的，例如，陶里亚蒂派同十分斯大林式地顽固的多列士派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概念和组织有很大的伸缩性。

毕耶特罗·英格拉奥在他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①一文中，曾几次接触到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它的辩证关系问题。他承认这里的问题不是什么“两种不同的斗争，先取得民主的自由权利，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制，而是完全一致的同一个斗争。”可是他所说的“社会体制”不过只是一种“进步的民主政治”，这种政治

由于它将改变最落后的意大利社会结构，由于它使得民主的自由权利有了新的社会内容，就将从根铲除法西斯主义，而使公开反动的政权有可能再度出现。

在他看来，这里的问题是一种通往社会主义的预备政权的问题，他称它作过渡性的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混乱是：过渡时期的要求和过渡性的政治体制被混同起来，这种政治体制，由于它并非无产阶级的政权，因而，从社会的意义来看，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

正确的观念是承认需要在纲领中把基本的民主要求，同构成

① 《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1959年1月号。

对资本主义机构的改良的过渡时期经济口号，有机地和辩证地联系起来。

而根本的错误则是把自己限制于这一部分纲领，不用社会主义的口号(例如，生产工具国有化等等)来对它加以充实，特别是把过渡时期的口号和一种过渡时期的、并非由工人政党组成政府的政权混淆起来了。

必须了解的是，过渡时期的政治解决办法决定着所制定的过渡时期纲领的结构、精神、方针和动力，这个解决办法不可能是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在典型的资产阶级机构范围内的一个政权，它实际上是一个新政权。

基本的民主要求和结构改革只是由于不同的政权的性质而具有这种或那种内容，这种或那种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们在一个纲领中确定下来向大家宣布，以有助于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政权的建立，并且使这一目的的实现仿佛是它们本身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个政权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直接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厅。

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这个政权只能采取工人政党的政府形式，这个政府受到群众革命组织的委员会的支持。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以什么方式和方法达到在资产阶级政权之外的这样一个新政权的问题。列宁和他的时代的第三国际曾经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是议会之外的群众革命行动的结果，必要的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目的，只是在于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来促进群众的行动，以及直接从内部来打破关于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任何幻想。

列宁当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里教导“左派共产党人”的，是一种新的、不习惯的、反对机会主义和反对事业主义的工人参加议会的主张。今天，赫鲁晓夫之流得出了结论，认为这些理论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主义世界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所造成的新形势”使得有可能利用议会达到社会主义。

但是这些“理论家”在其他地方不断地强调说，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垄断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机构控制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严。从这个事实得出的合理结论，当然应该是：工人阶级现在实际上离开掌握着国家和经济的控制和管理舵轮比任何时候更远了，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需要打碎目前被垄断资本家所控制的旧的国家机构。

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论文里所提出的结论，到现在不但仍然有效，而且由于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加强，因而更为有效了，他写道：

只有天下最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人类历史中最深刻的革命活动，政权自有世界以来第一次由少数剥削者的手中转移到多数被剥削者的手中的过程，有可能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旧的框子里实现，有可能在实现的过程中不出现明显的破裂，而且也不需要创立体现新的生活条件的新的机构等等。

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利用，只占着一个明显地从属于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的地位。

可是目前的那些“革新家”的意见却与此不同。以自己的荣誉为赌注来支持已被人民群众抛弃的第四共和国的法国共产党，论勇气实在可嘉。完全依赖戴高乐的一段“插曲”也并未使之有丝毫改变的法国的“旧的民主传统”，法国共产党正准备在明天的“经过革新的民主政治”的民主的议会机构中占据必然只能由工人阶级

占据的地位。^①因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法共在它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结论中严肃的告诉我们，“有赖于争取民主的斗争的胜利以及它的继续不断的发展。”(黑体字是我们用的)

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在我们这个时代，民主的自由权利，以及对于资产阶级强权国家的发展倾向的有效的遏止，只可能是无产阶级为自己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结果，或副产品。争取“民主”的斗争事实上倒是包含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中。

实际上，议会外群众革命行动的目标，决不能是建立一个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的一个派联合的议会政府，而是要建立一个工人政党的政府，并且帮助这个政府实现它的过渡纲领。

如果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许多年代的整个时期中，在以建立工人政党的工人政权为方向的过渡纲领的基础上对群众进行教育与动员，那末就有可能或者通过取得议会多数，或者通过迫使资产阶级接受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这两种情况，从而实现上述的政治解决办法。

某些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他们了解到法国的经验已经使得“通过议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如何行不通，因而常喜欢强调议会之外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的存在，强调“议会中的活动和全国范围的活动之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关系。

上文已经提到的毕耶特罗·英格拉奥曾就这个问题写道：

有一种说法我们始终认为是错误的、片面的，那就是，认为在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是“议会的道路”。

^① V. 约昂在上文所引他的文章中，曾对现阶段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共产党的总的策略作过如下的规定：“通过具体的行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活动，以及更广泛地参加本国各级政治和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

我們永远也不能忘記，议会中工人反对派之所以有力量、能够发生作用，恰恰是因为它能够左右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它自己的活动和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工人的革新的革命斗争之間形成一种辩证的联系。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强调的一个观念，正是这种在议会内的活动和“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工人的革新的革命斗争”之間应当建立起的辩证的联系。这位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好多次只是随便提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民主口号和过渡性的口号之間、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活动之間的辩证的联系，可是他始终也沒有逃出从基本上讲仍然属于改良主义的方针和实践的圈子。比方说，他也预见到议会外的活动可能会使议会内的力量对比关系产生一种“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变化，他的意思也许是暗示在基督教民主党內可能有一派会分化出来，在议会中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

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即具体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都决定于这三个条件：制订一个适合于该国特点的过渡纲领；有系统地采取各工人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纲领和这个统一战线都以组织工人政党的政府为目标，这个政府采取这个纲领，并且得到议会外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的支持。

这条道路是唯一现实的、能够鼓舞和动员群众的道路。所有国家，像法国一样，都必定会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城市和乡村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一样，将脱离资产阶级的中心组织而走向极端。在这种时刻，工人政党就有可能由于分化取得群众的绝对多数或者积极的决定性的政治多数，并且建立它们的政府。

一切都决定于它们的纲领，以及它们争取工人政权的决心。

在这两种情况下，由议会产生的工人政府，事实上，将只是革命的联合阵线使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的结果。这种动员以及充实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就将保证一个工人的政府可以不顾资产阶级必然会有强烈的反抗来实施它自己的过渡时期的纲领。

一个以结合各国具体情况的具体的过渡时期纲领为基础的坚定不移的阶级政策，和一个各种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在某些情况下，也就能够取得议会中的多数，或甚至在从议会的代表比例看居于少数的情况下，仍能建立起工人政党的政府。那么，从工人政府的形成（不管它是如何形成的）开始，一切就将决定于议会外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发展的程度，它将能使得这个工人政府走出资产阶级的圈子，开始自己的活动。

除了重新发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统一斗争之外，再也不会会有任何“新”的东西了。

（译自英文版《第四国际》，1959年春季号）

二、不断革命論概要

——考尔文·席尔瓦

序

《不断革命論概要》是由于需要而写成的。它是为每月举办一次的我党干部学校而准备的。现将其出版，相信它将获得更广泛的用途。

本书如标题为《不断革命論略证》，或许更为恰当；因为这才名实相符。不断革命論的概要本身或许可用数语说明如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世界实体。当代的各个民族革命只是这个实体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世界革命的有机部分。

“由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世界革命在形式上是民族的，然而在内容上是国际的。它表现为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民族革命。

“由于合并发展的规律，在许多国家中，虽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有待完成，但在历史上较晚而在社会内容方面则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业已成熟了。不断革命論教导我们，在这些国家（因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而称作‘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当前的时代不能由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国家来完成。这些任务将只能由无产阶级政权（即工人国家）来完成。

“在这种种情况下，当前时代的革命在三方面是不断的：

1. 革命不能中止于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它必须并确实在不间断地（不断地）继续下去，直至无产阶级政权——得到农民支持

的工人国家——的创立。

2. 工人政权自然不能停留于完成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它显然必须继续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因此，革命**不间断地**（**不断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阶段发展；或换一种说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国家变为得到**贫农**支持的工人国家。

3. 但是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它代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决战。其中之一必定获胜，消灭对方。民族革命因此**不间断地**（**不断地**）**转变**为国际即世界革命；并只在世界革命中**完成自己**。

“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简明概要，其逻辑论证我们在本书中已试图概述。没有试做历史的说明，因为必须使这本概要保持易于掌握的份量。”

最后一点。不断革命论不是空洞的抽象。它表示世界革命的实际的、活生生的过程。在以俄国革命发端、以仍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告终的多次重要革命中，这个理论都为无数的方法所证明。它得到了证实，并被认为是正确无误的；这不是偶然的。在本文中，我们已把不断革命论定义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只是当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通用名称；而不断革命论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因此，它是今天每一个积极革命者的不可缺少的理论武器。

考尔文·R.德·席尔瓦

1954年1月1日于科伦坡

不断革命論概要

I. 导論

1.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
2. 这个理论有两方面：
 - (i) 内部的即民族的方面；
 - (ii) 外部的即国际的方面。
3. 内部的即民族的方面特别说明落后国家的革命发展(前途)的基本路线。它说明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
4. 外部的即国际的方面说明,每一民族革命如何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它表明一切民族革命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它证明每一民族革命转变或发展为世界革命即国际革命的倾向和必然性。

II. 世界革命

5. 不断革命论把世界革命看做一系列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民族革命。(斯大林主义者断言,不断革命论把世界革命看做一个在世界一切国家同时爆发的革命,这是捏造的。)
6. 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各个民族革命(世界革命是由它们组成的)将构成一个系列。然而,不同的民族革命将只是一个整体或实体的(即世界革命的)有机組成部分,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即特别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
7.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或实体的最好说明,就是它创造了一个真正的、统一的世界經濟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存在着：(a)一个真正的**世界市場**；(b)一种真正的**国际分工**，是世界经济存在的证明。

每一民族的资本主义和每一帝国主义都依赖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如果你把世界经济看做一条山脉，那么你就可把各个民族的资本主义看做山脉的诸峰。）

而且，不同的民族经济是**互相依赖的**。每一民族的经济都从世界的其他部分（即从其他民族的经济）吸取资源，并为世界的其他部分提供资源。证明这一点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一个真正的**世界貿易体系**。

8. 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内的不同民族经济既有互相依赖的一面，也有互相**竞争**的一面。同样，依靠不同民族经济的民族国家也在你死我活地**对抗着**；每一国家始终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力图打破在无论什么时期内都存在于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均势。

9. 这些**矛盾**的一个结果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

（关于这些矛盾，参见注 I.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任务）

10. 资本主义是受**不平衡发展规律**支配的。这点可由许多方面说明。下面是这个事实的三点主要证明：

(i) 资本主义本身沒有在一切国家中同样地代替早期的社会制度，即封建主义。

(ii) 在大多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渗透，不如工业。

(iii) 在每一国家中，经济的一切部门不是均衡地发展的。一般的情况是，工业要比农业更为发达。在许多国家中，重工业不如轻工业发达。在所有国家中，或许，生产“经济作物”的农业（供工业用的原料）部门，要比生产粮食作物的部门更为发达。

11. 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内达到革命的水平。显然，各个国家都在同一时间内达到革命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革命是一系列的民族革命。

12. 然而，这些民族革命是因以下两点主要原因而互相联系的：

(i) 各民族经济的互相依赖(即每一民族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

(ii) 每一民族革命都摧毁先前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国际均势这一事实。

13. 构成世界革命的一系列民族革命的互相联系是有机的，原因有二：

(i) 每一民族革命都瓦解着资本主义的新世界体系的统一。

(ii) 每一民族革命都构成社会主义的新世界体系的一个起点。

这样，每一民族革命就代表着两种世界体系或世界秩序的斗争。

每一次的革命成功从而也就代表兴起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对于腐朽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一次胜利；正如每一次被击败或被镇压下去的革命都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于萌芽中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一样。

III. 落后国家

14. 既然世界革命采取一系列有机联系的民族革命的形式，让我们就从不断革命的**内部即民族方面**开始吧。

15. 我们在上述第三段中业已提到：不断革命的**内部即民族方面**特别适用于**落后国家**。

16. 然则，什么是一个落后国家呢？这是一个就资本主义发展而言落后的国家。

既然，在一个国家中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已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地开辟了。

所以，一个落后国家就是一个没有完成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留待实行或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愈多，一个国家就愈加落后。

17.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它们包括两点：

(i) 政治任务。

(ii) 社会任务。

18.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任务从历史上来说是以资产阶级国家代替封建国家。

19.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任务是以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代替封建的所有制。（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在土地方面采用资本主义关系，以代替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一种商品，从而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20.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上述任务尚未达于完成时，我们看到，一个落后国家有两个特征。

(i) 在经济发达程度上，农业比工业占优势；而且农业本身是不发达的，对它只有很小的投资，并且在技术上是原始的。

(ii) 在社会发达程度上，农民比无产阶级占优势。

IV. 落后国家的合并发展

21. 在此阶段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样一点，即一个国家尚未完成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该国家未被提出。

相反，在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一个落后国家的基本社会特征是：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仍待完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这个国家面前已经提出。

这种形势是由于落后国家的合并发展。

（注意：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也是两点：

(i) 政治任务。

(ii) 社会任务。

政治任务是**以工人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社会任务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

22. 合并发展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合并发展的规律实际上是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一种特殊应用。

23. 我们已经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说明世界革命在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内成熟的事实。

但是，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不决定不同国家进入世界革命的顺序。

革命（即世界革命）在不同国家成熟的顺序是由合并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24. 合并发展的本质在于，一个落后国家在其发展为一个先进国家时，把历史上相继的各个发展阶段压缩在一起，或甚至跳过它们。这个国家并不在自己的范围内简单地重复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把这些阶段合并起来，即压缩，甚或超越它们。

25. 在同一发展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这种压缩和超越，亦即合并，可从种种方面说明。让我们试举数例：

(i) 在经济方面：

(a) 尽人皆知的例证是锡兰的运输系统。在这里你看到牛车、马车同铁路、汽车运输以及现在同飞机，全都合并在一个运输系统内。这样，运输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即畜力运输、蒸汽机运输、内燃机运输和航空运输(它们在历史上彼此相继)，在这里就紧并在一起了。(世界上也有从畜力运输直接跳跃到航空运输的地区。)

(b) 再有，在锡兰的农业系统中，我们看到最原始的植稻技术与最先进的植茶技术并存。(植稻的隔条种植法与大农场中的大规模农业并存。)

(c) 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中，人们看到，各种最原始的农业形式在同一经济中与各种最先进的工业形式结合在一起。人们还会看到，最现代化的全新工业被装设起来，而不再重历它们先前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跃进。

(ii) 在政治方面：

(a) 合并发展在这个方面的最有趣的例证就是波斯最近石油国有化的情景。在封建国王治下领导一个“议会”政府的一个封建的首相，国有化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石油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发展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几个阶段就压缩在一起了。

(b) 还有，在非洲的不同部分，它们直接从部落首长制政府的阶段过渡到“代议”制政府的阶段。没有“封建”阶段介于其间。

(iii) 在社会方面：

(a) 在非洲的许多部分，古老的部落所有制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合并在一起。

(b) 在印度，封建的柴明达(中间人)制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合并在一起。

(c) 在锡兰,封建的封地制和安地制(分成租佃制)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结合在一起。

26. 现在有必要注意有关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形式(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一个重要事实。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形式不再体现它们在历史上体现过的同样的前资本主义关系。

例如,印度的柴明达制是一种封建形式。但是,在现代印度,柴明达制与在这个国家占优势并已经渗入柴明达制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合并存在。换句话说,封建的形式不再体现一种单纯的封建关系。我们把这样的关系称做半封建关系。

再有,以一个令达(官职)在封地制中所享受的令达权为例;或以尼拉加拉雅(官职)在分配地中的权利为例。这些都是封建的权利。但在今天,这些人的每一方都可自由地抵押或出卖他的权利(即不需对方的同意)。这都是资本主义的交易。换句话说,封建所有制已经卷入资本主义所有制之中。而且,佃户为分配地或封建租地而交纳的地租在现代已折换为现金付款。换句话说,封建的形式已被资本主义的关系渗入。我们把这种结果称做一种半封建的关系。

(上述情况显然适用于我们的安地制(分成租佃制)。半部落的所有关系的概念等等,从上述来看也是清楚的。)

27. 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半封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甚至半部落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是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现在是清楚了。

V. 落后国家的阶级制度

28. 现在有必要概述一下在落后国家中因其合并发展而盛行的阶级制度。

(为了方便,我们将只举半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相结合的例子。)

29. 在落后国家中,阶级制度不像先进国家那样简单。

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两个基本阶级。它们是:

(i) 资产阶级即布尔乔亚。

(ii) 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

然而,在落后国家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各个阶级仍然作为重要的阶级存在着。

这样,如果我们从各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只举封建主义为例,我们就能有:

(i) 封建的或半封建的领主。

(ii) 半封建的农民。

(iii) 工匠,等等。

(为了我们目前的目的,如果我们认为一个落后国家只有下列四个阶级,那是足够了:

(i) 资产阶级。

(ii) 工人。

(iii) 封建主。

(iv) 半封建的农民。)

VI. 落后国家的阶级关系

30.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阶段。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革命的成熟都依赖该国家阶级关系发展的方式。

因此,让我们概述一下落后国家的阶级关系。

31. 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提出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有关落后国家的新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几乎每

一个落后国家不是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征服，就是被置于它的势力和剥削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几乎每一个落后国家还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

32. 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我们都会发现，资本主义是一种外来的输入。

本地的资产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资本的支配下在这些国家中成长了起来，它们为外国帝国主义资本服务，并做为外国帝国主义资本的小伙计。本地资本是和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不可分地糾結在一起的。

33. 而且，在殖民地国家中，帝国主义統治已經代替了封建統治。

在半殖民地国家中，帝国主义支配着这个国家。

因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的政治任务，即以资产阶级国家代替封建国家，本身已被从帝国主义的支配和統治下获得民族独立的任务所代替。

34.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任务因此是：

(i) 在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統治，获得民族独立；

(ii) 在社会方面和經濟方面，摧毁半封建的土地关系。

35. 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落后国家中不同阶级对于该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的关系；从而还有这些阶级自己之間的关系。

我们还必須研究一下帝国主义者自身同落后国家的各社会阶级之間的关系。

(为了方便，我们以后将只以殖民地国家为例。)

36. 让我们从帝国主义者开始。

帝国主义者在阶级上自然是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曾经是摧毁封建制度。

但是，在殖民地国家中，帝国主义者虽则摧毁了封建国家或使之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例如从前的印度各王公国家），他们却没有摧毁封建制度本身。

相反，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即在殖民地国家中寻求支持的需要），帝国主义实际上支持了封建主及其对封建佃户的权利。的确，就印度的柴明达制度而论，帝国主义者为了自己实际上创造了这个封建阶级的一个新部分。

落后国家中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因此是密切的；而且封建主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强权在这些国家内的一个主要支柱。

37. 从上述来看，显然，半封建的农民在其反对封建剥削者的斗争中是要直接和帝国主义国家交锋的。

半封建的农民因此是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统治者的阶级；他们是一个能够被吸收参加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阶级。

（注意：然而，封建农民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人。相反，封建农民的目的在于自己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私有主。关于这个事实在落后国家的阶级关系中的重要性，参看第 VII 节，57—61 段。）

38. 工人阶级的反帝本性是不待说的；因为，工人阶级是一切部门的资本的、特别是外国资本的始终一贯的和彻头彻尾的反对者。它是反对资本和资本的一切同盟者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旗手。因此，它必然也主张摧毁封建制度。因此，它无疑是半封建农民反对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的同盟军。

39. 我们再来看本地资产阶级。

他们对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任务的态度如何呢？

40. 既然竞争是资产阶级的生存规律，既然每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都是垄断其国内市场，那么本地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显然就是竞争和对抗的关系。

但是这种竞争是包含在一种社会和經濟关系的结构之内的，这种结构阻碍当地资产阶级把民族独立变成真正实际的目标。这种结构有三方面：

(i) 在帝国主义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本地资产阶级不过是帝国主义资本的小伙计。他们没有独自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力量。他们需要同盟者。这些同盟者只能是封建的农民和(或者是)工人阶级。

(ii) 然而，在工人阶级方面，冲突却是显然的。冲突在工厂和工作地点连续不断地发生；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本地资产阶级依靠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支持。在工人的阶级斗争中，帝国主义者和本地资产阶级是同盟者。

(iii) 在封建农民方面，也和本地资产阶级有冲突。冲突起因于本地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的經濟利益的互相联系。例如，许多本地资产阶级本身就是封建主或者是封建主的债权人。本地资产阶级因此对于维持封建的經濟权利具有一种既得的經濟利害关系。本地资产阶级因此也不能成为封建农民进行废除封建主义的斗争的一个同盟者。相反，本地资产阶级成为封建主反对半封建农民的同盟者。

41. 我们可将落后国家的阶级关系描述如下：

(i) 封建主同帝国主义者在反对封建农民和工人阶级——还有本地资产阶级——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ii) 本地资产阶级，虽然和帝国主义者进行竞争，却在反对工人阶级和封建农民这一点上和帝国主义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iii) 封建农民和工人阶级对于反对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有关反封建斗争的问题上对于反对本地资产阶级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

(iv) 工人阶级和封建农民对于反对封建主和帝国主义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对于反对本地资产阶级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工人阶级自然还彻底反对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

VII. 落后国家的革命或不断革命的內部方面

42. 我们现在能够研究一下落后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前途）道路问题。

43. 我们已经知道，合并发展使这些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面临在同一时期内完成两种在历史上和社会内容上不同的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44. 在历史上，反对封建主和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这个革命的直接受益者——领导的。这就是说，在前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的战斗中同封建农民发展了一种联盟。

45. 但是，在我们上述的阶级关系的状况下，落后国家的本地资产阶级在这个时代不能领导半封建的农民，去进攻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

46. 在这种形势下本地资产阶级所能做的，就是图谋利用群众运动，以便本地资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者竞争时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利用群众运动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压力，把它作为一种手段，靠牺牲群众运动的利益谋求和帝国主义者的新的、更有利的妥协。

47. 因此，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半封建农民在他们反对

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寻求另一个城市阶级去领导他们。

（农民在历史上从未成功地建立过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永远必须被一个城市阶级领导。参见注 II. 农民和政权）

48. 这种领导权自然为工人阶级，现代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欣然提供。

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现在为工人和农民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中的战斗联盟所代替。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现在也领导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49. 但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于工农联盟的领导权导致建立一个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政权（或国家），而且就是工人阶级的这个政权（得到农民的支持），在完成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50. 落后国家的革命的主要事实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以便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51. 必须补充说明，正是落后国家的这种阶级关系使上述事实成为必需。如果我们暂时假定，工人和农民不去建立一个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政权，却使本地资产阶级执政，我们就会懂得这个事实。

52. 假定本地资产阶级在工农联盟的支持下终于执政；就是说，假定工农联盟使本地资产阶级执政。结果如何呢？

显然，封建农民和工人都将向新政权提出他们的要求。

但是，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本地资产阶级甚至不能满足封建农民的要求，更不用说工人的要求了。

工农联盟因此弄得和那个它刚刚拥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发生直接、公开的冲突,而且它必须继续以一个工人政权去代替这个资产阶级政权,以便即使是实现农民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权不得不再一次地而且愈发地依赖帝国主义者,它们的势力刚刚被革命摧毁掉。这自然意味着革命的一种倒退——一种倒退,正因为它不能前进。

53. 因此,在现时代,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在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后止步不前。它必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间断地(不断地)前进,去建立一个工人政权。

54.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是**不断的**;而且这是落后国家革命不断的**第一个意义**。

(参见注 III. 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

55. 落后国家的革命是不断的这个事实,还有**第二个意义**。这是继工人政权的建立之后发生的。

56. 显然,工人政权不能也不愿没有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告停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求将向革命的工农政府提出,并必须满足。换句话说,由于工人国家的建立本身,落后国家的革命不能中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它**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57. 这就是落后国家革命不断的**第二个意义**,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间断地(不断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换一种说法,就是:落后国家的革命是一个;虽然它有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阶段。两个阶段的**统一**也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领导革命的结果。)

58.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注意阶级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是在落后国家中**完成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过程本

身中发生的。这个变化是和农民有关的。

59. 我们在前面(第 37 段)已经注意到,封建农民,作为农民,其社会目的是使自己摆脱封建桎梏,并把农民的租地变为绝对的私有财产。封建农民的志向是变成一个农业资产阶级。

60. 但是封建农民一旦变成一个农业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就变得和工人国家直接冲突起来。就富裕农民——即那些主要靠雇工耕种他们所有土地的人们——而言,尤其是如此。决非工人国家的支持者的富农,有变为工人国家的敌人的趋向。

61. 贫农——即尽管在地方上伴随革命而进行过土地分配,那些仍然拥有不敷需要的土地的农民——的情况则不然。就他们的情况而言,争取土地的斗争在继续进行。这个斗争现在对准的是富农。贫农因此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中,即在革命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时,继续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得到农民支持的工人政权因此现在变为得到贫农支持的工人政权。

62. 中农是那些拥有足够的土地的农民,他们间或在季节性雇工的帮助下,靠自己的家庭劳动耕种这些土地。他们在支持还是反对工人政权的问题上,动摇不定。工人国家的任务是中立他们。

VIII. 不断革命的国际方面

63. 我们现在来看落后国家革命不断的第三个意义。这个意义不是民族的,而是国际的;而且不难理解的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不断革命适用于一切国家,既适用于落后的国家,也适用于先进的国家。

64. 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断的这个事实的国际意义,源于国际革命的活生生的统一,或者换一种说法,源于无产阶级社会主

义革命的国际即世界性质。

65. 如我们已知道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它具有一个真正统一的世界经济和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政治体系。因此，不难理解，任何成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亦即无产阶级国家在任何国家的建立，都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剧烈的缺口**。

66. 资本主义必须堵塞这个缺口，否则它必将扩大。

67. **扩大缺口的需要**，亦即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其他各国（亦即**国际地**）的需要，是由革命已经成功的那个国家的形势产生的。

68. 我们已经知道，每一民族经济都依赖世界经济，而且同其他的民族经济是互为依存的。割断一个民族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就能给该民族经济以致命的打击。

革命的国家因此**必须**不断努力使它的经济同世界经济重新联系起来。

69. 但是控制世界经济其他部分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将竭其全力，阻止这种联系。它们确实会更进一步力求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吞并**这个新建立的工人国家。

70. 在这种形势下，工人国家的唯一可靠保障是把革命向**国际上扩展**，直到这些新国家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分裂出来并被引入革命的势力范围，直到民族革命本身变得巩固起来。

71. 如此，当代的每一民族革命都**必须**而且**趋向于不间断地（不断地）**转变为国际即世界革命。

不断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实际的和活生生的过程。

注 1.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任务

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真正的世界经济,与此相关的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两个主要矛盾:

它们是:(i)政治矛盾;(ii)经济矛盾。

政治矛盾在于这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不相适应。

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形式是民族国家;而适合于世界的政治形式则是世界国家。民族国家是与世界经济矛盾的。而且,每个民族国家都是和其他民族国家矛盾的。

资本主义自然尽其反动的力量,去克服这个矛盾。这种奋力采取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的方法。帝国主义,从这种观点来看,不过是一种把尽可能多的世界经济(如果可能,则把全部世界经济)置于一个民族国家统治之下的努力。每一个帝国主义,自然,是和其他一切帝国主义矛盾的。

这个矛盾的进步的解决办法,要求的不是由一个民族征服所有其他民族,而是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世界国家。这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政治任务。

社会主义世界国家还将消除基于如下事实的经济矛盾,即构成世界经济的有机部分的不同民族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互相竞争的。各帝国主义经济自然也是这样。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任务是以国际合作代替这种国际竞争,以便把国际分工导向它的逻辑结局,从而使世界经济得到和谐的发展。

因此,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世界社会,它以和谐发展的世界经济为基础,由一个世界国家加以管理。

注 II.

农民和政权

农民虽然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却从未能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特有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分散的、个体的，不能以任何经久的方式联合起来。

在当前的时代还有一个原因，可陈述如下：封建农民如果实现了他们把封建占有地变为私有财产的目标，就变成资本家，而且因此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类型的资本家。他们建立起来用以创造、保护和发展这种财产关系的国家因之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资本的领域内，大资本统治小资本，城市资本统治农村资本。因此，纵使一个“农民国家”被建立起来，它不久也就处于城市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不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

注 III.

斯大林主义者的錯誤

斯大林主义者不承认落后国家的革命的**合并性质**。他们不仅按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而且从**時間上**继续把这两种革命隔裂开来。他们基本上按照这样的方针行动：“首先，同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反对帝国主义者；然后，同农民一道反对资产阶级。”

这个方针也把当前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因而使它们注定遭到失败（理由已如上述）。这个方针的目标，是要在**资本主义结构内**建立一个政府，并预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互着资产阶级国家统治下的整整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观点的错误何在。

基于这个错误的另一个错误是斯大林主义者的人民阵线政策。

这个政策以阶级合作（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为基础，而抛弃阶级斗争。它以和所谓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为名的，而以放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目标为代价。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本国资产阶级政权。在先进国家中，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大资产阶级政权有别的“小资产阶级政权”。在两种情况下，它所要达到的都是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纵使实现了，也不能导致一种稳定的局势，或一个稳定的政权。就殖民地的情况而论，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被废除并代之以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资产阶级政权再一次向帝国主义屈服。“小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也一样，不是无产阶级接掌政权，就是大资产阶级复辟。政权的中间稳定状态是不可能的。在每一国家中，在每一领域内，革命都是不断的。

注 IV.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或和平共处理论

本文的 65—72 段*说明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特别是，它说明这种理论的这样一个主张的错误，即工人国家通过正确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可以“中立”国际资产阶级。

这个理论包含两个互为依存的命题。首先，它宣称，如果从国际帝国主义包围下能够争取到必需的时间，社会主义是能够在—个国家建立的。其次，关于第一个命题的条件，它宣称，工人国家采取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来中立国际资产阶级的政

* 原文如此。正文至 71 段而止。——译者

策,就能赢得必需的时间。

就可看出,这个理论的第一个命题还含蕴着社会主义的一个定义,即:社会主义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一个民族社会或体系。显然,否则你就根本不能谈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就马克思主义而论,这个定义实际上是一个重新的定义;因为,照我们在注I中所说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概念是一个国际社会;一个以彻底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公式,因此在说法上是矛盾的。

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是历史的和具体的。它是一个十分科学的概念,以阶级斗争的规律适用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并不把社会主义看做某种理想的、乌托邦的图景,而把它看做资本主义以后社会发展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的、现在成为桎梏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是世界规模的,不仅是民族规模的)的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建筑在资本主义所已取得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的成就之上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背对这些成就并企图开历史倒车的社会。

提议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也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激烈攻击,而且确实是对的否认。它用以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的,是一个新的、伪科学的、乌托邦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提出的是一个闭关自守、按其内部规律成长、纯靠其统治者手腕的主观因素而同世界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隔绝的民族社会。

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反动的。它只能引导人们努力使资本主义回到自身世界发展的道路上来,更不用说否定社会主义本身的世界基础和性质了。

工人国家的真正任务自然是和这个错误理论所说的不同。这个任务是在每一国家中，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创造先决条件，并建立和加强基础。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今天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提出的，这种形式表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如下主张：世界的“社会主义”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没有理由不应和平共处。这个理论的这种形式和这个理论的先前形式一样地错误，虽然新公式的意图是要掩饰一种新的现实。

新现实是在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工人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全都是被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政党所统治的，构成了一个国家体系。这个“社会主义”势力范围把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市场分裂为二。现在在世界上不是有一个单独的经济体系或区域，而是有两个体系或区域，每个在性质上都与另一个不同，每个实质上同另一个的市场割断联系。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区域的广袤和人口，由于它从资本主义夺走的资源和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在它的世界性质方面已经遭到严重的和危险的限制，即使不是这种性质的完全消灭的话。资本主义不能在这个正在窒息着它的有限的基础上长远发挥作用。资本主义因此必须立即（不仅是迫切地）重建它的世界经济和体系；否则崩溃。

凡是稍谙阶级斗争的规律或者注意吸取历史教训的人，甚至都不会梦想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真正投降，都不会梦想资本主义将不战而降。现代政治，特别是美国政治，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不仅不束手待毙，或听任事态自然发展，或仅试图保持现状；相反，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更加努力去吞并“社会主义”势力范围，并把这些国家及其市场拉回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区域实际上也必须这样行动。它也生命攸关地需要扩展,使革命进一步成功地越出它的范围。

这种扩展的需要不仅是或主要不是出自军事的需要。经济的需要也是强有力的;因为,恰好,“社会主义”区域的扩张本身,尤其是它的资源的扩充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决不是促进它的经济同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的隔绝,而实际上是迫使它和更广阔的世界场所接近。社会主义体系也不可抗拒地需要成为一个世界体系;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定义如此,而且也因为它的性质本身。两种体系因此互相扼杀;的确,它们正在互相扼杀。其中之一必定胜利,二者不能共存。世界革命继续是一个统一体,它不能并且也不突然中止于仅仅取得世界一个部分的胜利。

社会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可以并存和并肩发展的理论因此是错误的。它也是反动的,因为它在立论教世时,仍然凭借的是那个关于闭关自守的、与世界其他部分隔绝的经济的概念。它否认国际范围内和民族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注意:和平共处还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要革命。)它把民族领域里的人民阵线的阶级合作主义带到国际领域里面来。它是为了苏联官僚主义统治者、他们的同盟以及卫星国的利益,遏止世界革命过程的挣扎。某些人轻率地认为它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放弃,它并非如此。相反,它是这个理论在一种新的伪装下的继续。斯大林主义既未改变它的性质,也未改变它的理论。

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分歧

——莱斯里·古纳瓦达尼

I 从属于苏联的外交政策

1. 我們在錫兰的經驗

自从一部分人脱离锡兰平等社会党参加斯大林主义阵线之后，许多人对于锡兰平等社会党和锡兰共产党在政治上究竟有何差别的问题，不禁产生了新的兴趣。这里的这几篇文章，目的在于试图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明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主要分歧，我们希望这些文章将能够帮助澄清这一问题。

首先，最重要的分歧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是以群众斗争的需要为主要依据来决定的，可是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却是完全决定于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决定于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临时的——并且是随时改变的——需要。换句话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任何阶段都尽量采取一种能够推进运动的发展，以使其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的政策，而斯大林主义分子在每一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却只是为了协助苏联政府执行它的外交政策，至于这种行动对于群众运动将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们全然置之不顾。

这一论断的真实性，是过去二十五年左右世界各地共产党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的。可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最好拿我们

在锡兰所取得的经验作为一个开端，因为在这里我们所要谈的事例是大多数人都完全知道的。

锡兰共产党的历史是并不很长的，1940年初一部分斯大林主义分子被从锡兰平等社会党清除出来，它才开始形成。可是就是它的这一段不太长的历史也完全足以说明，从它所发挥的功能来讲，它并不是帮助人民群众完成自己的解放斗争的一种工具，而是帮助苏联政府和帝国主义取得协议的一种工具。

从1940到1941年，锡兰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和锡兰平等社会党一起一直就反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并把它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个时候苏联正和希特勒的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种政策当然是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需要完全一致的。

可是在1941年年中，在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之后，他们的政策就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不仅是苏联对德国的战争，而且整个的大战都变成了民主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民的战争”。甚至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这时日本还没有对苏联作战）之间因殖民地问题引起的战争，也变成了我们应该支持的“进步的战争”。他们对工人的要求，不是要他们举行罢工，而是要他们更积极地工作。被关入监牢或者被迫进行地下活动的锡兰平等社会党人现在被称作是国家的叛徒和日本的奸细。这种政策当然决不能有利于群众斗争，而只能是有利于苏联的外交政策。

战争在1945年结束了，可是苏联政府和它的西方的帝国主义盟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却并没有完结。它们进行合作的“蜜月期间”的感情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去。因此当一个新的政党，统一国民党在锡兰出现的时候，锡兰共产党就完全不能从锡兰人民群众的观点，从维护锡兰人民利益的观点来看待这个政党。

它必须通过克里姆林宫的玫瑰色的眼睛来观察这个政治组织。因为，斯大林不是和统一国民党的领导人们，那些英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维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吗？因为这个缘故，当锡兰平等社会党能够辨明统一国民党的性质，认为它实际是锡兰资产阶级的政党，并从一开始就警告人民群众，要他们认清它的本质的时候，锡兰共产党竟不得不公开宣称，统一国民党并不真正是一个什么政党，而不过只是一个“阵线”，并且现在在这个阵线中还可以找到许多进步分子。1947年2月锡兰共产党在它的代表会议上竟然进一步采取决定，要在即将举行的普选中，支持统一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以反对锡兰平等社会党的候选人！

当然，由于群众强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国民党，锡兰共产党并没有能够顺利地执行它的这种政策，比方说，他们不得不撤消了对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候选人的支持，而这个候选人，完全是用来反对统一国民党的佩雷拉同志的（这个共产党的候选人是以“独立”的身分参加竞选的）。但问题是，在对待统一国民党的关系上的这种妥协政策的最根本的基础，却并不是锡兰的政治局势的需要，而是莫斯科外交政策的需要。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1948—1950年间锡兰共产党的策略。1947年的大罢工，不同于1946年，最后以失败告终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遭到牺牲，工会运动进入了可怕的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进行的工作很明显是耐心地、艰苦地重新建立已经涣散的工人组织，以便迎接新的斗争高潮。锡兰平等社会党正是这样作的。而锡兰的共产党却并非如此。对于那些共产党人来说，决定的因素，是苏联的外交政策随时改变的需要，而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

1948年以苏联政府为一方，以西方帝国主义为另一方的合作，终于结束了。现在，冲突变成了主要的东西。于是，锡兰共产

党的政策也照常进行了改变。政策的主要目的现在变作是尽一切可能给帝国主义和它们的代言人制造麻烦，形成一种压力，以使帝国主义分子能够和斯大林达成合理的谅解。从1948年到1950年，锡兰共产党完全不考虑锡兰国内的实际情况，大力宣扬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并企图鼓动工人进行自杀性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结果只可能是完全消灭他们仅剩的一点力量。很幸运，当时并没有人理会他们。

在这里，我们请大家注意，在我们中间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的斯大林主义辩护者所提出的一个新的论点，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们说，事实的确是那样，可是所有这些都过去了。将来的情况肯定会完全不同。苏联和帝国主义者之间达成谅解是决不可能的事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又把锡兰共产党推上了斗争的道路。

不幸的是，这个论点包含着许多的空想，而并没有多少必然的逻辑。在这两个大的军事集团之间，不可能有长时间的妥协，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战争随时在威胁着整个世界，可是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要求在印度、缅甸和锡兰这样一些国家中能有中立的政府。因此，一个中立的资本主义的政权越来越变成了锡兰共产党的目标。而另一方面锡兰平等社会党的目标却是要以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来代替统一国民党的资本主义的政权。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第一个分歧，从这里可以看出，实际是一个最主要的分歧。这一情况的真实性，从我们自己在锡兰的经验中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就是为什么锡兰平等社会党中的每一个健康的成员都拒绝走上和斯大林主义阵线进行联合的道路，拒绝接受“苏联的领导”，使我们

的斗争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

2. 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

我们在前一节中已经说明锡兰共产党的作用，并不是作为帮助人民群众争取自己的解放的工具，而是作为帮助执行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这实际是许多共产党的一般特点，它已经使得工人运动多次遭到出卖和失败。在这样一篇很短的文章中，要作更详细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简单地讲一讲，由于追随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些主要的政策上的“变化”。

1933年，希特勒取得了德国的政权，并马上就变成了苏联的主要威胁。因而，苏联外交政策的中心要求是尽快和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取得“和平协议”，以对抗希特勒。然而，不幸的是，这时世界各共产党不是被用来领导它们本国的人民群众取得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而是被当作一个工具以保证那种协议的实现。

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所有的共产党都开始向右转了。争取和苏联达成“和平协议”的斗争变成了所有这些党的根本路线。而且为了争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这种协议的支持，它们全都放弃了阶级斗争，而采取了“人民阵线”的阶级合作主义的路线。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也被放弃，而代之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以便反对法西斯主义危害的政策。

这一政策使得群众运动遭受了多次的挫折，而以西班牙的情况尤为严重。在这里，由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反对人民阵线政权的法西斯主义的颠复活动，在1936年遭受到的打击，并非来自政府的力量（当时的政府是站在法西斯主义一边的），而是来自人民群

众，工人组织了自己的民兵，接收了许多工厂，甚至夺取了政府的权力，而且西班牙的农人也把土地完全占领过来。这一反法西斯的斗争已经显然发展成一次社会革命。反法西斯的斗争，只有在它变成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的时候，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可是这种情况和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计划是不相适应的，他们感到他们的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会由于在西班牙出现社会革命而遭到危害。一心要“争取”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而把他们在西班牙进行的斗争完全限制于保存资产阶级民主。拿苏联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恫吓的武器，他们和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们一起，解除了工人的武装，把农人已经夺得的土地归还给地主，监禁和枪杀反对这种政策的革命的工人，完全充当了绞杀西班牙革命的刽子手。这种反佛朗哥的斗争，从一开始就纯粹是以恢复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军事斗争，其结果是肯定会遭到失败的。1938年，这一斗争已经完全结束，而英勇的西班牙人民却直到今天仍然挣扎于佛朗哥的铁蹄之下。

1939年8月，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外交政策发生了改变。因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也立即经历了和它适应的重大的转变。“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曾经在人民中作了四年准备工作的反希特勒战争现在开始了，而苏联却并非站在“热爱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一边，因此这个战争变成了必须加以反对的帝国主义战争。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掉转头来进攻苏联，而苏联发现自己正和英法处于同样地位的时候，那些一向是苏联外交政策驯服工具的共产党，在一夜之间也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政策，立即把那次大战看作是“人民的战争”，而加以支持。在那些“民主主义的”国家中，阶级斗争被放弃了，其他的一切斗争（包括1942年8月印度争

取独立的伟大斗争)也都受到了挫折,1943年由列宁建立起来以便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也自动解散,作为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衷心信赖的一种表示。

在这次战争之后,苏联政府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合作一直延续了好几年。因而各共产党所采取的阶级合作政策也随着继续下去。这些政党向帝国主义分子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防止战后欧洲革命浪潮的兴起,并以稳定已经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在法国,共产党人甚至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职务,而这一政府那时正在对越南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同时还投票赞成发行战时公债。

1948年,苏联外交政策从和西方帝国主义进行合作变为和它们进行日益加剧的斗争。于是那些共产党的政策又随着改变了。在两年的时间中,它们一直采取进行罢工和怠工的冒险主义政策,希望借此恫吓帝国主义分子,以使他们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甚至在这时候,问题也不是如何发展群众运动以便达到胜利地夺取政权的目的,而只是继续采取着一种施加政治压力的政策。

这个路线曾经几经改变,而最后却确定下来,专门以发动广泛的争取和平的运动为务,目的是要使得某些资产阶级集团不再和美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共产党所关心的不是发展群众运动,以求最后胜利地夺取政权。(在南斯拉夫和中国这两个人所共知的例外的国家中,共产党所以能把群众领向胜利,完全只是因为它们没有理会克里姆林宫对它们所作的指示。)

在法国,共产党所掌握的群众的确包括了大多数的法国工人。大规模的总罢工运动不时发生,可是政治情况却始终停滞不变。在意大利,百分之四十的人民都积极支持共产党,可是争夺政权却并不是该党的目标。在大约三年以前,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陶

里亚蒂竟公开对资本主义的总理加斯贝利说，如果意大利政府愿意退出大西洋公约，那他的党马上就会支持政府！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这种使群众运动从属于苏联外交政策需要的政策，削弱了这一运动，使它在许多国家中遭受到残酷的失败，帮助帝国主义取得本身的稳定，并推迟了世界资本主义最后总崩溃的期限。因此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政策也并不符合苏联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为说到最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如何，是完全关系到它自己的命运的。

II 它們为什么会进行錯誤的领导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第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把群众斗争的需要从属于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其次，这种政策给群众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种情况的主要责任当然应该归之于苏联的领导人们，他们在 1943 年以前通过共产国际，后来又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提供了这种罪恶的领导方针。

在这里，我们来回答一下在许多诚实的个人的头脑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想来是很有好处的。如果苏联是一个工人阶级已经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已经被消灭的国家，那么他们要问，这个国家的领导怎么可能会向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提供错误的领导方针呢？

我们只要想一想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苏联革命的日子过去以后，苏联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变迁，想一想在这期间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堕落倾向已经发展起来，同时想一想今天的苏联的领导人和 1917 年革命期间的领导，在性质上和目标上是如何完全不同，那么这种思想上的混乱是很容易得到澄清的。

俄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那些年月，对俄国人民群众来说，真

是充满了苦难的年月。那些年又是内战，又是帝国主义的干涉，国内饥荒，国外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抵制。而且更重要的是，革命想要向俄国国境以外发展，以求在那里找到一个立足点，结果也遭到了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低落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只要我们想一想，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没有文化的农民，那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个官僚机构怎么会慢慢夺得领导权，占据了原来由人民群众占据的位置。

这种官僚主义的堕落倾向已经渗透了整个的共产党、各工会组织以及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门。其结果是一切民主精神完全破坏无遗，而使一个包含着许多极端罪恶的特性的极权政府得以建立起来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革命后的俄国正经历着一种特殊的双重性的发展。一方面，通过企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而达到的消灭资本主义的结果给苏联经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官僚机构的得势却在政治领域中带来了骇人听闻的堕落倾向。

这个官僚机构很久以来一直都忘了，他们统治着的这个国家乃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创建起来的。由于对本国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同时对其他地方的群众的力量更加轻视，这个官僚机构几乎是具有保守的天性，它唯一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持现状以求保住自己的地位和种种特权。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随时准备冷酷无情地牺牲全世界工人的利益。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的领导人向世界工人提出的领导方针，目标不是为了实现世界工人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符合苏联政府现行外交政策的利益。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澄清一下。即使我们承认苏联本国的落后情况以及它长时期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的

孤立状态使得苏联的领导人日趋堕落，采取了狭窄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可是我们仍然不得不问，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又为什么会接受苏联领导人的这种叛卖性的领导呢？我们承认在这些共产党内确实可以找到许多动机非常纯正的忠诚的男女志士。可是这些人又究竟为什么会同意这样的一些把苏联外交政策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他们本国革命斗争的利益放在从属地位，甚至常常是完全置之不顾的政策呢？

我们光是说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经济援助，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真正的最根本的理由是，这些人并不是对群众的力量怀有信心、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就可以取得胜利的**革命者**。虽然对于共产党内的一般工人群众来说，特别是对那些真正群众性的共产党内的一般群众来说，情况也许并不是这样，可是对所有共产党内的自觉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特别是那些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来说，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正像苏联的官僚机构把他们的信任不放在群众身上，而放在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周旋的能力等方面，他们的国外的追随者，在精神上也和他们的祖师完全一样，不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本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上，而是寄托在苏联（现在还有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这就是为什么，在斯大林主义分子看来，为了使苏联政府在执行它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能够取得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暂时的利益，而不惜把本国人民斗争的利益置于从属的地位，或甚至有意识地使它遭到危害，这并不是是一种背叛行为，而反倒是真正把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斯大林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本国的群众运动并不看作是有一天能够给人民带来解放的主要工具，而把它看作是另一个主要工具的附属品，这个主

要工具，在他们看来，就是从国外派来的红军。

在近代史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客观情况的需要战胜了对斯大林的服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在群众的压力下拒绝服从斯大林的指示，终于取得政权，消灭了资本主义。同克里姆林宫的决裂就是这种“独立自主”的结果。其次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初奉行斯大林的政策使自己从属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而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惨痛经历之后，终于不顾斯大林的指责，走上了进行反蒋的全面斗争的道路——直到获得胜利。斯大林当时没有敢再次重复他对待南斯拉夫的政策。在这两个国家的例子中，在实践方面和斯大林主义的决裂，非常不幸，并没有带来和斯大林主义的那种不要革命的观念的真正的决裂。不论是南斯拉夫或者中国，如果它们原来是先进的国家，国内有一个在文化上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那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说，整个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然而，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来看，最重要的一点是，胜利的取得是和同莫斯科的不革命的路线和决裂分不开的。因此，它们也就帮助更进一步地说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现在仍然是把它们希望寄托在国外的“救星”上，而不是寄托在对本国人民群众的信赖上。不管是谁，我们首先要看他是否信赖人民群众和他们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革命力量。归根结底，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的区别所在。

III 民主和专政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个分歧是他们对不同形式的政体的主张。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张一种民主的政体，而斯大林主义者则赞成独裁者专政。

我们完全知道，斯大林主义者对于这种指责一定会愤怒地加以否认。可是只要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继续不加批判地维护苏联现存的政治制度，那种反民主的极权政治，那么他们的这种否认根本就不能成立。事实上，这些斯大林主义者，由于锡兰平等社会党不肯放弃批判苏联政治制度中各种反民主性质的权力，因而就拒绝和锡兰平等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我们很难相信这些对国外的极权主义的政权热烈拥护的人们，在国内宣扬民主会带有任何诚意。

不难证明，在苏联现存的政治制度中，根本连丝毫民主的影子都没有。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在苏联的选举中，对每一个选区来说，都只容许选举**唯一的一个候选人**。谁也不容许提出自己来和官方提出的候选人竞选。换句话说，苏联的选举完全不是民主选举，而不过只是一个巨大的骗局，选举人只是去投票赞成早已被选定的一个代表。令人痛心的是，在过去也有一个国家曾经实行过这种一个选区一个候选人的滑稽可笑的制度，那就是——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

空口说选举人可以不选官方提出的候选人——他并且也可以投票反对他，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那样作的结果，只不过是使他的一张选票作废罢了。民主选举的基础是容许选民可以在敌对的政策和敌对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而在这里却根本没有选择可言。更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一个普通人公开表明对政府的反对，不怕承担一切后果，那是根本不能想像的事！

这同时使我们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选举显然是在一种强迫的空气中进行的。投票人数极高的百分比（有时高达99%）被斯大林主义者用来证明在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得到人民的拥护。这个党的确得到人民极大的拥护，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可是不管这种拥护达到多高的程度，即使在一个工人国家中，我们

也不能想像，一般的普通人会如此热情以至投票人数高达99%，特别是他们知道那个候选人不管怎样也反正是会当选的。从这里我们必然只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投票人数的百分比所以这样高，只不过是出于他们害怕触怒政府当局。上面所讲的苏联这种选举制度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说明这种选举是如何远远脱离了民主的原则和实践。而这里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国家中，如果除了当权的党以外，其他的一切政党都完全被禁止，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政体。在苏联存在的这种一党制乃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条主要的原则。托洛茨基主义者却认为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否定，他们主张其他一些苏联的政党都应该有权自由进行活动，可以自己进行宣传，可以参加竞选，而且如果它们能够使大多数的选民相信它们的政策的正确性，也可以管理政府。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这种除了当权的党，对其他一切政党都加以取缔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包含着巨大危险的制度。当权的党，即使是一个模范的革命的政党，如果不经常受到公众批评的监督就必然会有非常巨大的堕落的危险，仅这一点就是不容忽视的。真正的公众的批评，只有在敌对的政党有自由对当权的党进行攻击并提出不同的政策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苏联的例子正可以说是一党政治的危害性的活生生的明证。

为了维护这种一党政治的正确性，斯大林主义者常常提出论证说，既然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当然也就只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利益总的来说是一致的。可是也很可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只有某一个党能够正确反映这种利益。谁来决定那是哪一个党呢？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必须由工人自己来决定。然而在斯大林主义的安排之下，由于其他的一切党已全被取缔，那就是等于已经替他们把这个问题决定了。

资本主义的消灭并不表明，在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最好的方式上，所有的人意见都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存在分歧，而且是巨大的分歧。在一个党内不可能解决的分歧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建立单独的政党。否定人民的这种权利，就是否定他们在不同的政策中进行选择的权利，那也就是否定民主。

在这里我们要请大家注意和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传统有密切关系的两个问题，我们认为这决不是节外生枝。第一个问题是，东欧国家完全被剥夺了独立自主权。苏联政府同这些国家逐步发展自由的平等的关系，却日益加强对它们的控制。和南斯拉夫的决裂正就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彼此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工人国家之间才能够建立正常的关系。

其次，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的传统也完全浸透了共产党的组织。现在的共产党远远不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在这里不同的观点不是可以自由提出、自由宣扬，而是党内的任何反对派一般都很快受到惩罚。任何人如果敢于对莫斯科外交政策所决定的路线表示异议，马上就会被清除出去。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却是完全不同的。在党内任何分歧的意见都有提出和宣扬的机会，最后总是由党员大会在充分讨论之后民主决定的。比方说，锡兰平等社会党党内倾向于斯大林主义的集团，在它分裂出去以前，在党内完全有充分的机会宣扬它的观点。这是只有在一个民主的政党中才有可能的。

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的实践，是对社会主义高尚理想的叛卖。他们相信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不仅在经济方面，而要在各个方面都将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揭露资产阶级民主，认为那是一种假民主，而他们所以这样作，只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用一种真正的，更充分的民主来代替这种假民主。他们称这个民主为工人的（或社会主义的）民主。

IV 保卫苏联

我们在前面的一节中已经清楚地说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强烈地反对目前苏联的这种极权主义的政治体系，他们认为应该用一种他们称之为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政治体系来代替这种极权主义政治。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主义者充分地赞成苏联现存的经济制度，那就是工商企业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换句话说，他们在对苏联的经济制度表示赞同的同时，却反对它的政治制度。而因为经济比政治更带有根本性，所以他们仍然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尽管在那里出现了政治上的堕落倾向。由于这种原因，他们仍主张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而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敌人。

这种一方面支持苏联，一方面又反对它的政治制度的态度有些人未免感到迷惑不解。这种迷惑主要是由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们造成的，这些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声称，任何人如果支持苏联，他也就必须支持苏联的政治制度。可是这种推论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它把苏联这个国家和它的政府等同起来，并且假定一个工人国家只可能有一种政治制度，那就是苏联现行的制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只要大致看一看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就可以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同样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却十分可能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比方说，我们看到德国实行过一般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制度，而在英国却又有一般称之为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两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我们也不难想像，不同的工人国家，也可能有不同的政治体系。目前在苏联这个工人国

家实行的政治制度乃是一种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治。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必须用他们称之为工人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系来代替这种独裁政治。

不管怎样，在苏联推翻这种独裁政治的任务必须由苏联的工人们自己去完成。这个任务决不能交托给资本主义分子或帝国主义分子。不管这些人如何成天叫嚷着民主，他们进行反苏斗争的唯一目的是要消灭国有化和计划化的经济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能和资本主义分子站在一起，来反对苏联的官僚机构。相反地，为了保存苏联的进步的经济体系，他们倒准备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分子们站在一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这种一方面保卫苏联，一方面又反对它的政治制度的立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十分明确、十分清楚的。人们的迷惑只是由斯大林主义分子造成的，那些斯大林主义分子希望把苏联和它的领导集团等同起来。他们把对这个领导集团的任何攻击都说成是对苏联本身的攻击，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压制对这个集团的任何批评。这当然不是什么使人惊奇的事。因为也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才能真正保卫住自己的地位。要按照这个集团所作的一切来看，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办法来为自己辩护。

不管怎样，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会在别人的恫吓之下，来美化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或者支持一个罪恶的领导集团。他们坚持执行一方面保卫苏联，一方面反对它的政治制度和领导集团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政策的指导之下，托洛茨基主义者决非像斯大林分子们所说的出卖了苏联。他们也决非像资本主义分子们所急于想表明的，出卖了民主。相反的，他们所采取的正是可以同

时保卫二者的唯一的道路。

V 真理和假真理

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不同点，关系到用假真理当作一个武器的问题。托洛茨基主义者即使在看到事态对他们不利(当然是暂时的)的时候，也仍然坚持真理，而斯大林主义者却与此相反，只要假真理能够有助于维护他们的狭隘的党的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求助于这种假真理。不仅如此，他们简直是一贯地使用假真理作为他们的斗争的一个武器。

对于一般从来没有研究过斯大林主义的方法的人们来说，这话也许看来未免过于笼统一些。但是，真实的情况的确不多不少正是如此，这一点我们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问题上都很容易找到无数的例证来加以说明。

作为我们的第一点说明，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种斯大林主义的可鄙的假真理的传统的根源，那就是苏联所实行的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政治制度中，我们看到使用最高形式的假真理的方法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自 1936 年以后在苏联进行的清党工作和随着清党工作而来的审讯活动是所有的人都很熟悉的。这种审讯，再加上由审讯而产生的荒唐的招供，本身就构成对斯大林主义的统治者们所采取的消除政敌的方法的严厉的谴责。

在今天，每一个有自己的思想的人都会毫不怀疑地相信，那些审讯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审讯，而只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进行的遮人眼目的活动，在那些审讯中，一切罪证都是毫无争辩余地的，被告不过像木偶一样表演着被派给他的角色；那些所谓的供词也完全不是真正的供词，而只是从不幸的被告的嘴中硬逼出来的虚假

的供词。这些情况，托洛茨基主义者当然一直是非常清楚的。由于错误地相信杀死斯大林也许会改善苏联的情况（而对这些如此富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甚至这一点他们也是很难相信的），他们也许会相信一个季诺维也夫或者一个加米涅夫曾企图刺杀斯大林。但是决没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相信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一些大半辈子为了推翻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人，会在他们脱离斗争几年之后，跟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要在苏联重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这却是在莫斯科的审讯中所得到的“供词”。

这种“供词”的虚假性，在今天，不仅只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是大多数的人都完全清楚的事实。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府公开承认了十五个医生的供词全部都是虚假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取得的，这种承认已经彻底地粉碎了整个斯大林主义的假审讯和假供词的法律程序。这等于是暗暗承认过去在苏联所获得的全部“供词”以及后来在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审讯”，全都不过是一些可咒诅的谎言和骗局。

这种把一切政治上的反对者都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的可恨的作法，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一直都在那里一成不变地搬用。在锡兰也是如此，共产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全被清除出党，但理由并不是他们的政治上的真实的分歧意见，而是一种荒唐的指责，说他们是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好细。很显然，这样作的目的是要使那些持有分歧意见的人失去威信，并借以削弱他们的政治见解可能发生的力量。

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时候也必须把某些人从他们的党内清除出去。可是他们决不对他们进行虚假的诽谤，而是公正地说明所以开除他们的真实的政治原因。他们相信和正义站在一起的人根本

不需要害怕充分和自由地说明这里所牵涉到的政治问题的真相。

而且，斯大林主义者还不仅是在组织工作上使用这种假真理的武器。在政治问题上，我们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他们也同样使用这种武器。比如说，斯大林主义者对上一次的帝国主义战争后来所以改变立场，对它加以支持的真正原因，实际是在1941年年中，苏联看到自己已经和同盟国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处在同一个军事集团中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是十分诚实地（虽然在我们看来是十分错误地）考虑到，为了苏联的间接的军事利益，完全有必要牺牲参加同盟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群众斗争。可是他们又不肯坦白地、诚实地把这种情况向人民群众说明，而仍然采取欺骗的办法，对他们说帝国主义战争的目标已经改变了，整个战争已经变成了人民的战争。

接着在1934年斯大林解散了第三（共产主义）国际，他这样作很明显是为了讨好他的帝国主义同盟者，丘吉尔和罗斯福。可是他对他的追随者所提出的理由却完全是虚假可笑的，他说现在各国的共产党已经都具有必要的经验，可以不必依赖一个中心的领导，单独进行活动了。

苏联的领导人们的这种对待真理的苟且的态度得到他们的国外的追随者的效法，是完全不足为怪的。这就是锡兰的斯大林主义的报纸所发表的一些时事论文所以常常表现对真理毫不关心的真正的原因。

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此完全不同，他们始终依靠真理的武器来推进他们的运动。假真理是他们极端厌恶的一种手段。这当然不是说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不肯用欺骗的办法去对待敌人。比方说，本文的作者，如果他不是对政府当局隐瞒着自己的真实姓名，那他就不可能在战争期间五年半的时间内始终躲过了帝国主义的

警察们的眼目！可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决不对人民群众撒谎，或者欺骗他们。忠实于列宁的教导，他们对人民群众讲的都是真理，即使真理并不总是那样合自己的胃口，有时甚至会带来暂时的挫折。因为，他们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的最好的方法，这个群众运动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强大得足以把政权接收过来并管理那个政权！

至于虚假和欺骗——托洛茨基主义者愿意把他们留给资本主义分子们去使用吧。他们需要这些东西：资本主义分子所维护的那种制度，就是让极少数的人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以只能依靠把真理隐藏起来的办法来保卫这种制度。相反的，对于力求推翻那种制度的工人们来说，在他们的武库中，最大的武器就是真理。让那些自称工人领导的人们不要损害了这个武器的锋利。

VI 斯大林主义的危机

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经济的苏联的建立，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巨大胜利。它本身的存在就表明世界资本主义遭到削弱，因而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的一个巨大财富。然而另一方面，它的趋于堕落的政治制度却使得许多人退避三舍，使他们脱离了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将来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个样子吗？”他们绝望地问道。斯大林分子所能作的当然也不过只是尽一切可能来美化这个政治制度，一般的办法就是把一切对它的指责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虚假的宣传。不用说，这一套表演是不能令人十分信服的。

相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坦白地承认这种政治上的堕落倾向，

但同时指出这不过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产生的暂时的现象。他们满怀信心地宣称，苏联的工人一定会有一天推翻他们的官僚主义的统治者，接收国家的领导权，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而使一切走上正常的道路。

许多年来，这种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的设想一般都只表现为一种假想的预言，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或者根本找不到可以令人信服的具体的根据。因而，一方面，资本主义分子可以兴高采烈地提出他们的阴森森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就是消灭一切社会和政治自由。另一方面，斯大林分子也可以拿在苏联看不到任何工人阶级反抗的迹象，来证明在那里没有任何事情会引起工人的反抗。

可是今天，情况已经改变了。因为，已经发生的许多重大的事件都表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政治革命的预言并不是空洞的梦想，而是有现实作为根据的可靠的预见。随着斯大林的忽然死去在苏联出现的许多改变就是表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正确的第一个显著的例证。

斯大林刚刚死去以后，苏联的新的统治者们简直是手忙脚乱地急忙向苏联的人民群众提出了一系列的让步和诺言。其中包括降低物价、大赦（政治犯不包括在内）、释放那十五个医生、答应改革刑法以及不鼓励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很明显，那些新的领导者，意识到那个高压手段的政权在群众中已经产生了极深的仇恨，同时由于害怕群众会利用斯大林的死所造成的新的情况采取某种行动，因而急于想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印象，让他们相信在斯大林时代之后，一个新的更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换句话说，这些让步和诺言表明了苏联人民的不可怀疑的力量已构成了对政府的一种压力。

这情况是如何会产生的呢？斯大林的死无疑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可是同样不容怀疑的是，这一发展的基础早就已经打下了。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文化水平比过去更高的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认识到并且完全信赖自己的力量，已经不再愿意像过去一样对官僚机构处处让步了。

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四面被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孤立的工人国家。这一事实也有助于情况的改变。在过去，官僚主义的统治者们可以拿苏联正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以及边界上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作为论据，日益强化压制人民的国家机器。可是今天，由于大批东欧国家的建立、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中群众运动的兴起，官僚机构也就没有办法再使用这种论据了。日益觉醒的苏联工人，已经开始看到他们的那个压制性的政权并不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国家的保卫者，而是反对工人的官僚机构的保卫者！

在日益增长的来自工人的压力之下，不进行一次巨大的斗争，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机构是否会被迫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呢？斯大林死后的种种让步是否表明事情真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呢？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不这样想。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大赦的范围不包括政治犯，而改革压制性的刑法的诺言也始终没有兑现。换句话说，那些让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变这个政权，而只是为了维持这个政权。此外，在东德发生的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也让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属于苏联集团的欧洲国家中消灭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治可能采取的形式。

1953年6月17日，在东德发生了反斯大林主义政府的、由一百五十万产业工人参加的总罢工，其声势是如此浩大，甚至东德的

武装警察也完全无力应付。最后调动了驻在东德的强大的苏联占领军才算把当时的局势控制住。这个壮大的工人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和口号清楚地表明，运动的矛头不仅指向官僚主义的东德政府，它同时也反对西德的资本主义政府。东德工人的运动，这种第一次公开反对官僚主义独裁政治的反抗活动已经为苏联的以及苏联控制的、在官僚机构统治之下的东欧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开辟了道路。

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经联系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情况谈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我们指出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在实践中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纲领的时候，革命才能向前发展。而且南斯拉夫，由于采取这种作法，最后和克里姆林宫公开决裂了。东德的事件以及斯大林死后俄国的改变更说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了苏联集团中的各个国家，包括苏联自己在内。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每一步发展都将更进一步加深这种危机，而使官僚主义独裁政治日益临近最后的毁灭。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立场是不容辩驳的。斯大林分子的立场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反对工人的官僚主义暴政的保卫者。资本主义分子预言说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其结果将是一种新的暴虐政治，这种预言现在已被证明完全是虚假的。不但这种事情决不可能发生，而且和那种胜利相配合的，将是苏联集团国家中的工人们在反对自己的官僚主义的暴君们方面所取得的胜利。

(1954年3月)

四、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綱領草案

——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政治局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而有必要让位给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证明，世界无产阶级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前后两次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事实无疑在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壁垒，对拥有巨大的生产力的人类来说，已经成为无法忍受的桎梏。

近十几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途。通过原子能和其他物质的利用，生产力有飞跃发展的可能。如果这一点能够为整个社会合理地运用，那么，它将给人类带来无限光明的未来……。老而不死、而且已腐朽透顶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和依大资本利益把人类加以隔离的民族国家的壁垒，不仅阻碍着人们利用这种伟大的可能性，相反，还把这些成就变为对人类的可怕的破坏手段。原子战争的恐怖笼罩着世界人民。

打倒资本主义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成为紧要的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危机在全世界引起了骚动。今天，革命风暴已名副其实地在席卷着全世界。昨天还处在未开发和野蛮状态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人民，已拿起武器，起来彻

* 日本最早的托派组织叫“日本托派联盟”，1957年12月改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革共同”）。目前该组织已四分五裂。

底消除帝国主义势力。

帝国主义——正在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时代，正是不断发生革命风暴的时代。今天已经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如今，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刻不容缓的实际行动。

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早就具备。目前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在于无产阶级的主观条件。就是说，阻碍革命的最大障碍在于无产阶级指导部、传统的工人运动指导部。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多年来不止一次地背叛了革命，使无产阶级遭到失败。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篡夺了伟大俄国革命所建立的苏联劳动人民国家的领导，扼杀了布尔什维克党，对苏联劳动者施行可怕的专制统治，把苏联变成革命者的监牢。今天，他们仍然采取“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和平共处”等官僚主义的外交政策，压制着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他们还以民族主义政策来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妨害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团结。因此，今天全世界无产阶级在进行世界革命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消灭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统治。特别是对苏联阵营的工人来说，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是燃眉之急。只有在苏联阵营内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才能使已经拥有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取得飞跃发展，才能保障这些国家的安全。

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始终包括以下三种互相联系的革命斗争，即：

- (一) 在帝国主义先进国家的革命；
- (二) 殖民地革命；
- (三) 苏联阵营的政治革命。

今天唯一能够统一地领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三种具有有机联系的革命斗争的政党，就是继承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来进行斗争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第四国际。

垂死的帝国主义被工人国家的发展和殖民地革命逼得走投无路。它的矛盾越是加深，就越发疯狂。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为了挽回其颓势，正在欧洲和亚洲进行殊死的斗争。

在远东唯一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斗争的重要一环，即与中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相对抗的、世界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最大的政治和经济据点。日本所处的这种重要地位，同时也赋予反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日本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过去不断地定期发动战争，借此扩张其狭小的地盘而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目前又在为深刻的内部矛盾所苦恼。而且它已经遇到了中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这样，在未来的阶段，将不可避免地促使日本革命斗争向前发展，同时将把日本无产阶级的重大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我们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未来的斗争中，将担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站在日本无产阶级的前列进行斗争。

第一节 根本任务

我们提出下列基本目标，并为促其实现而斗争。

一、推翻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排除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

二、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说，要实现为城市和乡村的贫民所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三、工人的国家将无偿没收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手段（金融机关、生产设备、商业资本、运输机关、矿山、山林、土地）。

四、工人国家将以从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过来的生产手段为基础，建立计划经济制度，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前提条件。

五、以国家的大量投资为基础，由农业无产者发展国营农场，同时逐步加强小农的合作化，最后把整个农业部门都纳入工人阶级的国有计划经济制度中。

六、通过同全亚洲，特别是同中国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合作，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并且同已经掌握了政权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朝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

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劳动人民，通过激烈的群众行动，将认识到只有团结在革命的指导部周围，才能获得胜利。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人们将会认清，1917年俄国工人阶级所实现的，以及1956年10月至11月匈牙利工人所取得的全民的团结（统一的最高形式），亦即苏维埃，才是推翻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唯一适当的群众组织。

在革命高潮时期，群众必然会组织苏维埃，以夺取政权。

在这个时期，革命的指导部应当同在苏维埃组织中飞跃地成长起来的群众共同前进，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第二节 过渡性的纲领

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深刻化的今天，如果不诉诸群众的革命行动，就不可能实现一切局部的要求。而且这种革命行动本身也将

促使阶级对立加剧，使情况日益朝着作最后决战的方向发展。因此提出过渡性的纲领的目的在于有意识地促进这种不可避免的革命过程的发展。

一、实现工会的民主化和按产业系统实现全国工会的统一。以车间的斗争委员会为基础，按产业系统和地区确立联合斗争组织。

二、完全消灭失业者。由工人组织把失业者分配到各产业。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缩短工作时间。

三、以不熟练的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为标准，确立全国一律通用的最低工资制度。

四、由工人管理基础产业。银行、煤矿、矿山、电力、钢铁、私营铁道、海运、造船及其他基础产业，将无偿地收归国家。

五、在全国建立反对资产阶级和国家的剥削与掠夺的劳动农民自主的组织，使之同工人组织进行合作。

六、废除自卫队和警察等一切镇压机关。确立工人的自卫组织。要求自卫队建立士兵委员会。

七、同中国、朝鲜和苏联的计划经济进行全面的合作。加强日本同中国和苏联工人阶级的团结。

八、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要求美军立即撤出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领土。废除一切同美国缔结的军事协定。

九、废除一切秘密外交。

十、建立工人政府。

译自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刊“第四国际”
第2期，1959年7月出版

五、为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 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 纲领第三次草案

无产阶级为了从全世界消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真正使人类获得解放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把自己的先锋队组织起来。

但是，现在的自称“共产党”却拖延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使之遭到失败，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无产阶级运动的危机，不外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指导部的危机。为了摆脱这种危机，就必须取代一向背叛革命的自称的“共产党”而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指导部，即建立新的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的先锋党。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把自己同一切机会主义组织区别开来，并公开展开活动。

我们将学习马克思所完成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斗争经验，全力以赴地把自己锻炼成为新的先锋党。

共产主义者认为，掩盖自己的见解和目的是可耻的。我们有义务公开提出下列问题。

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实力，粉碎资产阶级政权，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放自己。

* 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同”)成立于1958年12月，它的领导成员是被日共开除的反党分子，内部也经常闹分裂。

一、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

打倒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一) 在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階級在一切方面都在遭受剝削。

資本主義以形式上的身分平等和個人的自由意志為基礎的社會關係，代替了舊社會所存在的身分差別和超經濟的壓迫。資本主義還通過商品交換，沖破了局限於一個地區和處於分裂狀態下的舊社會的壁壘，把全世界統一起來。

這樣，資本主義成功地動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產力。但是在這種社會里，一切生產手段都為資產階級所占有，生產社會的基本生活資料的工人階級，卻完全失去了生產手段。工人作為無產階級，已經一無所有。

工人為了生活，只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在資本家底下工作，以取得工資。

大規模的用機器生產的工業所造成的龐大的失業者，把工人階級的工資壓低到不能再低的水平。工人階級經常遭受失業的威脅。

工人階級每天的勞動，只能使資產階級發財致富。資產階級把通過這種辦法得來的財富積累起來作為新的資本，並把它作為統治和剝削工人的手段。工人通過勞動，把自己日益牢固地拴在資本家的鐵鎖上。巨大的財富和享受集中在社會的一部分人身上，但另一方面，工人越是努力勞動，其處境便越加悲慘。

資本主義把人類改造自然的生產活動變成商品生產，即變成令人難以忍受的工資勞動，把工人變成非人的機器的附屬品。

藝術、科學和一切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都為統治階級——資

产阶级所垄断。由于资产阶级控制和垄断了一切生产活动，所以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绝望以及社会上的一切痛苦，同时也使资产阶级本身腐化和堕落。

工人阶级为了夺回劳动的果实，使生产活动变为工人自己的活动，就必须从资本家手里夺取生产手段，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建立新的生产体系。

依靠世界市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也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创造了条件。资本的积累不仅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统治手段，更主要的是产生了他们的掘墓人——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在组织上日益团结起来，同时使工人的反抗也日益强烈。

当工人阶级起来坚决地有意识地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注定要灭亡，工人阶级必将取得胜利。

(二) 资产阶级假借整个社会的名义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建立起拥有保护私有财产安全的各种暴力机构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完全无法调和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存在一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毫无关系的整个社会的一般的利益。

因此，工人阶级要剥夺资产阶级，首先必须粉碎资本家的国家政权，建立自己的阶级政权。

如果不剥夺资产阶级，团结一切劳动人民来共同组织生产和建立镇压反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所制造的世界市场，使全世界有可能组织成为一个共同体。工人阶级将消除由于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国家而造成的全世界分裂的情况。工人阶级必须推翻一个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粉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壁垒，实现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把全世界组织成为新的大同的社会。

(三) 未来的新的大同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其团结的力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在这个政权的领导下，把资本家私有的生产手段收归整个社会所有，把一切生产活动从资本家私人的商品生产改组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生产。

实现这一点，阶级统治就会消灭。人统治人的情况就不能存在。随着阶级统治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

全人类将获得解放，根据阶级统治写下的人类历史也将结束。共产主义社会将使人们有可能充分地发挥各种能力，这将成为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始。

人类将经过共产主义的最初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彻底实现共产主义。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把社会生产组织成为共同的生产活动，按照统一的标准和劳动量来分配产品。

人们将根据自己的能力从事劳动，按劳取酬。

生产不必再采取以价值为媒介的商品生产这样一种迂迴的方式。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将直接成为社会整个劳动的一部分。社会劳动将根据劳动量进行分配，而且产品也要加以分配。货币和工资之类的旧社会的遗物都将迅速消灭。

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教育的全面普及，将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旧社会的劳动将为人类完全根据自由意志对自然所进行的最为自主的活动所代替。这样就实现了不存在任何强制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

每一个人都将摆脱因民族和地区的不同所造成的限制，每个

人固有的职业上的分工也将消除。人们将建立一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所有人类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大同社会，人类的发展将是不可限量的。

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抛弃阶级社会，全力以赴地争取实现如上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四) 认为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是愚蠢的幻想。

只有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采取联合行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基本任务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权，在全世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通过这种政权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为此，我们将努力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全世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统一。

我们要以对腐朽透顶的社会的垃圾资产阶级的刻骨憎恨和战斗的精神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要在斗争中无条件地把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义务。

不管有什么理由，我们都要同一切缓和和掩盖两个阶级的对立的反动幻想进行彻底的斗争。

我们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为改良和改革资本主义，而是为推翻资本主义本身而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进行斗争的。

二、对帝国主义和世界革命的估计，

无产阶级应该怎样进行斗争

(五) 1848年革命时建立的巴黎公社，使西欧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历史的主人翁登上舞台。

到十九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进一步暴露出它是应该加以变革的制度，而且必将灭亡。

资本主义已经由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在十九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已经不只限于英国一个国家。德国、美国和日本都相继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重工业取得了发展，这种经营需要有巨额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里，仅仅靠私人企业进行资本积累，已经感到不够。因此，通过股份公司的形式，一举而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建立了以银行资本为中心的金融资本，进而发展成为“卡迪尔”和“托拉斯”之类的资本家的联合组织，于是便发展成为受金融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在这个时期以后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便直接地发展成为最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国家。

在帝国主义经济中，虽然生产力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极大的发展，以及资本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但是劳动人口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经常存在的过剩人口——主要存在于农村和中小企业之中——阻挠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化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垄断资本得以通过垄断价格等来掠夺农民和小企业主，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

长期的失业和不能维持生活的劳动条件，不仅强加于工人阶级，而且也强加于一般劳动人民。

经济衰退的长期化和经济危机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历史的生命。

金融垄断资本对外寻找商品的销路和原料、资源的来源，更主要的是寻找输出过剩资本的地方，因而开始对殖民地进行统治。

对殖民地人民明目张胆的压迫和掠夺，彻底地暴露了帝国主义的腐朽透顶的本质。

特别是，由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帝国主义列强，参加了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因此，世界便成为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市场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为重新瓜分市场而进行的激烈的竞争和斗争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只有用无产阶级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为粉碎资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办法才能得到解决。

很明显，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阶级。

在还广泛地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情况下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的直接的任务就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不可能进行任何只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独自の课题的中间阶段的革命。那些因受阻没有能够走向资本主义，而且受垄断资本剥削的农民和一般劳动人民的要求，只有在推翻垄断资本之后，才能实现。

由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世界市场互相进行激烈的竞争和冲突，所以全世界的阶级斗争也互相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同时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将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的导火线。而日益明显的是，无产阶级只有实现世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可以在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直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

在帝国主义已形成世界体系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那种只把无产阶级革命视为在一个民族的社会领域内进行的、只解决自己

的问题的革命的想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六) 帝国主义战争毫无例外地把俄国无产阶级也卷入战火中。尽管俄国非常落后，但俄国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立场，没有等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就直接夺取了政权。他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胜利的前程。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并非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深刻化而自然爆发的。组织先锋队和这个先锋队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乃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首要条件。

事实上，俄国革命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列宁克服了孟什维克(他们只期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因此没有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在四月出现的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的机会主义，采取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才取得的。以俄国革命为开端，在欧洲的废墟上进行的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虽然发展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地步，但由于领导这些革命的党没有能够迅速地成长，因此都遭到严重的失败。德国工人阶级在克服了“左倾幼稚病”的宗派主义错误之后，又犯了同社会民主主义者保持无原则的统一战线的错误，因而在1923年秋天的决定性时刻未能坚决采取行动，结果遭到失败。以这次失败为转机，革命运动开始走向低潮，致使俄国无产阶级政权陷于孤立。

由于把维持这种陷于孤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且在列宁逝世后终于控制了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主义者犯了错误，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进行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一直遭到失败。

1926年英国煤矿工人的总罢工所造成的危机，由于改良主义

的干部同资本家进行交易而得到解决。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则由于把民主革命绝对化，采取了追随民族资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方针，所以才使革命淹没在国民党军事改变的血泊中。

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叛变的帮助下，垄断资本一面维护自己的社会体系，一面通过狂热的投资活动，继续进行最后的积累。但是，这种狂热不久就为(经济)大危机所引起的停滞所代替。资本的破坏性的影响表现为因购置新的大型固定设备而造成的生产力过剩。机器停止开工达几十个月之久，同时，有数百万工人被赶出工厂。因大量出卖股票而造成的股票危机说明，采取过去的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已经不能处理高度发达的各种生产力。社会上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阶级对立的加剧清楚地说明，继帝国主义战争和十月革命之后所进行的世界规模的阶级决战已逐渐逼近。

依靠老办法已经不能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德国垄断资本，通过法西斯主义粉碎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运动，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由于这样，德国资产阶级依靠国家的大力支持而具备了进行剥削的条件。但是，斯大林主义者并不是为了摆脱革命的危机才同处在改良主义的领导下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进行斗争的，而是根据“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采取最后通牒主义，顽固地阻止了统一战线的建立，结果，遂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注视下遭到了最严重的失败。德国垄断资本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转变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法国无产阶级发挥了巨大的阶级力量，起来彻底粉碎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实现了统一战线政府。但这个政府的目的是维护已开始崩溃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他们竟抛弃了无产阶级的纲领，再次把牺牲强加在无产阶级头上。人民战线政府也没有

采取与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就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在革命运动中再次出现的叛变行为，延长了帝国主义的寿命，并造成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在这次大战中出现了核武器）这样一种悲惨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尽管如此，使阶级斗争的基本策略屈从于保障苏联国界安全的外交政策的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旗帜，而且还同帝国主义建立没有阶级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代了“分头前进，一起进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

其结果，则给战后的阶级斗争带来了不可救药的阶级调和主义。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由于对盟军抱有幻想，因此都不战而败。在大危机、大战以及后来的阶级对立的加剧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即企图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叛变的帮助下，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摆脱这个日益深刻的危机。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遭到挫折，应该让位给社会主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便找到了新的延长寿命的形式。

（七）新的延长寿命的形式，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说明，资本主义的自由的运动方式已经不能包容在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合成化学工业和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等方面看到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了。

掌握着统治权的股东使中小股东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们不一定要把公司的利润全部都拿来分配，而是把它保存在公司内，借以确立筹划为大量增加固定资本所需的巨额资金的机构。这样在自己内部掌握金融的结果，资金便摆脱了资本市场的限制，而使资本家得以轻而易举地扩大企业，同时使垄断的形式获得更加高

度的发展。这种资金的积累,只有采取下述措施才能实现,即通过国家机关把依靠税收集集中起来的巨额的社会资金作为长期低利的国家资金贷给重要的产业部门,或者是采取对企业内部积累的免税、低利息和扩大消费者使用等经济政策来维持垄断利润和促进积累。

依靠接受国家机关补助的企业内部资金的积累方式的开展,乃是股票资本发展的结果。随着资本的所有者和企业机能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便使人们产生了认为可能实行资本的社会化之类的幻想。但是,在股票制度下大多数小股东都必然要变得软弱无力。少数占统治地位的股东则把自己的利害当作公司本身的利害,进一步加强了其私有制度。

那些已超过私人资本的范围,而且又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所不能缺少的(生产)部门,将由公司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由于国家的直接介入,私有制将日益加强。

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取得了这样巨大发展的各种生产力,由无产阶级直接对生产和消费实行社会主义的统治,无疑地会使生产力得到飞跃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地为社会主义作好准备。

无产阶级只要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就可以没收主要产业,从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实行直接分配社会劳动和按劳分配产品等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必须利用国家垄断资本特有的信用和财政等机构作为在管理、记账、计算等工作上实行经济改革的工具,使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

如上所述,由于同国家机构加强联系的结果,“公共的性质”在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已完全为社会主义作好了物质准备。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坚决地采取行动和夺取政权,就有可能进

行一切工作。为国家垄断资本的“公共性质”所迷惑的一部分“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曾散布不夺取政权而只促进企业“国有化”的作法，决不能为无产阶级开辟争取解放的道路。

尽管个别的金融资本会进行有形无形的抵抗，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外乎是依靠政权来集中地保护私有制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切都取决于公共企业和大垄断企业部门内的工人的行动。不用说，这些基础产业的工人经常有被垄断利润（它是由国家机关的补助和中小企业所让与的价值构成的）的残羹所收买，或是同中小企业工人的斗争性不断加强的情况相反，有变成工人贵族的危险。这也是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为抵抗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动的决定性的进攻而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很容易造成同国家政权的对立。通过每天的现实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必将明确地认识到，不坚决采取行动，就不可能解决任何矛盾。在这个阶段，采取全国统一的政治方针，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能引导工人阶级走向革命的先锋党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经济超过国家的壁垒而建立起来的联系将进一步得到发展。

一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从客观上看，各国无产阶级有必要日益加强团结。

抛弃资产阶级割据的国家，把全世界组织成为单一的共同体和社会主义社会，乃是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

在落后国家的民族革命中，企图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会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很明显，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就是建立自己的政权的任务。

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也只有同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一起

走向形成单一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才能获得胜利。

道路只有两条，那就是依靠民族资产阶级来稳定国家资本主义呢，还是由无产阶级来掌握政权。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粉碎了一切和平主义的幻想，并告诉无产阶级进行不妥协的独自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八) 过去认为，落后国家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取得“若干先进国家的最积极合作”(列宁)，也就是说，“得到国际性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

但是，不仅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而且也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革命走向低潮的情况下被孤立起来。

如果以世界革命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作有意识的努力，那么，被迫处于孤立境地的无产阶级政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但是，根据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使世界革命遭到失败所造成的孤立状态加以合理化和绝对化了的斯大林主义者，必然会进行各种歪曲，把被歪曲了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伪称为社会主义，这样便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出现了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之上，破坏公社的原则，独揽政治权力的特殊的官僚阶层。

目前统治着苏联社会的是，夺取了十月革命的果实，放弃未来的世界革命，以一个国家实现革命的幻想来巩固特权统治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他们所推行的政策的目标，就是保持均衡，维持现状，以保持特权。

为此，他们在国际上采取和平共处政策，同正在走向灭亡的资产阶级讨价还价。他们不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来争取持久和平，

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借以求得不稳定的和平。他们还把各国共产党变为对帝国主义施加压力和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使阶级斗争陷入无法挽救的改良主义的泥坑。

在国内，尽管国有化经济有所发展，但没有采取由社会分配劳动时间，以及根据劳动工资分配产品的社会主义原则，所以分配仍然是不平等的，而且还有价值关系的残余。由于几个五年计划的获得成功，生产力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虽然如此，但解散拖拉机站和改革工厂管理机构等措施却加强了独立核算制度，从而进一步贯彻了价值规律，拖延了工人取得彻底解放的时日，并促使官僚变成特权官僚。

劳动也同阶级社会一样，完全成为谋生的手段，而且是依靠差额极大的工资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来维持的。

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解放。

现在的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停滞、被歪曲和绝对化了的存在。

在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过程中，苏联无产阶级必须打倒特权官僚的统治，恢复被剥夺了的自己的政治统治。

（九）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斯大林主义者的叛变和为之所助长的广泛的爱国主义气氛，曾经使无产阶级运动倒退。但是在大战中，无产阶级运动再次走向高潮。

由于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失败，使人类的财富和生命受到空前破坏的战争宣告结束。这时候，世界无产阶级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对面临危机的资产阶级统治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东欧的几个国家和中国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许多殖民地国家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但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法西斯解放战争”这样一种无可救药的没有阶级性的规定，使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被各国狂热的“国民的复兴”所淹没，从而妨害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已经面临决战的法国和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自始至终都被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帮凶的自称先锋党的可耻的叛变所出卖。希腊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所展开的英勇的斗争，也由于苏联官僚主义的袖手旁观而在付出了流血牺牲之后被粉碎。

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在印度、印尼、菲律宾、缅甸和中国各国掀起的革命风暴，由于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无原则的妥协，以及采取相反的极“左”的策略，而不得不作了重大的后退。

这样，好容易才渡过了战后的革命危机时期的资产阶级，便在“国民的复兴”过程中找到了保卫自己的办法，即确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而且取得了巨额利润的美国资产阶级，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他们一面以巨额的资本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一面重新整编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资产阶级。

以1947年为转机，摆脱了危机的世界资产阶级，以美帝国主义者为主团结起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已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发动了新的进攻。

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击破资产阶级的反攻，为开辟新的革命前程而坚决地进行斗争。

但是，面临这种危机，同帝国主义者调和的梦想已经破灭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却为保障苏联国境的安全而建立了共产党国际情报局，并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斗争来代替反对资产阶级统

治的阶级斗争。

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1949年斯大林主义官僚把全世界无产阶级束缚在只以实现民主为目标的和平运动中，放弃了打倒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

在资本主义暂时取得稳定的情况下，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自1954年以来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其内容完全没有阶级性，即认为“两个体系”的生产力的竞争将会保障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这种政策使无产阶级放弃了打倒资产阶级政权和实现世界革命的战略，更主要的是掩盖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熄灭了人们对资产阶级的憎恨的火焰，从而成为现在一切叛变行为的根源。

但是，所谓“两个体系在生产上进行的和平竞赛”决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争取到胜利。自有各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组成的单一的阵营，以及世界无产阶级对国际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才能决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战后十多年来，在美国掌握绝对领导权的情况下进行的重建世界资本主义的过程，已基本上结束。在加紧积累新的资本的过程中，要求同美帝国主义站在同等的地位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又投入了激烈的重新瓜分市场的斗争。依靠民族资产阶级来取得独立，并正在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挤入世界市场，将使瓜分市场的斗争更加激烈。

在世界政治中，各国不断的离合集散，由几个国家组成集团和在外交上进行虚虚实实的讨价还价，已经取代了象征着以美国为盟主的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和政治同盟。

资本的竞争的加剧，打破了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和平幻想。这

将引起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公开冲突,更主要的是,暴露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定性的对立。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持续十多年之久的“冷战”,创造了具有空前巨大破坏力的原子武器。资产阶级以发动全面的原子战争来威胁无产阶级。斯大林主义者便借此把和平共处的战略变成了合理的东西。

只有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带来凄惨的结局。同时,只有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才能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斗争,而企图通过协定、集体安全保障和废除军备等来阻止帝国主义战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已。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无疑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唯一的道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切都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坚决行动,也就是取决于确立无产阶级的指导部。

本同盟不承认这种完全缺乏革命性的意见,即主张通过和平共处和提高苏联的生产力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将竭尽全力引导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决定性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同时在这个斗争中打倒统治着苏联社会的特权官僚,为在全世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进行斗争。

三、日本革命的前景和日本无产阶级的任务

(十)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明治维新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远东市场,特别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统治中国为目的的激烈竞争,也给了年青的日本资本主义以沉重的压力。

一面抵抗因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而对日本造成的压迫和变成殖民地的危险，一面强制地走完了原始积累的过程的日本资本主义，并未发展成为以自由的政策作为基础的产业资本主义。

近代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官办的用机械进行生产的大工业推动的，它所需要的莫大的资金，都是通过国家机构、享有特权的股份公司和银行等集中的。

新兴的大工业的有机构成很高，它同资本的规模比较起来，是并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工人的。在纤维工业等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都是依靠彻底地剥削女工来维持的。这就改变了产生无产劳动者的过程，阻止了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

尽管地租很高，但是在修改地租的过程中没落了的农民依然紧紧抓住土地不放，这就促进了“寄生地主制”的成长。高比率的实物地租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寄生地主制”，决不意味着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存在，它只是说明了在帝国主义阶段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状况。

在牺牲在无法维持生活的低工资和悲惨的劳动条件下苟延残喘的工人和苦于交纳高额地租的贫农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积累的日本资本主义，逐渐地使自己发展成为近代的帝国主义。那就是以在国家的帮助下实现的原始积累为杠杆，一开始就经营建立在政治和商业的利益和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股份公司，然后在股份公司的支配下，建立以银行为中心加强了封锁性的结合的财阀康采恩这种特殊的形式。

天皇制政权，逐渐地暴露了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中心的本质。

但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乘帝国主义列强斗争的间隙渔利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反抗和争夺市场

的斗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也不得不作殊死的挣扎，以苟延自己的生命。

于是便以在明治年间所获取的朝鲜为立脚点，对大陆市场开始进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强盗式的侵入。

自上而下的公开的军事的警察的独裁代替了在第一次大战比较顺利的资本积累过程中产生的民主运动和政党政治。

这种独裁统治乃是通过野蛮地消灭当时虽然没有明确的革命目标，但是却以果敢的斗争进行了反抗的无产阶级战斗组织建立的。

第二次大战前的“日本共产党”，作为国际的斯大林主义错误的一翼，对日本资本主义缺乏明确的斗争方针，它们采取了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再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的战略路线。尽管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但它们的极共宗派主义的实践方针，使它不可能把广大的工人阶级团结到反帝斗争中来。由于它们自己在镇压的面前濒于溃灭，因而即使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刻，他们仍然是无所作为。

(十一) 分割远东市场的生死斗争，不久即形成了日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公开的军事对立。

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部成功的日本帝国主义，又进一步企图侵略华北，1937年便开始了全面的中日战争。

日本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特别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列强所支配的西太平洋市场构成了威胁，于是接着便爆发了全面的太平洋战争。

战时经济的要求，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巨大发展。发展这些部门，就需要足以供应大量固定资本的大规模的资金集中，这样财阀的封锁性便成为一种限制。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全面地动员国家权力的办法自己建立了国

家垄断资本主义。

但是在积蓄了最大的资本家财富的美帝国主义者的力量面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全面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的惨败为资本主义的日本造成了决定性的危机。

在战争时期被窒息了的无产阶级运动，又如怒涛一般地开始前进。对于打倒资产阶级政权的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决定性的战斗时刻已经来临。

但是，领导这个斗争的日本斯大林主义者“日本共产党”却固执把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的战略，不仅对打倒日本资本主义缺乏彻底的斗争方针，而且从把第二次大战看作是“反法西斯战争”这种毫无内容的规定出发，犯了把统治者美国占领军当作是“解放军”的错误。

他们制止了1947年的“二一”大罢工，进一步采取地区人民斗争等右倾的议会主义的策略，致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陷于混乱，帮助资本家阶级摆脱了危机；并恢复起来。

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家阶级又重新整顿了统治机构，为了粉碎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通过土地改革造成了数量庞大的自耕农而开放了农村市场，以及把天皇制权力掩盖起来，给予人民以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等等。

这样的方针同试图削弱第二次大战中的仇敌日本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愿望也是一致的。

战败和被占领的事实，确实使日本资产阶级不得不作某些后退，但是美利坚帝国并没有无视日本资本主义合乎规律的发展而采取专横做法，也没有达到其实现“完全统一的统治”的目的。相反地，在“民主化”的招牌下，美帝国主义者的占领政策却促进了日

本资本主义合乎规律的发展。解散财阀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朝着彻底地消除财阀的封锁的性质的方向发展，国家给予的各种资金的援助，不外都是从保存依靠战争经济来推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机构的意图出发的。

“社会党”的片山内阁也是代表资本家的利益的，它忠实地推进了恢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工作。

摆脱了危机的资产阶级，从1949年起就对因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叛变而错过了1946—1947年的斗争高涨时期的无产阶级展开决战，其目的在于造成资本家的稳定的局势。

虽然说毫无作为地渡过了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但是日本的无产阶级还有着充分的阶级的战斗力量。打败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而展开打倒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是十分可能的。

但是“日本共产党”所采取的“产业复兴斗争”的方针和甚至抑制罢工的极端右倾的策略，不能不使无产阶级遭到惨败。

在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可耻的“民主化同盟”运动的协助下，几万战斗的工人被赶出工厂之后，也就是在等于是总崩溃的时期的1950年和1951年期间，日本共产党一变而把极左的策略搬到阶级斗争中来。武装暴动的、在战略上贯穿着右倾实质的“火焰瓶策略”，给日本无产阶级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害，致使资产阶级得以轻易地恢复自己的力量，协助美帝国主义者们在朝鲜发动的军事冒险，一举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重新确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

(十二) 暂时赢得政治上的稳定的日本资产阶级，目前又与美国资产阶级缔结了帝国主义的阶级同盟，正在梦想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再次向海外市场扩张，并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建立机构，把以租税和国民零星存款为源泉的长期而且低利的国家资金，作为设备资金主要的贷给动力、运输和生产重要输出商品的巨大垄断资本。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更加推进了以巨大的垄断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积累。

日本资本主义在生产方面，已经具有相当于战前数倍的实力。

但是，为了在日益加剧的夺取海外市场的斗争中战胜美、英和西德，日本资本主义就必须首先实现设备的彻底近代化，并进一步加强资本对工人阶级的统治。

各产业从 1956—1957 年开始执行的一系列“合理化”计划，就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推行的。

他们还企图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加强自己的体制，使自己成为第一流的帝国主义强国，以便向东南亚实行资本输出等经济侵略。

对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压迫，作为他们以自上而下地加强他们的统治为目的的进攻来说，是更加激烈了。

他们正在虎视眈眈地企图再次夺回战后他们在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时期被迫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所作的让步。

资本家阶级已进一步把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缔结的同盟修改成为平等的东西，并且加强了。他们一方面以此作为维持自己的阶级统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则在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扩张。

历史已经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危险的侵略本质。

我们应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走上向海外扩张和它在国内加强统治体制的道路，这就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对资本家阶级毫不妥协的斗争来打倒帝国主义的统治。

对于日本的无产阶级来说，抛弃所有社会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已经直接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日本的无产阶级必须明确地提出自己的阶级目标——剥夺资本家，建设社会主义，为打倒日本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斗争中作具体的努力，把以农民为首的各中间阶层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除了依靠自己的阶级力量外，基本上是不能依靠其它力量的。无产阶级即使单枪匹马，也只有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才有可能把以农民为首的各中间阶层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日本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利用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资产阶级议会，但最终的目的则必须是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国会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府而奋斗。苏维埃是工人以各工厂为基础，以按一定的比率选出的代表为核心，包括一般阶层的人民按地区和产业系统组成的。苏维埃不单是立法机关，同时是具有一切政治的、经济的行政机能的执行机关。人民自下而上地对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进行检查的自由和罢免权都得到保证，他们的报酬都规定在一般工人的水平上。这样，工人阶级才能完全从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胜利的日本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立即执行下列政策，完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尖兵的任务。

(1) 废除一切资产阶级的镇压措施。

(2) 解散自卫队、警察、公安调查厅、海上保安厅等资产阶级权力机关。

(3) 废除资产阶级的审判制度，建立审判官的民主选举制。

(4) 建立工人的武装民兵组织，作为过渡性的措施，建设不存在职位等级制的陆、海、空赤卫军。

(5) 保证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完全自由。给予工人阶级集会、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并在物质上予以保障。保证工人罢工和在街上举行游行示威的自由。

粉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即时释放工人政治犯,追究一切捏造事件的责任。

(6) 实行通讯、报道机关的国有化和工人管理。

(7) 实行一切重要产业国有化和工人管理。

(8) 实行金融机关的全面国有化和工人管理。

(9) 商业通过合作社组织全面地由国家管理。

(10) 实行贸易的全面国有化和工人管理。

(11) 缩短工作时间,大量提高工资,逐渐地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争取废除工资劳动。

(12) 通过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等的技术援助和国家的资金援助,在农村组织社会主义的共同生产。

在农业方面也要采取措施以期迅速地走上按劳分配的方向。

通过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与农村的结合,设法把农村人口吸收到工业生产方面来。

(13) 从物质方面和技术方面帮助小手工业者阶层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

(14) 组织以基础产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15) 无偿地没收资本家所有的土地、房屋及其它财产。

(16) 公开一切秘密外交,废除秘密条约。

无偿地没收外国资本的投资和借款。

接收军事基地等外国的设施。

推行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外交政策。

(17) 废除一切资产阶级法规。

(18) 全面地废除男女差别。

(19) 确立无偿地利用一切医疗机关的制度。

确立对病人、老人、儿童给予完全的社会保险制度。

(20) 一切教育都归国家管理,并实行免费教育。

教育同生产活动相结合。普及共产主义教育。

(21) 科学研究完全自由。对科学工作者独立自主的研究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日本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同美国和东南亚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

日本无产阶级为了完成世界革命,而把自己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堡垒,特别是为了美国和东南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直接地伸出援助的手来。

同时还必须协助苏联、中国、朝鲜的无产阶级打倒官僚统治和恢复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并且把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尖兵的光荣职务担当起来。

四、組織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先锋,

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

(十三) 工人阶级依靠自发性是不能解放自己的。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的阶级意识,也是不可能作为明确的单一的阶级意识立即灌输给每个工人的。因此,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只有依靠在组织上对整个阶级保持独立的、由最高的阶级意识武装起来的先锋组织的领导,才能实现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这样的先锋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才取得的。只有以那些在正确的革命方针下团结起来、把

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凭自己的阶级觉悟进行活动的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先锋组织的存在，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只有依靠旨在打倒既存的机会主义的先锋政党的成长，才能取得日本革命的胜利。同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也需要成立一个足以代替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既存的各国共产党的、以真正的革命意志武装起来的、新的共产国际。

最初作为争取实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组织而成立的第二国际，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堕落成为机会主义的组织。我们同盟学习列宁通过打倒第二国际建立第三国际的经验教训，弹劾今天世所公认的各国共产党，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完全堕落成为改良主义的组织的的事实，不问明天如何，我们今天则要为了成立新的共产国际而工作。

1938年作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左翼反对派而登台的第四国际，虽然具有弹劾斯大林主义的托洛茨基的革命性，但是今天作为完全扩大了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组织上的缺点的组织，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在领导世界无产阶级方面，肯定的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同盟要把在世所公认的各国共产党影响之下的革命工人从机会主义中解放出来，努力同第四国际或独立的左翼组织领导之下的革命工人采取革命的统一行动，并且要为了迅速地组织新的共产国际而竭尽全力进行斗争。

但我们并不是非实践的，即没有争取日本革命胜利的实践而谈论建立新的共产国际。我们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刻也不会忘记，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高涨，才是成立新的共产国际的现实基础。

(十四) 日本既存的阶级政党已经完全失掉了作为工人阶级

的领导机构的资格。

社会党，我们可以从它的许多中间的构成分子身上看到的，中间的、妥协的性格就是他们的特色。这个党已完全为一贯的动摇和机会主义、和平主义和议会主义所毒化。左派在党内已处在必须不断地同资产阶级的走狗右派进行斗争的状况下。现在就是在工人运动中占主流地位的党内左派，也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他们一直在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阻碍工人阶级的成长。

日本共产党，自从它作为共产国际日本支部成立以来，吸收了许多革命的先锋战士参加了它的队伍，但是由于其国际权威主义和盲从主义，它一直在走着叛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

在放弃了世界革命，强行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把被歪曲了的过渡时期绝对化了的苏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机会主义同时也毒化了日本共产党。

在 1932 年纲领错误地把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的战略指导下，日本共产党在战后 1946、1947 年革命的高潮时期，由于难以挽救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使日本的无产阶级陷于混乱，并在 1949 年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中，使无产阶级遭到惨败。这个党突然所采取的极左的冒险主义的策略，更给了日本无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相反地，1955 年以来，由于他们极右的思想和策略，已使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沉睡了。而现在，他们正在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对资产阶级的中立政策中，完成其叛变的目的。

在这个党内部，现在依靠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掌握党内领导权的一部分人，正在同党内反对派反复地进行着派系斗争。

党内反对派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国家“公共的性质”增大的情况所迷惑，对一小撮垄断资本采取所谓国民的统一战线的非阶级的策略，并站在主张利用议会，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代改良主义和改良派的立场上。

日本战斗的无产阶级绝不能停留在公认的领导机构的约束范围内。同既存的各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坚决地断绝关系，乃是当务之急。日本共产党的下层革命工人，在党中央的官僚主义者的压制下，已在准备为工人阶级的真正利益而奋斗，我们将帮助他们革命化，为打倒机会主义而协助他们前进。

共产主义者同盟，将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领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阶级政党。

作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部队，共产主义者同盟将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武装起来，并站在无产阶级现实斗争的前面进行斗争。

(十五) 我们高声宣言，除了无产阶级革命以外，没有任何爆破资本主义的道路。共产主义者同盟对既存共产党的态度，一切都从这一点出发。除了无产阶级真正的阶级利益以外，我们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优先于个人利益。一切非阶级的分子和怠惰的胆小鬼都不能被允许参加它的队伍。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纪律是靠每个盟员的阶级觉悟来维持的。为了保证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集中全力经常制定出正确的政治方针。

盟员的阶级觉悟、自我牺牲精神、政治方针的正确，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同工人阶级密切结合，这是加强组织的唯一的保证。

对盟内理论上、方针上的原则的对立，有交换意见的完全自由，我们将通过排除一切暧昧的妥协的彻底的讨论而前进。我们必须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经常维护行动的统一。

日本无产阶级在其数十年的斗争中，没有一次能够把正确的领导和策略变为自己的东西。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总是使日本无产阶级宝贵的斗争蒙受重大的损失。我们已经不能再忍受这种情况。只有作为新的真正的先锋党，在全国所有的工厂内建立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才是把日本无产阶级导向胜利的唯一保证。

全日本无产阶级的同志们！

要打倒公认的领导机构的机会主义，清楚地注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为团结成为一个新的先锋党和确立正确的领导而竭尽全力进行斗争。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旗帜下，在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组织领导下团结起来。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建立新的共产国际！

打倒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三次全国大会

1958年8月于东京

译自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理论刊物“共产主义”1959年
第5期，1959年10月1日出版

六、爭取社会主义的世界斗争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
(1961年6月)

现在摆在人类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是摆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完成1917年俄国革命所开始的过程。这一任务延搁了四十年了，由于这种延搁而造成的损失，有经济萧条、文化停滞、法西斯主义和世界规模的大屠杀。在现在，除了这些以外，还有能够毁灭所有高等生活方式的热核战争的危險。

世界各地的劳动群众，在各种难于忍受的压力的推动之下，曾經不断地发动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结果，在许多国家里是取得了国家政权，在另一些国家里是建立了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所以没能取得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的原因，在于领导力量不足，甚或是领导有错误。需要建立一种与这一世界历史任务相适应的领导力量，乃是1938年第四国际基本文件的主旨；这种需要在其后二十三年中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这样一种领导的主要特征在于能够了解各种有关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能作出最坚决的决定来使它们得到有利的解决。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在某些时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能够在战略和战术方面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就不光是需要有天赋的洞察力。战略和战术必须以客观条件为基础，也就是说，必须以阶级斗争的消长变化为基础，而这种消长变化是被概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

反革命这二者的相对力量之中的。

一、四个主要阶段

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一) 1900—1917 年。这是一个准备时期，在其中，不断革命的理论有了发展，并且经受了考验；这种理论使人们看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型式和革命的政党的作用。它为无产阶级提供最有效的政治武器。在这一时期中，阶级斗争的高峰是 1905 年的俄国革命、1910 年的墨西哥革命和 1911 年的中国革命。这些革命开始了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无产阶级起义、农民起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起义的新时代。在 1905 年的革命中出现了工人代表会，这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固有趋势，是要在一种新的阶级基础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新的相互关系上，扩大民主并使之深刻化。

(二) 1917—1923 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突破时期。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标志出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始。在许多十分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指出了革命领导的重要性。俄国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之下成功了，可是欧洲其他地方的革命却遭受了失败。1918 年的德国革命使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可是它的领导人不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协助重新稳定资本主义。他们出卖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再建一种能够利用 1900—1918 年经验的领导这一任务，是在 1919 年由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第三国际的组织开始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所造成的蛊惑力量，却使得世界资本主义恢复了元气，足以把俄国革命孤立起来，阻止它的扩展。

(三) 1923—1943年。俄国革命的长期被孤立导致了它的墮落，导致了各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化，也导致了1943年第三国际的解体。工人运动不断的失败促进了反动力量的扩展，尤其是在欧洲的最恶毒的法西斯反动力量的扩展。工人运动1926年在英国的失败，1927年在中国的失败，1933年在德国的失败，1934年在奥地利的失败，1937年在西班牙的失败，1938年在法国的失败，终于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帝国主义企图粉碎第一个工人国家。

(四) 1943—1961年。这是国际革命新复活时期，这一时期现在仍在继续着。1943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胜利，乃是标志着德国帝国主义即将溃败的转折点，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南斯拉夫的革命于1948年和斯大林决裂了，这乃是斯大林主义将要完结的信号。1943年墨索里尼的垮台以及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西欧革命力量的复活。这一大有希望的开端在希腊、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由于背叛行为而遭受了挫折，它们在西欧挽救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可是在印度、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却有着殖民地革命的高潮。在战后，整个东欧的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被推翻了，这是由于苏联进入柏林而成为可能的，这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俄国革命周围建立起来的围墙。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遭受挫折，大大改变了世界上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其后，整个中东和非洲掀起了殖民地起义。由于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因此而来的西半球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建立，拉丁美洲也达到了新的转折点。1960年日本工人和学生的游行示威，以及这年年底的比利时总罢工，说明无产阶级斗争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也重新开始了。

二、世界的三个部分

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呢？现在的力量的对比关系如何呢？妨害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是些什么呢？我们要怎样去克服它们呢？

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观点来看，当代世界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领域：（1）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包括以美国这一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为领导的从日本到西德各高度工业化了的国家；（2）各工人国家，从东德到中国，在这里，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苏联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有着领导权；（3）亚、非、拉美的各殖民地国家。

在这三个主要部分里，革命力量的发展水平，因而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极不相同的。

苏联区域的人民已经超越过资本主义阶段，但仍然为一些有特权的、不受限制的、斯大林式的官僚机构所统治着。摆在这些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是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结束官僚主义的统治，建立平等主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一个健全的工人国家所应有的民主政治结构。就绝大多数人类而论，毫无疑问，计划经济已经证明要比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优越得多。重新建立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培育起来的无产阶级民主形式，会使经济计划工作能在每一国家中表现出更大得多的力量，也会有利于所有工人国家经济之间的协调合作。结束官僚主义阶层的独裁统治，给世界提供一个无产阶级民主实践的新榜样，工人们就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国家的防御能力，并鼓励世界其他地区加速超越资本主义。

各殖民地国家仍然停滞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不发达的或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之下。在这些国家里，主要的任务是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寡头执政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枷锁，并建立工

人和农民的政府。这种政府能够贯彻执行早已愆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土地改革、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军队民主化、扫除文盲、和世界市场建立更有利的关系,等等);在前进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快地结束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改变国家结构,并设法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工业化、经济计划,等等)。中国和古巴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应该推翻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生产资料,建立民主的工人政权。这种政权将消除热核战争的威胁,制订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朝向一种社会主义联盟迈进;这将使所有人类能够立即把他们的生产力量统一在一个有计划的由各国组成经济社会之内。

三、互相影响的各种过程

在现在的重要关头,世界革命在策略上必须把三种巨大的历史过程结合在一起,这三种过程是:高度工业化了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殖民地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各国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这三种过程是以极为不同的速度向前进展的。一个快步前进,另两个则退缩不前,或者不能和快步人的速度相配合。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古巴的工人和农民要在离开佛罗里达九十英里的地方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可是美国工人还没有脱离民主的机器来组织他们自己的群众的政党。

但是,这三种过程总是彼此互相影响的,有时互相促进,有时互相促退。例如,苏联势力之伸入东欧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从两面打破了对苏联的封锁)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大加强了苏联人民群众的自信心。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要求,使得官僚主义者不得

不做出重要的让步。斯大林死后的“解冻”也刺激了东德、波兰和匈牙利反对克里姆林宫代理人的虐政的起义。

苏联这一部分里的互相矛盾情况，对于其他两部分的人民群众也起着互相矛盾的影响。在殖民地人民看来，苏联和中国的成功似乎就是他们也能取得成功的榜样。从而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他们取得支持和有力鼓舞的源泉。另一方面，在西方，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及其极权主义的措施，却使工人们感到沮丧和气馁，使他们放慢了脚步，不和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进行清算，以免陷入更坏的灾难。西方工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又使得帝国主义者能够较自由地进行冷战，从而妨害苏联地区内工人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殖民地区域，通过共产党的中介和影响而运行的斯大林主义，在阻碍国际革命方面起着直接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共产党已经把它的党员埋葬在民主党之内，使他们成为史蒂文森之流的人物的司阍人。它一贯地不肯做有害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并且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在古巴，那强有力的共产党甚至曾经一度支持巴蒂斯塔政权。它反对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中革命党人所进行的争取政权的斗争。古巴革命的成功，只是因为古巴农民和工人最后从旁路上赶过了共产党。斯大林主义的作用在古巴和意大利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围绕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少数学生，只凭精力、自我牺牲和献身于战斗的原则，就能够领导一种群众斗争取得权力，那么，意大利共产党连同它那成百万的党员，要是表现出古巴人革命决心的十分之一，又有什么不能完成的事情呢？

民族主义运动也有着同样互相矛盾的影响。它们已经从帝国主义那里赢得了很大的让步，并且有助于鼓舞在帝国主义中心进行的进步斗争，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的黑人就受到这种鼓

舞。这种运动有着反帝国主义倾向，要解放出不可控制的革命力量，因此它们从莫斯科和北京那里取得了支持。这对于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有好处的；但是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由于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民主，却又加强了莫斯科和北京的反民主的统治阶层。当这种运动在许多国家里能够赢得国家独立的时候，它也散播了一些新的错觉，认为帝国主义控制的联合国是一种和平的工具。卢蒙巴的悲剧就说明这种错觉所能带来的灾难。一般说来，民族主义运动，在挣脱帝国主义政治枷锁的时候，只想把争取自由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渠道之内，反对实行那些为尽快地使殖民地区摆脱由来已久的停滞状态所必需的彻底措施。然而，在群众的革命压力之下，特别是再加上帝国主义进攻的压力，有些民族运动也能够采取非常激烈的步骤。墨西哥、玻利维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和一些其他地方的民族运动都是如此。在古巴，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一种挨打和反挨打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后不仅是把美国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而且也把古巴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

四、主要的决定因素

目前的世界局势是由四种主要因素来决定的：帝国主义阵营的衰退；苏联集团的力量不断增长；殖民地革命的不可遏止的发展；最后但决不是不重要，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运动不够活跃。

总起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规模的斗争的发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的。他们已经从帝国主义者那里赢得了阵地，并且继续前进着。力量的对比仍然有利于他们。

帝国主义联盟中最强大的一个成员在 1945 年以后所丧失的

威信和权力,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轴心国被击败之后,美帝国主义成为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最有力量的一个国家。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将在无限的时期里保持这种优越的地位不受挑战。有些华尔街的宣传家夸耀说有一种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它像罗马帝国一样可以持续一千年。

然而,十五年以后,它所自认为具有的在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监督世界的权利,从朝鲜到古巴,都发生了问题。

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相对地衰退了,苏联集团越来越占上风,而前者一部分是由后者所造成的。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各工人国家计划经济的发展,以意料不到的速度胜过了美国的经济优势。苏联的经济成长率不仅始终高于美国的经济成长率,而且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使得美国经济甚至不能发挥其全部生产能力(实际生产目前只为生产能力的75%左右),同时周期性的“衰退”和自动化又不断地增加失业大军。在军事方面,苏联很快地消除了美国在核武器生产上的优势,而且在火箭和导弹的能力方面超过了美国好几年。在教育方面,苏联在培养工程师、医生、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等等人才方面在全世界中首屈一指,因此在这些科学的基本研究工作和发明方面它很快地取得了领先地位。在外交舞台上,自从斯大林死后,苏联表现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灵活;通过援助计划,通过揭露华盛顿的侵略政策,它在各“中立”国家之中取得了地位。甚至在华尔街一向认为禁地的拉丁美洲,美国的外交方面的领导权也在受到了挑战。

然而,在这些敌对的国家集团之间,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斗争将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之间的争论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冷战中能够很容易地表现得十分尖锐。但是,它们只是一种远为重要和更有爆炸性的斗争的一些组

成部分；这种远为重要和更有爆炸性的斗争，就是旧秩序的支持者和主张社会主义的亿万人民之间具有世界规模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斗争。正是这种国际的阶级斗争，它将最后决定人类的命运——我们是要陷入原子战争的深渊呢，还是要开展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在这一舞台上，局势非常复杂；结果如何，尚难预料。

从东欧到中国都废弃了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退却，不能不屡次推迟进行摊牌的战争。不仅于此，自从中国革命以后，殖民地的革命就一直从东亚扩展到中东和非洲，甚至越过大西洋直到古巴；这种殖民地革命的进展，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加强了反资本主义阵营，并且增加了工业不发展国家中被压迫群众的自信心。

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并没有和上述这些胜利相配合的东西。在那里，情况一直是大不相同的。工人们不仅没有和其他各地的盟友采取一致行动，而且总的说来是死气沉沉。这种不活跃的情况，是由于战争结束时共产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背叛而造成的，而长期繁荣以及缺乏其他有效的领导（现在必须创造这种领导）又助长了这种不活跃的情况。

例如，在英国，工党在 1945 年取得了政权。但是艾德里、比万等人并没有在这世界上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虽然对工人作了相当的让步，但却利用职权来支持资本主义，并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工党的官僚们不但没有给人类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大路，反而使得英国有可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所筹划的反苏战争的滩头堡。这种背叛社会主义目标的行为，对于英国工人起了使他们意气消沉的作用，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能恢复过来。在美国，大战结束时发生了这一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

罢工浪潮。可是工人的头目们却把这种运动局限在狭隘的范围以内。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他们不断阻碍一般工人打算建立一个工党的积极性，并且在民主党机关里充当卑躬屈节的角色，就为麦卡锡主义铺平了道路。五十年代中这种政治迫害的气氛和对民主制度的侵蚀，再加上长期的繁荣，大大削弱了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使得帝国主义在外交方面能够无所顾忌地实行一种最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

革命的发展只限于世界上较不发达的地区，而且西方在政治上显然落后，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一整个时期的特点。这种消极的特点是当前现实情况的最主要的因素，它既牵涉到帝国主义力量的根据地，也牵涉到必须动员起来以夺取这些根据地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现在世界局势的关键就在于此。只有当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工人以他们全部巨大社会力量控制了政治舞台以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获得胜利。

主要的问题是，怎样解开这一死扣，打开这一困境，克服国际阶级斗争中这一有决定性的地区里工人的消极情况。不办到这点，就不可能有决定性的改变，不可能有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的质的变化，不可能开辟历史发展的伟大的新时期，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立于不败之地的胜利，也就不能保证原子战争不把我们的地球变成放射性的荒地。

五、蓄积力量

在西方，有许多有助于突发一场阶级斗争的客观力量正在蓄积着。其中有一些是暗中进行的，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一些则十分明显。当它们聚集起来的时候，它们能够在某一点上结合在一起，打破反动势力的锁链，解放出大工业中心和大城市中心产业

工人的郁积的力量。

最基本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那种使工人态度消极的繁荣，并不是正常的繁荣。这种繁荣大部分是以修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维持反动的统治和支离破碎的资本主义地区，以及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如果必须依靠这些事情（包括核武器、洲际导弹、毒气、毒菌的生产）来保证就业，那它根本是不健康的。工人们深深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它感到不安。尽管有着长期的繁荣，工人阶级仍然感到在经济上没有保障。一定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陷于失业，无论是由于裁员而引起的急剧的失业，还是由于自动化而造成的慢性失业。通货膨胀不断地在暗中降低工资收入，因而仅是争取维持生活水平就成了一项无尽无休的斗争了。在工作条件方面，情况也同样地不妙。除此以外，还有疾病和衰老的危险，这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因为美国虽然十分富足，可是它的社会福利是非常不够的。这些慢慢蓄积起来的经济压力怎样能够导致一场爆炸性的局势，1960年年底比利时的事例可以作出极好的说明。在那时，一个计划中的要更严峻地对待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纲领，引起了一场罢工浪潮，其规模和强烈程度甚至使政府都动摇了。

在美国，还没有工党，工人阶级觉得在重要问题上，他们的经济利益越来越要在政治舞台上加以解决，而政治舞台上却没有他们的代表和辩护人。这就不断引起了独立政治行动的问题。少数民族争取经济和社会平等地位的斗争，也倾向于采取政治的方向，并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一旦组织一个工党的推动力发生作用（在邻近的加拿大它已经发生了作用），它就能以非常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能走得很远。在英国，存在着一个有力的工党，由于没有独立的政策，由于在为工人阶级争取经济与社会利益的斗争中

缺乏战斗性，这就有助于这一政党的急进化，有助于使左翼倾向显露头角。西欧大部分共产党人和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也是如此。

殖民地世界的动荡，对于各帝国主义中心有着直接的经济影响。超额利润减少了，国外的赚钱企业被放在国家控制之下或甚至被国有化了。这不仅削弱了垄断资本家，而且也增加了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积累过多而闷塞的趋势。因此，除了资本主义在国内所面临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脱节现象。

无尽无休接连不断的起义，对于各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阶级，也有着一种累积的心理上的影响。那种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共产党阴谋”的不停的叫喊，已经骗不了人了。人们越来越觉得帝国主义的宣传家们是在说谎；不管关于“共产主义”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殖民地的人民必然有充分的理由按照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去想去做。

此外，殖民地国家的群众活动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的榜样。这种活动开始深入人心。它的力量，由于揭发和揶揄帝国主义，由于爆发例如用石头打尼克松之类的事件，由于直接求助于那种深深触及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心弦的同情心和支援，而又得到增强。这一事实已开始深深印入群众意识之中。

各殖民地和各帝国主义中心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改变，乃是“新现实”的显著特征之一。日本的情况就发生了最剧烈的变化。它所最积极经营的殖民地——华北——不仅赢得了自由，而且成为一个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已经感到小小的古巴的起义对于美国的影响的美国人，有条件来摹想巨大的中国的各种发展是怎样对它的邻国日本发生影响的。

在欧洲，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法国就受着接连不断的殖民地起义的打击。印度支那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的顽

强的英雄主义,对于法国工人不是没有影响的。法国的气候,尽管表面上很消沉,却决不适合于法西斯主义,1961年4月殖民主义者和军事阴谋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法国的政策是不断向右转的,但是,当一长串的殖民地起义最后跨过地中海并鼓动起法国工人的激情的时候,这种趋势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倒转过来。在比国,刚果的丧失马上使阶级关系尖锐起来,因为这时资本家们仍想用他们惯常使用的方法,要靠牺牲工人来维持他们的财产。不列颠帝国的解体(现在在非洲正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对英国将发生同样的最后影响;不管这一世界上政治手腕最圆滑的统治阶级手中有是什么样的聪明办法,事情总是如此。

说到美国,古巴只不过是一个先兆,说明拉丁美洲的各个民族都准备不顾华尔街的“门罗主义”,而提出他们自己的民族独立和经济解放主义。在从下加利福尼亚直到巴塔哥尼亚这一广阔区域内的这种革命过程,必然会不断地摇醒美国工人的昏睡,如果他们还没有被其他事件所唤醒的话。

苏联的成就也深深渗入群众的意识之中。最初,在美国人看来,苏联居然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复制了一套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一般都认为这种成就一定是由于“间谍偷窃了秘密”而得到的。当苏联的技术很快地发展了氢弹时,这种愚昧的想法就动摇了。当苏联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了轨道,进而要击中月球,拍摄月球另一面的照片,发送一只空间船到太阳和金星去,最后把第一个人送到轨道上围绕着地球转的时候,这一愚昧的想法就完全垮台了。在世界市场的某些地区里,苏联甚至也开始对美帝国主义挑战。例如,石油垄断资本家们就诉苦说,在许多地区(包括西欧),苏联有以低价和他们竞争的能力。这些成就有助于使重实效的美国人相信计划经济的潜力。一个直到1917年才

推翻封建的沙皇统治，遭受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内战、三次入侵的灾难，并且受到官僚主义错误管理和各种极权主义措施的妨害的国家，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居然在世界的技术战线上居于领先地位；这除了用计划经济的潜力来解释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苏联在群众教育、公共卫生和体育方面也获得了同样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殖民地人民的影响，乃是资本主义报刊经常关心的主题。更有眼光的编辑可能更关心这一事实：西欧的工人，甚至美国的工人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苏联的这种成就。计划经济一定要万古长青；它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已深深渗入帝国主义地区广大工人的思想之中，不管他们有什么关于苏联地区缺乏民主的保留意见。

最后，核战争的威胁使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能安心。的确，由于没有阻止这种趋势的有效办法，有很多人都力图把他们对于这种双方显示自己能够用多么快的速度向对方发送大量氢弹的竞赛的恐怖心，排除在思想意识之外。但是，恐怖仍然存在着；而且每隔不几天，各种通信工具就会通过关于这种那种战斗活动的报道，把它提到表面上来。像爱因斯坦、施魏策、罗素这类人物，以及第一流的核物理学家，都明白表示他们非常关心这一危险的严重性。

这种恐怖和不安，导致了许许多多次越来越大的反对核战争的示威。这些示威是在和平主义者领导之下开始的。和平主义领导者企图把这种抗议变成对各大强国的恳求，恳求他们加以注意并改过自新。这种目标是空想的，但是争取和平的示威者的希望却不是空想的。像许多其他开始时好像很和缓而无害的社会抗议运动一样，这种反对核战争的示威也能够逐渐激烈化，并采取战斗的阶级形式。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成千上万的母亲也列队游行。妇女成

群地出现在政治活动的舞台上，一向就是群众革命激情高涨的一个标志。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绝大多数参加者都很年青，而且他们都献身于和平事业。

六、青年人的重要性

革命主要是靠青年人来进行的。战后的一代人似乎注定要进行人类历史中最大的革命。许多人在像 1948 年波哥大那次大示威，或像 1945—1957 年那些席卷西欧的大示威里，已经受到革命的洗礼。更年青的一些人于 1958 年和 1959 年在古巴，或在去年日本、南朝鲜和土耳其的群众活动中，也活跃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先兆，说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今天美国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中，新的一代正在恢复美国的激进主义。

全世界的学校里都生气勃勃，流行着各种新的思潮。在这里，知识分子——这是测量社会气压升降的灵敏的风雨表——和学生们一起探索真理。在这里，在思想战线上，人们在一些关于常常显得和当前阶级斗争关系不大的问题的论证和争辩中，预先讨论到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斗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直接会涉及战争与和平、争取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等问题。讨论势必导致行动，这种趋势由于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而更为加强了。在学生主持下开始的行动，总会由远远更为有力的人们接着进行下去。匈牙利工人起义以及古巴革命都是先从知识分子骚动和学校中有反对意见开始，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征兆是出现了年青的社会主义者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急进派。例如，真嘎库仑运动中在政治上最活跃的人们，都热心学习马克思理论，包括托洛茨基主义。真嘎库仑运动

的发展,只是一种证据,它十分生动地说明:当新的一代理解了当代重要问题的意义,并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世界上将发生什么事情。

的确,也存在着一些危险的逆流,在美国尤其如此。在美国,像戈德华特青年协会和约翰·伯奇协会之类的反动的甚至带有法西斯思想的组织,已经有了发展。这些都是初期的阶级偏极化的症状。在和反动倾向作斗争时,青年人得到了政治锻炼,为以后的阶级斗争作了预备。

还需要注意的是青年人当中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产业工人中的新一代。当阶级斗争展开了前哨战,失业工人举行示威时,这些青年工人就将和过去一样,开始活动起来。青年的工人把他们的精力和成熟的工资收入者的见识结合在一起,并直接跟工业过程与老一代工人联系起来;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是完全能够掌握领导权的。他们在比利时总罢工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他们有着多么光明的前途。

七、寻求领导

任何数目的消极迹象——例如核战争的危險,富足的美国中的失业,种族歧视,亚、非、拉美特有的饥饿等等——都说明自从1924年革命的社会主义黯然失色以后,人类所面临的领导危机是十分深刻的。在这种危机的末日开始到来时,即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阶段,各种目的还处在半明半暗之中。那些按照历史逻辑顺序已被罢黜的领导们现在被推了出来;他们被迫去处理那些属于别的阶级的任务;但是他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给世界上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态,各种各样不三不四的办法,以及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大杂烩。例如,1938年墨西哥资产阶级政府沒收了石油工

业并把它放在工人管理之下。阿根廷的皮伦和印度的尼赫鲁都采用了五年计划。纳赛尔接管了苏伊士运河。现在最惊人的事件是古巴的革命：一个从一种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开始的领导，却信奉革命的辩证逻辑，而不信奉它自己的纲领的形式逻辑；并且最后在西半球建立起头一个工人国家，宣称它是所有拉丁美洲的榜样。

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有人宣称，这意味着不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或者，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至多只能更快速地和更有效率地完成必不可免的事情。即使如此，也不能证明不需要这样一种政党。要使人们不致陷入核战争的深渊，“快速”和“效率”可能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实在的情况是，这些事实最雄辩地说明，必须有一个像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9年开始建立起来的那种国际政党。这一国际政党是以各国的组织为基础的，而各国组织的根基则建筑在各自国家中群众运动之上，它们决定它们自己的领导人和发展方向。

人民群众，特别是殖民地的人民群众，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们的处境是糟不可言的。他们完全不能等到建立起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后才开始行动。由于除了作为一些细胞以外，还不存在这种政党，他们就遵循一条众所周知的政治法则，对于任何偶然站在当权的政党左方的全国性领导人，都加以拥护。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领导——这种缺乏是由于几十年来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背叛而造成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组织就占领了左翼地位，并且要比他们在受到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侧面攻击的情形下强大得多。因此，摩萨台能够取得政权并把英国的石油企业国有化，决不意味着伊朗的人民大众能够指望抄小路走而不必进行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作。正相反，这说明组织这种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需要它来保证迅速

而肯定的成功。摩萨台的垮台以及伊朗石油工业又回到英国殖民者手里,说明人民大众如果没有一个战斗的政党是多么脆弱。

即使是古巴的经验也不能取消这一结论。事实上,它大大加强了这一结论。古巴的领袖们是为生活本身所迫而承认:他们的革命并不是什么历史的例外,马克思主义同样适用于加勒比海。古巴革命的经验多么有力地说明问题啊!

伊朗的失败使得建党工作的前景暂时十分暗淡,与此相反,古巴的胜利马上照亮了这种前景。古巴带头在拉丁美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它也很可能在建党工作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古巴的情况说明,如果只是因为一个有革命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开始时带有小资产阶级看法,就取消这种组织,那该是多么大的错误。很明显,至少在一些殖民地国家里,这类组织乃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补充力量的来源。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由尼赫鲁、夸德罗斯和卡德纳斯为代表的那类民族主义——虽然当前有些力量,但提不出什么新的问题。列宁所制定的路线是,承认它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种盟军,但由于它的性质不可靠和常常变动,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信赖它。正确地说,现在世界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在某些地区中它的急进主义的发展——乃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帝国主义正在衰退,而为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

如果殖民地中种族主义的领导人有力量主要是由于缺乏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那么,社会民主党的继续存在和甚至复活,乃是由于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时代缺乏共产主义。从历史观点看,社会民主党当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了无产阶级时,就已经完结了。只是由于有战斗性的工人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它才好像又取

得一次新生命。但是无论在哪里它也没有打开什么新的局面。它只是继续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事情——把它的追随者的手脚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上，不管这种民主已衰败到什么程度。在德国，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以致这种政党公开地连马克思主义的门面都不要了。

然而，在有些国家里，由于有广大的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为基础，社会民主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在以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最右极的对面，是一些中间的和左的组织，它们在英国和比利时很有力量。社会民主党的这一部分，现在正处在动乱之中。凡是赞成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般党员，都在向左转。他们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都和右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感到左右为难。这种分裂反映着阶级关系更为尖锐了，这是阶级斗争一种新浪潮即将到来的预兆。左翼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最活动的部分一定会发现：即将发生的事情将大大加强他们目前走向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倾向。

在美国，社会民主党的规模、影响和力量都缩小了，因此它不得不退出选举活动。完全死硬了的右翼总是用铁腕来处理事物；然而，关于古巴革命的争论以及为它辩护的说法已经出现了，首先是在青年们中间。

在世界政治中，这种运动在共产党中和在共产党周围碰到的事情，要比社会民主党的最后命运远为重要得多，尽管后者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也十分重要。社会民主党和西方列强的保守的工会官僚们联系在一起，也抱有后者的基本看法及其根深蒂固的不愿意采取独立行动来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倾向。各国共产党则和各苏维埃国家的保守的官僚主义阶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和计划经济紧紧绑在一起。这一区别乍一看来似乎不大，实际上已证

明是一种有决定性的区别。

尽管几十年来，斯大林及其继承者曾努力要和资本主义统治者达成一种和解，来和工会官僚媲美，可是“和平共处”已证明是一种空想。原因之一是：虽然资本家发现工人领袖对于他们的统治是不可或缺的，可是他们不能在相同的基础上接受苏联的官僚机构。苏联的官僚机构是和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制度对资本主义是一种永远的威胁。只要苏联被孤立起来，罗斯福(比如说)就能和斯大林主义有利地共处。但是他们不能容忍一种扩张的苏联经济制度。整个资本家阶级，特别是美国的大资本家，把计划经济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加强和扩展，看做是一种致命的灾难。资本家们并不把计划经济和负责管理计划经济的人区分开来，不管后者是寄生虫般的靠着计划经济吃饭，还是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办法来保卫计划经济。美帝国主义专心致志于摧毁整个苏联制度(包括官僚机构在内)，力图把这些地区开辟为资本主义投资和剥削的场所。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当情况不妙的时候，苏联官僚机构的做法和西方工会官僚的做法，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德国的工会官僚屈服在法西斯主义的淫威之下而毫无怨言。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也同样抛弃了他们在德国的代表；但是当纳粹大举入侵、他们自己的脑袋也被放在断头台上的时候，他们就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并拚命地加以回击。其结果是非常成功的，这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得很清楚了。

但是，计划经济的发展也从另一方面对官僚机构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计划经济的成功最初会加强官僚机构，但最后会破坏它。正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主体本身健康越增强，对于寄生虫就越为不利。要理解“新现实”——即现在和斯大林时代的不同之点——必须记住这一点。

对于这种官僚机构来说，各种关系现在比以前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了。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国内工人阶级无论在数目上或在文化程度上都比以前强大得多。它的自信心和它的期望以及它急躁的心情都有所增长。斯大林死后，工人阶级就期望政府作一些大的让步，而它也得到了不少让步。在整个东欧，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都有同样的增强，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变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苏联在国际上不再是孤立的了。战胜德国帝国主义，席卷东欧，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在二十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圈——这种包围圈乃是官僚机构成长和得势的主要条件之一。战争疮痍的迅速恢复，以及那些使苏联成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的巨大成就，使得苏联手中掌握了许多崭新的外交武器。这就打破了官僚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即苏联在国际上的弱点。第三，计划经济扩展到其他国家，这在官僚机构内部造成了对抗的倾向。莫斯科不再能简单地制订法律而不考虑不同意见了；它必须考虑北京、贝尔格莱德、华沙等等的利益和意见。第四，殖民地革命的兴起引起了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从有机会促进“中立主义”起，到难于被除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魔鬼为止，这种魔鬼很可能在苏联造成一场争取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大运动。

苏联的官僚机构，在对国内作出让步时，从来没有忽略过真正的东西，即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和这一样，在国外，它是靠着牺牲革命斗争来维持它那通过“和平共处”来和帝国主义者打交道的政策和目的的。但是，在这一具有许多巨大压力、许多引人入胜的机会和许多可怕的危险的“新现实”中，苏联的官僚机构必须修改和转变它的路线。当然，在斯大林所做的转变和修改中，可以找到很多相同之处，但是不同之处是特别重要的。例如，1929年的向左

转是为那种由富农压力造成的组织危机所迫使然的，主要是想打击一下托洛茨基主义的左派反对党，这个反对党曾警告说要有来自富农的危险。赫鲁晓夫在1958年（正当他奉承人谄媚人的作法达到顶点的时候）开始的向左转，是为了避免来自左翼的包抄；但是它是为来自北京的压力所迫使然的，也是为阿尔及利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斗争的革命压力所迫使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向左转的后果和斯大林那时所要达到的后果可以是完全相反的。

莫斯科不断努力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之类的问题采取骑墙态度；即使这种作法也碰到斯大林在他统治的晚期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抵抗。掌握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它，而且这种反对十分有力，最后取得了一种以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援阿尔及利亚人为形式的让步。

在处理“顶端”问题方面，莫斯科现在也不像斯大林那样能够完全不受拘束。北京很有理由地不肯承认没有它的代表参加的最高会议，而且至少它已否决过一次拟议中的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的本性以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作用的问题，中国人的批评意见（不管他们的实际动机如何）轰传于各国共产党一般党员之间，且超出共产党党员的范围以外；这些批评意见已加深了克里姆林宫轨道内部的分歧。

所以，在过去十五年中我们所目击的情况是：计划经济扩展了；斯大林主义的独石柱得到暂时的加强，然后又破碎了。这在1956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了惊人的表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且承认这一暴君的许多罪行。

那种把思想意识统一起来的催眠术不灵了。例如，很多年来一直禁止派系活动的美国共产党，现在变得派系纷纭，莫衷一是。

他们证明不能有效地和旧领导相对抗，便转入各种不同的方向；有的人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大多数人在政治上表现消极，更糟的是，有的人参加了民主党，因为他们几年来就已经在那里替所谓的反垄断的候选人作工作了。在英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很多党员投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了。在匈牙利，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垮台乃是 1956 年发生工人变乱的一个主要因素。很有意义的是，很大一部分匈牙利共产党党员都转向无产阶级叛变者这一面，而且在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中占显著地位。

在一些国家中，共产党虽然还能团结一致，但是这种动荡也使得一般党员的心中要多做一些批判的思考。他们现在已准备要亲自评估各种情况和问题，对于各种其他急激派的立场，要根据是非曲直来加以判断，不再简单地把它们甩在一旁不加一顾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已经知道自己的知识有很多不足之处，而且在力图弥补这种不足时，甚至暗地里阅读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北京、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在其意识形态的争论中都觉得不能不提到“托洛茨基主义”（即使有时只是讽刺地提到，而在更多情况下是歪曲托洛茨基的真正立场），这一事实促进了上述的过程。正如托洛茨基早已预言的，在世界范围的改造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中，各国共产党的一般党员们必将提供某些最重要的力量。

现在还必得考虑到一种完全新的力量——古巴的革命及其领导。哈瓦那在整个拉丁美洲发挥了巨大的独立的影响。由于在四月间击溃了由白宫策动的入侵，古巴人的威望在世界范围内大大提高了。

和在其他地区里一样，在苏联地区里，这一说法也是适用的；在苏联地区里，古巴革命显得是西半球的政治的漫漫长夜中一盏

耀眼的明灯。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工人们是用多么感谢的眼光来看着这些勇敢的古巴人啊！在自从1945年起就挥舞着原子弹的帝国主义者鼻子底下，这些勇敢的古巴人居然在拉丁美洲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

古巴的革命使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特别是古巴的共产党，有一些值得深思的事情。少数坚决的革命者证明，群众是能够动员起来的，而且无需有莫斯科的批准就能取得政权。他们做到这点，并没有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的帮助，而且甚至是遭到它的反对的。这条绕过共产党的旁路，为整个世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说明在建立革命政党的工作中，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障碍是可能的。

它还表明了一些别的事情。其中之一是：殖民地的革命，在一种没有带上斯大林主义脚镣的领导之下，能够很快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另一件事情是：这种新领导的出现丝毫没有削弱苏联。相反地，它加强了计划经济的防御力量。它鲜明而生动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说法，即苏联的最好的防御力量在于把革命和计划经济扩展到新的地区去。对于加强苏联来说，赫鲁晓夫给予古巴革命的援助，要比多年来对帝国主义的“顶峰”谋求互相谅解的工作有用得多。

八、第四国际

列宁看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战斗的政党的必要性，并把它付诸实践；这种必要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后并未丝毫失却它的迫切性。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后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都只是更加证实列宁的看法是正确的。现在，在世界规模上集合起来的各种巨大力量，都打算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这样的政党。

我们手边已经有了一切有利因素。这些因素是：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阐明的基本纲领，革命成功的经验和严重失败的教训，强大的工人国家的存在，局势发展的越来越快，广大群众的急进化，阶级斗争的高潮，全世界革命斗争的风起云涌，帝国主义世界里的严重危机，斯大林主义的解体，在许多国家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激烈的不满情绪和他们争取断然改革的斗争，以及那种必然要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潮流的出现。

聚拢在第四国际周围的干部们都看到：在这困难的几十年里他们所十分顽强地保卫着的纲领和预测，都证明是正确的。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第四国际，即“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是于1938年在托洛茨基的指导之下成立的，那时正是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暗杀的前两年。托洛茨基断言，第三国际在1933年已经表明：当它在德国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在一起，允许希特勒上台而不作任何斗争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建立第四国际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它一直是第四国际的一个成员，直到美国政府通过一项反动立法迫使它退出这一组织。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仍然完全同情第四国际的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目标，并且一直以兄弟般的情谊密切关心它的繁荣昌盛。

第四国际力图使国际工人阶级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当代的主要问题，及其自己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使命。为了这一目的，第四国际首先是阐明事实的真相，不论这些真相是多么使人不快或暧昧不明。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它就尽其所能地认真观察问题并说老实话。为了这样做，它曾花过很大的代价，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折磨和迫害。在我们的时代里，要作真理的一个心口如一的代言人，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国际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教义并把它们应用到当代

现实上去的工作中，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并不把这些教义看做是圣经，而主要是把它们看做是一种生动的自我批评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虚怀若谷地看待那些要求我们对早已发现了的阶级斗争规律作新的评价的新事实。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不认为它自己是一个具有和整个工人阶级利益分离开来的利益的教派。它的利益就在于说清无产阶级的长期经验和历史目的，在于尽力所能及为目前斗争提供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它并不冒充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利权。它的贡献是以研究国际科学的最好的态度直率地提供出来的。它也以同样的态度研究别人的贡献。

从一开始，第四国际就面对着许多严重的困难。正如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说的，“在反动派得意扬扬、群众感到幻灭和疲惫的情况下，在由于工人阶级传统组织的腐坏而中毒的政治气氛中，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的中间，第四国际的发展必然是很慢的。中间派曾经不止一次地图谋把左翼统一在一起，他们的这些图谋是单独搞的，而且乍一看来既宽宏大量得多，也显得有希望得多。他们看不起我们的工作。但是，所有这些抱负不凡的图谋，甚至在人民群众还没有机会记住它们的名字之前，就化为泡影了。只有第四国际仍然顽强地、百折不挠地、而且越来越成功地逆流游泳。”

除了上述这些困难之外，第四国际还受到斯大林暗杀托洛茨基这一严重的打击。以后就是可怕的受迫害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许多著名的干部都在法西斯的毒气室和集中营里丧失了生命。在美国这个自命为“自由”世界的战士的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的领袖们是史密斯法案的首先的牺牲者。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主义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在所有大陆上赢

得了新的立足点。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托洛茨基思想的不可磨灭的性质。那就是：在帝国主义统治者看来，托洛茨基主义及其首尾一致的革命纲领，乃是他们的制度的致命的威胁；而莫斯科、北京和贝尔格莱德则发现，在我们的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影响之下，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已经不顾它们的反对而发生出来了。尤其使人注意的是，中国和古巴的革命在其主要路线方面，正是根据托洛茨基在很久以前确立的客观法则进行的。

现在，在许多国家内，人们对于托洛茨基、对于他的看法和贡献显然发生了新的兴趣。许多种他的著作已经出了新版，而且印数越来越多。最进步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理解到：不论一个人的态度如何，如果他不明白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意义，那就不可能完全了解今天的现实。

十分明显，复活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大规模地使托洛茨基主义原则普及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是，也必须坦率地承认，第四国际还面对着一种严重的内部危机，这种危机已经持续了许多年，而且是没有什么容易而即时可行的解决办法的。在这种危机中心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在这一国际中集中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1937年，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托洛茨基曾谈到这一现在使第四国际感到苦恼的问题，他说：“如果每一个党都自行其是，不征询别人的意见，也不服从根据民主原则作出的决定，那就不需要建立一个国际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国际建立一个中心机关来对各国的党发号施令，那就不需要有什么有智力的人，各国的党中只要有些机器人就够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实际政策，即中庸之道。”

无论这类内部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争端对于第四国际的机能起了多么不利的影响，在所有大陆上，仍然集合起很大一批干部。

在有些地方，这些干部人数很少，而且是孤立的。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扎下了深固的根基，在急进的工人运动中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已经建立起党的基础，这种基础在有利的条件下能够很快地发扬光大起来。

前面已经说过，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问题，在于把反资本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除了直接参加每一种这类斗争以外，还要在从思想意识方面把它们拉拢在一起的工作中，起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直到现在，第四国际的主要的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就在于这样一种纲领，这种纲领有意识地表明世界上所有三个部分的劳动人民的广泛利益，并把这些利益结合在一起。

在把这三个部分的斗争融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无疑可以证明：在一个区域中的比较拖长然而很巨大的胜利总是能够加速其他区域中的活动，从而能以更快的速度使它们更紧密地靠拢在一起。

在苏联区域里，生产力的成长率很高，使得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东西越来越比较丰富，这就增加了工人的要求。其前景是，各种条件将或多或少地稳步成熟，终将使得有可能排除官僚机构并恢复无产阶级民主。官僚机构是不会进行自我清算的；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好像也不会发生迅速的和早熟的爆炸。

在殖民地世界里，随着革命浪潮的扩展和加深，事变的发展要迅速得多。在这里，在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加纳这样还没有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困难问题。这里的任务是要突破这些限制，并采取 1917 年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以及现在中国和古巴的工人和农民所标明出来的道路。作为现在世界上最活跃的部分，今天的殖民地地区存在着最大的即时的革

命机会。

在工业发达的地区里，越来越深刻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正在搖撼着工人阶级，使它不再那么漠不关心和靜止不动。什么时候会发生急进化，是不能确切地加以预测的。只是十分明显，这种长期拖延的最后效果，一定会使这些斗争(当它们爆发的时候)在改变世界力量的均衡方面具有很大的深度、速度和决定意义。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赢得的每一个据点，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一定会有极大的扩展。在世界的这一部分里，应该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推荐的主要策略是，继续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保卫并宣扬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和建立列宁式的战斗的政党。

托洛茨基在 1940 年宣称：“资本主义世界是没有出路的，除非是把拖长临死时的痛苦看作是它的出路。它必须准备好很多年(如果不是很多代)的战争、起义、暂短的休战间奏曲、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一个年轻的革命的政党必须以这一远景作为自己的根据。历史一定会为它提供足够的机会和可能性，使它检查自己，积累经验，从而日趋成熟。先锋队员们融合得越迅速，流血的动乱时代就会越缩短，而我们这个地球所受的破坏就会越小。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站在无产阶级的前列，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解决的。事态发展速度和时间间隔问题确是十分重要；但是它既不能改变一般的历史前景，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政策的方向。结论是很简单的：必须以十倍的努力来继续进行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而第四国际的任务就在于此。”

事实已经非常有力地证实这一预测是完全正确的。建立自己的革命的政党，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时，出

现这种政党的客观条件，在现在也要比在 1940 年有利得多。各种迹象表明，一个伟大的革命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开始了。赢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这一历史使命，已经落到现在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一代人的身上。

七、二十五年之后

——第四国际委员会宣言（1963年7月）

第四国际从1938年成立以来，已经二十五年了，今天第四国际委员会再度肯定当时通过的基本纲领，即过渡纲领。

这个文献宣称，只有工人革命才能挽救人类。

纲领规定了工人阶级领导工作的危机所决定的时代的特点。纲领以工人阶级的需要为基础，着手把这个阶级从旧领导引入的泥坑里搭救出来，并引导它夺取国家政权。

过渡纲领是我们时代的重要文献之一。它之对二十世纪，犹如共产党宣言之对十九世纪，它是对世界资本主义主要趋向的一项分析，是世界工人阶级在整个一个时代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第二国际各政党的破产已由1914年的战争危机所暴露，虽然他们还掌握着工人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列宁建立的、代替它的第三国际已经在斯大林手里堕落成苏联官僚主义的外交政策工具。

在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曾遭到一系列背叛和失败。因此，需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

由此看来，创立第四国际的背景是一个倒下去的欧洲无产阶级。德国工人阶级是欧洲最强大的，被他们的领袖出卖以后，遭到了纳粹的蹂躏。

西班牙共和国被扼杀。莫斯科的审判，即斯大林堕落的最后表现，达到了一个可怕的高峰。

会议是在慕尼黑的阴影笼罩下召开的。

干部寥寥无几，组织涣散薄弱，大家意见分歧，莫衷一是。

托洛茨基灵敏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促成通过这个纲领和建立第四国际的，并不是这些主观缺点。最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历史事件。

托洛茨基看到，如果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危机不能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以前或战争期间加以解决，那末，就要利用革命的成果去解决。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纲领，革命的浪潮就要碰到帝国主义的岩石而破碎。这个纲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领袖来说，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

危机的二十五年

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过去了。这是一个经历过空前变革的时代。老朽的帝国灭亡了。新生的国家出现了。

被战争削弱的帝国主义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把旧的疆土交给像尼赫鲁、恩克鲁玛和本·贝拉这样一些新主人。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扩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企图修正过渡纲领的胆小鬼们、怀疑论者和印象主义者们一心认为，从1938年以来，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

有些人在战争结束时离开了第四国际的大厦，他们宣布在欧洲，战争的破坏、生产的瓦解、饥饿和混乱意味着：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条件，斗争已经倒退了几个世纪，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向后推延。

于是，当帝国主义通过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背叛在

欧洲重新奠定基础的时候，修正主义就戴上了一副新的假面具。

巴布洛领导的一种趋势在第四国际中有了发展，它对运动及其过渡纲领打上了一个问号。这种趋势所下的结论是：革命的情况会使各个领导人变成革命的，不管他们的出身来历和先前的发展如何。

它宣布，斯大林官僚主义不会再像战争以前那样背叛变节了。

为了反对修正主义者，1953年成立了国际委员会，目的是继承第一和第三国际的优良传统来建立一个第四国际，并且以过渡纲领为准则。

我们明确地宣布，只有一个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托洛茨基建立的第四国际——才能领导被压迫者推翻腐朽的帝国主义。它的纲领是以被压迫者在解放斗争中积累的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

任何其他领导都不能给人类指出一条出路。

帝国主义的危机

甚而曾被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过去的宣传所欺骗的社会民主派工人也看得出，帝国主义的腐朽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这些领导人本身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卖劲地贩卖这类奴言婢语的调子：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变了，“富裕”的和“充分就业”的社会可能实现了。

那怕在统治阶级某些阶层里，在信心方面也发生了危机，这就是英国托利党政治家们卷入臭名远扬的丑闻的一个原因。

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垄断势力增长得很快。每个国家都肩负着庞大的军事预算。

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腐朽预示着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名言，鲜明地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代证明了。

甚而在战争结束以前，在长崎和广岛投掷原子弹这件事实际上是第三次大战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这意味着对苏联的威胁。

资本主义市场的问题日益增多，因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由政府经营的经济组织，为各个垄断组织服务。

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下进行的所谓“技术革命”，现在正给劳动人民带来不幸的后果，即工人失业和贫困的一个永久性基础。

垄断资本主义在组织社会时给工人阶级提出的前景，正在最先进的“富裕”社会——美国——形成。充其量，这种前景对于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意味着勉强过得去的生活条件，但对其中大部分人来说，则仍然意味着贫困化和失业。

推翻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如果没有西欧、美国和日本工人的行动，是不能完成的。在过去三年中，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斗争。

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英国以及美国的政治斗争和工业斗争清楚地说明了：大国的工人运动，由于最近没有遭到惨重失败，将永远响应战斗性的领导。只是由于劳工官僚主义把持了工人组织，才使资本免于遭到失败。

由于欧洲经济不景气和再度出现大批失业人群，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尖锐得多的斗争。这种失业现象不是暂时的，而是现代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倾向的后果。

千百万不熟练工人正被永远地抛到废物堆里去。在每个国家里，受到影响并参加斗争的是受官僚主义控制最轻的年青一代。

空前规模的备战，一向是维持经济繁荣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同时又给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了沉重负担。

现在，由于人造卫星代替导弹成了主要武器，备战情况遂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对资本主义工业和财政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统

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工人阶级的坚定领导能够发动人们反对失业和战争，争取革命胜利。

反对官僚主义

劳工运动的官僚主义今天已变成帝国主义继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如果不分析劳工官僚主义（即斯大林的和社会主义派的官僚主义）的作用和历史意义、不进行不调和斗争来反掉官僚主义，那末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今天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在希腊、意大利和法国，忠于斯大林和苏联官僚主义利益的领导人们，打退了战后的斗争高潮，并且有意地背叛高潮。西欧的经济复兴是基于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造成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失败。

在历史的天秤上，西欧的失败比东欧资本家夺取政权所负的重量还大得多的多。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斯大林主义的基础是和平共处、通过议会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殖民地人民逐渐演进到自治。

大国的斯大林主义加倍地成了反革命，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因为它帮助镇压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法国和英国共产党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斯大林主义代表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官僚主义之一的利益，因而是改良主义中最虚伪和最系统的形式。

陶里亚蒂是一切官僚主义者中最虚伪的，他曾为改良意大利资本主义拟定了一个完整的纲领，这个纲领丝毫也没有触及国家的结构。

在其他先进的国家里，各个共产党的政策跟陶里亚蒂的改良主义原则也都是一致的。他们不主张工人夺取政权，而是主张资

产阶级的议会制度。

今天的“和平共处”更加成了一个有意欺骗群众、为帝国主义生存服务的公式。当帝国主义积蓄了最可怕的核弹头和弹道导弹的兵工厂之一的时候，当行星的每寸土地都被一颗人造卫星、一架U-2飞机和一艘美国军舰监视的时候，还有什么根据来相信和平策略能战胜帝国主义呢？

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连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衰落促使它采用一切军事冒险来侵略殖民地人民，例如在朝鲜、越南、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和古巴就是这样。

两大阵营掌握核武器并不意味着，像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恰恰相反，帝国主义一定要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

过渡纲领明确地声明，“唯一能避免或结束战争的裁军是由工人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这难道不是过去二十五年的教训吗？

苏联的官僚主义

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它在企图使自己适应战后形势、但又保持对苏联工人阶级的控制的时候，曾对“个人迷信”和“自由主义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只有那些甘愿当瞎子的人才看不到：它并没有解决苏联社会和斯大林运动中的任何一种基本矛盾。

战后斯大林主义的扩张已经使苏联的命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明显地听任世界命运来摆布。只有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工人领导并在这过程中消灭斯大林官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赫鲁晓夫呼吁跟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跟他过去的首脑会

议的政策一脉相承的，在去年 11 月讽刺性的“导弹”冒险以后允许帝国主义封锁古巴，是他背叛古巴革命的必然结果。

日内瓦首脑会议、戴维营会谈和巴黎首脑会议，丝毫没有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和和平事业。因而没有理由指望：在秘密外交失败后还会签成互不侵犯条约。

决定供应印度米格式战斗机来进攻中国的作法，说明苏联官僚主义今天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有多么远了。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动，这再一次证实了过渡纲领内容是正确的：“变成苏联一种反动力量的官僚主义，在世界舞台上无法扮演革命角色。”

官僚主义想与肯尼迪达成和平协议的奢望，是从反动的利益产生的，即从惩罚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中较开明的阶层产生的。它害怕俄国内部日益高涨的政治不安，比害怕帝国主义包围的威胁还厉害。

“在一国实现共产主义”，今天看来是一种不可能的和反动的空想，这只能是他们企图掩盖放弃世界其他地方共产主义政治的作法。

同时，面临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它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还需要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它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裁军协议，以便把资源从军事工业中转出来。

这样一种协议，可以冻结现状，也可以为官僚主义服务，因为官僚主义害怕地球上各角落闹革命，正如同它害怕俄国本土的工人阶级一样。

它准备支持任何一个似乎向这方向迈步的代理人，因此，它最近支持梵蒂冈和教皇约翰的通谕。

它准备同这一伙勾结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勾结的内容

包括放弃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支持。

苏 中 分 裂

1956年，中国共产党支持了赫鲁晓夫镇压匈牙利叛乱。他们在目前与莫斯科冲突中所持的立场，暴露出当时采取那一步骤是愚蠢的，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不当的。

赫鲁晓夫为了“胜利”到底，不得不把经济资源转到东欧去，停止支援中国。更重要的是，镇压匈牙利叛乱加强了赫鲁晓夫对帝国主义让步的右倾路线。

企图与帝国主义全面妥协和彻底修正全部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极端。

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分裂程度，反映了战后世界上斯大林主义的矛盾。中国领导人被迫自己摸索一些政策，来打开一条传播革命的道路。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革命，由于靠近太平洋，在战斗中必须把打击面直接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这种敌对情况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可是，赫鲁晓夫企图牺牲世界革命，达成协议的对象不是别人，恰恰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的领导人。因而从经验上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碰上了俄国官僚主义的反革命角色。

但是，中国人由于仍然受斯大林历史的束缚，无法找出处理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这种答案将是工人执政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党员所寻找的。现在，中苏分裂使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只有第四国际的独立革命路线，才能解释和解决这一问题。

反对修正主义

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运动就与修正主义的各种倾向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初期，修正主义所表现的，是城乡小资产阶级直接对工人运动的压力。

可是，今天，这种压力集中在劳工官僚主义身上了，因为这种官僚主义在不同程度上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世界帝国主义上层建筑合而为一了。

今天，修正主义者成了这样一帮人，他们使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适应现存的官僚主义领导，从而向资本主义的压力屈服。

今天，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否认或者低估国际工人阶级作为唯一能够解放全人类的独立的和革命的社会力量所起的作用。对这些人来说，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历史的主人，而是被历史所歧视的和消极的客体了。

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今天片刻也不能忽视修正主义思想和倾向。不仅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且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存在，只能开展一个反对修正主义的殊死斗争，才能得到保证。

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委员会拒绝参加巴布洛修正主义分子最近在意大利召开的“统一”会议的原因。

十年来，反对巴布洛修正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早期支持我们的一些欧美人士在过去十年间改变了对巴布洛和巴布洛主义的看法。我们没有改变看法。

巴布洛主义给我们在托洛茨基运动中提供了一种核心人物蜕化变质的新形式。

巴布洛主义出现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巴布洛及其伙从，当时和现在都代表一个失去阶级地位的小资产阶级集团，他们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沒有一点根基，不仅缺乏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修养，而且缺乏对托洛茨基主义传统和原则的尊重。

他们像伯恩汉和沙赫曼一样，被一些事件吓倒了。由于缺乏稳固的阶级根基，他们在碰到下边这些情况时很容易迷失方向：斯大林主义的传播、工人阶级的失败、社会民主主义的复活以及许多以前的殖民地区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

巴布洛分子无法了解世界帝国主义面临的危机的规模和复杂性，因而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说，世界面临了“蜕化的工人国家的世纪”的形势，原子战争就在眼前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的官僚主义会促进世界革命，欧美工人阶级在第三次大战爆发（可能在 1954 年）以前，不可能也不愿做任何事！

巴布洛及其集团为了把这种悲惨的前景强加在第四国际身上，进行了分裂活动，首先在 1952 年开除了国际共产党（法国）中的法国多数派，继而 1953 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表了“公开信”，从而使事态发展到了顶峰。

对工人阶级采取怀疑主义、对官僚主义采取奉承态度，乃是巴布洛主义的招牌。斯大林死后，巴布洛跟着多依彻，向全世界宣告：官僚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已经开始。

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过渡纲领，纲领写道：“**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进行起义——第四国际的党。**”

可是，巴布洛向他的国际组织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决议，恰恰砍掉了这一句。

历史已经对他的预测作了恰当的答复。

当东德工人起来反对乌布利希和苏联占领军的时候，巴布洛

拒绝要求撤除苏联军队，目的是为了不伤害工人的斗争！

1956年，巴布洛和他的国际秘书处又企图给苏联官僚机构涂上一层进步的色彩；说苏联政府11月30日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声明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只是在红军第二次粗暴干涉匈牙利事件的前四天！他们就这样地企图减轻苏联官僚机构的反革命作用，从而背叛了工人委员会的英勇反抗。

可是，巴布洛主义的最悲惨的影响在西欧已很明显。巴布洛集团还没有在西欧任何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革命党。相反，他们失掉了无数的机会，许多组织不是被解散，就是迷失了方向。

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巴布洛采用了特殊类型的入党主义的自杀战术，而这种战术是以“战争—革命”的同样自杀战略决定的。

他认为，工人们在战争时刻都会投奔他们的传统组织（此外，领导人们在工人的压力下也会变得革命），因此，他相信，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唯一问题是入党问题，但丝毫不触及官僚主义的领导人。

比利时总罢工的教训再一次证实我们的这种信念是正确的，即国际秘书处的战略和战术只会导致工作失败和士气低落。

当比利时资本家及其国家第一次严重挑战时，国际秘书处的人们不去领导工人为了争取政权进行独立的革命斗争，反而死心塌地地依附劳工官僚主义者的战略。从来没有提出过一项过渡要求。

社会党领导人的“结构改革”无法解放工人，而国际秘书处由于无批判地支持这些纲领性要求，把自己降低成社会民主党的附属品。纲领说：“他们根本无力了解政治形势并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这就是入党主义的真相。

巴布洛未能根据“革命中心”已转到殖民地世界以及殖民地国家的唯一革命力量是农民的“理论”在欧洲建立革命政党，而他却把没做到这点说成是合理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一种曲解，必须加以揭露和反对。

现在，这种“理论”已经完全应用在阿尔及利亚，本·贝拉无力地掌握着政权，一方面靠法国财政的支持，另一方面靠巴布洛的出谋献策。

弹压共产党、虚伪的选举、枪杀失业工人、逮捕布迪亚夫——所有这些事件和其他镇压手段不是巴布洛分子没有看到，就是被他们加以谅解；而政府的点滴改良却被他们大肆宣扬、百般夸张，程度之甚使人难以相信。

这就证明(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巴布洛修正主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死敌。他们放弃了建立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他们给带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权涂脂抹粉，并且模糊殖民财政资本的真正作用。

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保卫现状**，而是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没有工人阶级及其领导，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农民，像俄国革命所证明的，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是不能起领导作用和独立作用的。那些像巴布洛否认或歪曲这一普遍真理的人，都是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由巴布洛协助的(如果不说是策动的)机会主义蜕化的最有教训意义的例子，就是锡兰平等社会党。1954年，第四国际分裂的时候，这个党的领导人采取了暧昧不明的立场。

(可是，这事发生以前几个月，少数拥护巴布洛政策的人从平等社会党分裂出去了。然而，党的领导人拒绝对这次分裂作出任

何政治结论。)

针对这点，巴布洛积极鼓动平等社会党领导人采取机会主义路线，今天，这些领导人已放弃了革命主张，在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面前采取了最可耻的屈服立场。大家知道，1960年，平等社会党准备与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资产阶级的锡兰自由党组织联合政府。

这些领导人是一群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小资产阶级的骗子。如果谁不相信，那末就请他读读过渡纲领关于国际的任务的词句，并把这些词句跟平等社会党的政策对比一下。

“在任何人民战线里，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它立足之地。它不妥协地跟一切与资产阶级裙带系在一起的政治团体挑战……。”

国际委员会相信，平等社会党成千的忠实共产党员将会成功地重新肯定第四国际的原则和纲领，并澄清修正主义的党和肃清修正主义分子。

在美国，巴布洛主义出现得较晚，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却表现得相当恶劣。虽然，该党在1953年对巴布洛展开了斗争，并于1953—1954年对他的政策展开了无数次的批评，可是今天他们在实质上还是巴布洛政治路线的支持者，不过由于法律的原因，他们不能参加他的国际。

我们认为，这次退却的原因必须从下面情况中去找：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没有像托洛茨基时常敦促的那样发展、丰富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上的退步是与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突然的和剧烈的变化有关的，这一变化是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大变化。因此，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策对于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今天，美国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活动，我们认为，对于明天推翻帝国主义将起巨大作用，从而能解决我们行星上的重大问题。

可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古巴和黑人问题的政策却严重地和无法允许地违反了革命的职责。当联邦政府派军队到阿肯色和密西西比州强迫实行“统一”教育制度的时候，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是号召工人和黑人不要相信联邦的干涉，而要建立自己的民兵队伍，保卫少数民族的权利。

社会主义工人党不这样作，反而支持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政策，甚而批评他们步子太慢了！（今天准备侵略古巴的就是这支军队。）

此外，当对南方黑人展开了有组织的迫害时，社会主义工人党——与过去的一切作法和先例完全相反——却呼吁民主党政府给黑人议席！

我们认为，这种作法跟号召肯尼迪先生建立社会主义是同样荒唐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采取这种战术和口号不会推动黑人与劳工团结的事业，反而会使路德·金和马尔科姆之流的骗子手更加把持他们对黑人运动的控制。

社会主义工人党曾为古巴革命和保卫革命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当对于去年 11 月导弹危机应当公开表示意见的时候，党的领导人却不批评赫鲁晓夫的讽刺性策略，当时赫鲁晓夫试图利用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与肯尼迪举行一次首脑会议。

1962 年 11 月 9 日，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总书记道布斯同志在纽约市“战斗劳工讲台”上发表谈话时说过：

“在没有得到更多的事实以前，我认为，我们对导弹问题应当慎重考虑，理由有二：

(1) 对于危机的根本意义以及我們从中吸取教训来说,这并不是最有关系的。(原话如此!)

(2) 沒弄清全部真相,对战术问题作出仓促的判断是不很明智的。

我們应当像更进一步探究危机的教训那样来研究古巴问题的这个方面……”——(1962年冬季《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24卷第1期)

这种态度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朝鲜问题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采取的坚定态度有天渊之别,那时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沒掌握“全部事实”却正确地分析和斥责了克里姆林宫的反革命角色。

道布斯同志教我们“探究”、“研究”和“等待全部事实”。但是,最重要的事实是第四国际纲领明确规定的:

“共产国际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因而也就不能不同时背叛殖民地群众的解放斗争……宣扬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已经肯定地转移到第四国际手里了。”

世界各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任务,我们再重复一遍,就是揭露官僚主义的外交政策的讽刺性,以便使先进的工人可以更充分地准备在革命危机时期反对它——但是,我們任何时候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道歉。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部分人离开了阶级斗争和誓死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道路,这是理论混乱和政治停滞的征号。

只有一条路可以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死胡同里走出来。我们认为,坚决使党脱开“激进的环境”,而向工会、黑人、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少数民族,而最重要的是面向工人阶级的青年。

“只有青年人的充沛热情和进取精神,才能保证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只有他们的胜利,才能使老一辈中的优秀分子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过去是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过渡纲领》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对这一事实

的认识，即争取黑人平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必须与无情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相结合。

不管党内目前情况如何，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未来一段时期里将证明，各地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和欲望是正当的，他们的希望就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爆发美国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

国际委员会一向拥护第四国际的统一，反对分裂运动和损害干部的各种企图。最近在意大利召开的会议决不能被认为是“统一”的会议，而是 1953 年开始的分裂的政治继续。

第四国际的真正统一，只能通过坚持正确的方法、坚定的原则和一个久经考验的纲领才能实现。建立在混乱基础上的统一，乃是一根用散沙做成的绳子，因为它的基础不是建立一个与各种其他倾向作斗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领导的信念。

修正主义者说，“这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时代”。但是，这种天真愉快的白痴既没有信心，也没有乐观主义。它所表达的是那些把政策如意地适应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左派改良主义者的需要的人的态度。

巴布洛的国际毫无前途可言，因为它是以小资产阶级（一个毫无任何历史前途的社会集体）为基础的。我们对国际抱乐观态度，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进行的阶级斗争。

我们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时代，不是因为某些不可改变的进程使它如此，而是因为我们将根据坚定的、有原则的、自主地干预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建立一个世界的党。

建立第四国际的斗争是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第四国际要消灭那些骗子手、庸医和多事的道德教师。”

我们号召所有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领导的人、号召所有为过渡纲领而斗争的人、号召所有接受“建立会议”的基本建议（即领导的危机只有通过第四国际有觉悟的活动才能解决）的人进行下列几项工作：

努力把第四国际建设成唯一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运动。

在托洛茨基主义存在的各个国家里，把过渡纲领变为行动。

争取在1964年秋季召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会议。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1963年7月